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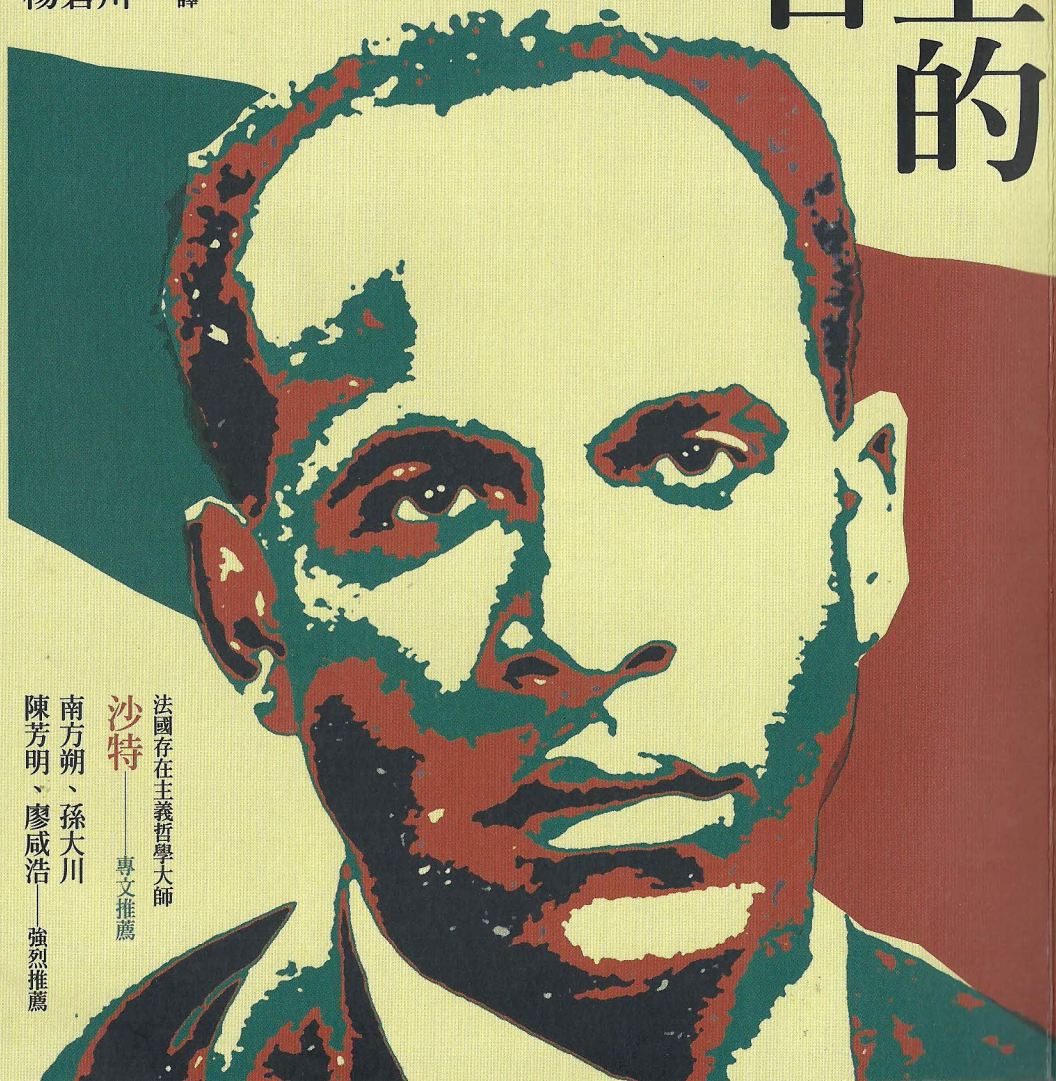
Frantz
Fanon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弗朗茲·法農——著

楊碧川——譯

大地上的
受苦者

二十世紀最出色的殖民主義批判者
以狂熱又熾烈的文字魅力
再次喚醒第三世界沉睡的靈魂



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大師

沙特

專文推薦

南方朔、孫大川

陳芳明、廖咸浩

強烈推薦

《大地上的受苦者》是弗朗茲·法農的最後一本著作。早在《黑皮膚，白面具》一書中，法農便提出對於種族主義的反思，他認為種族主義並非偶發事件，亦非恣意妄為，而是一種宰制的文化體系，這種體系也在殖民地運作。若是不看清統治文化所帶來的壓迫效應與奴役現象，那麼對於種族主義的抗爭便是徒然，因為這種壓迫的觸角廣及社團、政治與文化，甚至也會影響個體的精神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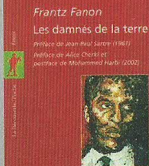
在全球化對弱勢地區已然形成新殖民剝削的今天，法農的諸多觀點，都能讓我們看清當前的許多現象，原是源自整個殖民主義／資本主義的淵藪。

法農的昨日之怒，是類似孟子「聞誅一夫紂，未聞弑君也」的義怒，是大丈夫不忍人之心「朝向他者」的承擔；是摩西抗拒繼續被奴役的命運，率領族人走出紅海的鬥爭；是耶穌在逾越節走進耶路撒冷，迎向暴力中心，全面和虛偽的世俗帝國決裂的大勇。

——孫大川（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這本書雖寫於二十世紀中期，但至今不失其時代意義。……世局之亂不是局部的恩怨情仇（包括台灣的統獨議題），而有更深的全球心理狀況，要深入這個心理的潛意識才能找到病源。這就是法農的意義：作為全球的精神科醫生，他在二十世紀中葉所作的診斷，迄今仍犀利透徹，直指當下許多問題（包括去年以來的全球性金融海嘯）的源頭，就看我們如何對症下藥了。

——廖咸浩（台灣大學外交系教授）



Master 036 心靈工坊出版 定價420元

弗朗茲·法農

Frantz Fanon

▼ 弗朗茲·法農是二十世紀最出色的後殖民主義論述先驅。1925年出生，1961年因血癌病逝。短短三十六年的一生，留下了四本完整的著作：《黑皮膚，白面具》、《阿爾及利亞革命第五年》（*L'an V de la révolution algérienne*）、《大地上的受苦者》，以及過世後出版的論文集《邁向非洲革命》（*Pour la révolution africaine*）。西蒙·波娃譽為當代最傑出的人物之一。

一生充滿悲劇的法農，誕生於加勒比海的法屬殖民地馬提尼克島，二次世界大戰中，他自願入伍，在激烈戰役中受重傷幾乎喪命。戰爭結束後，他到里昂大學攻讀精神醫學，遭遇了不可理解的經驗：他發現他的法國「同胞」因為他的黑皮膚而疏遠、歧視他，對戰爭中死對頭的義大利人的親熱程度，更遠甚於他。1952年，法農寫下了震驚黑人世界與歐美知識份子的經典之作《黑皮膚，白面具》。1953年，他到阿爾及利亞一所醫院工作，目睹殖民地的悲慘情狀，開始思索殖民主義。

法農思考殖民主義的主要工具之一，就是精神醫學。他從精神醫學裡習得了關於壓抑、認同、反彈發洩與人格扭曲等概念，以過人的洞見與創意，將這些原本處理個人、家庭關係的分析方法，擴大運用在集體的殖民與被殖民現象上，並對暴力重新詮釋。1961年，他飽受血癌折磨，仍在生命最後一刻，奮力寫出了至今仍極具影響力的《大地上的受苦者》。

譯者簡介

楊碧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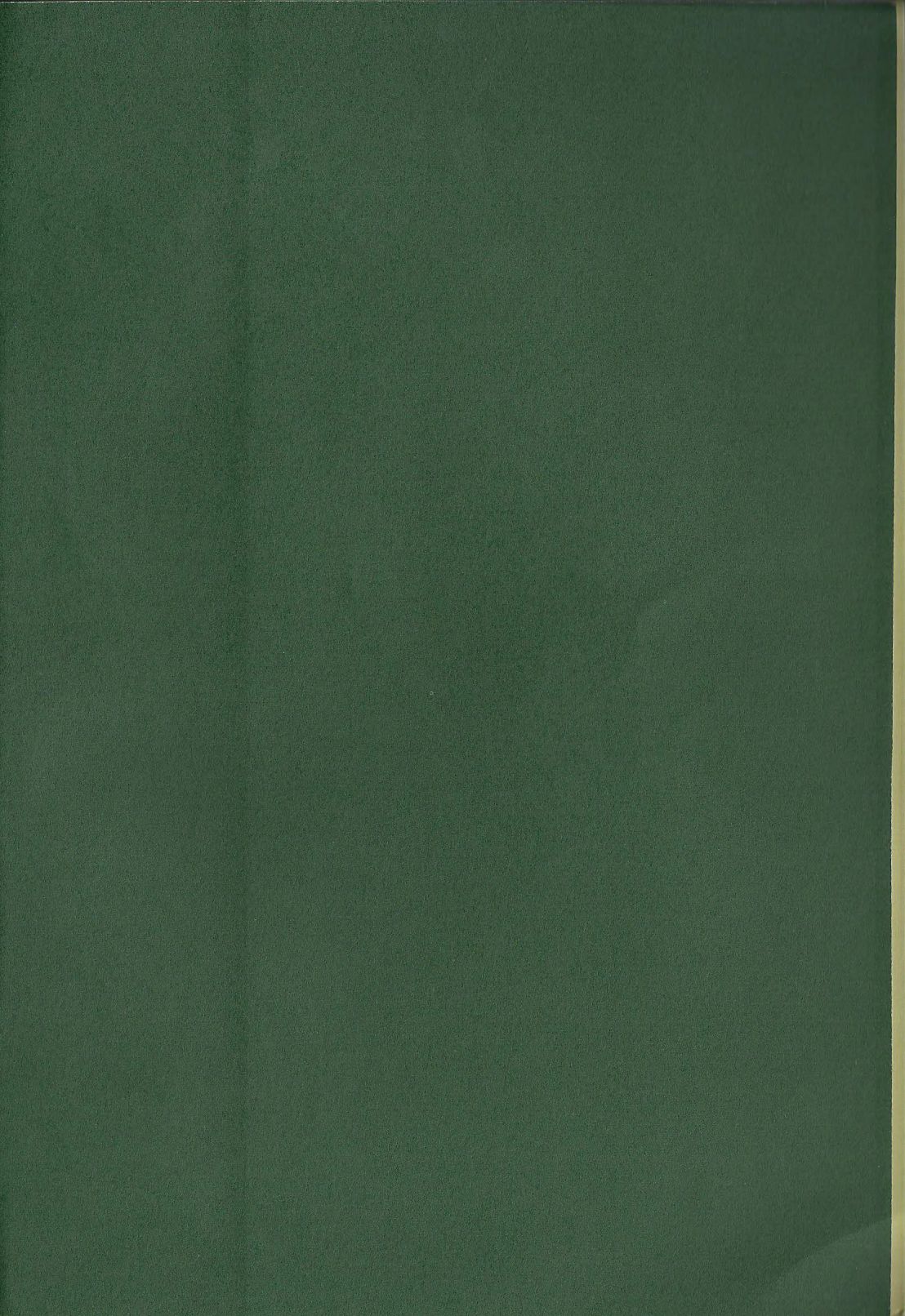
1949年生於新竹市，成長於台北市。私立東方中學畢業。1970-1977年坐政治牢，出獄後，打工、自修歷史。80年代起遊歷各大學向學生社團講介台灣歷史、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等主題。著有《簡明台灣史》、《世界史大辭典》、《台灣歷史辭典》、《台灣歷史年表》、《日據時代台灣人反抗史》、《後藤新平傳》、《陳獨秀傳》、《毛澤東傳》、《托洛茨基傳》、《史大林傳》、《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史》、《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史》、《西藏獨立》、《格瓦拉傳》等約30冊。

思想觀念的帶動者

文化現象的觀察者

本土經驗的整理者

生命故事的關懷者





Master

對於人類心理現象的描述與詮釋
有著源遠流長的古典主張，有著素簡華麗的現代議題
構築一座探究心靈活動的殿堂
我們在文字與閱讀中，找尋那奠基的源頭

大地上的
受苦者

F r a n t z
F a n o n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弗朗茲·法農——著
楊碧川——譯

【中文版推薦序】

昨日之怒

——閱讀法農《大地上的受苦者》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孫大川 (Paclabang danapan, 卑南族)

一、最後的法農

在一次和摯友艾莉絲·薛爾齊 (Alice Cherki) 的談話中，法農提到沙特的伴侶西蒙·德·波娃，說她是屬於那種懂得「節省自己精力的人」；薛爾齊因而回憶起法農生前常掛在嘴裡的口頭禪：「千萬不要節省自己的精力！」這種自我焚燒式的生活態度，在法農短暫生命（三十六歲）的最後一年，表現得更為淋漓盡致。一九六〇年底法農被診斷罹患棘手的「髓細胞性白血病」，他隨即在一九六一年初有莫斯科之行，尋求醫療救治。數星期後返回突尼斯，病情表面上似有好轉。然而，四月初，本身即是醫生的法農，可能有感於自己時日無多，向友人表達了強烈寫書的

意念，說是要針對非洲和阿爾及利亞的情勢提出一番省思。他開始每天催促著他的三位打字員，熱切地以口述的方式進行「書寫」；他甚至頑固地要求出版商能在當年九月出版他的新書，因為他說：「第三世界的政治圈都熱忱期待這本書的出現。」可見他多麼希望在他死亡之前，能夠總結他在阿爾及利亞和非洲的經驗，適時地提出他的觀察、期待、預測和憂慮。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日，法農將新書定名為《大地上的受業者》，並獲致他終身心儀的沙特為它寫序。這本書其實是法農所有的著作中，唯一真正由他選擇書名的書。十月中旬，法農終於被勸服遠赴他始終不願前往的美國就醫。去世前三天，他一位阿爾及利亞的朋友帶來剛出版的《大地上的受業者》。十二月六日，法農在病痛的折磨中逝世，無法充分得知世人對他最後一本書的反應和評價。

這樣一種壓縮在六、七個月的寫作計畫，死亡的陰影所鼓動的存在性烈火，注定了《大地上的受業者》這本書的性格與內容。熟悉法農書寫和語言表達形式的人，當然不會太驚訝於《大地上的受業者》所表現的法農式既狂熱又熾烈的文字魅力。但，由於這些文字幾乎都是在法農口述並迅速打字後便寄交出去的初稿，因而在文獻引證、事實分析、敘述邏輯和文詞修飾等方面，皆無暇做細膩的處理。關於這一點，法農本身顯然也意識到了。在給出版商的一封信裡，他坦承自己的敘述口吻太過激烈，卻苦於沒有更多的時間來修改。這種情況，在支持和反對法農的讀者群裡，當然分別產生了差距甚大的閱讀效果。而那些過激的言詞，也的確引發了甚至是自己長期摯

友的反感與失望。

法農在臨死之前，到底在想什麼？他的最後一本書到底想說什麼？一個知道自己時日無多的人，踢開種種修詞，他想給未來的世界傳達什麼樣的訊息？

二、暴力，作為停損點

《大地上的受苦者》全書除「結論」外，共分五章。讓我們從結論談起。

對大多數有教養的知識份子來說，本書結論中法農近乎歇斯底里式的反歐洲言論，不但刺耳而且令人崩潰。結論一開頭（頁三二一），法農就說：

「來吧，同胞們，最好現在就決定改絃易張！（略）」

必須離開夢境，拋棄之前那些陳舊信仰和友誼。我們不要把時間浪費在那些無效、冗長的敘述或令人厭惡的模仿上面。讓我們離棄這個歐洲吧，它一面叨叨不休的暢談人道，一面又到處屠殺它遇到的人類，（中略）幾個世紀以來，他們阻礙了其他人的進步，以自己的光榮和目的而奴役別人。幾個世紀以來，歐洲人假借『心靈探險』之名，窒息了大半的人類。看看今日的歐洲，擺盪在原子的分化解離和精神的解離之間。」

他接著把矛頭指向美國：

「兩個世紀前，一個舊的歐洲殖民地，即美國，決定趕上歐洲。它是那麼成功，卻變成一隻集歐洲的缺陷、毛病和不入道於一身的怪獸。」

將時空拉回到半個世紀前的阿爾及利亞和非洲，法農目睹且參與的世界，正是一個積極想擺脫歐洲殖民，尋求國族解放與國族獨立的激進時代。根據他親身的觀察和體會，「去殖民」所面對的最嚴峻的挑戰，並不是歐洲殖民者的船堅炮利、商品貨幣或宗教信仰，而是被殖民者在有意識、無意識間，不斷仿效、複製殖民「母國」的一切結構，成了她擺脫不掉的「母體」。對法農而言，歐洲的殖民主義乃是一種對「他者」徹底的系統性否定；他所造成的世界是一個將「他者」加以「排除」(excluded)，剝奪其做為「人」的屬性，令其「物件化」的冷酷力量。從人類整體的角度來看，我們對人的狀況的分析、對人的前途的規劃、對人與人關係的維繫，應該是以「全體」人類為對象。歐洲五百年來殖民全球的經驗與後果，暴露了他們的偏執、自戀與限度。法農因而鼓舞他深致期許的第三世界國家，擺脫長期以來不斷向歐洲模仿、納貢的心態；激發想像力，將目標定在嘗試去解決歐洲人未能給出答案、未能容納「他者」的困難問題上。

法農去世之前急著完成《大地上的受苦者》，大概就是因為他樂觀的以為他所努力促成的第

三世界，似乎預示了人類一個全新的可能性；而他也深信這本書所傳達的訊息、所提出的分析與提醒，正是第三世界的領袖們迫切需要的。

明白這一點，為我們掌握法農在他這本最後遺著的核心命題是非常有幫助的。這不但可以讓我們理解他反歐洲的立場，也可以讓我們重新評價他最引人爭議的有關「暴力」的論點。

歐洲殖民主義之所以要揚棄、超越，不完全是政經層次的問題。作為一位精神科醫生，法農更關切的是這當中所涉及的存有層次的問題。否定「他者」，即是將被殖民者「去人性化」，將其「動物化」，將其描述成一種「惡的精髓」；並使用一般動物學的語彙（狄、夷、番、蠻），來指稱被殖民者。法農說：殖民地是涇渭分明的摩尼教善惡二元論世界。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分別活在截然分割的兩個世界，無論在倫理、社經地位、環境條件等方面，皆有天壤之別。而為維持這二元世界的秩序，殖民者只能仰賴軍隊和警察所組織起來的結構性暴力。根據法農當時的經驗與觀察，當此一二元世界陷入極端失序之狀態時，被殖民者反殖民、反奴役、反異化的鬥爭，只能透過暴力的手段來終止。法農認為暴力之所以必要，恰是因為異化本身即是經由暴力而造成。沙特為本書所寫的那篇有名的序，就是順著這樣的理解將之發揮到極致。沙特響應地說：「被殖民者只有在用武力驅逐殖民者的同時，才治癒了自己的精神官能症。當他們發怒時，才又重新找回自己失去的意識之透明性，並在自我塑造的過程中認識了自己。」

一定是當時阿爾及利亞和非洲情勢的發展，給法農增添了信心與靈感。對他來說，「第三世

界」的團結雖然尚未完成，卻已是一個正在進行中的志業。因而在他臨終的最後幾個月，不僅嘗試明確指出被殖民者如何藉自我解放的暴力，建立自己的「停損點」；同時，他也絞盡心思提出一些方案和警告，希望能穩固、壯大他所預見的「新人」、「新國度」。首先，他敏銳且務實地理解到，只有「廣大鄉民」才具有決斷性的造反力量（第二章）；而知識份子與政治領導人，也只有深入體察「廣大鄉民」的實際行動及生活訴求中，才能真正培養出脫離善惡二元論的辨別能力與責任感。法農強調國家獨立後，內部多元力量和人民力量的參與，倡導一種全面性的「權力分散」。不過，在理想圖畫的憧憬背後，法農毫不閃避提醒國族意識所可能帶來的厄運（第三章，頁一六九）。法農警告說：

「國族意識，若不是協調的凝聚了全體民眾內心深處所憧憬的生活，若不是來自人民的動員最具體、直接的結果，那它將只是個毫無內容、脆弱且粗糙的型態而已。我們在其中所發現的缺陷，充分說明了年輕的獨立國家為何容易從國族過渡到種族，從國家過渡到部落。正是這些裂縫，使人理解那些損害國族的飛躍發展和國族統一的倒退現象。以後我們將看到，會出現這樣的弱點以及其中涵蓋的嚴重危險性是一個歷史的結果：是因為落後國家的國族資產階級不能使民眾的實踐理性化，即缺乏理性。」

他接著從國族資產階級、地主、城市無產階級、買辦、公務員以及被神話化的領袖等方面，逐一分析並推測許多去殖民化國家在獨立之後所可能陷入的條條絕路。從第三世界國家事後發展的歷史來看，法農在一九六一年所做的預測、警告，不幸大都一一言中，準確得令人膽顫心寒。

三、存有的治癒

對法農而言，「去殖民」的志業既然必須觸及到人的存有層次，那麼我們要「去」掉的項目，當然就不只是「歐洲」，也不只是有關法政、經濟、社會等事務的框框架架。國族文化的創造力，也是去殖民鬥爭中重要的一環。法農不認為因為要去對抗殖民者的文化扭曲，而回頭去擁抱部落的舊慣習，那是被殖民文化人的懈怠。法農在討論「國族文化」時（頁二四六），露骨的說：

「因此，我們不該為了面對殖民主義的篡改、歪曲、貶抑的舉動，而滿足於專心關注人民的過去往事，只在往事中找尋一些要素。我們應該努力用和民眾同樣的節奏去進行鬥爭，以便確立未來，耕耘幼苗已經萌芽的土壤。國族文化不是那抽象的民眾主義所認定的、以為可以從中發現人民真實的那些民間傳說。它不是沉積下來的一堆沉澱物，即愈來愈遠離當前民眾現實的東西。國族文化是人民在思考層次上所作的整體努力，為了描述、正當化和歌頌一場民眾於其中能完成自我構成與自我維持的行動。因此，在落

後國家裡，國族文化應該是位於解放鬥爭的中心。那些還在以非洲黑人名義作戰，以這個文化名義反覆召開會議的非洲文化人，今天應該領悟到，他們的活動和作品，其實只是在核對一些文獻和比較一堆石棺罷了。」

就像在論暴力時一樣，暴力作為停損點，目的並不是為了要以暴制暴，而是為了要去開拓一個超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全新未來。對法農來說，文化戰鬥也必須遵循同樣的邏輯。在另一個段落裡（頁二三五），法農有更明白的陳述：

「人們在殖民主義眼前展示一些鮮為人知的文化瑰寶，永遠也不會使殖民主義感到慚愧。被殖民的知識份子憂心專注文化工作時，意識不到他正在借用占領者的技巧和語言；他滿足於把這些工具蓋上一個硬說自己是國族的印記，但卻奇怪的令人聯想到異國情調。經由文化作品回到人民身邊的被殖民知識份子，所作所為實際上卻像個外國人。有時候他毫不猶豫的運用方言，以表達他盡可能接近人民的意願；而他的見解、他所關心的，卻和祖國的男女所認識的具體狀況不一致。（中略）文化絕不像習慣那樣的半透明，文化完全避開一切簡單化。它本質上是和習慣相反的，習慣始終是一種文化的退化。希望黏附於傳統或恢復已被丟棄的傳統，這不僅是違反歷史，而且是違反人民。當

人民支持反抗不共戴天的殖民主義的武裝鬥爭，甚至是政治鬥爭時，傳統的意義改變了。（中略）在一個處於鬥爭階段的落後國家裡，傳統基本上是不穩定和有著離心傾向留下的痕跡。所以，這也是為何知識份子經常有著不合時宜的危險。」

這樣看來，「國族文化」在解放運動中的演化，既不可受制於殖民體制，也不應當退縮到一廂情願、自我催眠的自戀洞窟中。新凝聚的國族意識，鼓舞被殖民國家的文化人，嘗試探索文學、藝術新的主題和體裁，並向一個更具普世價值的新文化創作邁進。這些主張，其實早在一九五九年法農出席羅馬第二屆黑人作家暨藝術家國際研討會上即已提出，並幾乎一字不改收錄在《大地上的受苦者》的第四章裡。可見，法農對文藝戰線的重視。精神科醫學的訓練和在阿爾及利亞獨特的臨床經驗，讓法農相當敏銳的注意到：殖民體制中被殖民者因極度驚恐、壓抑，所產生的肉體亢奮和精神消耗。它不但可以翻轉成部落與部落之間的血腥屠殺，也可以退縮到傳統巫術文化中集體著魔、徹夜熱舞狂歡的歇斯底里狀態。問題的最後，因而還是要回到問題最初的根源——人的存有。反殖民的鬥爭，其實是對存有的治癒。

最能夠反駁說法農在寫《大地上的受苦者》時已淪為暴力的歌頌者、一個極端的好戰份子的指控，就在本書的最後一章（第五章）。法農以整章的篇幅，針對殖民地戰爭所造成的種種精神障礙，進行分析與診斷。他列舉個案分別從反應性失調症、酷刑後精神障礙、孤兒被拋棄症候群

和身心症症狀等四大類型，嘗試勾勒存有治癒的策略與計畫。他指出阿爾及利亞人的犯罪和暴力，不是神經系統組織的結果，也不是什麼性格上的特異，而是殖民環境的直接產物。他強調：完全解放，是有關人格全方位的解放。在這些精神病的診斷背後，充份流露了法農仁愛、慷慨、善良、深具人道精神和難以忍受不公正存在的個性，一如所有曾親近過他的人對他人格特質的見證。

四、朝向他者

一九六一年四月法農決定寫書，同時請友人跟沙特連絡，邀他寫序：「告訴他，每回我坐在桌前，總會想起他……。」八月，法農赴羅馬見到了沙特和西蒙·德·波娃。基本上，法農非常重視沙特對他的態度，這不完全是對他聲望的崇敬，其實也反映了法農對法國知識界既矛盾又難以割捨的情感。做為法屬西印度群島馬提尼克（Martinique）的黑白混血兒，法農說一口不帶腔調的純正法語，青少年時代也渴望有單純的法國認同。但，黑皮膚和阿爾及利亞的經驗，改變了他的想法和人生道路。即使如此，如果能得到像沙特這樣的法國大哲學家的公開支持，為他的革命志業、為他的思想和行動，無異是一種來自法國夢鄉強而有力的肯定。艾莉絲·薛爾齊在她的《黑色吶喊：法農肖像》（*Frantz Fanon: Portrait*）一書中，頗為生動地描述了法農當時的心境；而西蒙·德·波娃的回憶錄裡，也花了數頁的篇幅談到這一次的會面。

坦白說，法農和沙特之相互欣賞有其思想和時代背景上的因緣。不過，至少在暴力這件事情上，他們之間的確有著本質上的差異。表面看，法農無論在語言和表達方式上，幾乎與沙特同調。這或許是作為一個革命鬥士，無意識間不得不採取的語言姿態。然而一旦剝除那些激越的修詞，我們將立刻發現：法農在暴力論述的後面，充滿對「他者」的關愛與責任；而沙特暴力哲學的底層，卻是無底的深淵和虛無。台灣英年早逝的哲學家蔣年豐，在其最後遺稿《地藏王手記》裡，宣稱沙特、傅科、德勒茲、德希達等法國哲學家，都是當代的「幽冥大師」。從地藏王的眼中看，他們是鬼王，看到了「五濁惡世」裡的眾生相。蔣年豐判定地藏王是後現代的神祇，讓我們面對現實世界的真相：地獄、惡鬼與畜生。無獨有偶，二十世紀上半葉，隨著人類兩次毀滅性的大戰，以及對資本主義社會和科技文明的深度反省，人們愈來愈找不到我們「存有」或「意義」的根基。後現代的幽冥大師們，讓我們見到現代社會權力擠壓的「地獄相」（傅科），見到現代人慾海流蕩、消耗離散、吸毒恍惚、行屍走肉的「畜生相」（德勒茲），也見證現代生活餓鬼爭食、貪利拜物、幽靈遊魂、離經叛道的「惡鬼相」（沙特）。這些摻雜現象學、存在主義、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的法國思潮，依其充滿否定精神的哲學語彙，是非常容易和像法農這樣一位去殖民戰士的革命語言相應的。沙特生於一九〇五年，比起德勒茲等人足足大了二十多歲，卻共同受到第三世界左派思想和一九六八年學生運動的洗禮。沙特以他徹底遵循笛卡兒主義的哲學立場，強調人的個體自由，認為人除了他自己別無立法者；因而人毫無約束，必須為自己做出決

定，這是人的存在無可退讓的尊嚴。從這樣的角度出發，「他者」在沙特那裡，正好是令他作嘔的東西；「他者」必須被排除、被否定。除了孤零零的自我和他的自由意志外，一切盡歸虛無。這當然不可能是法農「去殖民」所要得到的結果，也不會是他《大地上的受苦者》立論的旨趣。據薛爾齊的回憶，法農當時的確沒有想過沙特的序到底會寫些什麼？為他來說，沙特答應寫序這件事本身，比序的內容還重要。薛爾齊甚至進一步描述說：法農似乎預感到自己將無法親自為書中的觀點辯護。事後證明，法農特別是在他有關暴力的主張，明顯受到沙特序文的誤導。

直截了當的說，法農的昨日之怒，是類似孟子「聞誅一夫紂，未聞弑君也」的義怒，是大丈夫不忍人之心「朝向他者」的承擔；是摩西抗拒繼續被奴役的命運，率領族人走出紅海的鬥爭；是耶穌在逾越節走進耶路撒冷，迎向暴力中心，全面和虛偽的世俗帝國決裂的大勇。他們的憤怒，都有一個共同的焦點：「他者」；他們將「他者」放在優先的位置，承認他們、擁抱他們。據說沙特在世的最後一年（一九八〇），曾與班尼·萊雅（Benny Lévy）有一場頗具爭議的訪談。班尼·萊雅早年是沙特的秘書，學生運動時期曾是一位激進的毛澤東主義者，後來受到猶太裔哲學家勒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的影響，擺脫了沙特存在主義的思想路線。訪談裡，班尼·萊雅似乎有意透露晚年沙特有「倫理」轉向的跡象。果真如此，若重新要求沙特為法農的書寫序，不知他又會寫成怎樣的內容？

五、被擺弄的受苦者

在《大地上的受苦者》裡，法農對暴力的行使是有它一定的條件的。「極端失序」的二元論僵局，雖然很難劃出一個明確的標準和界線；但以他在那個時候對阿爾及利亞和非洲各地國族建構現況的了解，應該有他一定的估計和判斷。半個世紀過去了，法農的憂慮依然存在，第三世界的情況仍有待改善。然而，殖民、後殖民，現代、後現代的理論生產，卻汗牛充棟、推陳出新，已經到了令人目不暇給的地步。以此名義召開的大大小小的會議，印製出來的一本又一本的論文，以及大學裡開出來的一堂又一堂的課程，早已將大地的受苦者遠遠拋棄——這些文化人嘴裡說出來的術語，沒有任何一句是他們聽得懂的語言。

殖民、被殖民也常被到處亂用，藉以掩飾另一個更不正義的暴行。台灣自一九七〇年代起，逐漸偏離雷震《自由中國》所代表的民主論述，將兩岸和島內的政治矛盾轉換成族群鬥爭；並在一個完全缺乏分析、檢別的情況下，籠統認定台灣從荷西時代、明清兩朝、日治時期到中華民國階段，皆是一連串被殖民的歷史，台灣人要當家做主，乃是本土化運動的終極目標。中華民國或台灣要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應該是合理的訴求。但是，它的理由不應當是台巴子如何如何或中國豬又如何如何的問題，更不是誰殖民誰的問題。從台灣原住民的角度說，這四百年來，不論是哪一個階段，原住民才是真正被殖民的受苦者。將近二十年前，我曾撰文反對台灣新興民族

論所謂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四大族群的分法，因為這不但會模糊掉原住民和漢人間的「民族」差異，更轉移四百年來漢人作為殖民者的事實與責任。每次看到一群漢人指責另一群漢人誰殖民了誰？誰又剝奪了誰的文化、語言和主體性？不禁覺得人生之荒謬，莫甚於此。法農在世，不知該幫誰說話？台灣思想界之貧困、缺乏遠見和創造力，可見一斑。

三十六歲的法農帶著對第三世界的憧憬過世了，而我也在三十六歲那一年投入原住民文化復興的志業。二十多年來，最令我感動的是我們似乎掌握了另一個文字工具（漢語），並大膽地介入台灣的書寫世界。我們拒絕再一次被消音，拒絕繼續在歷史中流浪。不過，我腦海中始終揮不掉法農一再提醒的話：文化本質上和習慣相反，習慣始終是一種文化的退化；試圖依附傳統或恢復已被超越的傳統，不僅違反歷史，也違背人民。這裡隱藏了一種敞開性，一種隨時迎接自己文化死亡的敞開性。當法農期待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化人，攜手邁向一個更具普世面向的新文化創造時，大概也懷著同樣的心情吧？！

【她序】

永遠追問的人（二〇〇二年）

精神科醫師、《黑色吶喊：法農肖像》作者
艾莉絲·薛爾齊（Alice Cherki）

《大地上的受苦者》一書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月底，由法國馬斯佩羅出版社（Editions François Maspero）出版，當時作者弗朗茲·法農罹患白血病，正在美國華府附近的貝塞斯達醫院與死神奮戰。為了避免一出版便被查封，這本書是在半隱密的狀態下很艱辛印刷出來的，但還是一發行便以「有害國家內部安全」的主要罪狀遭到查禁。這種情形早已發生在法農的上一本書《阿爾及利亞革命第五年》（*L'An V de la révolution algérienne*，一九五九年同樣由馬斯佩羅出版），其他一些有關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書籍亦同（比如：墨利斯·馬辛諾〔Maurice Maschino〕的《拒絕》〔*Le refus*〕，亨利·阿萊〔Henri Alleg〕的《問題》〔*La Question*〕）。這種查禁在當時是屢見不鮮的。

然而，這本書仍開始流通，並且在媒體引起極大的迴響。經過一番非常繁瑣的運送過程（甚

至繞道土耳其），法農終於在十二月三日收到一本樣書，另有一些剪報，其中包括一篇尚·丹尼耶爾（Jean Daniel）寫的長篇論述，發表於十一月三十日的《快訊》（*L'Express*），可以算是一篇褒揚的評論。法農讓人把這篇文章唸出來給他聽之後，說道：「沒錯，但這也不能喚回我的骨髓。」幾天後法農便與世長辭，日期是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當時他三十六歲。

精神醫學與政治之路

法農於一九二五年出生於馬提尼克島的法蘭西堡，來自一個富裕的小資產階級家庭，手足眾多，成長在一個老殖民世界裡，還沒開始對奴役的現象提出質疑。不過，法農倒是在十分年輕的時候，便參加了「第五部隊」（*Le bataillon V*）——由戴高樂主義力量（*Les Forces gaullistes*）整編的加勒比籍自願軍。參與這個活動的過程，培育了他的反抗意識，但也讓他體驗到層出不窮、無所不在的種族歧視。復員之後，他於一九四五年戴著十字軍勳章返回馬提尼克（頒給他勳章的人就是後來的沙隆將軍〔*Le général Salan*〕，他後來常說這是他和對方唯一有過交集的東西），通過高中會考並經常與埃梅·塞杰爾（*Aimé Césaire*）往來（他十分欣賞塞杰爾，不過當時已經很不認同對方的政治觀點）。彼時，塞杰爾選擇把馬提尼克視為屬於法國的一個省份。

很快的，法農來到法國，於里昂攻讀醫學。除了這門科目之外，他也非常熱愛哲學、人類學與戲劇，並且很早就投入精神醫學的專業。與此同時，他雖沒加入任何黨派，卻參與了所有反殖

民主主義的運動，還編輯了《達姆——達姆報》(Tam Tam)——一份屬於殖民地留學生的小期刊。特別是，一九五二年他在《思想》(Esprit)雜誌發表了第一篇文章〈北非症候群〉(Le syndrome nord-africain)，探討的是來自北非的勞工：這些人離鄉背井，承受著「每天每日都死去活來」的痛苦，和自己的原鄉切斷了聯繫，與他們的終極目標相距甚遠，成了一件給乒乓球兵兵扔掉的東西。

他在聖亞爾邦 (Saint-Alban) 精神病院待了十五個月，並認識一個很重要的人：托斯克爾 (Francois Tosquelle)，原籍西班牙的精神科醫師，也是一位反佛朗哥派的鬥士。這對法農之所以走上精神醫學這條路，以及他後來對於政治的投入，都是個關鍵性的過程。他在這裡得以從各個層面研究精神疾病，這裡是精神與肉體、歷史與社會結構的交會之所。一九五三年，他通過精神科醫師資格考，接著被派往阿爾及利亞的布里達 (Blida，阿爾及利亞布里達省省會) 精神病院。不過早在一九五二年，在弗郎西斯·瓊松 (Francis Jeanson) 的奔走下，法農的第一本著作《黑皮膚，白面具》已由法國門檻出版社 (Editions du Seuil) 出版。

在阿爾及利亞，他不僅發現自己與院方的傳統精神醫學格格不入，同時也不太認同阿爾及爾學派那些精神醫師對於「土著的原始狀態」的理論。他逐漸洞悉當時阿爾及利亞作為一個殖民地的現狀，隨即全力改造院裡的精神科，並負責引進他與托斯克爾共同實行的「社會治療法」。他因而不停修正醫護人員與精神病患之間的關係，他不僅和歐洲人，同時也 and 信奉回教的那些「土

著」一同試圖恢復他們的本土文化、他們的語言、他們的社會生活組織，亦即所有能夠形成意識的東西。這一場小型的精神醫學革命，獲得了醫護人員的贊同（他們絕大部分都很關心政治），同時也得到當地政治活動份子的認可。法農的名聲從此遠播。當時是一九五五年，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已然開打。

面對阿爾及利亞人追求獨立的希求，法國社會黨政府竟視若無睹，讓法農感到相當不解；此後他的反殖民主場愈來愈聞名。後來「阿爾及利亞之友」（*Amitiés algériennes*）的運動找上了法農：這是一個對政治犯家屬提供物質協助的人道主義協會，領導者是主張國家主義的政治活動份子，與占領布里附近那些基地的游擊份子有所聯繫。他們對法農的第一個請求，是要他負責醫療那些飽受精神錯亂之苦的游擊隊員。

就這樣，在精神醫學及政治活動的交替作用之下，法農投身於阿爾及利亞追求獨立的奮戰之中。一九五六年年底，在一封寫給總督侯貝爾·拉寇斯特（Robert Lacoste）的公開信裡，他辭掉了精神科醫師的職務；他在信中寫道，他已經無法解救某些人，「使他們等到應有的待遇，這是一個把剝奪人權及不平等和謀殺當成合法原則的國家，當地人在自己的國家裡永遠都是瘋子，生活在一種完全沒有人格的狀態下。」於是法農被趕出了阿爾及利亞。

接著，一九五七年的第一季，他在法國度過三個月的時光；雖然他堅信阿爾及利亞的獨立已然勢不可擋，然而旅居法國這段期間，這樣的立場卻沒獲得任何迴響。在阿爾及利亞國族解放陣

線 (Front de Liberation Nationale, FLN) 法國總會的幫助下，法農得以前往突尼斯——那裡是國族解放運動境外組織設置的地點。與法國正式決裂。

法農在突尼斯同時從事精神醫學及政治這兩種活動。後來他成為國族解放陣線的刊物《鬥士報》(El Moudjahid) 工作團隊的一員。他從內部親眼目睹國族解放陣線的所有矛盾之處，其中包括了政治代表和軍隊之間愈來愈嚴重的爭執。儘管經常大失所望，他仍舊繼續支持阿爾及利亞的解放運動，同時也是一位不斷創新的精神科醫師。他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愈來愈感到興趣，並於一九五九年底由阿爾及利亞共和國的臨時政府任命為黑色非洲的巡迴大使。那是非洲各國爭取獨立的年頭。法農成為一個貨真價實的巡迴大使，盡心盡力從加納趕至喀麥隆，從安哥拉趕至馬利，為真正的獨立而鼓吹戰鬥。他甚至還想出一條可行的路線，由馬利出發，穿越撒哈拉沙漠去和阿爾及利亞的反動份子會合。

然而一九六〇年十二月，法農於旅居突尼斯期間，發現自己罹患骨髓性白血病。他僅存一年的生命，並於這段時間寫了《大地上的受苦者》這本書。

爲受苦者所發的吶喊

這是唯一一本由他自己選擇書名的著作（而非由出版社決定）——身為醫師，他很清楚自己的病，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

法農與時間及死神展開一段真正的競賽，一邊還期望著要向外傳遞一個最後的訊息。傳遞給誰呢？給那些不幸的人。然而這裡指的，絕大部分已經不再是十九世紀末工業國家裡的那些無產階級，那些高唱著「起來吧，大地上受苦的人；起來吧，飢寒交迫的人」的無產階級。法農想要與之對話的，那些在大地上受苦的人，是指貧窮國家裡那些不幸的人，那些真正想要土地和麵包的人；彼時，西方世界的勞工階級大多有種族歧視，而且顯然對海外的人民一無所知，再加上殖民地能間接帶來一些利益，因此他們對這些殖民地的命運，都表現出某種程度的冷漠。

這本書並非經濟論述，亦非社會學或政治性的評論，而是對殖民地國家的現狀與變化所發出的呼籲，甚至可說是吶喊。在整本書中，法農著力研究政治、文化與個人的關係，而且很強調經濟、政治及文化等層面的控制對被殖民者產生的效應。他的分析，注重的是奴役制度的後果，對象不僅包括各種國族也包括個人，同時他也強調這些人要獲得解放的條件，首先在於個人的解放，亦即「人的去殖民化」。

《大地上的受苦者》是弗朗茲·法農的最後一本著作。他在一九五二年，年僅二十五歲時，便寫了《黑皮膚，白面具》；一九五九年寫的《阿爾及利亞革命第五年》，則是馬斯佩羅早期出版的書籍之一。此外他還發表了為數眾多的文章：包括先前已提過的〈北非症候群〉，以及一些相關精神醫學的文章，特別是一九五六年在第一次黑人作家與藝術家研討大會發表的〈種族歧視與文化〉；接著是〈文化與國族〉，於一九五九年在羅馬召開的第二次黑人作家大會上發表。在

所有這些文章當中，論據的推展並非建立於理論之上，而是以實務經驗作為基礎；這些經驗同時也是他思想發展的起始點。早在《黑皮膚，白面具》一書，關於種族主義的反思，便聚焦於某些文化片面宣告的文化統治：種族主義並非偶發事件，亦非恣意妄為，而是一種宰制的文化體系，這種體系也在殖民地運作。若是不看清統治文化所帶來的壓迫效應，那麼對於種族主義的抗爭便是徒然，因為這種壓迫的觸角廣及社團、政治與文化，甚至也會影響個體的精神狀態。

《大地上的受苦者》一書，持續對統治階層所造成的奴役現象提出上述質疑；這個統治階層，能同時使團體與個人在各自的變化中遭受破壞、有所轉變。本書提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關係的現況，也提出解放的條件，除了政治文化的解放，還要加上個人的解放，政治鬥爭更為激進。此外，最後兩個章節當中，一章是探討文化及建構國家的關係，另一章則是闡述阿爾及利亞戰爭所造成的心理創傷。

法農由自己的特殊經歷出發，從最貼身的故事寫到他投身其中的過程，而這樣的經驗也是他不得不書寫出來，並傳達給旁人知曉的。他的書寫依循著以下的脈動：組成本書的五個章節各有不同主題，一段一段，有如詩歌裡的段落，穿插嚴謹的分析，書寫的語言，總是企圖在意義之外，能促進了解，而非只是玩弄抽象觀念，正如同年輕的法農提到自己的第一本書《黑皮膚，白面具》時講的那樣。

有人曾經責備，也有權責備法農將不同文類及不同層次的論述混為一談（政治、文化及心理

分析），責備他援用了自己作為精神科醫師的經驗，將這些關於精神錯亂的素材引入政治領域。有人曾經責備過他的風格，認定他的文字很激情，而且極富預言色彩。然而，矛盾的是，這正是法農的現代性所在。作為一個精神科醫師，他苦難的主觀性經驗，使他與苦難的人直接接觸。

也有人責備他過於強調暴力。然而法農卻是由實地經驗得知對一個個體行使暴力所造成的後果：這個個體沒有出路，只會漸失人性，變成鐵石心腸，或充滿可怕的暴力衝動，終而付諸錯誤的行為。這種暴力，不應加以否定，而應該加以組織，進行解放鬥爭，從而超越暴力。在〈種族主義與文化〉一文，法農對自己的醫療行為做出如下結論：「占領者那種既扭曲又僵硬的文化，在解放之後，終於對另一個國族的文化開放（這個國族已經成為他們真正的兄弟）。這兩種文化能互相對立，也能彼此相長。〔……〕一旦將殖民統治永遠排除，決定包容不同文化的相對差異，就能找到普世共存的價值。」另外在《黑皮膚，白面具》一書，他也同樣提出這種存在於黑人世界與白人世界的超越：「這兩者必須脫離他們各自的祖先曾經有過的非人聲音，讓真正的溝通誕生。」這種超越的觀點，彼時，已存在於《大地上的受苦者》一書當中。雖然後來在政治鬥爭中變得更為激進。

法農當時很希望沙特能為這本書寫序，豈料過去這些年來，這篇精彩的序言竟比本書內文還擁有更多讀者。然而，那篇序文多少扭曲了法農的關懷和語調。這篇序言主要是寫給歐洲人看的，因而與書中內容並不是很協調。至於法農，他發表言論的對象，其實是除了歐洲人以外的所

有人，他是在跟他們談論未來，而在那個未來，他們終將超越「對他者的恐懼」。沙特的這篇序言尤其還誇大了法農對於暴力的分析。事實上，法農對暴力進行分析，沙特卻是在為暴力辯解，法農並未將暴力當作目的，而是視它為一種無可避免的過程。沙特的文字有時充滿鼓吹犯罪的口氣。比方如下的句子：「讀一讀法農的書吧！你們就會知道，被殖民者在無能為力的時候，殺人的瘋狂念頭，就是他們的集體無意識。」或者還有這一句：「殺死一個歐洲人，這是一舉兩得的——同時清除一個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一個人死了，一個自由人活下來。」這其實都削減了法農那些主張的真義，因為看起來這些句子要辯解的已經不再是暴力，而是個人的謀殺行為。它所辯解的已經是那種犯罪的行為，而不再是人人天生都有的暴力——這種暴力喚起了人類自身內可能存有的個性。法農當初閱讀沙特這篇序文時，並未做出任何評論，甚至還一反常態，保持極度的沉默。不過，他倒是給出版社寫了封信，希望將來時機成熟，能有機會說明自己的看法。

為被壓迫的人而戰

《大地上的受苦者》被視為七〇年代的指標性書籍，內容主要在探討第三世界主義，然而政治議題掩蓋了他對被壓迫者之所以精神錯亂所提出的強烈質疑，這本書隨即遭人遺忘，法農的全部作品也都被視為不合時宜。他的政治膽識關注的是一個已過去的去殖民化時代，因此也被視為陳腐過時，而他本身的期待也迫於現實而無法實現。那麼對於爭取解放的那一大群農民，法農是

否高估了他們的力量？我們可以發現，在當時阿爾及利亞爭取獨立的政治現狀中，大部分參與奮戰的鬥士皆為農民。別忘了法農所寫的是一個特定的歷史經驗。況且，在他看來，農民的活動力也能與革命的作用互相輝映，正如同他在本書第二章〈自發性的偉大與弱點〉解釋的那樣。

那麼他是否低估了宗教的力量？事實上，他所參與的阿爾及利亞解放運動，呈現出來的並不是一種回教徒的革命，反倒結合了各種不同潮流——一九五六年的蘇盟河（Sounnann）大會綱領，雖然發起人立場不同，但沒有特別強調宗教定於一尊，反而主張應該尊重多樣化的意見。法農曾呼籲那些正在進行去殖民化的國家革新，並要他們創造出一個全新的人，然而非洲國家後來的演變，不正否決了這樣的呼籲？此後在地緣政治上的發展，正好與他的期待背道而馳？事實上，這樣的發展，倒是證明了他所提出的那些警告並非憑空無據（請見第三章〈國族意識之厄運〉）。

法農分析的是一件偶發的事實，因此我們若是只把他的作品局限在當時的時代背景，沒有將之視為對於一切可能變革的呼籲，那麼他的著作就很容易被評為與時代脫節。難道由於他的期待並未實現，我們便認定他針對現實所提出的那些論點謬誤百出？我們都很明白，這個現實（其中包括暴力）在今日，已經不再是「殖民壓迫」或「第三世界的未來」，而是「愈來愈嚴重的不平等」、「南北之間愈來愈大的差異」、「被邊緣化」、「把人類物化」。

去殖民化運動及阿爾及利亞戰爭經過四十年後，在一個朝著全球化經濟的「強權」邁進的世

界裡，這個事實不斷出現在南／北的關係之中：浮上檯面的那種有計畫的腐敗，乃由非洲國家的政府一手安排，並由已開發世界的那些大型石油企業、醫藥企業及其他大公司一手促成。與此同時，對一切有害於民主解放運動、有害於人民主動參與政事的行為，這個已開發世界卻以不主動干涉作為藉口（尤其是以維持經濟帝國主義作為藉口），表現出無動於衷的態度，而那些民主解放運動及人民主動參與政事的行為，正是法農所鼓吹的，並使他從一個關心時事的精神科醫師，變身為政治活動份子，為那些被壓迫的人民而戰。

然而這件事實並不僅僅與那些所謂的「開發中國家」有所關聯。它同時也攸關所謂「已開發世界」裡愈來愈嚴重的不平等現象，在這個已開發世界，不幸的人必然生活不穩定或失業，他們的位置沒有任何前景——被排斥、被邊緣化。法農嚴詞批判這種現象，因為他不希望對每個人而言，生活都像「死到臨頭」一樣，每天每日苟延殘喘，使得生命看起來「並非朝氣蓬勃或方興未艾，而是不斷和無所不在的死神奮戰」。法農希望每一個人在他的歷史中都是主角，在政治上都是主動的參與者。

跨時代的思想論述

從盧安達到波士尼亞，從阿富汗到中東，連美洲與歐洲也不例外，處處都是分裂的世界，戰火綿延，血流成河，暴力事件層出不窮，那些國家對於它們所挑起的一切感到既震驚又憤懣，而

那些人民的暴力也導致一種沒有人性的惡性循環，使二十一世紀那些世代的思想、生活與未來都為之崩解，無論就個人或集體的層面來看都一樣。

現在還是有人在討論阿爾及利亞戰爭；曾經有三十五年的時間大家都把它稱為「事件」，如今終於為它正名了。大家又重新描述了那件事實，揭發那個酷刑。然而許多時事評論，對於當時敵對的那兩個陣營的暴行，各打五十板，卻忌談兩方的「不對稱武力」。對於當時那兩個彼此隔絕、拒絕溝通的世界，法農曾經針對它們的武力關係作出分析，而那種武力關係，在當今世上的許多地區，不是也依然存在？當那些已開發的社會與國家，發現自己的領土竟慘遭暴力威脅而感到震驚之際，他們心中的憤懣難道不會取代原有的理性？試想：當兩個世界之間無法締結任何條約，當透過對話而進行調停的空間關上大門，當實力較強的那個世界自詡為另一個世界的主人時，會有什麼結果？這可預見的前景，使法農憂心，並促使他撰寫《大地上的受苦者》，正是對於這個世界的先見之明。

法農也見到戰爭（其中也包括國族解放）所帶來的創傷性後果，造成無止境的後遺症，招來不斷重演的暴力及種族及身份認同的倒退。而這些倒退，貫穿二十世紀的歷史，並以一個既新穎又十分老舊的想法作為基礎，進入新世紀：將他人視為邪惡的化身，並自詡為善良的體現。這些景象，法農在《大地上的受苦者》一書分析殖民地的情勢時，便早已描述過：對殖民者而言，被殖民者就是邪惡的化身。除此之外，他還指出這種形勢在主觀層面所造成的毀滅性效應：被指為

邪惡的那一方，由於在他人的眼光下動彈不得，首先會感到極度羞愧，接著就會變成仇恨。這個過程與今日情況，出奇的相似。

因此，閱讀《大地上的受苦者》時，要先超越作者撰寫這本書時在歷史背景所受的限制，而且要根據我們的時代特性來解讀。這本書究竟為我們帶來什麼啟示？我們看到無論在南半球或北半球，因時代發展而受到遺棄的人愈來愈多，而且面對全球化的趨勢，被這個時代特性認定為「一無所有」的人，所受的屈辱及自卑也屢見不鮮：他們沒有祖國，沒有國土，而且也沒有家，沒有工作，沒有身份證，更沒有表達意見的權利。

所以閱讀或重讀《大地上的受苦者》一書，有助於了解這種對人的剝削會有什麼後果：暴力、種族與身份認同的倒退。然而除了書中強調的這些主題之外，法農的思想還有以下的時代性：當大家一方面否定對精神疾病與權力關係做唯物論式分析，另一方面，也否定存在主義或文化主義觀點（或從心理分析角度，將之視為一種與周遭環境完全隔離的主觀探險），法農卻很有遠見的，試圖建立起一個新的知識體系，將身體、語言及「他人」經驗，視為建構未來政治所不可或缺的主觀經驗。這種方式，其實與馬庫斯（Marcuse）學派的方法相去不遠，或者更深入來說，與維也納那些政治精神分析學家的研究課題也所差不遠——後者因二次世界大戰而被迫逃亡至美國，飽受排擠與壓迫。

因此，法農之所以能表現出一種偉大的時代性，並非偶然。藉由自己的出身及經歷，他見證發生於上個世紀的那些事件（他本身就是那些事件的主角之一），對抗那個時代不斷出現的創痛。

若從法農的生活及思想活動來看，他也是極具時代性的：在這個經濟全球化、排斥個體的時代裡，青年法農所寫的那句話，那句代表他所有思想活動的話：「啊！我的身體！讓我永遠做一個追問的人吧！」超越了我們稱之為意識形態垮台的那些東西，並在這個時代許多年輕人的心裡引起共鳴——無論他們講的是哪種語言，出生於何地。

【他序】

灼熱之聲（一九六一年）

法國思想家、作家、存在主義哲學大師

沙特 (Jean-Paul Sartre)

也不是那麼久以前，地球上有一二十五億居民，其中有五億人和十五億土著。那五億人掌握了「語言」(Verbe)，其餘的則借用它。在兩者之間，被收買的小君主、封建領土和一群假資產階級，則充當中間人。在殖民地，真實赤裸呈現；「宗主國」則偏愛將之蒙蔽；必須讓土著喜歡他們。某種程度上來說，就像愛母親那樣。歐洲的菁英們進行著製造優秀殖民土著的工程；我們選擇一些青年，用熾熱的烙鐵，在他們的額上烙上西方文化的原則，在他們的嘴裡塞進聲音的鉗口具，塞入一些麵糊般黏牙的豪言壯語；讓他們在宗主國短暫逗留後，再把他們送回老家，像是被仿製一般。這些生動的謊言對他們的弟兄已無太大的意義，謊言四處迴盪，從巴黎、倫敦、阿姆斯特丹，我們歐洲人高喊：「帕德嫩神廟！博愛！」而在非洲和亞洲的某些地方，有一些人一張口就是「帕德嫩，博愛」，這真是黃金時代。

黃金時代結束了，嘴兀自張著；黑皮膚和黃皮膚的聲音仍高談我們的人道主義，但卻只是為了譴責我們的無人道。我們傾聽著這些帶著尖酸、恭謙的陳述，並不感到不悅。首先，我們驕傲的驚嘆著：怎麼，他們自己能夠講話了？我們當初是怎麼栽培他們的！我們從不懷疑他們已接受了我們的理想，既然他們是在譴責我們背叛了這個理想；歐洲人對自己的任務深信不疑：把亞洲人希臘化，創造希臘拉丁黑人這個新品種。我們暗自補上很實際的一點：讓他們去叫吧！這樣會使他們好受些；會叫的狗不咬人。

另一個世代來了，改變了議題。他們的作家和詩人，以難以置信的耐心，試圖對我們解釋：我們的價值不適合他們的現實生活，他們既不能完全拋棄，也無法完全吸收這些價值。這大概是要說：「你們把我們變成怪物，你們的人道主義向我們聲稱是屬於全世界的，而你們所實施的種族主義卻將我們特殊化。」我們聽他們的嘮叨，內心十分坦然：殖民地的行政官不是花錢被雇用來唸黑格爾的〔譯註〕，而且他們也很少唸；但他們不需要透過這個哲學家就知道，不幸的意識會不斷深陷在自身的矛盾中，毫無效果可言。因此，讓我們使他們的不幸永遠延續下去，能從這困頓中脫身的，只有風。專家告訴我們，如果他們的呻吟中帶有幾分請願的影子，那將是要求完全合併。當然，我們是不可能答應這個要求的：正如你們所知，這就摧毀了建立在過度剝削基礎上的體制。但，只要在他們面前拿著這根胡蘿蔔就夠了，他們會加快的跑。至於叛亂，我們歐洲人可以安心：哪一個有覺悟的土著會去殺害歐洲的好兒女們，唯一的目的竟是要變成像他們一樣的

歐洲人？簡單來說，我們鼓勵這種憂鬱，我們覺得有時候把龔古爾獎（prix Goncourt）賜給黑人也不是件壞事。這是一九三九年以前的事。

一九六一年。聽好：「我們不要把時間浪費在那些無效、冗長的敘述或令人厭惡的模仿上面。讓我們離棄這個歐洲吧，它一面叨叨不休的暢談人道，一面又到處屠殺它所遇到的人類，在它自己街道的每個角落，也在世界的每個角落。幾個世紀以來……歐洲以『冒險精神』的名義，扼殺了大部分的人類。」這是一種嶄新的口氣，誰敢用這種口氣？一個非洲人，一個來自第三世界的人，從前的被殖民者。他補充說：「歐洲達到這樣的速度、瘋狂和無秩序……陷入深淵，最好趕快遠離這深淵。」換句話說，歐洲完蛋了。這是個難以啟齒的實情——我親愛的歐洲同胞們，難道不對嗎？但我們在骨子裡是信服的。

然而，必須要下一個但書。舉例來說，如果有個法國人對另一個法國人說：「我們完蛋了！」——據我所知，這種情況從一九三〇年起差不多天天發生——這是個激情的論述，灼燒著愛和狂怒，使說的人和他的同胞同在一缸水裡。然後通常他會再補充說：「除非……」大家都懂得下文：他的意思很清楚，別再犯錯了；如果他的建議沒有逐字被確實遵循，那麼國家只有走上分裂一途。總之，這些話是威脅帶著奉勸，並且因為這樣的話語是從國際間的相互主體性那裡迸發開來，也就更不令人感到震驚。相反的，當法農說歐洲走向自掘墳墓時，他不是發出警告，而是提出診斷。這位醫生並不宣告不治——人們已看到了奇蹟——也不開出治療的藥方。他從外面，根

據他所能收集到的症狀，指出她正瀕臨死亡。至於醫治她，不，在他腦海裡還有其他要操煩的事，他並不在乎她的死活。因此，他的書引起紛紛議論。如果你感到尷尬而開玩笑說：「他到底給我們寫了什麼呀？」那你就沒抓住這些爭議的真正本質：因為法農不是為你們而寫，他的作品——對別人來說是灼熱的——對你們而言卻是冷冰冰的。他在書中經常談論您們，但卻不對您們說話。黑人的龔古爾獎和黃種人的諾貝爾獎的時代結束了：被殖民者帶上桂冠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一個講法語的前土著，使這個語言折服於一些新的迫切要求；運用這個語言，並僅僅用來對被殖民者說：「所有落後國家的土著們，團結起來！」多大的降級！作為父親，過去我們是唯一的對話者，現在兒子們甚至不將我們視為是有資格的對話者了。我們只是他們論述的對象物。當然法農也順便提到我們那些惡名昭彰的罪行：塞提夫〔譯註2〕、河內、馬達加斯加，但他不浪費時間去譴責，他利用這些罪行。如果他揭穿了殖民主義的策略，那些使得移植民（colon）和宗主國民關係團結又對立的複雜伎倆，那是為了他的弟兄們，他的目的是教這些人挫敗我們。

因為他，第三世界發現了自己

總之，通過他的聲音，第三世界發現了自己，並為自己說話。我們知道世界本來就不是清一色的，也知道其中還有些被奴役的人民，有些獲得了假獨立，有些仍舊為爭取主權而戰鬥。最後，有些雖然獲得完全的自由，卻仍處在帝國主義侵略的威脅之下。這些差異源自殖民史，換句

話說，就是源自壓迫。這裡，母國滿足於付錢給她的封建領主，用分而治之創造一群完完全全的被殖民者資產階級（bourgeoisie de colonisés）；在別的地方，宗主國更是一箭雙鵰：殖民地既是剝削地又是移民地。因此，歐洲增加了分裂和對立的群體，製造一些階級，有時製造種族偏見，並千方百計挑起和增加被殖民社會的層級，法農並未隱瞞什麼。為了鬥爭我們，舊殖民地必須鬥爭自己，或者說，這兩者是誰也離不開誰的。在戰火中，一切內部障礙必須消融，無權的資產階級商人和買辦，具優勢的城市無產階級，住在貧民窟的流氓無產階級（lumpenproletariat），大家都應該站在農村大眾——真正的國族革命預備隊一邊，在殖民主義故意阻撓發展的這些地方，當農民起義造反，很快就出現一個激進的階級：他們承受赤裸裸的壓迫，比城市勞動者更加受苦受難，為了不致於餓死，除了打破所有的結構外，別無選擇。假如它勝利的話，這個國族革命將會是社會主義的；如果抑止了這股衝力，將是被殖民資產階級掌權，這個新國家儘管表面上是個主權國家，仍舊被帝國主義者掌控。喀坦加（Katanga）的例子足以說明這個問題。

因此，第三世界的團結尚未完成；這是還在進行的事業，在每個國家中，獨立前後，透過農民階級的指揮，所有的被殖民者團結起來。這就是法農對他的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弟兄們所闡述的：我們要就一起到處實現革命的社會主義，否則就被從前的暴君各個打倒。他什麼也不隱瞞，既不掩飾弱點，也不掩飾失和及騙局。這裡，運動出師不利；那裡，在令人耳目一新的成功後，運動失速了；在其他地方，運動停止了：如果想再搞運動，必須是農民們把資產階級拋入大

海。讀者要嚴格提防最危險的異化——領袖、個人崇拜和西方文化，要提防過去遙遠的非洲文化的重返；真正的文化就是革命，是趁熱鍛鑄出來的。法農高聲疾呼；我們作為歐洲人，我們可以理解他，證據就是手裡所拿著的他寫的書，他難道不怕強大的殖民勢力從他的率直中提取好處嗎？

不，他什麼也不怕。我們歐洲人的手段落伍了；這些手段有時可能延緩解放，但不能阻止解放。我們不要想像我們能調整自己的方法，新殖民主義——宗主國的懶人夢想——是虛無飄渺的空氣，「第三勢力」絕不存在，或者，倒不如說這是殖民主義賦予權利的資產階級謊言。我們的馬基雅維里主義〔譯註3〕不太有能力左右這個已經覺醒、並一個一個發現我們的謊言的世界了。殖民者只有一個依靠：武力。如果他們還有武力時，土著只有一個選擇：奴役或主權。法農並不在乎您讀過他的作品沒有，這又如何？他是向他的同胞們拆穿我們的老詭計，確信我們沒有備用的另一套。他是對著他們這樣說：歐洲把她的爪伸進我們的大陸，我們必須割斷她的爪子，直到她縮回去為止。時機對我們有利：在比塞大（Bizerte）、伊麗莎白維爾（Elizabethville）或在阿爾及利亞鄉村發生的事，全球都知道；集團吸納了反對派，彼此尊重，讓我們利用這種癱瘓狀態，讓我們進入歷史，讓我們的蜂湧而入，第一次將這段歷史變為全球性的。戰鬥吧！在沒有其他武器的情況下，用忍耐磨的刀就足夠了。

歐洲人，翻開這本書，融入書中吧！在黑夜中摸索幾步後，你會見到一些陌生人聚集在火堆旁，走過去，聽聽他們的講話，他們在討論你們那些商社和傭兵的命運。他們可能會看見你，但

仍舊繼續討論下去，甚至不刻意壓低嗓門。這種滿不在乎打擊了心弦：父親，黑暗的造物主，「你們的」造物主，是已死的靈魂。你們免除了祂們的光明，祂們只向你們說話，你們不用操煩去回答這個還魂屍。兒子們不知道你們，一堆火照亮了並溫暖了他們，這火可不是你們的；你們，在虔敬的距離，將會覺得自己偷偷摸摸，夜間活動，凍得半死。風水輪流轉，在這行將出現另一道曙光的黑暗中，你們才是幽靈。

在這種狀況下，你們會考慮把書扔出窗外。既然這本書不是為我們寫的，為什麼要讀它呢？那是為了兩個目的；第一，法農向他的同胞解釋你們，並且指出我們那異化的機器：好好利用這個良機，使你們在客觀的真實中發現自己。我們的受害者通過了創傷和鎖鍊認清了我們；這使他們的證言無可辯駁。只要受害者指出一切我們對他們所做的，就足以使我們認清自己對自己所做的。這有用嗎？有用，因為歐洲正瀕臨死亡的門口。但是，你們還是會說，我們是在母國生活的，而且我們也譴責她的暴力。的確，你們不是移殖民，但你們並不見得更好過。這些是你們的開路先鋒，是你們把他們派到海外去，他們讓你們變得富有；你們也曾警告過他們，如果他們讓血流得太多，你們就會矢口否認；就像一個國家，不管哪個國家都一樣，在海外豢養一批煽動者、挑釁者和間諜，一旦他們被抓到，國家即矢口否認。你們，如此的自由、人道，把對文化的熱愛甚至推向矯揉造作的程度；你們故意裝作忘了你們有殖民地，並用你們的名義在那裡進行屠殺。法農向他的同志們——向他們其中某些，尤其是太西化的人——揭露了母國居民和他們的殖

民地代理人是利害一致的。你們要拿出勇氣來讀這本書：因為，第一，它會令你們感到羞愧，而這種羞愧誠如馬克思（Karl Marx）所說的，是一種「革命的感情」。你們看，連我自己也不能擺脫主體性的幻象；我也是，會這樣告訴你們：「一切都完蛋了，除非……」作為歐洲人，我偷了敵人的書，把這本書變成治療歐洲的藥方。你們要好好利用這本書。

第二個理由是，如果你們撇開索黑爾^{〔譯註4〕}的法西斯主義的胡言亂語，你們會發現，從恩格斯（Engels）以來，法農是第一個揭示歷史發展的助產士。此外，不要以為是過於旺盛的血氣或童年的不幸遭遇，令他對暴力有什麼我不清楚的特殊愛好：他不過是讓自己成為局勢的翻譯者罷了。但這已足夠使他逐漸建立一套偽善的自由主義者向您們隱藏起來的辯證法，這辯證法造就我們的同時也造就了他。

上個世紀裡，中產階級把勞工看作是忌妒者，他們有一些粗俗的嗜好，放蕩不羈；但中產階級小心的把這些粗人納進我們的物種中，或至少把勞工當作自由人；換句話說，可以自由出賣勞動的人。在法國和英國，人道主義被宣稱是具有普遍性的。

強迫勞動則是完全相反的情況。沒有契約，除此之外，還必須恫嚇，因此滋生了壓迫。我們在海外的士兵拒絕母國的普同性，在人類中施加限制：既然沒有人能不把掠劫、奴役或殺害同類當成罪行，他們就確立了被殖民者不是人的同類的原則。我們的打擊力量被授與任務，把這種抽象的信念變成事實：下達命令把附屬國的居民降為高等猴子的水平，以正當化移殖民把他們當作

牛馬的事實。殖民暴力並非只為了嚇唬被奴役的人，使他們心存敬畏，更企圖使他們非人性化。為了清除他們的傳統，用我們的語言取代他們的母語，為了摧毀他們的文化而不把我們的文化給他們，把他們勞累得昏沉。他們挨餓、生病，如果還敢抗拒，那麼害怕會令他們繼續勞動；用槍瞄準農民；本國人民來到農民的土地上，用馬鞭強迫農民為他們耕種。一旦有人反抗，士兵就開槍打人，即成為一個死人；假如他退讓了，他即失去尊嚴，墮落，不再是個人。羞愧和害怕逐漸撕裂了他的性格，使這個人完全被瓦解。一些專家把事情辦得更加乾淨俐落，「心理作戰」可不是今天才建立的；洗腦也不是。然而，儘管如此大費周章，在任何地方都沒達到目的：在剛果，我們砍黑人的手，在安哥拉，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這完全是最近的事，我們在那裡把不滿者的嘴穿了洞，再用掛鎖鎖住他們的嘴巴。我並不認為把一個人變成牲畜是不可能的，我只是說，如果不使一個人變得十分虛弱，是達不到這種狀況的；只靠打罵絕對是不夠的，必須強化飢餓。這是奴役的麻煩之處：當我們把同類變成家畜時，我們降低他的收益，不論給他是否只有那一點點，飼養場的主人最終付出的代價比他賺到的更大。因此，殖民者不得不在訓練一半時停止，結果土著變成了既非人亦非動物。挨打、營養不良、生病、擔驚受怕，但這只到一定程度，他們都有著同樣的特徵，不管是黃皮膚、黑皮膚還是白皮膚：懶惰、狡猾、偷竊、只知道使用暴力。

可悲的殖民者，就這樣毫無保留，展現出矛盾。他必須像精靈所做的一樣，殺死他們欲意掠奪的對象，然而這卻不可能；他不是應該去剝削他們嗎？由於沒有把屠殺弄到種族滅絕，沒有把

人奴役到淪為家畜的地步，他不知所措了，操作逆轉，一個無情的邏輯甚至把他導向去殖民化（décolonisation）去。

但這不會立即發生。首先是歐洲人繼續統治。他失敗了，但還沒察覺到；他還不知道那些土著只是「假土著」而已；他在他們身上造成傷害，按照他的說法，是為了要消除或壓抑他們身上的惡。三代過後，他們有害的本能已不再出現了。什麼本能？那些促使奴隸去殺死主人的本能？他怎麼不承認是他自己的殘忍，反過來加在他們身上的呢？在這些被壓迫農民的野蠻中，他怎麼沒有發覺自己那殖民的野蠻，已經滲入他們渾身的毛孔，而無法治癒了呢？理由很簡單：這位桀傲不馴的歐洲人，已被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害怕失去權力沖昏了頭，渾然不記得自己從前是一個人，他以為自己是一根馬鞭或一支槍。他竟然認為把「劣等人種」馴服成家畜，是通過他們的條件反射而成功的。他忽略了人的記憶力，抹不掉的回憶；還有，特別是，他從未明白過一點：我們不會變成我們現在這個樣子，如果不是透過內心私密、極端的否定，否定人們在我們身上所做的。三代？從第二代起，兒子一剛睜開眼就看到他們的父親被鞭撻的光景。借用精神科醫生的話，他們是被「創傷化」的人們。終生如此。但是，這些不斷捲土重來的侵略非但不能使他們屈服，反而把他們拋進無法忍受的矛盾中，歐洲人遲早會為這種矛盾付出代價。從此，不管別人怎麼訓練他們，還是用羞辱、飢餓、痛苦來教訓他們，只會在他們身上引爆狂怒，其強度就跟施加在他們身上的壓迫力強度相等。你們說他們只知道暴力？當然，起初只是殖民者的暴力，但不久

就變成他們的暴力了；也就是說，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就像我們從鏡子裡照出自己的身影那樣。

你們不要搞錯，透過這種狂怒，這種憤怒和怨恨，這種經常想殺死我們的欲望，由於害怕鬆弛而經常繃緊的強勁的肌肉，他們變成是「人」；也透過殖民者，是他要他們成為幹粗活的人，反抗他的人。仇恨，盲目的仇恨儘管是抽象物，卻成為他們唯一的財富：這是主人挑起的，因為他想要讓他們變成動物，他想熄滅這種仇恨但卻失敗了，因為自己的利益而半途而廢；因此，假土著仍是人，由於壓迫者的權力和無能，在半土著的身上轉化成頑強拒絕淪為動物的條件。其餘的大家都知道，他們是懶鬼，怠工、奸詐小人、手腳不乾淨的人：這都是當然的囉；他們那微不足道的小盜竊，表明了一種尚無組織的反抗的開端。這還不夠；有些人赤手空拳地撲向槍口，這些人是他們的英雄；其他一些人則以殺死歐洲人來使自己變為成年人。他們被射殺，不論是土匪或殉道者，他們的痛苦都引起群眾的恐慌。

對，受到驚嚇，在這新階段，殖民地的暴力侵略使被殖民者的恐懼感內化了。由此，我說，他們不僅僅對我們用之不盡的侵略感到害怕，更害怕因此激起他們自己內心的狂怒。他們被卡在我們對準他們的槍口，和那從心底湧起、沒意識到的殺人欲望的嚇人衝動之間：因為，首先，這不是「他們的」暴力，而是我們歐洲人的、被反轉的暴力，持續增強並且將他們撕裂；而這些被壓迫者的第一個行動是，將那些會受他們的以及我們的道德譴責而不可言喻的怒火深深掩埋，而

這怒火只不過是他們人性的最後殘留。閱讀法農：您將會知道，在被殖民者感到無力的時刻，殺戮的瘋狂念頭是他們的集體潛意識。

一旦這種壓抑在心頭的狂怒無法宣洩，就會糾纏和蹂躪被壓迫者自己。為了擺脫它，他們竟然互相殘殺；由於沒有對抗真正敵人的能耐，各部落之間互相交戰，你們可以靠殖民政策維持他們的對立關係；同胞互相舉刀相向，還以為從此可以一勞永逸的摧毀他們那共同令人厭惡的可恥形象。然而，這些救贖的犧牲者也無法舒緩他們的嗜血飢渴；他們只有在變成我們的共犯時，才能自制地向機關槍前進：這個他們所排斥的去人性化，卻由於拒絕而更得以發展。在殖民者感到有趣的眼中，他們用超自然的壁壘互相提防，時而使古老和可怕的神話重現，時而用細緻的儀式互相束縛。就這樣，著魔的人遭受時時刻刻勒令他注意的儀式所束縛，以逃避深藏在內心的需求。他們跳舞，使自己有事幹而不聞著；這鬆弛了他們那痛苦而緊繃的肌肉，而且舞蹈悄悄地，不知不覺中使他們模仿大家說不出口的「NO」，和他們不敢犯的謀殺舉動。在某些地區，他們使出最後的一招：著魔。從前，這是單純宗教的事，是信徒與神聖事物結合的一種溝通行為，如今變成他們超越絕望和屈辱的武器：薩爾（譯註5），羅阿（譯註6）部落神社都降臨到他們身上，統治他們的暴力，把暴力消耗在鬼神附身之上，直至暴力枯竭。同時，這些上層人士保護他們，意思是說，被殖民者通過宗教來對抗殖民地的異化。由此產生的唯一結果是他們把這兩種異化、錯亂合一，而每種異化各自因對方而加強。在某些精神病當中，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幻覺者

天天幻想自己被凌辱，居然在某一天早晨聽到天使稱讚他的聲音，但是嘲笑聲也不斷出現；從此，嘲笑和讚賞互相交替。這是一種防禦，同時疾病的演化也走向終了：病人人格分裂，逐步走向癡呆。就那些嚴格挑出來的不幸者當中，我還要加上我已談過的另一種著魔——西洋文化。你會說，如果我是他們，相較之下，我會喜歡薩爾儀式甚於雅典古衛城。很好，這下您明白了。然而，因為你不是處於他們的地位，所以也不全然明白。還沒完全達到這個地步。否則，你會懂得他們別無選擇：他們兼而受之。兩個世界，導出兩種著魔：他們整夜跳舞，天亮後又急忙去教會做彌撒，分裂日復一日地增大。我們的敵人背叛他的兄弟並成為我們的共犯；他的兄弟也一樣。土著身份是由殖民者在被殖民者同意下，引進和維持下來的精神官能症。

既要求又同時否認人的境遇：矛盾是具爆炸性的。況且已爆發了，你們和我們一樣清楚這一點。我們生活在一點即燃的暴力時代，出生率的上升助長了糧食匱乏，新生的人要稍稍更擔心生存，而不是死亡，暴力的怒潮捲走了所有的障礙。在阿爾及利亞和安哥拉，我們一看到歐洲人就殺。這是個自食其果的時代，是暴力的第三期：暴力反過來轉向我們，打擊我們，然而我們仍舊無法理解那就是我們自己的暴力。「自由主義者」變呆了：他們承認我們對土著不夠禮貌，在可能範圍內給予他們某些權利，是更加明智和公正的。他們已不得允許土著，讓他們一批批，用不著推薦，就能進入那大門緊閉的俱樂部——我們這一族類裡；面對這個野蠻、瘋狂的暴怒，他們不比壞的殖民者更能倖免。國內的左翼十分尷尬：他們知道土著的真實狀況，深知他們受盡無情

的壓迫。左派並不譴責他們的叛亂，並深知那是由於我們幹盡了壞事所引爆的。但是，他們認為，一切總得有個限度：游擊隊員必須牢記，要表現出騎士的風度；這將是最好的方式，得以證明他們是「人」。有時候，左派申斥他們：「你們太過分了，我們將不再支持你們。」原住民根本不理他們：對於左派的支持，他們可以不屑一顧。他們一開始打仗，就立刻發現一個嚴峻的事實：我們都是半斤八兩，我們都曾利用過他們，不需要再證實些什麼，他們將不會給任何人什麼特別待遇。唯一的義務、唯一的目標就是：想盡一切辦法驅逐殖民主義。我們當中思慮最為謹慎者，迫不得已，已準備好要去承認接受這點。但是，他們無可避免在這場角力中，看見這些下等人，如何使用所有不人道的手段，才容得自己躋身屬於人的憲章當中。盡快賦予他們作為人的資格，使他們和平穩定下來是值得一試的。我們美麗的心靈是種族主義的。

這樣的心靈讀法農的書應該會有所收穫的；法農充分展示了，這種抑制不住的暴力既不是荒謬的暴風雨，不是野蠻本性的復活，更不是憎恨的效應；而是，人正在重新建構他自己。我想我們曾經了解這個真實，卻又把它忘了：任憑怎樣的溫柔，皆無法抹去暴力的痕跡，只有暴力自己才能摧毀這些痕跡。被殖民者只有在用武力驅逐殖民者的同時，才治癒了自己的精神官能症。當他們發怒時，才又重新找回自己失去的意識的透明性，並在自我塑造的過程中認識了自己。我們從遠處眺望，而把他們的戰爭當作是野蠻的勝利。但是，通過戰爭本身逐漸解放了戰士，逐步清除了戰士自身裡裡外外的殖民黑暗。戰爭從開始的那一刻起，即是無情的。要嘛你就一直害怕

受驚，要嚇就令人害怕；也就是說，陷入分崩離析、被造假的生活，或者重獲生命的統一。當農民接觸到槍枝時，古老的神話褪色了，禁令也一一被打破了。戰士的武器就是他的人道。因為，起義一開始，他就必須殺人，打死一個歐洲人，是一石二鳥之計，可同時消除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剩下的，是一個死人和一個自由人。倖存者第一次感受到腳下踏的祖國大地。在這一時刻，祖國離他不遠，他無論去哪裡，在哪裡都感覺到它，再也不那麼遙遠了，祖國和他的自由混為一體。但是，殖民地軍隊驚嚇之餘，又重新反擊：必須團結起來，否則只有被屠殺。部落的反目緩和下來，趨向消滅：首先，因為這種不和使革命陷於危險絕境，更深入來說，不和除了使暴力偏向對抗虛假的敵人之外，沒有任何效果。比方說在剛果，這種反目持續著，是因為殖民地代理人在維持的關係。祖國開始出現：對於每個弟兄而言，只要有戰鬥弟兄所在之地，祖國即無所不在。他們的同胞愛和對您的憎恨，是表裡一體的。他們殺敵人，也隨時被殺。法農向他的讀者指出「自發性」的局限，即組織化必然伴隨危險。但不管任務多麼艱鉅，在每個活動的進展中，革命意識深化了，盤根錯結的情緒消逝了。沒有人需要談什麼阿爾及利亞國族解放陣線士兵身上的從屬情結（*complexe de dépendance*）了。農民掙脫了雙眼的矇蔽，知道自己的需求；這些需求過去要他的命，但他試圖對其一無所知，現在他發現了它們，宛若是無止盡的索求。

在這種民眾暴力裡頭——長達五年，對阿爾及利亞人而言是八年——我們無法區別其中哪些屬於軍事的、社會的或政治的必要性。戰爭，哪怕是在提出指揮和責任的問題時，也將創造出和

平的新社會結構，這將成為和平時期首要出現的機構。在這裡我們看到了新傳統鑄造出來的人，在可怕的當前出生的孩子；在這裡，我們看到每天的戰火使他正當化，使他擁有即將誕生的權利，並且每日隨戰火誕生：隨著最後的殖民者被殺，搭船回老家或被同化，隨著少數種族消失，讓位給社會主義的友愛。但這還不夠，戰士們燒毀了階段；您認為他們面對母國人的水準，不會甘冒生命危險的。看看他的耐心啊：也許他有時夢想一個新的莫邊府〔譯註7〕；但您相信他們心裡不作如此打算：他只是個乞丐戰士，在貧困時奮戰，對抗擁有強大武力者。等待著決定性的勝利，經常，他什麼也不期待，卻把對手折磨得疲於奔命。但這樣一來，他自己的損失也是很可怕的；殖民地軍隊更加兇殘了：分區控制、掃蕩、強制集中監禁、報復性攻擊，女人和小孩都殺。戰士清楚這點：這個新人以結束來開始生命，他視自己為具有強大能力的死人。他將會被殺：他不但接受這個風險，而且深信必定會如此；這個具強大力量的死人失去了妻兒；他見過那麼多的垂死末日，他寧願戰死而不願苟且偷生；其他人可以從勝利中獲得好處，不是他：他太累了，但是，這種心靈疲憊產生了難以置信的勇氣。我們在死亡以及絕望中發現我們的人道，他卻是在超越了刑求和死亡外發現。我們掃了風；他變成颶風。作為暴力的產兒，他每一刻都從暴力中汲取了他的人道。我們靠他的犧牲而成了人，他成了我們之中的人。一個另類的人：更加優秀。

暴力，一個新時刻的出現

法農就此打住。他曾經指出道路：作為戰士們的代言人，他號召非洲大陸團結一致，對抗一切反目和地方山頭主義。他的目的達成了。如果他想全面描述去殖民的歷史現象，他就必須談到我們；這當然不是他的企圖。但是，當我們闖上這本書時，書由不得作者的初衷，而繼續影響我們。因為我們體驗到革命中人民的力量，而我們以武力來回擊。因此，一個新的暴力時刻出現了，這一次，是必須回到我們身上，因為暴力正在改變我們，隨著假土著經歷暴力而自我改變。每個人看要怎樣都行，以他想要的方式進行自我反省。但願他還有反省能力：因為，今天的歐洲，被所有針對它而來的打擊而震驚得茫然若失，在法國、比利時和英國，甚至只要稍微思考，就立刻成為殖民主義罪惡的共犯。這本書根本不需要序言，尤其它不是為我們寫的，所以更加不需要。然而，我卻為它寫了序言，為的是要把論證進行到底：我們也是，歐洲人，人家把我們給去殖民化了；也就是說，人家用血腥來剷除我們身上的移殖民。如果我們有勇氣，那就該看看我們自己，看看我們變成什麼樣子。

首先應該正視這個意想不到的景象，我們人道主義的脫衣舞表演。人道主義如今赤裸裸了，並不美好。它不過是一種欺騙的意識型態，美化了掠奪的正當性；它的溫柔言詞和矯揉造作不過是為我們的侵略做擔保。那些殖民者氣色很好，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劊子手。得了吧，如果你不

是受害者，那麼當你們投票選出來的政府，你們那些年輕弟兄為之服役的軍隊，在毫不猶豫也不感到內疚進行種族滅絕時，你們毫無疑問成為劊子手了。如果你們反過來選擇當受害者，而且冒險被關一、兩天，你們也只不過是選擇擺脫關係而已。你們擺脫不了：這關係必須承擔到底。嘗試理解這一點吧！如果暴力只是從今夜才開始，如果地球上從未存在過剝削和壓迫，也許「非暴力」的口號就可以平息爭執。但是，如果千百年的壓迫，決定了全部的體制，甚至是你的非暴力思想也是受這個前提限制，那麼，你們的消極被動態度只會把你們列入壓迫者的行列。

你們很清楚我們就是剝削者。你們也很清楚，我們掠奪了「新大陸」的黃金及金屬資源，搶奪了石油，把這些東西帶回老家。不無出色的成績：一些宮殿、教堂和偉大的工業城市出現；殖民地市場用來緩和或轉移經濟危險。歐洲富裕得淌出油水，向所有的居民許諾他們作為人的權利；然而，作為一個人，在我們這邊，就是殖民主義的共犯，因為大家都毫無例外享受了殖民剝削。這個肥胖而慘淡的大陸，終於以陷入法農恰當地稱作「自戀」中做結。科克托^{〔譯註8〕}對巴黎這個「每時每刻都在談論自己」的城市感到厭煩。歐洲又能幹什麼呢？還有那超歐洲的怪獸，北美洲呢？都在閒扯一些自由、平等、博愛、榮譽、祖國。這些並不妨礙我們抱持種族歧視的論述，骯髒的黑鬼、骯髒的猶太人、骯髒的阿拉伯人。一些寬容親切的自由派——總之是一批新殖民主義者——宣稱對這種矛盾感到震撼。然而，這些話不是錯誤就是自欺欺人。在我們歐洲，沒有什麼比人道的種族歧視主義更表裡一致的了：因為歐洲人只有通過製造一些奴隸和怪物，才能

使自己成為「人」。只要有土著的存在，這種欺騙就不被揭穿。我們以人類的名義宣稱一種抽象的普同性，而這個主張用來掩蓋現實上的操作：在大海的那一邊，有一群下等人種，他們多虧我們，才有可能在一千年以後終究達到我們的水準。簡單來說，我們把種族和菁英混為一談。

今天，土著們揭開了他的真相；這下我們那封閉的歐洲人俱樂部就露出馬腳了：這個俱樂部只屬於少數派的。還有更糟糕的，既然他人透過反抗我們成了人，看來我們是人類的敵人。菁英終於露出他們的本性：他們不過是一群土匪。我們那些寶貴的道德標準失去了它的翅膀，如果仔細審視這些，只會發現一堆沾滿血腥的價值。如果你們一定要舉個例子，那就回顧法國那些何等寬大的豪言壯語吧！我們真的寬宏大量嗎？那麼塞提夫呢？還有那奪走百萬餘名阿爾及利亞人性命的八年的殘忍戰爭呢？還有那電擊拷刑呢？但大家可要明白，人家並不譴責我們背叛了什麼使命，因為我們根本沒有什麼使命可言。受到質疑的是「寬大」本身；這個悅耳、漂亮的字眼只有一個含意：它那被授予的地位。面對眼前的這個人，新生的、解放了的人，沒有人有任何權力和優勢給別人什麼。大家各自享有所有的權利。而我們的族類，如果有天將被打造完成，將不是被定義為全地球的居民的總合，而是以地球上全體居民彼此互動而產生無盡的整體相互關係來定義的。我說到此為止，你們將會毫無困難的將工作了結；只消正視，當做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我們那些貴族氣派的美德：它們氣數已盡。這些道德又如何它在它所產生那些下等貴族中殘存？

幾年前，一位資產階級評論家——一位殖民主義者——只能找到這一點來捍衛西方：「我們

不是天使，但我們至少有些內疚。」好個真情告白！從前，我們的大陸還有別的浮標：帕德嫩神殿、大憲章、人權宣言或納粹的黨徽。如今，我們知道這些東西的價值是什麼了：我們不再假裝能從船難中自我解救，除了通過罪罪感，這個相當基督教的情感，來救贖我們自己。完了，真正完蛋了！歐洲到處在漏水，會發生什麼事呢？再簡單明白不過了，過去我們是歷史的主體，現在反過來成為（被動的）客體。權力關係逆轉，去殖民化已經開始；我們的傭兵能做的，只是推延去殖民地化的完成。

老「母國」仍必須為此大量砸錢，把所有兵力投入一場可以預想勢必失敗的戰爭。前阿爾及利亞總督布喬（Bugaud）製造出那樣值得懷疑的光榮的殖民殘酷，而在冒險的終點處，我們會發現，殘酷儘管增加十倍，卻仍舊不夠用。派遣部隊去阿爾及利亞，他們在那裡駐紮了七年卻一事無成。暴力改變了它的方向：我們過去是勝利者，我們使用暴力，但它似乎沒使我們改變：它使其他人瓦解，而我們，我們的人道主義，保持完好無傷；母國的人為了利潤而團結，把他們的犯罪共和體稱作博愛，稱作愛；今天，同樣的暴力，到處受阻，通過我們的士兵又回過頭來面對我們，內化了並控制了我們。退化開始：被殖民者重塑他自己，而我們，移殖民者，宗主國居民，不管是極端派和自由派，卻解體了。盛怒和害怕表露無遺：這呈現在阿爾及利亞的捕獵行動〔譯註9〕中。現在，野蠻人在哪裡？殘酷在哪裡？什麼都不缺，甚至不乏達姆達姆（tam-tams）鼓聲：當歐洲人活活燒死穆斯林時，這邊倒有汽車喇叭響起「法國的阿爾及利亞」的節奏。法農提

到，不久前，一些精神科醫生在會議中對土著的犯罪行為感到悲痛：他們說，這些人互相殘殺，很不正常；阿爾及利亞人的皮質層（cortex）一定很不發達。在中非，其他一些人則建立這樣的看法：「非洲人很少使用他的額葉（lobes frontaux）。」這些學者現在可能可以在歐洲繼續他們的調查，這對他們會有好處，尤其在法國人身上做調查。因為幾年以來，我們的額葉大概也同樣是機能低下的吧：愛國者有殺害同胞的行徑出現；趁他們不在時，炸掉他們的守門人和住宅。這不過是個開端：內戰預計在秋季或明年春天來臨。然而我們的皮質層似乎情況良好；倒不如說，是沒有擊潰原住民的能力，暴力回過頭來堆積在我們的內心深處，而要另找一個出口。阿爾及利亞人的團結造成了法國人的分裂。在遠離宗主國的整個土地上，那些土著跳著準備戰爭的舞蹈。恐怖離開了非洲而在歐洲扎根：有些十分天真的憤怒者，想要讓我們用血的代價償還曾經受土著擊敗的羞辱；然後，還有其他人，其他所有的人，同樣是有罪的——在比塞大事件，在九月的私刑後，誰上街去大叫：「夠了！」但他們比較沉著：自由主義者，那些慵懶的死硬左派份子。他們也頭腦發燒，怒氣沖天。但是他們多麼膽小怕事，只會用神話、複雜的儀式來掩飾自己的憤怒。為了拖延最後算帳和真相大白的時間，他們把一個大巫師按在我們的頭上，這個巫師的作用，是不惜一切代價把我們留在黑暗中。一事無成：有人宣揚暴力，有人要抑制暴力。暴力它在原地轉圈；某天在梅斯爆發，隔天則在波爾多；它從這，傳到那，這是在玩傳環遊戲。一步一步輪到我們被引向淪為土著的地步。但是要我們完全成為土著，則必須是我們的土地被從前的被殖

民者奪走，我們必須餓死方休。不會這樣的：不會，是那些喪失權力和地位的殖民主義控制了我們；是它，遲鈍又傲慢，不久將騎在我們頭上；它，就是我們的薩爾，我們的羅阿。

當你們在讀法農此書的最後一章時，會相信，寧可當一個土著，即使處在最悲慘的時刻，也勝過當以前的殖民者。一個警方公務員被迫每天十個小時去刑求人，並不好；他的精神會繃斷，除非我們禁止拷訊者，不准他們為自己私人的好處而超時工作。當我們想通過嚴格的法律來保護國家和軍隊的道德時，軍隊卻有系統的敗壞國家道德，這是不對的。沒有一個有著共和國傳統的國家，會把成千上萬的青年交給一些暴力的軍官。

我的同胞們，這不對，你們現在知道所有以我們的名義所犯下的罪行。你們對此不向任何人噙聲，甚至不敢對自己的靈魂噙聲，由於害怕對自己的評價。起先你們不知道，我想要去相信這點，你們半信半疑，現在你們知道了，卻始終保持沉默。八年的沉默，使人墮落！沒有用的：今天，酷刑那眩目的太陽升到了最高點，照亮整個國家。在普照的陽光下，再也沒有正義的爽朗笑聲，不再有哪一張臉不是塗上了脂粉來掩蓋憤怒或害怕，不再有哪一個行為不流露出我們的厭惡和共謀。今天，只消兩個法國人相遇，他們之間就有一具屍體。而當我們說「法國」的時候，從前，它是個國家的名稱；而在一九六一年，可要小心這會不會是一種精神官能症的稱呼了。

我們能復元嗎？會，暴力就像阿基利（Achille）的長矛，能使被刺的傷口癒合。今天，我們被束縛，飽受屈辱，因害怕而生病。我們跌至谷底。對殖民地的貴族來說，這還不夠：在他們沒

有先把我們法國人殖民化之前，是無法完成在阿爾及利亞那進度落後的使命。我們每天在戰鬥之前退縮，但要深信，我們絕對逃避不了的；他們需要戰鬥，那些殺人者；他們想撲向我們，朝人群中亂打。讓我們將巫師及拜物神的時代終結吧：只能戰鬥，或在集中營中腐爛發臭。這是辯證的最後時刻：你們譴責這場戰爭，卻又不敢宣佈自己同阿爾及利亞戰士團結在一起；別害怕，指望殖民者和傭兵吧！他們將會使你們跨出一步、毅然採取行動。於是，被逼到絕境的你們，可能終將卸下這新的、在你們身上煽起前科重罪之暴力枷鎖。但是，正如有人說過，這是另一部歷史。人類的歷史。我深信，我們同創造這歷史的人們聯合起來的時候不遠了。

〔譯註 1〕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精神現象學》(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中所指的「自我意識」，即從自己／自我中分裂出的意識。

〔譯註 2〕塞提夫 (Setif) 位於阿爾及利亞的康士坦丁縣。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土著在慶祝戰勝德國的紀念日示威時，遭法國警察開槍驅散，動亂持續一個禮拜，至少有兩萬名以上的阿拉伯人遇害。

〔譯註 3〕馬基雅維里主義 (Machiavellisme)，指權謀霸術，為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

〔譯註 4〕索黑爾 (George Sorel, 1847-1922) 法國作家，主張工人行使罷工的權利，反對議會掛帥，不信任政客，影響了法國無政府工團主義 (syndicalism)，晚年卻向義大利的墨索里尼獻媚。

〔譯註 5〕薩爾 (les zars)，為著魔者舉行的儀式，使著魔者，通常是女性，能將附身情況控制住，與之和平相處。

〔譯註 6〕羅阿 (les loas)，地方性的神靈。

〔譯註 7〕奠邊府 (Dien-Bien-Phu) 戰役，一九五四年，法軍在這裡被武元甲指揮的越南獨立同盟軍擊潰，成為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 (1946-54) 的決定性會戰。

〔譯註 8〕科克托 (Jean Cocteau, 1889-1963)，法國藝術家，多才多藝，擅詩歌、小說、戲劇、電影等。

〔譯註 9〕阿爾及利亞人對歐洲人的暴行。

【目錄】

【中文版推薦序】昨日之怒——閱讀法農《大地上的受苦者》 ■孫大川 005

【她序】永遠追問的人（二〇〇二年） ■艾莉絲·薛爾齊 019

【他序】灼熱之聲（一九六一年） ■沙特 033

【導讀】不受小惠，始見大非：法農對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共生體的診斷 ■廖咸浩 059

第一章 論暴力 071

第二章 自發性的偉大和弱點 137

第三章 國族意識之厄運 171

第四章 論國族文化 221

第五章 殖民戰爭和心理失調 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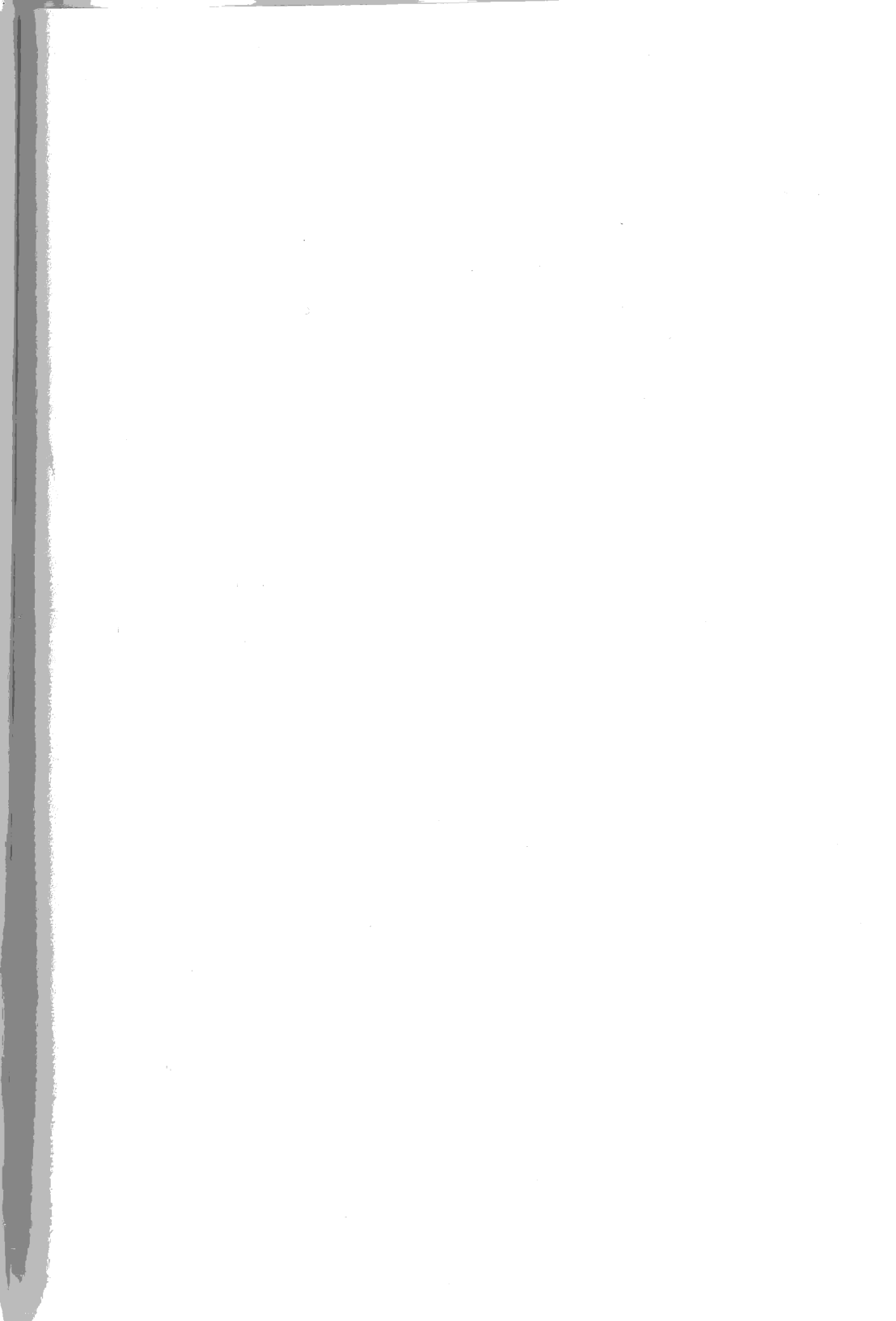
結 論 321

【後記】世界新革命的推動者（二〇〇二年） ■穆罕默德·哈爾比 327

【附錄一】 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 3 3 3

■ 楊碧川

【附錄二】 延伸閱讀 3 4 3



【導讀】

不受小惠，始見大非：法農對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共生體的診斷

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廖成浩

殖民，這到底是不是一個過時的議題？這恐怕就像資本主義是不是個過時的議題一樣：當我們認為資本主義已不再是問題的時候，也正是它的問題演變成海嘯的時候。

拉長歷史的尺度，所有的殖民問題當然都不再是問題，比如在第六世紀日耳曼裔的法蘭克人征服了高盧人的地區而成立了法蘭克王國時，難道沒有殖民問題？但千年之後，法國早以「法蘭克人之國」(France=Frankreich=Franks' kingdom)而行諸於世，何來殖民問題？因此，關心殖民議題是爲了要處理當下的權力關係，爲的是求得公義在當下獲得貫徹、並在未來獲得確保。同時，殖民的議題並不涵蓋所有的權力關係；它指的是國與國、或種族與種族的壓迫關係。而且這種關係主宰了幾個世紀來的世界歷史，並且持續宰制著我們的生活。

但殖民主義會改變。正如資本主義影響世界的方式會進入「晚期」，殖民關係也會蛻變成

「新」殖民主義，（而且事實上晚期資本主義與新殖民主義正是一體兩面的關係。）但這並不意味著宰制與壓迫一定會減弱減少；早期殖民主義與新殖民主義不但有相當的傳承，隨著殖民方式的精緻化，宰制益形隱晦，也更容易擴張。同時，殖民關係雖主要是國際關係，但自始與國族內部的階級關係及性別關係，都有著密切的鈎連，甚至可以說是帶動這些宰制關係的主旋律。這樣的連動關係，更可謂於今尤烈。

因此，法農的這本書雖寫於二十世紀中期，但至今不失其時代意義。隨著法農的洞察回顧殖民地獨立前後的狀況，確能以古鑑今，透視藏身今日的迷霧中、仍徘徊不去的昨日的鬼影。

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共謀關係

閱讀法農的這本書，必須要先能掌握他用以貫穿全書的左翼立場，這個台灣讀者較不熟悉的思維，為他的洞察提供了立論的一致性與思想的硬度。首先，他點出了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共謀關係。因為這個根柢上的共通性，使得殖民地的人民在面對殖民者時，產生了極大的內部矛盾。因為領導右翼民族主義運動的，多是法農所稱的「國族資產階級」（national bourgeoisie，即受惠於殖民體制的本地人）。這個階級因為本質上是商人，本來就較為利益取向，領導反殖民運動的初衷，主要也是為了搶奪殖民母國的在地資源。加之大多受過較多的殖民教育，視野受到殖民者影響也最深，其「頻率永遠調向歐洲」的買辦屬性又極易把獨立後的國家在利益交換的情況

下，變成「歐洲的娼寮」(the brothel of Europe)，其三，國族資產階級爲了確保自身的階級利益，往往將其所佔據的統治階層「部落化」(tribalized)，以國族之名，行中飽私己之實。一個不慎，這個階級挾國族之名遂行斂聚的現象，就會無止境的延長下去。對這樣一個「心智怠惰、精神貧瘠、且心理上深度國際化」的階級，法農從其行遍各殖民地的經驗，得出了極大的不信任。

雖然，法農認爲右翼的反殖民運動妥協傾向太濃，但他仍然認爲反殖民運動的成功繫於能否成功凝聚「國族意識」(national consciousness)，唯方法須是左翼的，也就是透過「暴力」(violence)的革命。法農對暴力的正當化，根植於其從心理醫生的視角出發對殖民情境的理解。在殖民者拜火教式(Manichean)善惡二分法之下，殖民體制就是最赤裸、最原始的壓迫與剝削狀態：原住民被視爲負有原罪，在自己的土地上動輒得咎。另一方面，殖民者／移居者(settler)在殖民地所建立起來的世界，既是敵視原住民的地獄，又不免成爲原住民忻羨的天堂。被殖民者長期處於情緒苦無出路的狀況下，時時瀕於暴力的邊緣，甚至出現精神問題。最常見的是以內鬥的方式宣洩，或藉傳統宗教及神話轉移問題焦點。

因此，暴力的使用分幾個層次：首先，對被殖民者而言，針對殖民者的暴力反抗，有其心理上的需要：可對個人產生某種「滌清」(cleansing)的效果。但真正具正面意義的暴力，須待反殖民革命的時機來到。經由暴力的使用，人民因此而「團結成一體」，在他們的意識中產生了「共同的使命、國族的命運及集體的歷史」，未來的「國族」也開始有了眉目。暴力不僅是國內

革命之所繫，也是國際財富重分配的前提。當這些本地人在追求自由的路上，不再受到阻滯，他們的視野不再受到局限，他們才能勇於認知到，歐洲的風華原來都是建築在第三世界人民的血汗與屍體上，並且勇於要求償還損失，以俾藉此來重建被剝削一空的殖民地，重新在國際上找到自己公允的立足點。

但法農也注意到，殖民地某個階層的民衆在「精神上的不穩定性」(spiritual instability)。這些民衆因為長期累積的被剝奪感、長期處「人下之人」的地位，以致任何施捨都可能獲得一種平反為「人」的錯覺。但這些來自殖民者的讓步或小恩小惠，不過是試圖延長殖民宰制的障眼法，並無涉最根本的問題——改變殖民政權的本質。而更重要的是，「剝削的劣行也可能戴著黑人的面具或阿拉伯人的面具」。反之，許多非「國族之子」(sons of the nation)卻還更接近國族抗爭的立場，足以成為同志或戰友。

這樣一個較為複雜的認知，大量降低了法農定義中的暴力的盲目性與任意性。但這種具有高度的暴力，卻無法一蹴而幾。首先，必須有國族主義運動內部遭排擠的激進派（即左翼傾向者）轉戰農村，並在這個過程中與農民大量接觸，從而見識到他們素樸的「自發性抗爭」(spontaneous rising)。長期被殖民者所洗腦的知識份子，一旦與農村民衆接觸，心中來自殖民者的制約就會逐漸瓦解。從民衆素樸情感的洗禮中，他才能找回自己的「異常的潛能」(unusual potentiality)，滌除自己最後的妥協傾向（成爲一個左派）。但另一方面，這些不滿於全面妥協的知識份子也在

這種「自發性抗爭」中，發現民衆單純的恨意無法克竟解放之功，而必須佐以對民衆的教育與啓蒙。將個人的、地區的抗爭加上既屬國族又超越種族的高度。否則，如前述，民衆的恨意也容易因爲殖民者的小恩小惠，而輕易感動並放棄抗爭。由以上可見，法農在強調知識份子應向農民學習的同時，也強調農村民衆必須不斷在抗爭的過程中，超越非黑即白的二元心態，學習接受較複雜的「多層次意義」(shades of meaning)；換言之，城市的激進知識份子與農民應視爲國族運動的腦與心、理與情，缺一不可。

然而，法農也特別提醒，我們必須意識到「國族意識」其實充滿了陷阱，因爲撐著「國族意識」這面大纛的，正是甚不牢靠的國族資產階級。在法農的思考裡，國族意識只是一個階段，雖無法略過，卻必須在獨立之後轉型爲社會或政治意識 (social or political consciousness)。但遺憾的是，多半的前殖民地都不斷的被國族資產階級的政客挾持，繼續在國族意識中打滾，甚至如前述將國族意識「種族意識化」，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及牟利自肥的網絡。

文化，解放運動的整體

故法農相當重視腦子的「去殖民」改造。那麼文化在反殖民的大業中扮演什麼角色呢？在殖民統治的過程中，殖民者透過教育體制不厭其煩的灌輸一個論點：土著文化在（殖民）現代性未到之前是野蠻而黑暗的。殖民者的論述在貶抑黑人或阿拉伯文明時以至稱方式進行，故本土知識

份子時也反擊以至稱方式肯定自己的文化；當時非洲甚至阿拉伯世界，都企圖以一種泛阿拉伯主義（pan-Arabism）或黑人性（négritude，又譯黑鬼格）來對抗殖民者對本土文化的歧視及壓制。但法農時期以為不可。他認為阿拉伯世界與黑人世界，各地或會一度有相當的一統性，但在時間的進程中，各地早已發展出不同特色的文化，尤其在殖民統治之後，更已形成一定程度的區域差異。故全稱的文化認知便脫離了現實，無法對文化的生機有所貢獻，甚至造成傷害。

那麼，「文化與殖民鬥爭的關係」到底如何？法農認為文化無法脫離政治的民族解放工程獨自進行重建。把文化視為獨立的領域必然會想要證明，前殖民時期的文化既不黑暗也不野蠻，於是，這個工作想當然爾須從農民所保存的傳統文化再出發。但法農認為傳統文化雖然經由農民努力保存，卻難免已被殖民者切斷現實性，而形成徒具形式的樣板文化。法農認為這種定義下的「文化」「無法證明『國族』的存在」，國族必須在人民的反殖民奮鬥中「予以實質化」。文化「不是特殊主義、不是習俗、也討厭被簡化」。法農並不反對重新運用舊文化，但其目的應是「展開未來」。更重要的是，文化不只是解放的關鍵之一，而是解放運動的整體。唯有在為解放而奮鬥的過程中，真正有意義的新文化才於焉「獲得形式與內容」。「被殖民者有意識、有組織的重建國族主權的行動，就是最完整最明顯的文化展現」：「若國族意識得以完成，這就是最精緻的文化（most elaborate form of culture）。但國族意識不是國族主義（nationalism），因此，國族的自我意識事實上乃是確保對外「溝通之門」的不二法門。唯有「在國族意識中，國際意識

(international consciousness) 才能存在與生長。而這種雙重的湧現最終而言才是所有文化的泉源。」

反思暴力、國族與傳統文化

不過，法農論述在進步論者眼中並非無可挑剔，若干觀點也曾遭到一定程度的質疑。一是其對於暴力的鼓吹，二是其對國族意識的注重，三是對傳統文化的低估。關於這三點，我們必須擺脫沙特的序言觀之。沙特認為法農在本書中的論述是一種「嶄新的聲音」，一種敢於直接對歐洲文明宣戰的聲音。此說信然。但他的嶄新，並不在於敢於提倡暴力，而在於提倡「暴力革命」。對法農而言，暴力的衝突來自殖民壓迫，當民衆意識到暴力的對象應是殖民者而不是自己或自己的鄰人時，他就初步的找到了精神問題的出口。但暴力的使用則必須經由政治教育提升到國族／超種族的層次。

當然，帝國殖民的年代與左翼狂飆革命的年代似皆已一去不復返，但取而代之的則是無數少數民族的議題，包括內部殖民與新移民的不同狀況。這些問題理應由內部透過協商進行適當的處分，但迄今卻只有魁北克等少數地區避免了大規模的暴力，其他從斯里蘭卡到科西嘉、從巴黎到洛杉磯，則都還是籠罩在暴力當中，看不到硝煙散去之時。法農若生在此時，雖未必會再提倡暴力革命，卻可能從心理醫生的角度，繼續判定暴力必將週而復始、永無寧日。

法農所關注的國族意識，如前述，並不是國族主義，更不是狹隘的種族意識，而是跨族群跨越「共同創造國族」的意識，並由此而「共同創造的」國族意識。換言之，這是在反殖民的過程所協商而成，並非原先已存在的本質。他對此的注重肇因於他對非洲許多社會（以部落或社區為認同根據的）前現代社會結構的認知。他認為不超越這種結構，無以對抗殖民。

當然，從今天的角度而言，「民族國家」的觀念已受到區域性「超國家」及「全城城市」的夾擊，赤裸的殖民狀況也轉換成新自由主義／新殖民主義的隱形宰制，因此，國族意識似也需要有更複雜的轉型：也就是一分為三：在上是一種全球性的結盟，在下則是社區的深耕，而國家的架構則扮演協商二者的中介者。

然則，我們不要忘記，並不是地球上每一個地區都完全進入了這種後期資本主義的生活形態。在世界各洲，尤其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有許多所謂的「國家」仍因為部落及社區的差異及內部殖民的問題，而無法發展出能讓眾人接受的國族意識。這些地區也許無法完全如法農所言以國族鬥爭凝聚國族意識，但國族意識卻仍是個極待解決的問題。換言之，就是要設法以當代的方式讓所有人找到可茲共同接受的理想，但是這種理想又須如法農所言，根植於國際意識，或曰「普世的胸懷」（cosmopolitanism），而非揚己排他的國族主義。

法農對傳統文化確有所保留，但並非如沙特所言，「要提防過去遙遠的非洲文化的重返」。如先前曾論及，法農認為傳統文化在殖民統治的刻意打壓下，與當代現實已有距離。但他並非全

面的反傳統，也支持運用舊文化創生新文化。然而，一味以舊文化抵制現代性固然可能導致文化自戕，但將舊文化全面視為過時，多少是沾染了現代性的傲慢。傳統左翼視傳統文化為「封建保守落伍」，確實是其一大盲點。文化不可能以革命革之，但卻可以革命斷傷之；文化不可能從零開始，卻可能因革命而被迫從殘破中再出發。

但瑕不掩瑜，法農在本書中的多數觀點，都能讓我們看清，當前的許多現象原是滋生於殖民主義／資本主義的淵藪。而今天的病徵雖更隱而不顯，卻可能意味著更深的沉痾。當前全球化的局面下，尤其在社會主義體制崩解後，國族資產階級與全球資本主義合作關係益加密切，統治也日益穩固。而藉由消費悲情國族意識、陳倉暗渡新殖民主義，以謀取特定階級的利益，幾乎仍是各前殖民地政客普遍的策略。

重審「現代性」

追根究柢，從殖民主義到新殖民主義，一以貫之的主導性迷思都是現代性，背後的動力則是資本主義的擴張。當前各國的國族資產階級與全球性資本主義的結合，對人類的威脅已經遠遠超過殖民的剝削，而是直奔人類的滅絕；核武、環境污染、藥物濫用、全球暖化等問題紛至沓來。因此，要如何將國族資產階級「從資本主義的工具，變成人民的僕人」，可謂關鍵議題，而這絕對要從重審現代性著手。

換言之，若欲了解殖民之舉有何不當，必先釐清「現代性」的意義。首先是，現代性的出現究竟是歐洲內部自發的現象——即是否如黑格爾所言，始於希臘時期植下的自我種子，最終開花結果成爲通體透明的自我意識——或只是一個偶然與機緣的產物？再進一步的問題是，現代性是否是真命天子、是人類進化的極致？或亦只是一個應被歷史化（historicized）、有始也有終、故也會被取代的現象？但即使現代性不是歷史的終點，我們還是要問，現代性的來臨是不是一「進步」？或只是演化的「一個階段」？

根據杜塞耳（Dussel）的論證，在歐洲發現美洲之前，當時真正的富裕地區是東方，而歐洲猶是世界的偏遠地帶。也因此，歐洲百般企圖與東方進行貿易，以取得歐洲無法自己生產的奢侈品，包括絲、瓷器及香料等。但因為陸路爲阿拉伯人所阻，轉而尋找海路：先有葡萄牙人麥哲倫發現沿非洲海岸的航路，後有哥倫布爲避開葡人而往西行，結果卻發現美洲。美洲的大量資源使得歐洲在學習管理的過程中，發展出了以數字管理爲核心的西方現代性。另一方面，西方現代性也非純爲歐洲文明內部的萌發，而是受到來自阿拉伯、印度與中國的文明洗禮之後，才因美洲的因緣而發展出來。故西方會產生現代性，不是因爲其文明之優越，而是因爲落後；而當時富庶許多的印度與中國未發展現代性，則反而是因爲無「向東航行」以尋求商業航路的需要，而無緣發現美洲。

其次，在近年諸多關於後現代性、反身現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超現代性（trans-mo-

demity) 的討論中，我們理應看清了現代性是個必須被歷史化的現象。而同樣在這些討論中，我們也理解到現代性未必意味著「進步」。在現代性看似將文明益加細緻化的過程中，人類傷害其他人類的方法已變得空前的細膩，戕害大自然的效率也變得空前的驚人。而殖民主義不就是個最典型的例子？表面的優雅高尚與先進之下所進行的勾當，其野蠻程度完全不遜於部落社會以長矛和弓箭所進行的打殺。

如果現代性並未賦予前殖民國家任何剝削與壓迫的藉口（如「殖民讓落後地區現代化」），那麼法農關於「歐洲的風華乃係建立在殖民地的資源之上」的洞察，就必須逆向來實踐，也就是殖民賠償及重建責任的問題。這也就是前殖民國普遍不願向前殖民地認罪的關鍵。然則，今日世界的南北問題，及許許多多第三世界的內部問題，都可清楚的溯源至殖民統治。

為台灣找到出路

瓦解了現代性相關的迷思，我們就比較容易為台灣的「後殖民現況」找到出路。殖民議題在台灣的難度在於兩個互相糾結的現象，其一是台灣的國族資產階級掌權時間，因為中間經歷了早期國民黨的統治而遲滯了約四十五年的時間。這段期間權力鬥爭的論述主要圍繞著現代性所有權的爭議（即台灣的殖民現代性 vs. 中國的江浙現代性）。然而這其中只見雙方對現代性的崇奉，而絲毫不見反省。無怪乎演變迄今，台灣的所謂後殖民研究，往往都致力於殖民者對台灣的貢獻，

而這卻正是殖民者要被殖民者牢記在心中的：殖民者的來到，象徵著殖民地進入了新的歷史時刻，它從此擺脫了傳統的黑暗與愚昧，迎向光明的現代化時期。轉化的過程容或辛苦（甚至受辱受傷），但血淚的灌溉，必有豐碩的果實。

其二是，原住民持續被漢人殖民的狀況，因為漢人內部的利益衝突攫取了所有焦點與資源而遭到忽視。台灣這種持續「內部」殖民的現實，正是所謂「移居者」反客爲主的實例之一。同樣是移居者宰制的國家，如加拿大、澳洲等都在多年已前展開了爲原住民去除殖民枷鎖的工作，唯獨台灣卻仍是極不光采的例外著，這也不能不歸咎於漢人耽溺於國族意識（種族意識）與現代性迷思的陷阱中，而不知「進步意識」何意！

然而，法農所未直接談到的則是，對現代性的崇拜卻不只發生在曾被殖民的地區；多數非歐國家的現代性崇拜，與殖民者在殖民地實施的輕蔑本土的教育，有異曲同工之妙，且早就把這些社會自我殖民而變成了「類殖民社會」。中國就是一個絕佳的例子，鋪天蓋地的文革若沒有現代性崇拜作祟，何以反傳統至此？就盲目崇奉現代性而言，台灣與中國果然係屬同根所生。

世局之亂不是局部地區的恩怨情仇（包括台灣的統獨議題），而有更深的全球心理狀況，要深入這個心理的潛意識才能找到病源。這就是法農的意義：作爲全球的精神科醫生，他在二十世紀中葉所作的診斷，迄今仍犀利透徹，直指當下許多問題（包括去年以來的全球性金融海嘯）的源頭，就看我們如何對症下藥了。

論暴力

國族解放、國族復興、重建屬於人民的國家、英聯邦等等，不管是使用什麼名稱或引進什麼新方案，去殖民（decolonisation）始終都是一種暴力的現象。不論我們在什麼層次研究去殖民，例如：個人之間的交往、新名稱的運動俱樂部、鷄尾酒會、警察，還是國有或者私人銀行的董事會，去殖民不過是十分單純地由一「類」人代替另一「類」人的過程。沒有過渡期，而是全新的、完整且絕對的交替。我們當然也可能指出一個新國族的湧現，一個新國家的建立，它的外交關係和政治、經濟方向的變化。但是，精確說來，我們選擇了消除歧異，去談論一個白板狀態，也就是最初的去殖民從那被定義的起始狀態。它不尋常的重要性在於，從第一天開始，去殖民就成爲被殖民者最起碼的要求。老實說，成功的證明，在於社會結構徹底改變了。這種改變異常非凡的重要性在於，它是被人們渴望、要求和強求的。這種改變的必要性，在被殖民者男女的意識及生活中，是以一種原始、衝動和強制的狀態存在。但是，這種變化的可能性，也同樣被另一類男女，也就是移殖民者，以下列的形式體驗：在他們的意識中，認爲未來是可怕的。

去殖民的歷史過程

企圖改變世界秩序的去殖民，根本就是一個全然混亂無序的綱領。但它不可能是一個神奇的操作、自然的撼動或者和陸諒解的結果。大家都知道，去殖民是一個歷史的過程，也就是說，只有當我們認清那賦予它內容與形式的歷史化運動，它才能被理解，才能找到自己的可理解性，使自身變成透明。去殖民是兩股天生你死我活敵對勢力的角逐，兩者的獨特性，正是由於它們皆提取自殖民情境所分泌的養分。它們是在暴力的情況下展開首次決戰，並在大量的刺刀及大砲下維持共同生活——更確切地說，所謂共同生活，是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剝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是老相識。當殖民者說他認識「他們」時，的確是有道理的。因為殖民者造就了他們，並且繼續製造出他們。殖民者從殖民體制中提取出真實，也就是他的財產。

去殖民絕不可能不受人注目，因為它對人的存在，它改變了人，它把不具本質性的存在、被壓垮的觀眾，轉變成享有特權、幾乎受到歷史大力吹捧的偉大演員。它在存在裡，帶進了一種由新人類的節奏、新的語言、新的人性。去殖民是真正地創造新人。但這種創造，不是從任何超自然力量那裡得到正當性：被殖民地化的「物」，在自我解放的過程中，變成了人。

因此，在去殖民化的過程中，有著對殖民情境做全盤重新提問的需求。如果我們想精確地描

述它的定義，可在「後來居上」〔譯註1〕這句名言中找到。去殖民是這個名言的驗證。因此，就描述的層面而言，所有的去殖民化都是一種成功。

去殖民以赤裸裸的姿態展現，它透過所有的毛細孔，以燒紅的子彈和血淋淋的刀劍，讓人來揣度。如果後來者必須居上，那只能是兩大主角決定性、致命對決後的結果。若要使後來者爬到前排的堅定意願獲勝，要使他們在那有名的、用來定義何謂一個有組織社會的階梯上爬升（有人說，用太快的速度），那只有透過在天平上放入所有的手段，當然包括暴力。

我們無法以這樣的綱領就瓦解一個社會，即使只是個原始的社會，如果不是在一開始的時候，也就是說，甚至是計畫本身公式化的最初，就決定要掃除路上所碰到的一切障礙。決定實現這個綱領、使它變成動力的被殖民者，隨時準備好動用暴力。他從出生就清楚這個充滿禁令的狹小世界，唯有靠絕對暴力，才能對它重新提問。

殖民地是個分割的世界。不必浪費唇舌去重提土著和歐洲人的城市、土著和歐洲人學校的區隔，或南非的種族隔離。然而，如果我們深入到這種分割的內部，我們至少可以標示出其中幾條動力的境界線。走近殖民地世界，走近這個安排和地理佈局，將使我們據此重新組織去殖民社會的界線。

被殖民世界是一分爲二的世界。兵營和警察局標明分界線。在殖民地，憲兵、軍隊是被殖民

者有效的對話者，他們是殖民者及壓迫體制的代言人。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不論是宗教或世俗化的教導，父子相傳的道德反思教育，工人在五十年的優良忠誠服務後獲頒的誠實楷模獎章，因和諧與智慧而增長的愛情，或者鼓勵遵守既定秩序的美德，這些，都在被剝削者周圍營造出一種服從與禁制的氣氛，大大減輕了警察的任務。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在被剝削者與當權者之間，有衆多道學教授、顧問和「偏激傾向導正專家」的介入。相反的，在殖民地，憲兵或士兵藉由他們立即的出現，直接頻繁的介入，保持和被殖民者的接觸，並用槍和凝固炸彈，命令被殖民者不得動彈。人們可以看到，權力的仲介者使用純粹暴力的語言。仲介者並不減輕壓迫，也不掩蓋支配。他們把壓迫和統治暴露出來，忝不知恥地凸顯自己那維持秩序的地位，把暴力帶進被殖民者的家裡和他們的腦袋裡。

被殖民者的面貌

被殖民者居住地帶與殖民者居住地帶，並不呈現互相補充的狀態。這兩個地帶互相對立，但這樣的對立不是爲一個更高的統一而服務。這兩個被純粹亞里斯多德邏輯所支配的地帶，都遵守相互排斥的原則：無法和解，多說無益。殖民者的城市是石塊和鋼筋打造的銅牆鐵壁，燈火通明、鋪上柏油。而城裡的垃圾箱總是塞滿了從未見過，甚至是從未夢想到的、不知名的殘渣。殖民者的雙腳從不被人看見，可能只在大海裡才展現；但我們從未足夠靠近到可以看見它們。結實

的鞋子保護殖民者的腳，城市街道乾淨、光滑，沒有坑洞，沒有石子。殖民者的城市是座吃飽沒事幹又輕鬆的城市，肚子總填滿了好吃的東西。殖民者的城市是白人的、外國人的城市。

被殖民的城市，或至少是土著的市鎮、黑人的村子、阿拉伯街、印地安人保留區，則是聲名狼藉的地方，住滿了聲名狼藉的人。人們在那裡隨地、草草地被生了出來。隨地、隨便因某不知名原因死去。這是個沒有間隔的世界：人挨著人，小茅屋挨著小茅屋。被殖民者的城市是座飢餓城市，渴望著麵包、肉、鞋子、煤炭和光明。被殖民者的城市是座蹲下來的、屈膝的城市，一座躺臥著的城市。這是黑人的城市、阿拉伯人的城市。被殖民者以淫蕩、羨慕的眼神望著殖民者的城市，夢想占有它。用盡所有占有的形式：坐在殖民者的桌旁、躺在殖民者的床上，可能的話和殖民者的妻子上床。被殖民者是嫉妒的，殖民者不是不知道，在他瞥見被殖民者那失控的眼神時，酸苦地見識到這點，但他始終保持警惕：「那些傢伙想奪取我們的地位。」的確，一個被殖民者至少每天一次夢想處在殖民者的地位。

這被分割、被一分為二的世界裡，住著不同類別的人們。殖民地獨特性就在於：談經濟現實、不平等、生活模式極大的差異，都無法做到遮掩一個屬於人道這個層次上的現實。當我們快速審視殖民脈絡時，即可明白地看到，分隔這個世界的，首先是屬於或不屬於這個類別、這個種族的事實。在殖民地，經濟的下層結構同時也是上層結構，原因即結果；因為是白人而富有，因為富有而成爲白人。所以，每當討論殖民地問題時，馬克思主義分析總是應該稍微放寬些。馬克

思對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探討，並沒有到概念的層次上，我們在此也不是要去重新探討這個問題。農奴和騎士的本質不同，但兩者都必須借助神權來正當化身份的不同。在殖民地，從外地來的外國人，用槍砲和機械來強制統治。儘管他成功地制伏和據為己有，他始終是外國人。首先構成了「統治階級」特徵的，既非工廠，也不是財產，亦不是銀行裡的帳戶。統治族群首先是外來的，那些不像當地人（*autochtones*）的，那些「他者」（*les autres*）。

暴力主宰了殖民地世界的佈局，不斷地破壞當地人的社會形態，毫無保留地摧毀了經濟、衣著和外表原先的參照座標。然而，當被殖民者決定成為歷史的舞台，奮力衝進禁區的一刻，被要求以及承受的，同樣是這個暴力。炸毀殖民地世界，今後將是十分清楚的行動意象，非常可以理解，也能為每個被殖民的構成份子遵循。瓦解殖民地世界，並不意味著在撤廢邊界線後，人們會整治兩個地帶間的通道。摧毀殖民地世界，不多不少，就是要取消一個地帶，把它埋在泥土深處，或趕出土地。

被殖民者對於殖民地世界提出的質疑，並非是觀點上的理性較量。那不是有關普遍概念的論述，而是一種把獨特性提出，當成絕對的瘋狂論證。殖民地世界是摩尼教的善惡二元論世界。殖民者對被殖民者做肉體上的限制，也就是藉由警察和憲兵，限制被殖民者的空間，這還不夠。就好比為了闡明殖民剝削的極權主義特點般，殖民者把被殖民者描述成一種「惡的精髓」（註1）。

被殖民者社會不只被描述成一個沒有價值標準的社會。殖民者斷言，在被殖民者的社會中，這些價值標準不是被拋棄了，就是根本不會存在過，這樣說還不夠。被殖民者被宣稱為，對倫理學是抵制的，不僅缺乏價值，也是對價值的否定。他是，讓我們敢於承認這點價值的敵人。在這個意義上，他是絕對的壞。他是腐蝕成份，破壞一切接近他的東西，是扭曲成份，使一切與美或道德有關的東西變了形，是一切不吉祥力量的受託人，是盲目暴力的無意識及無法回收的工具。梅爾先生（Meyer）可以在法國國會上嚴肅地說，不應該讓阿爾及利亞人進來國會殿堂嫖淫共和國。的確，自從和被殖民者接觸過後，所有的價值就不可逆轉地中了毒和被污染了。被殖民者的習俗、傳統、神話，尤其是神話，就是貧困、體質敗壞的標誌。所以，這也就是為何，要把下列兩件事放於同一平面上來看：用DDT消滅寄生蟲、疾病的媒介，以及基督教在異端邪說、本能、邪惡等等還在萌芽的狀態時就把它們給扼殺了。黃熱病的消除和福音佈道的進步，分屬同一份決算表。但是，佈道團的捷報實際上告訴我們在被殖民者內部引進異化酵素之重要性。我談基督教，誰也沒權利對此感到驚訝。殖民地的教會是白人的教會、外國人的教會。它並不召喚被殖民者走向上帝，而是走向白人的道路、主人的道路、壓迫者的道路。如眾所皆知的，在這一歷程中許多人被徵召，卻很少人入選。

【註一】我們已在《黑皮膚，白面具》書中描述過這種善惡二元論的世界。

有時候，這個善惡二元論竟然達到邏輯上的極端，將被殖民者去人性。確切地說，把被殖民者動物化了。因此，當殖民者談到被殖民者時，他使用的是動物學的語言。他影射黃種人的爬行、土著住所散發出的氣味、游牧部落、惡臭、大量繁殖、亂鑽亂動、比手畫腳。當殖民者想描述或找出一個恰當的字眼時，經常參考中世紀的動物寓言集。歐洲人很少依靠「形象化的」詞。但是，領悟了殖民者計畫的被殖民者，理解了人家對他興訟的意圖，立刻知道對方在想什麼。這個爬升的人口統計圖，這些歇斯底里的群眾，這些完全沒有人性的面孔，這些胖得什麼也不像的身體，這群沒頭沒尾的人，這些似乎不屬於任何人的野孩子，這種攤在太陽下的懶散，這種植物般的韻律，這些都成了殖民辭彙當中的一部分。不久就要湧現了，那些戴高樂將軍講到的「黃色人群」、莫里亞克先生（M. Mauriac）講到的黑色、棕色和黃色群眾。被殖民者知道一切，並且呵呵大笑，每當他們在他者的話語裡發現自己成了動物。因為他知道自己不是動物。更確切地說，恰在他發現自己的人性的同時，他擦亮武器，做好戰鬥準備，要讓人性獲勝。

一旦被殖民者開始搗亂，開始讓殖民者惶恐不安時，我們就會派出一些善良的靈魂，在「文化大會」上向他展示西方價值的特殊性及豐富性。但是，每當話題牽涉西方價值時，立刻就會在被殖民者身上產生一種僵直、肌肉痙攣現象。在去殖民階段，被召喚的則是被殖民者的理性。我們向他們提出一些確切的價值，充分向他們解釋：去殖民不該意味著倒退，而是應該建立在一些

經試煉過、牢靠、受評定的價值上頭。然而，目前的情況是，當一個被殖民者聽到一段有關西方文化的論述時，他就抽出自己的大砍刀，或至少要確保刀子能隨手可拿到之處。白人價值之所以擁有優越性，是受到暴力的保證，白人價值在對決的過程中勝過被殖民者的生活或思想方式，是浸滿在侵略性中的。暴力、侵略性，透過復返，使得我們在被殖民者面前提起這些價值時，不免換來冷笑。在殖民的脈絡中，殖民者從未停止過對被殖民者的攻擊，除非被殖民者高聲清楚地承認白人的價值優越。在去殖民時期，被殖民大眾對這些價值不屑一顧、蔑視並唾棄它。

這種現象通常被掩蓋起來，因為在去殖民時期，一些被殖民的知識份子已經跟殖民國家的資產階級建立了對話關係。在這個期間，當地居民只被視為面貌模糊不清的群眾。殖民的資產階級有機會在各處認識的幾個土著，不足在立即的感知上發揮作用，使得差異化得以產生。相反地，在解放時期，殖民主義的資產階級熱切地尋找與「社會菁英」們接觸。那著名的、針對價值的對話，是與這些菁英進行的。殖民資產階級認識到自己不可能在殖民地維持統治時，就決定進行文化、價值及技術各領域的後衛戰。然而，絕不應該忘記的，是占極大多數的被殖民民眾，他們對這些問題漠不關心。對被殖民者而言，最根本的價值，首先是土地，因為這最具體：土地保證了麵包，當然，也保證了尊嚴。但這個尊嚴與做爲具「人道的人」的尊嚴無關。這個理想的人，他從未聽人說過。他在自己土地上看到的，是我們可以抓他、打他、使他挨餓，卻不受懲罰；從未

有過任何一個倫理學教授或神父，過來代他被打，並跟他分享麵包。對被殖民者而言，作爲一個倫理學家可以十分具體，就是使殖民者的傲慢噤聲，使他行使的暴力粉碎，簡單地說，就是直接了當地把殖民者從全景圖中驅逐。人人平等這一著名的原則，在殖民地會找到對此的闡釋，只有當被殖民者提出，他與殖民者是平起平坐之時。再進一步，他想要爲超越殖民者而戰鬥。事實上，他已決定代替殖民者，並占據他的位置。正如我們所見，整個物質和道德的世界崩潰了。一直在抽象普遍性方面遵從殖民主義者的知識份子，如今爲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能夠在新世界和平共處而奮鬥。但是，他沒有看見，因爲確切的說，那是由於殖民主義已經滲透到他所有的思想模式中了，他看不到一個事實，殖民者，一旦殖民的脈絡消失，也就沒必要與他們共存了。這個情況的出現並非偶然，在阿爾及利亞政府和法國政府談判以前，歐洲少數所謂的「自由主義者」已經清楚地表態：他們要求，不多不少，雙重的公民資格。就是由於我們局限在抽象的層次上，才想迫使殖民者在未知中做一個十分具體的飛躍。讓我們這麼說吧，殖民者完全知道任何浮誇的詞藻也取代不了現實。

表象化的去殖民

於是，被殖民者發現他的生命、呼吸、心跳和殖民者一樣。他更發現殖民者的皮膚不比自己的皮膚值錢。這一發現引起世界的大震撼。被殖民者一切新革命的保證由此而起。如果我的生命

確實和殖民者的一樣重要，那麼他的目光就不再令我覺得咄咄逼人、令我顫慄，他的聲音不再令我發愣了。我不再面對他而不知所措，實際上，我已不把他放在眼裡。不只在他面前，我不再感到侷促不安，而且我正爲他佈下一個陷阱，使他除了逃走以外沒有別的出口。

我們曾經說過，殖民脈絡的特徵是強制世界一分爲二。去殖民把世界統一起來，透過一個激進的決定，根除世界異質性的部分，藉由在國家的基礎上，有時是在人種的基礎上，將世界統一。我們知道塞內加爾的愛國者所說的一句惡毒的話，當他們提起總統桑哥爾（Senghor）的手腕時：「我們曾經要求指導層非洲化，而現在，桑哥爾使歐洲人非洲化了。」這意思是說，被殖民者絕對有可能直接地洞悉去殖民是否發生，因爲後來者居上是最起碼的要求。

但是，被殖民的知識份子卻給這一請願帶來不同的變奏，事實上，他似乎有很好的理由：行政人員、技術人員、專家是必要的。然而，被殖民者卻把這些破格的優待，詮釋成同樣是破壞的手段，而且，隨處都會聽到一個被殖民者宣稱：「早知道，我們根本就不必獨立……」云云。

在那些真正進行過解放鬥爭的被殖民地，在那裡，人民流過過的鮮血和武裝鬥爭的時間，促使知識份子們湧回到廣大民衆根基之處，在那裡，我們參與了一場真正的剷除工程，將知識份子所汲取自殖民主義資產階級的上層建築根除。在他自戀的獨白裡，殖民主義資產階級通過那些教授們的中介，的確使被殖民者深信，本質是不朽的，儘管所有的錯誤都該歸咎於人。那當然就是所謂的西方的本質。被殖民者接受了這些思想的基礎，人們可以在他腦子的一個褶子裡發現一

個警惕地捍衛希臘拉丁根基的哨兵。然而，在解放戰爭時代，被殖民者重新接觸他的子民，這個裝模作樣的哨兵就粉碎了。所有地中海的價值，人道的、光明、美的勝利，都變成了沒有生命和褪色的小玩意。所有這些華麗詞藻似乎成了空洞的堆積。這些似乎使靈魂高貴的價值黯然失色，因為它與人民投入的具體鬥爭完全無緣。

首先是個人主義消逝了。被殖民知識份子從他主人那裡學到，個人必須受到彰顯。殖民主義資產階級用棒槌把個人社會的想法打入被殖民者的思想裡，在這個社會裡，每個人關在自己的主觀裡，財富就是思想的富有。而在解放鬥爭時期，有機會逃到人民當中的被殖民者，將發現這個理論的錯誤。鬥爭的組織形式將向他提供不同的詞彙。兄弟、姐妹、朋友是被殖民主義資產階級所放逐的詞，因為對他而言，我的兄弟就是我的錢包，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手段。被殖民的知識份子，在一種類似火刑中，參與了所有偶像的毀滅：自私、傲慢的辯駁，老是要駁倒人的幼稚愚蠢。這個受殖民主義文化燒傷的知識份子，也將發現村民大會的組織內容密實、人民委員會密佈各地，地區或支部會議超乎尋常的頻繁。個人的事務今後不斷地成爲衆人的事務，因爲具體來說，大家都將被外籍兵團發現，可能被殺或得救。在這個脈絡下，「擺脫困境」(démériage)這種無神論的救贖方法是被禁止的。

一段時間以來，關於自我批評我們談很多：但，我們可知，這首先是一個屬於非洲的機制？無論是在北非的村落裡，或是在西非的集會裡，傳統的做法是，當一個村子裡爆發衝突時，必須

當衆辯論。當然是集體的自我批評，但帶點詼諧氣氛，因為大家都很放鬆，因為所有的人最終期待相同的結果。知識份子漸漸放棄算計、異常的沉默、不可告人的想法、暗中耍小聰明、祕密等等這些，漸漸，隨著他投身於民衆之間。我們因此可以這麼說，在這個層次上，團體已然勝利，它發散出自身的光芒，分泌出自己的理性了。

但是，有時候去殖民也會在一些尙未被解放鬥爭充分撼動的地區發生，我們又可以重新見到同樣機靈、狡猾、奸詐的知識份子。我們在他們的身上，完整無缺的重新找到他們與殖民主義資產階級交往過程中，撿拾得來的舉止和思考形態。昨天他們是殖民主義的寵兒，今天又搖身一變成爲國族權威的驕子。他們組織了某些掠奪國家資源的活動，冷酷無情地通過手段或合法的竊取爬上高位；濫用國家當前的貧困，大搞進出口、開股份公司、炒作股票、享受特權。他們再三要求商業國有化，即把市場和良機獨獨保留給國族主義者。在理論上，他們急切地要把從國家偷來的贓物國有化。在這個冷酷的國家時期，在所謂嚴峻階段，他們掠奪的成功迅速引起人民的憤怒和暴力。在非洲及國際的當前情況下，這個貧困和獨立的人民，快腳步邁向社會意識的覺醒。這一點，那些小個人主義者不用太久的時間就明白。

爲了吸收同化壓迫者的文化並且在其中冒險，被殖民者必須提出一些抵押品。其中，他必須要把殖民主義資產階級的思考模式變成自己的。這點，我們可以在被殖民的知識份子沒有對話能

力中看出來。因為他們在面對一個對象物或觀念時，不知道去讓自己成爲不重要的。相反地，當他在民衆中積極活動時，他將驚訝連連。他完全被民衆的誠實和正直解除了武裝。一個在暗處窺伺著他的、一直會有的危險，是搞民衆主義（populisme）。他變成一個隨聲附和的人，同意民衆的每一句話，並把它當作格言。然而，農民、失業者、挨餓者並不企求真理；他們絕不會說自己就是真理，因爲他的存在就是真理。

在這個時期，知識份子表現得宛如一個庸俗的機會主義者般客觀，事實上他沒停止耍手段。對人民而言，問題從不在於去拒絕知識份子，或使他走頭無路。人民要求的是把一切弄成是共同的。被殖民知識份子在人民大潮裡的融合，將會出現推延的情形，因爲他對細節的存在帶著一種古怪的崇拜。人民並非抗拒分析。他喜歡人家向他解釋，喜歡明白論證的逐條陳述，喜歡看方向往哪邊走。但是，被殖民的知識份子，當他和人民相處之初，老是計較細微末節，甚至忘記了殖民主義的失敗是鬥爭本身想要達到的目的。被席捲在多元形式的鬥爭當中，他傾向著重在地方性任務，大搞特搞，總是過於一本正經，卻看不到全局。他把規律、專長、領域各種概念導入人民革命這台可怕的混合攪拌機器裡。由於投入在一些確切的點上，他有時候會忘記運動全局的統一性，並在局部性失敗時，禁不住開始懷疑，甚至心灰氣餒。相反的，人民一開始就採用了全體性的立場。土地和麵包：如何能獲得土地和麵包呢？人民所採取的這個表面上局限和狹窄位置，追根究底，是最具豐富性和最有效的操作模範。

真理的問題同樣令我們非注意不可。在人民之中，任何時候，真理只歸於與國家相關的那些。沒有任何絕對的真理，沒有任何關於精神具透明性的論述，可以粉碎這一立場。被殖民者用同樣的謊言，來回答殖民地狀況的謊言。他們對自己的人格坦率，對殖民者在態度上則是收斂和模糊不清。加速殖民統治崩潰的那些，就是真的；促進國家出現的那些，就是真的，保護土著，擊潰外國人，這些是真的。在殖民脈絡中，沒有什麼真實的行為準則可言；所謂好的，只不過是傷害「他們」的那些。

因此，我們看到支配殖民地社會的原始善惡二元論，在去殖民時期原封不動地被保存下來。那是因為殖民者一直是敵人、對立者，更確切地說，是必須被推翻的人。壓迫者在他的轄區裡進行統治、剝削和掠奪；而在另一個地區裡，被殖民之「物」是被獵殺、被掠奪的，在能力可及的範圍內供養著壓迫者，無須過渡地直接從殖民地的岸邊到「母國」的宮殿和碼頭。在這被固定住的地帶，表面平靜，棕櫚樹在雲朵下搖曳，海浪拍打著鵝卵石，原料來來往往，殖民者的存在同時被正當化。而被殖民者仍舊蹲著，半死不活，永遠做同一個夢。殖民者寫歷史。他們的生平就是一部史詩，一部歷險記。他是絕對的肇始者：「這片土地，是我們造就它的。」他是持續的理由：「如果我們走了，一切都完蛋，這片土地將回到中古世紀。」在他面前的，是一些麻木不仁的人，他們打從內心受到狂熱與「祖先的習俗」紛沓困擾，面對殖民唯利是圖的新動力，他們構

成了一個幾近礦物般堅硬的框架。

殖民與被殖民的群眾關係

殖民者創造歷史，並且知道自己在創造歷史。因為他經常參照母國的歷史，他並明確地指出，他在這裡是延續這個母國。因此，他寫下的不是被他掠奪國家的歷史，而是他的國家在掠奪、侵略和使人挨餓的歷史。被殖民者被強迫成爲無法動彈的狀態，只有當他們決定結束殖民主義的歷史、掠奪的歷史，並使國族的歷史、去殖民的歷史出現時，才可能被重新審視。

被割裂的世界，善惡二元論的世界，動彈不得的世界，銅像的世界：征服這世界的將軍銅像、架橋工程師的銅像。這個對自己深具信心的世界，如一塊巨石，重壓在遭受鞭子抽打的脊椎上。這就是殖民地世界。土著是被關在籠子裡的人，種族隔離不過是分割殖民地世界的一種形式。土著首先學會的第一件事，是待在自己的位置上，不能超越界線。這也是爲何，土著的夢，是肌肉的夢、動作的夢、具侵略性的夢。我夢見自己跳躍、游泳、奔跑、攀登。我夢見自己哈哈大笑，跨過大河，被一堆永遠逮不到我的車子追趕。在殖民時代，被殖民者從晚上九點到早上六點之間，不停地解放自己。

這沉積在被殖民者肌肉裡的攻擊性，首先對自己的同胞發揮。這個時期，黑人們彼此互毆，

警察和預審法官面對北非這種犯罪行為爲不知所措。我們在後文將討論這一現象（參見第五章）。面對殖民地特有的安排，被殖民者恆常處於緊張狀態中。殖民者的世界是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充滿排拒，又同時使人失望。我們已經了解到，被殖民者經常夢想安頓在殖民者的位置上。不是變成殖民者，而是取代他。這個充滿敵意的、沉重、具侵略性的世界，因爲它粗暴的排斥被殖民者群衆，但這個世界所代表的，不是人們想要盡快逃離的地獄，而是一個觸手可及，但又有兇猛的看門狗守衛著的天堂。

被殖民者始終保持警惕，由於他很難辨識殖民世界那無數的符號，從不知道自己是否跨越了界線。面對由殖民者安排的世界，被殖民者始終被當作嫌疑犯。他的罪惡感並不是一種承認、接受的罪惡感，而比較像是一種咀咒，大禍臨頭（譯註2）。然而，在被殖民者內心深處，他並不承認這些對他的審理案件。他是被統治，而不是被馴服。他被貶低，但並沒有被說服而認爲自己低人一等。他耐心等待殖民者放鬆警戒，再撲向他。被殖民者的肌肉一直在等待。我們不能說他焦慮不安，說他害怕。事實上，他始終準備好要拋棄獵物的角色，而擔任獵人。被殖民者是個恆長夢想自己成爲迫害者的被迫害者。社會的象徵——憲兵、兵營響徹的軍號聲、軍隊列隊和高懸的旗幟——既是抑制劑又是興奮劑。這些象徵，毫不意味著「別動」，而是「好好準備攻擊」。事實上，假如被殖民者有沉睡與遺忘的傾向，那麼，殖民者的傲慢，和他心裡掛記著想去檢驗殖

民體制的牢固性的想法，也會再三提醒他：重大的決鬥絕不會無限期延長。這種取代殖民者的衝動，無時無刻不使肌肉處於緊張狀態下。我們知道，事實上，在目前的情緒狀態下，障礙的存在會使運動有加快發生的傾向。

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是群眾的關係。殖民者以其勢力來對抗數量。殖民者有暴露狂，他對安全的操煩讓他得高聲提醒被殖民者：「在這裡，我是主人。」殖民者在被殖民者的心中挑起了維繫著一把一發不可收拾的怒火。被殖民者被鎖在殖民主義的天羅地網裡。但我們看到，在那裡面，殖民者獲得的，只不過是一個假的石化狀態。被殖民者肌肉的緊張會週期的在一些血腥的爆發中獲得紓解：即部落的鬥爭、酋長間的鬥爭和個人之間的鬥爭。

在個人的層次上，我們參與了一場真正的理性的否定。殖民者或警察可以整天毆打被殖民者、侮辱他，叫他下跪，我們可以看到，被殖民者在碰到另一個被殖民者一點點的敵視或挑釁的目光，就會拔出刀來。因為他最後的一招，是用對付自己的同類來保衛自己的人格。部落鬥爭，只會使深埋在腦海中的舊恨，永遠傳下去。被殖民者大量地把肌肉消耗在報復上，企圖說服自己以為殖民主義並不存在，以為一切照舊，以為歷史在繼續。我們從那可以清楚地看集體的層次上，理解這些著名的逃避行為的意義：就好像沉浸在同胞的血中，就可以使人看不見障礙，就可以把以武裝鬥爭來反殖民主義這個不可避免的決定，拖延下去。在部落之爭中，非常具體地造成

集體的自我毀滅，這因此是被殖民者紓解肌肉緊張的途徑之一。所有這些行爲，是面對危險時的死亡反應，是自殺行爲，它讓殖民者在生命及統治獲得鞏固的同時，認定被殖民者是沒理性的一群。被殖民者也同樣借助宗教，成功地對殖民者不予理會。通過宿命論、罪惡、貧困、命運回歸上帝，壓迫者的一切創舉都被消除了。個人就這樣接受上帝所決定的腐敗解體，在殖民者和命運之前伏首貼耳，通過一種內心的再平衡，邁向一種石頭般的平靜。

然而，在這段期間，生活繼續下去，被殖民者通過廣泛且可怕的神話——這種神話在落後社會裡多如牛毛——而抑制自己的攻擊性：邪惡精靈的介入讓我們走路歪斜，那些兇神惡煞、半人半豹、半人半蛇、六足狗、殭屍，所有這些一系列無窮無盡的小動物或巨人，在被殖民者周圍支配著一個比殖民主義世界更可怕的禁忌、障礙和抑制的世界。這個滲入土著社會、魔術般的上層建築，在利比多經濟的動力中，擔任明確的的職務。事實上，落後社會的特徵之一，即是利比多首先是屬於團體、家族的事務。人類學家早已詳細描述過這個社會的特徵：在這個社會裡，那個夢見自己不是跟妻子，而是同另一個女人有性關係的人，必須要公開承認這個夢，並向那女人的丈夫或受傷害的家庭盡繳納實物，或以工代賑的義務。這一併證明了所謂史前社會非常重視無意識。

神話和魔術的氣氛，在令我害怕的同時，表現得如同一個不容置疑的現實。它在令我驚恐的同時，使我融入傳統、融入我的地區、我的部落歷史。但又同時令我安心，它給了我一個位置，

一張身份證。在落後國家，祕密這個面向是一個集體的面向，特別專屬於魔術的範疇中。在這千絲萬縷的網內，行動自我重複，帶有如同水晶般的永恆性，把我限制在這個網內的同時，被肯定為永恆的，則是我的世界，我們的世界。相信我，殭屍比殖民者更可怕。從此，問題不再是讓自己去符合殖民主義那披著鐵甲的世界的規定，而是在小便、吐痰或夜間出門時必須再三思量。

超自然、魔術的力量，表現為一股驚人的自我力量。殖民者的力量無限的萎縮，被貼上外來的標誌。我們不再需要去對抗他們，既然神話結構的可怕厄運也十分重要。我們看到，一切都獲得解決了，透過幻想層面上那些永恆的對決。

然而，這群人民，從前被分割成一個個不真實的小圈子，他們被一種無法言喻的驚嚇所折磨、卻樂於在夢般的折磨中自我迷失，在解放鬥爭中，這群人民自行解體了，又重新組織起來，並在血和淚中誕生了實際且直接的對決。給解放戰士（*moudjahidines*）吃的東西、為他們放哨、幫助欠缺生活所需品的家庭、代替被殺害或被囚禁的丈夫：這些都是在解放鬥爭中，人民被鼓勵去執行的具體工作。

在殖民世界，被殖民者的情感被維持在一種十分敏感的狀態，猶如裸露的傷口躲避腐爛因素那樣。精神機制縮起來，被磨滅了，透過肌肉的示威表現，做自我卸載，這讓一些學者認為，被殖民者是歇斯底里的。這種勃起的情感狀態，受到看不見的守門人的監視，他們可以直接與人格

的核心溝通，不須透過中介，這樣被監視的情感的勃起狀態，在危機時，將與情慾一起，透過運動機能上的消解，達到自我滿足。

從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被殖民者的情感狀態消耗在多少有些恍神的舞蹈中。這也是為何，研究殖民世界，必須要研究舞蹈和著魔。被殖民者也正是用肌肉的狂歡，來放鬆自己。在這個過程中，最激烈的攻擊性、一觸即發的暴力被疏導了、轉變了和消失了。舞蹈集會是受允許的，它提供保護以及允許。在固定的時間、日期，男男女女聚集在一個約定的地方，當著嚴肅的宗族面前，大膽地做出步伐不整齊，但實際上是系統化的示意動作，通過許多方法，不去承認頭的重要性，脊椎的彎曲，整個身體往後拋，一目了然的看出一個集體為驅魔，獲得解放，說出意見做出崇高的努力。一切都被准許……在圓圈內。人們爬上小山崗，好像要更接近月亮，溜到河邊陡坡上，彷彿要顯示舞蹈、大淨、清洗、淨禮等是具同樣價值的，這些地方都是神聖的場所。一切都被准許了，因為，實際上，人們聚集起來，只是為了讓積蓄的利比多和受阻的攻擊性，像火山爆發似的噴出來。象徵性的死刑，形象化的襲擊，想像中的各種謀殺，必須統統發洩出來。不愉快就在吵吵嚷嚷聲中，像熔岩般蔓延開來。

再進一步，我們掉入全然的著魔狀態中。的確，被組織起來的是場附魔——驅魔大會：對吸血鬼的迷信，中了鬼神、亡靈、妖魔的邪。這些人格的分裂、雙重性、解體，扮演了穩定被殖民社會的主要經濟功能。去的時候，男男女女十分不耐，步履維艱，「神經緊繃」。回來時，村子恢

復平靜、和平和靜止不動。

在解放鬥爭時期，我們將在某些操作裡頭，看到一種獨特的去情感狀態。人們背靠著牆，刀架在喉嚨上，或更精確地說，把電極放在他的生殖器上，在這種情形下，被殖民者被勒令不再陳述自身的歷史。

經過幾年不切實際、沉溺在最駭人的幻想中之後，被殖民者終於拿起槍，迎擊唯一否認他存在的勢力——殖民主義勢力。在戰火洗禮下成長的年輕被殖民者一代，很可能嘲笑——祖先的殞屍、雙頭馬、還魂的死人，以及趁人打哈欠時鑽到體內的鬼神，不過，這年輕的一代並沒有放棄這些。被殖民者發現了現實，並在自己的實踐中，在使用暴力中，在解放中企圖改變這個現實。

我們剛看到，這個暴力，在整個殖民時期，儘管一觸即發，但卻空轉著。我們也看到，它藉由舞蹈或著魔的情緒宣洩而被疏導。我們之前看到，它在同胞相殘的鬥爭中消耗殆盡。現在，問題就在於去掌握這個正在重新導向的暴力。之前，它沉溺於神話中獲得自我滿足，想盡辦法發現集體自殺的機會，現在，新的條件將使它改變方向。

暴力，作為補償

從政治的策略和歷史的觀點看，殖民地的解放在當代提出一個具根本重要的理論問題：什麼

時候可以說國族解放運動的局勢成熟了？它的前衛應該是什麼樣子？因為去殖民具有多樣性，理性於是猶豫著，禁止自身去說，什麼是真正的去殖民，什麼是假的去殖民。我們將看到，對於投身其中的人來說，有著決定方法、策略的迫切需要，即領導和組織的問題。否則，只剩下盲目的唯意志主義，具有極端反動的隨機性。

在殖民時代，是什麼勢力向被殖民者的暴力提出新方向、新的投資點呢？首先是政黨和知識、商業上的菁英。然而，某些政治組成有以下的特徵：他們只宣佈一些原則，而不發出命令。在殖民時代，這些國族政黨的一切活動就是選舉掛帥，這是一系列連續不斷、各抒己見地討論有關人民支配自己的權利、人性的尊嚴和有飯吃的權利原則的哲學——政治論文，高唱「一人一票」原則。國族主義的政黨從不強調力量對決的必要性，因為他們的目標不是要根本推翻體制。和平主義者，合法主義者，實際上他們是秩序的支持者，應該是說，是新秩序，也就是殖民資產階級秩序的擁護者。他們生硬的向殖民主義資產階級提出一個對他們來說根本的問題：「給我們更多的權力。」當涉及暴力這個特殊問題時，菁英們總是模稜兩可；他們的語言是暴力的，而態度是改良主義的。當這些資產階級國族主義的政黨幹部說一件事時，他們直言不諱表示他們實際上不這麼想。

要詮釋國族主義政黨的特點，必須同時通過國族主義政黨的幹部的素質，和支持者的素質。他們的支持者是城市居民。這些已從殖民情況中獲利、但顯然利益是被打折扣的勞工、教師、小手工業者、商人們，他們有著共同的利益。這些支持者要求的，是改善他們的命運，增加工資。這些政黨和殖民主義者間的對話，從未被中斷過。他們討論規劃選舉代表制、出版自由、結社自由，討論著改良。因此，看到大量的土著在宗主國的政治組織分支中積極活動，就不必大驚小怪了。這些土著針對一句「政權屬於勞工階級」的抽象口號而奮戰，卻忘了在他們的地區，首先引導戰鬥的，是國族主義的口號。被殖民的知識份子將他們的攻擊性，投資在想要同化於殖民地世界的意圖上，幾乎不加遮掩。他把這個攻擊性用來為自身、個人的利益服務。因此，個別被解放了的奴隸、獲得自由的奴隸階級，就輕易誕生了。知識份子所要求的，是增加獲得自由的奴隸，組織一個真正自由的階級。相反的，群眾並不期待看到個人增加成功的機會。群眾要求的不是殖民者的身份，而是他們的位置。大多數被殖民者渴望得到殖民者的土地；對他們而言，重點不是進入與殖民者的競爭當中，他們要的是他的位置。

農民被大多數國族政黨的宣傳撇在一旁。然而，十分清楚的，在殖民國家，只有農民是革命的。他不會失掉什麼，卻應該贏得一切。農民，這個失去地位的人、挨餓的人、受剝削的人，最快發現只有暴力能補償他。對他而言，沒有妥協、沒有和解的可能。殖民或去殖民，單純只是武

力較量關係。被剝削的人，爲了自己的解放，除了武力以外沒有別的手段。當一九五六年紀·摩勒先生〔譯註3〕對阿爾及利亞殖民者投降後，國族解放陣線在一本著名的小冊子中指出，殖民主義只是鬆開架在脖子上的刀，並沒有任何一個阿爾及利亞人覺得這些話太過份。這本小冊子只不過表達出所有阿爾及利亞人內心深處所感受到的：殖民主義不是一台思想機器，更不是具有理性的肉體。它在自然狀態下即爲暴力，只有在一個更強大的暴力面前才會屈服。

至此都還保持沉默的殖民主義資產階級，直到作決定性解釋時，才進入行動。他們引進一個新概念，即非暴力，但確切地說，那是殖民主義的一種新花招。在其原來的形式中，這種非暴力對知識份子或經濟方面的菁英而言，意味著殖民主義資產階級和他們有共同的利害，因此爲了能共同得救，必須迫切達成協議。非暴力是試圖在一切不可逆轉的形勢、一切流血、一切遺憾的行動發生前，大家圍著會議桌解決問題。但是如果群眾不等會議桌周圍的椅子擺好，只聽他們自己的聲音並開始放火行兇，我們就會看到那些菁英和國族主義資產階級政黨的頭頭們，奔向殖民主義者那邊，並對他們說：「這太嚴重了！我們不知如何結束這一切，必須找出一個解決辦法，必須尋求妥協方案。」

這個妥協的概念在去殖民化的現象中十分重要，因爲它並非那麼單純。事實上，妥協同時關

係到殖民體制和年輕的國族資產階級。殖民體制的擁護者發現，群眾有可能毀壞一切。破壞橋樑、破壞莊園、壓制、戰爭，這一切都嚴重打擊經濟。妥協也是爲了國族資產階級，在認不清這個颱風可能造成的後果的情況下，他們實際上害怕被這巨大狂風掃到，於是不斷向殖民者說：「我們還能阻止這場屠殺，群眾仍相信我們，要是你們不想壞了一切，那就趕快做吧！」下一步，國族政黨的領袖就和暴力保持距離。他高聲斷言，自己跟茅茅〔譯註4〕、這些恐怖份子、這些劊子手沒有任何關係；在最好的情況下，他退居到恐怖份子和殖民者之間的無人地帶，並毛遂自薦當起「對話者」：這意味著在殖民者不能跟茅茅討論的情況下，他十分願意開啓談判。這也是說，國族鬥爭的後衛部隊，也就是那些從未停止過與欲鬥爭對手處於同一邊的人們，卻翻跟斗的處於談判與妥協的前衛去了，因爲他們一直小心翼翼的避免與殖民主義中斷接觸。

在談判前，大部分的國族主義政黨，在最佳情況下，局限在爲這種「野蠻行爲」辯解。他們不極力要求人們鬥爭，往往在一些非公開的圈子裡，恣意譴責那些被報紙和母國輿論稱之爲醜陋的精彩行動。客觀看事物的考慮，構成了這種保守主義政治的正當藉口。然而，被殖民的知識份子和國族主義政黨領袖的這種典型態度，事實上並不客觀。事實是，他們不確定群眾這種不耐的暴力，是保護他們本身利益最有效的手段。也有人深信暴力辦法的無效。對他們而言，無疑的，所有透過武力粉碎殖民壓迫的嘗試，都是絕望的行爲，是自殺的行爲。也就是說，在他們的頭腦裡，殖民者的坦克和戰鬥機，占據了巨大的位置。當有人對他們說：必須行動，他們看到炸彈從

他們的頭上投下來，坦克車沿路開過來，砲擊、警察……而他們坐著不動。他們一開始就是輸家。他們無能用暴力獲勝，這點不需要被論證，已然在日常生活及行動中表現出來。他們還停留在恩格斯所採用的一種幼稚的立場上，恩格斯在跟杜林先生這位幼稚泰斗的著名論證中指出：「就像魯賓遜能搞到一把劍一樣，我們也能讓星期五在某個早晨手持手槍出現，於是整個『暴力』關係顛倒了：星期五指揮，而魯賓遜被迫苦幹……因此，手槍戰勝了劍，甚至連最幼稚的公理愛好者無疑也會持有這樣的看法：暴力不是一個簡單的意願行為，這個意願要能付諸實行，得要有一些十分真實的先決條件，尤其是一些工具，而最完善的工具會勝過不太完善的；此外，這些工具得生產出來，這也意味著，較完善的暴力工具的生產者——粗略說來，就是所謂武器生產者——會勝過較不完善的武器生產者。一句話，暴力的勝利基於武器的生產，而武器生產反過來是建立在一般生產的基礎上，因此……建立在『經濟勢力』、經濟的國家、暴力能支配的物質手段的基礎上。」〔註2〕的確，改革主義的領袖們不講別的：「你們拿什麼去跟殖民者作戰？用短刀嗎？用獵槍嗎？」

在暴力這個領域，工具的確是重要的，因為原則上，一切都建立在工具的分配上。但，殖民地解放為這個領域帶來新觀點。例如，我們看到，一八一〇年的西班牙戰役中，儘管拿破崙統帥

〔註2〕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 《反杜林論》 (Anti-Dühring) 第二部 · 第三章〈暴力的理論〉 (Théorie de la violence) · Editions Socia-

四十萬雄兵入侵，還是被迫撤退。然而，法國軍隊可是因它的武器、士兵的勇猛、統帥的軍事天才，使整個歐洲顫抖。面對拿破崙軍隊龐大的手段，西班牙人受屹立不搖的國族信念所鼓舞，發現了二十五年前美國民兵曾用來反抗英國軍隊的那種游擊戰。但是，如果被殖民者的游擊戰，不是作爲一個新要素，存在於這個全球化的競爭過程、介於托拉斯與壟斷之間的一個新要素，那它就不會成爲一種暴力工具，能與其他暴力工具對抗。

資本主義與殖民地的共犯關係

在殖民最初，一支特遣隊就能占領一大片土地：剛果、奈及利亞和象牙海岸等等。然而，今天被殖民者的國族鬥爭處於一個嶄新的狀況中。飛躍上升的資本主義，看到了殖民地是原料的源頭，這些原料加工後就可以傾銷歐洲市場。經過一個資本積累階段後，它在今天達到了對一樁買賣盈利概念的修正。殖民地變成了市場。殖民地居民變成了買東西的消費者。因此，如果必須繼續加強駐軍，如果貿易萎縮，即加工品和工業產品不能再出口，這便證明了必須把軍事解決方案排除掉。一種奴隸主義型的盲目統治，對宗主國來說，並沒有經濟的盈利可言。宗主國資產階級獨占派不支持一個僅會依賴刀劍政策的政府。宗主國的工業家和金融家們所期待的，不是大量殺戮土著，而是要借助經濟合作來捍衛他們的「合法利益」。

因此，資本主義與殖民地上爆發的暴力勢力，在客觀上成爲共犯關係。再加上，被殖民者並

不是單獨面對壓迫者。當然，他們受到進步的各國及人民在政治上及外交上的支援。尤其有各國金融集團進行的競爭和殘酷的戰爭。一個柏林會議可以把非洲瓜分成三、四個國籍。今天，重要的不是某個非洲地區是法國的或比利時的統治地，而是經濟地域受到保護。猛烈的砲擊或焦土政策，如今已讓位給經濟上的隸屬了。今天，不必再為對付蘇丹土著而進行鎮壓戰爭了。人們較高雅些，較不血腥，決定和平解決古巴卡斯楚體制。人們嘗試招住幾內亞，嘗試推翻穆薩迪克（譯註 5）。因此，害怕暴力的國族領袖如果想像殖民主義者「要把我們都殺光」，那就錯了。當然，軍人們繼續玩弄殖民地征服時代的假象，但金融界人士很快就把它們帶回現實中。

這也是為何，有理智的國族主義政黨，被要求盡量明確表達他們所要聲討的，並且與夥伴，也就是殖民主義者，一搭一唱，心平氣和的，共同尋找一個尊重雙方利益的解決良策。我們看到國族改革主義，經常以誇大的公會主義形式表現，一旦他們決定行動，就會透過高度和平的方式：安排城市內工業部門的罷工，以遊行示威歡迎領袖，聯合抵制巴士或進口食品。這些活動，同時用來對殖民主義施壓，又可讓人們消耗力氣。實行這種冬眠療法（l'hiberno-thérapie），這種人民的睡眠療法，有時竟能奏效。於是，從會議桌上的討論，出現了一種政治的升級，使加蓬共和國（République du Gabon）總統姆巴（M. M'ba）在巴黎官方訪問時，十分莊重的說：「加蓬獨立了，但加蓬和法國之間什麼也沒改變，一切繼續照舊。」事實上，唯一改變的是，姆巴先生是加蓬共和國總統，和他受到法國總統的接見。

殖民主義資產階級在安撫被殖民者的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宗教的協助。所有甘受侮辱、寬宥冒犯、不動聲色地接受別人吐口水和辱罵的聖徒，都被當作模範。殖民地各國的菁英們、這些被解放的奴隸，當他們站在運動的前面，必然以產生一個戰鬥的代用品而告終結。他們充分利用同胞的奴隸狀態來羞辱擁護奴隸制的人，或向與他們競爭的屬於壓迫者的金融集團，提供一個滑稽可笑的人道主義意識形態內容。現實上，他們從未真正號召奴隸，從未具體動員奴隸。恰恰相反，在真實的那一刻，即對他們而言是謊言的一刻，他們揮舞起群眾動員的威脅旗幟，當作好比可能神奇「終結殖民體制」的決定性武器。在這些政黨內部、幹部中間，顯然有些革命者斷然不理這種國族獨立的鬧劇。但是他們的干預、他們的積極、他們的發怒動作，迅速惹火了黨機器。這些人逐漸被孤立，然後被甩開了。在這一時刻，宛如辯證法似的關聯性，殖民者警察找上他們。在城裡不安全，活躍份子對他們避而遠之，領袖拋棄了他們；這些帶著煽動性眼神的不受歡迎人物，只有離開城市，往鄉村去。他們察覺到，帶著某種暈眩感，農民群眾一知半解的聽懂他們的話，而且直截了當問那個他們毫無準備答覆的問題：「我們什麼時候開始幹？」

暴力氛圍漫開後

來自城市的革命者和鄉下人的會面，將在以後引起我們的注意。現在我們該回到政黨，該來指出他們行動裡頭，不管怎樣仍算是進步的特點。政治領袖在他們的論述中「說出」國家這個名

稱。被殖民者的要求因此獲得了一個形式，沒有內容，沒有政治、社會綱領，只有一個模糊的形式，但不管怎樣總是一個國家的形式，一個框架，那我們稱作最低要求者。握有發言權、在國族主義的報章上寫文章的政治人物們，他們給了人民一個夢想。他們避免顛覆，但事實上，卻在聽眾或讀者的意識中植入了可怕的顛覆酵母。經常，我們使用國族或部落的語言。這又再度支持了夢想，使得想像能跳脫殖民秩序。有時候這些政治人物還說「我們黑人，我們阿拉伯人」，而這個具矛盾雙重性的沉重稱呼，在殖民階段得到一種類似神聖化的感覺。國族主義的政治家們正在玩火。因為，正如一位非洲領袖最近向一群年輕知識份子吐露說：「先好好思考後再跟民衆談話，他們很快就激動起來。」總之，歷史的狡猾，將可怕的玩弄殖民地。

當政治領袖召集民衆參加集會時，我們可以說空氣中瀰漫著血腥味。然而，這位領袖所關心的，往往是要「展現」武力，目的不是要使用它。看群眾聚集在一起、周圍有警察包圍、軍事示威演習、逮捕、放逐領袖——這一切維持了興奮感，又引起民衆騷動的混亂，給人民一種幻想：他們以為時候到了，是要幹什麼的時候了。在這些不穩定的時刻，政黨不斷呼籲左派要鎮靜，同時又探索右派的思想境界，企圖辨識殖民主義的寬容意圖。

人民同樣利用這種共同生活的插曲來準備並維持革命能量。例如，好幾天內一直與追捕他的警察作戰的土匪，那個在一次格鬥中撂倒四、五個警察後不支倒下的人；爲了不肯「招供」同謀

而自殺的人；他們對人民來說，是燈塔，是模範，是英雄。顯然，說這些英雄是小偷、壞蛋或墮落者，根本無濟於事。如果這個人被當局追捕，是由於他的行為指向某個殖民者的人身或財產，那麼界線就十分清楚了。認同過程是自動的。

同樣必須注意到國族抵抗殖民地征服的這段歷史，在這成熟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被殖民人民當中的偉大人物，始終是那些領導國族抵抗入侵的人。貝昂贊（Béhanzin）、松迪亞塔（Soundiata）、薩莫里（Samory）、阿布蝶兒卡戴爾（Abdel-Kader）等人，他們特別在行動前那段時期復活了起來。這證明人民準備重新出發，中斷殖民主義引進的停滯，並創造歷史。

新國族的湧現，以及殖民結構的摧毀，要不是獨立的人民暴力鬥爭的結果，就是來自邊陲暴力行動的結果，這樣的暴力行動由其他的被殖民者承擔，並對殖民體制產生強制性效果。

被殖民的民衆並不孤立。儘管殖民主義使盡氣力妨礙，但是它的邊境仍舊可被新的消息、外面世界的迴聲滲透。它發現暴力已成爲一種氣候，到處爆炸，到處席捲殖民體制。這種成功的暴力對被殖民者不單提供報導的作用，而且是可具操作性的。越南人民在奠邊府的偉大勝利，嚴格來說，不再僅僅是越南人民的勝利了。從一九五四年七月起，殖民地民衆向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爲了實現一個奠邊府，該怎麼辦？該如何行動？」再也沒有任何一個被殖民者懷疑這個奠邊府「勝利」的可能性了；反而要如何整備武力、組織和投入行動的日期這些才是問題所在。這

種來自四面八方的暴力不單單改變了被殖民者，也改變了殖民主義者，使他們意識到還有許多邊境。所以，這也是為何，一個真正的恐慌將控制殖民主義政府。他們企圖先下手為強，把解放運動向右扭轉，並解除人民的武裝：快點，快點，讓我們進行去殖民化。讓我們趕快把剛果去殖民，免得它成爲另一個阿爾及利亞。讓我們爲非洲投票表決憲法架構，創造共同體（Communauté），革新這個共同體，我替你們來驅魔，讓我們趕快進行去殖民，去殖民……他們以這樣的速度來去殖民，把獨立強加給了烏夫埃·玻尼（Houphouët-Boigny）（譯註9）。殖民主義者以設定框架、輔導的策略，基於對國家主權的尊重立場，來回應被殖民者定義下的奠邊府戰略。

但是，讓我們再回到這個暴力氛圍，這個一觸即發的暴力。我們看到，在暴力日益成熟的過程中，許多傳送帶把它接過來，再帶出去。儘管殖民體制迫使暴力在部落抗爭或地方山頭主義鬥爭中變了形，但暴力仍逐步前進，被殖民者認清了他的敵人，自己所有的不幸從此有了名字，並把自己的仇恨和憤怒全部投入這條新道路。但是，我們要如何從暴力的氣氛過渡到暴力行動呢？什麼事使這重砲彈爆炸呢？事實上，首先是「暴力的」這個發展不會讓殖民者的幸福毫不受影響，「熟悉」土著的殖民者從許多跡象上察覺到有些事情正在起變化。善良的土著變得很稀少，壓迫者一走近，只見一片沉寂。有時候，土著的目光變得兇狠，態度和講話直截了當充滿了挑釁。國族主義政黨開始騷動，集會頻繁，同時，警力增加，援軍抵達。殖民者，尤其被孤立在自己農莊裡的農業經營主，首先惶恐不已，他們要求當局採取強有力的措施。

果然，當局採取了轟轟烈烈的措施，他們逮捕了一、兩個領袖，大搞軍事演習及閱兵、空中飛行。示威演習、作戰操練，空氣中瀰漫著的火藥味，並未嚇退人民。這些刺刀和連續砲轟更加强了他們的攻擊性。空氣變得十分凝重，人人都想證明自己已準備好放手一搏。也就是在這種狀況下，子彈獨自打出來，因為神經衰弱，恐懼至極，人們對板機十分敏感。一件平常的偶發事故，卻開始機槍掃射：在阿爾及利亞的塞提夫，在摩洛哥的中央露天採礦場，在馬達加斯加的穆拉曼加。

鎮壓非但無法消除國族意識的躍動，反而是增強了它的進展。在殖民地，當自覺的萌芽到達一定階級時，大屠殺加強了這種覺悟，因為它顯示出，在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一切以武力來解決。我們在這裡必須指出，政黨並無發出武裝暴動的命令，沒有準備這種暴動。所有這些鎮壓，這些因恐懼而起的行動，都不是領袖們所樂見的。事件令他們措手不及，所以當局能夠決定逮捕他們。但是今天殖民主義國家的政府完全知道，除掉群眾領袖是十分危險的。因為到那時，人民如脫韁之馬，投入農民暴動、叛亂和「野獸般的屠殺」之中。群眾充分發揮「殘忍的本能」，並迫使當局釋放一些領袖，而把重新恢復平靜的艱鉅大任交給領袖們。被殖民者自發地把暴力投入摧毀殖民體制的巨大任務中，不久將與那些無活動力、搞不出名堂的「釋放X先生或Y先生」〔註3〕的口號攪和在一起了。於是當局釋放這些人，並同他們談判，群眾舞會的時間開始了。

在另一種情況下，黨機器可以維持毫髮無缺的狀態。但是，由於殖民主義的鎮壓和人民的自發反應，政黨被其中積極活動份子搞翻天。群眾暴力與占領者的兵力激烈對峙，形勢惡化，險象環生。於是，自由之身的領袖們站在邊線上。他們的官僚機關和良好的綱領突然變得一無是處，人們見到他們遠在事件外，試著以「被戴上嘴套的國家」為名義，進行一場終極的冒名頂替工作。按照一般慣例，殖民主義者會立刻貪婪地撲向這個意外的好運，把這些沒用的人轉變為對話者，馬上給他們獨立，要他們恢復秩序。所以，我們看到，人人都意識到這種暴力，問題不總是在於以更大的暴力去回應它，而在於如何解除危機。

那麼，事實上，這種暴力是什麼呢？我們之前看過，這即是被殖民大眾所擁有的一個直覺：他們必須解放，而且，除了透過暴力外，別無他法。這群沒有技術、飢餓衰弱的、不熟悉組織方法的人，在面對占領者強大的經濟力及軍事力時，是怎樣的一種精神脫軌，竟讓他們相信，只有暴力才能解放他們呢？他們怎能期待勝利呢？

因為暴力——這是丟臉的事——作為方法，可以成爲一個政黨的口號。一些政黨幹部可以號召人民進行武裝鬥爭。必須深思暴力這個問題性。當德國好戰者決定通過武力解決邊境問題，我們對這一點也不驚訝。但當安哥拉人民決定拿起武器，阿爾及利亞人民摒棄非暴力的方法時，證

〔註3〕有一種可能的情况是，領袖真正作爲被殖民群眾的表達。在這樣的情况下，殖民主義將利用他被拘禁的狀況，從中獲益，並試著生產出新的領袖。

明發生了或正在發生一些事情。被殖民的人，這些現代的奴隸，已經不耐煩了。他們知道唯有這種瘋狂才能使他們擺脫殖民壓迫。世界建立了一個新的關係形式。落後國家的人民扯斷了他們的鎖鏈，並且不可思議的成功了。人們可以宣稱，在人造衛星的時代，餓死人是荒謬的，但對被殖民大眾來說，這個表達並非那麼脫離現實。事實上，今天沒有一個殖民主義國家，能只靠延長大規模的駐軍這種鬥爭型態，就僥倖成功的。

在自己國內，殖民主義國家面對種種矛盾、勞工的要求等等，勢必動用警察力量。加上當前的國際情勢下，這些國家需要軍隊來捍衛體制。最後，人們知道由莫斯科指導的解放運動的神話。從體制的膽小論辯看來，這意味著：「如果繼續這樣下去，共產黨會利用這種混亂而滲透到各地方。」

在被殖民者的不耐當中，就他奮力揮舞著暴力威脅的旗幟而言，這證明他已意識到當前情境的一個獨特性格，並且打算利用它。而且，在直接的經驗方面，被殖民者由於有機會看到現代社會深入荒漠的最偏僻角落中，他相當敏銳地意識到他不曾擁有的東西。群眾，出自一種推理，可以說是相當幼兒式的推理，堅信所有這些東西都是人們從他們那兒偷走的。這也是為何，在某些落後國家裡，群眾走得很快，並在獨立兩三年後，感到相當挫敗，覺得若沒什麼真正的改變，那實在就「不值得」為此戰鬥。一七八九在資產階級革命後，法國地位最低的農民從此大變動中獲

得物質上的好處。但普遍可以見證到的是，在大多數的例子中，對落後國家中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居民而言，獨立並不帶來立刻的變化。內行的觀察家意識到，存在著一種潛在的不滿，猶如一場火災過後還未燒完的灰燼，始終有再著火的危險。於是，有人說，被殖民者想走得太快。然而，我們可別忘了，才在不久以前，有人抱怨他們太遲鈍、太懶散和宿命論。人們已察覺，在解放鬥爭時，方向明確的暴力，並沒有經過升旗儀式後，神奇地熄滅。它尤其因為國家建設還處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決定性競爭的架構內，而不熄滅。

這個競爭，將一個最爲地方性的要求，賦予了一個幾乎是世界性的面向。每個集會、每個鎮壓行動，會在國際舞台上得到響應。發生在沙佩維爾^{〔譯註7〕}的謀殺事件，震撼了輿論幾個月，在報上、在電台廣播中、在私人談話中，沙佩維爾變成一個象徵。透過沙佩維爾，男男女女開始討論南非的種族隔離問題。我們無法聲稱，只因那些蠱惑人心的宣傳，大國突然關心起落後地區的「小事情」。每次農民暴動，每一次第二世界的動亂，都屬於冷戰的範圍。在薩利茲伯里（Salisbury），兩個男人挨棍棒毒打，一整個集團即受到撼動，開始談論這兩個人，藉這個打人事件的機會，引發辛巴威的羅德西亞（Rhodesia）的特殊問題，並把它同整個非洲和全體被殖民的人聯繫起來。但另一個集團也進行同樣規模的活動，衡量著其體制裡地方性的缺失部分。被殖民者意識到，沒有一個集團不對地方上發生的事情感興趣。他們不再將自身局限在區域性的小圈圈裡，他們知道他們正處於全世界的動盪氣氛中。

殖民暴力和和平暴力之間

當我們得知，第六或第七艦隊每三個月會駛向某個海岸時，當赫魯雪夫（譯註8）威脅要用飛彈來挽救古巴的卡斯楚時，當甘迺迪提到寮國，決定考慮採取極端的解決辦法時，被殖民者或新獨立的人民會有一個印象：不管願意或不願意，自己都會被拖著狂奔。事實上，他們已經在行進了。我們舉最近解放國家的政府為例：當權者把他們三分之二的時間用來監視四周，防止可能會有威脅，只剩下三分之一時間為國家服務。同時，他們替自己找靠山。遵循同樣的辯證法，國族內部的反對派蔑視議會，不走這樣的路線。他們尋找答應支持兇暴騷亂的同盟者。暴力的氣氛在滲透到殖民階段後，繼續不變地支配著國民的生活。因為，我們曾說過，第三世界並未被排除在外。恰恰相反，它處在風暴的中心。所以，這也是為何落後國家的政治家在論述時，無止盡地維持著攻擊性和誇張的口氣，而在正常情況下，這些本應該消失。我們同時也理解到，這些新領袖們的不禮貌是經常被注意到的。但人們較少注意到，他們對同胞或同志們過分有禮貌的另一面。不禮貌是一種行為，首先用來對付其他人，對待前來觀察和調查的前殖民主義者。前被殖民者太常有這樣一個印象，認為這些調查的結論已被寫好了。記者的採訪是個證明。文章穿插照片，證明他在談什麼、到過那裡。調查意在證明一個事實：自從我們不在那兒後，一切都亂糟糟。記者通常埋怨沒受到禮遇，工作條件差，更遭到冷漠或敵意的阻擋。這一切都很正常。因為

國族主義的領袖知道，國際輿論不過是西方新聞界製造出來的。當然，當一個西方記者向我們問問題時，很少是爲了要幫我們。例如，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那些最自由主義的法國記者，不斷使用曖昧的形容詞來描述我們鬥爭的特點，當有人責備他們時，後者卻信誓旦旦地說自己是客觀的。但對於被殖民者而言，客觀性總是被用來反對他們。同樣地，我們也明白，一九六〇年九月在聯合國大會上所出現的新國際外交口氣，對殖民地各國代表是挑釁的、粗暴的、過激的，但殖民地民衆並不認爲他們太過份。非洲代言人的激進主義使傷口化膿，讓大家更加看清楚，大國的否決權和彼此間對話的本質，以及第三世界微不足道的作用。新獨立人民所開創的外交，不再是微妙的言詞、話中有話和催眠誘導。這是因爲，他們的代言人受人民的託付，要同時捍衛國家的統一性、發展群衆福利和人民擁有自由及麵包的權利。

這是一個在行動中、轟轟烈烈的外交，與殖民化的停滯、僵化世界形成奇特的對照。當赫魯雪夫先生在聯合國大會上，揮舞著他的皮鞋，並拿它捶桌子時，沒有一個被殖民者、落後國家的代表對此笑出聲來，因爲赫魯雪夫向看著他的殖民地國家展示出，他，這個俄羅斯農民，可是擁有火箭，他如此對待資本主義的可憐蟲，那是他們應得的。同樣，穿軍裝出席聯合國大會的卡斯楚，也不會引起落後國家的議論紛紛。卡斯楚所展現的，是他意識到暴力統治繼續存在。令人驚訝的是，他居然沒帶機關槍進聯合國；但有人會反對嗎？農民暴動，絕望的行動，用短刀或斧頭武裝起來的集團，他們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你死我活對立鬥爭中，找到了自己的國籍。

一九四五年在塞提夫死去的四萬五千人，不會被注意；一九四七在馬達加斯加死去的九萬人，可能只占報紙上一則簡短的報導；一九五二年在肯亞遭到鎮壓犧牲的二十萬人，可能遭到相對無動於衷的待遇。這是因為國際矛盾還不夠明顯。韓戰和印度支那戰爭已開創了一個新的階段，但尤其是布達佩斯（譯註9）和蘇伊士運河事件（譯註10），構成了這種對立的決定性關鍵時刻。

被殖民者依靠社會主義國家無條件的支援，用他們的武器衝向殖民主義不可攻克的堡壘。如果說這個堡壘是用大刀和赤手空拳攻不破的，那麼，當人們決定考慮冷戰的情勢時，它就不再是銅牆鐵壁了。

在這新形勢下，美國十分認真地扮演守護國際資本主義的角色。最初，他們建議歐洲人爲了釋出善意而實行去殖民。後來，他們就毫不遲疑地大聲宣佈：先是尊重，然後是支持非洲屬於非洲人的原則。今天，美國不怕公開正式宣稱，他們是捍衛人民享有自己統治自己權利的衛士。門農—威廉斯先生（譯註11）最近的旅行，只是表明美國人意識到第三世界不該被犧牲。因此，人們可以明白，爲什麼被殖民者的暴力，只有在把它抽象地同壓迫者的軍事機構相比較時，才是絕望的。相反的，如果把這種暴力放在國際力學上，人們就會注意到，它對壓迫者構成可怕的威脅。農民暴動和茅茅團騷亂的持續不息，打亂了殖民地經濟生活的平衡，但並不危及宗主國。而就帝國主義之眼看來，比較重視的，是社會主義宣傳滲透大眾、並感染他們的可能性。在冷戰時代，這已是個深刻的危險了，如果引起熱戰，這個被謀殺人命的游擊戰所摧毀的殖民地，又會變成什

麼樣呢？

這時，資本主義意識到，它自己的軍事策略，在面對爆發的國族解放戰爭，有全盤皆輸的危險。在和平共存的架構內也是，呼籲讓所有的殖民地消失，更加極端地，呼籲起資本主義要去尊重的中立主義。因為，不管怎樣，首先要避免的，是戰略上的不安全，即大眾向敵對的學說敞開大門，點燃幾千萬人根深柢固的仇恨怒火。被殖民的民眾完全明白這種支配國際政治的強制必然。這也是為何，即使那些怒斥暴力的人，也勢必依照這個全球暴力來做決定和付諸行動。今天，兩大陣營之間的和平共存，在殖民地國家中維持暴力並挑起暴力。明天，我們可能會看到在殖民地全面解放後，這個暴力區域將移往他處。也許我們會看到，少數國族的問題將浮出。少數國族當中一些人，為了解決自己的問題早已毫不躊躇地讚美暴力了，我們說，美國的黑人激進派民兵會武裝起來並非偶然。如果在所謂自由世界中，有保護蘇聯猶太人少數國族的委員會，並且，戴高樂將軍在他的一次講話中，對受共產主義獨裁壓迫的幾百萬穆斯林灑下幾滴眼淚，這也並非偶然。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深信，反種族主義鬥爭和國族解放運動都純粹是從「外部」醞釀、遙控的動亂。因此，他們決定用這種有效的戰術：自由歐洲之聲，支援被統治少數派的委員會……他們搞反殖民主義，就像在阿爾及利亞的駐軍司令那樣，指揮特種空中勤務（SAS）或心戰課，進行顛覆性戰爭。他們「利用人民反人民」，其結果眾所皆知。

這種暴力和威脅的氣氛，這些揮舞著的火箭，嚇不倒被殖民者，也沒有使他們迷失方向。我們看到，他們在整個最近的經歷中，得以「了解」這個情勢。在當代世界沉浸其中的殖民暴力及和平暴力之間，有一種共犯的對應關係和同質性。被殖民者適應了這種空氣，總算是跟上了時代。有時，人們驚訝於，被殖民者不肯買一件洋裝給自己的妻子，卻寧願買個半導體收音機。這沒什麼好驚訝的，因為被殖民者深信他們時來運轉了。他們生活在世界末日的氣氛下，認為什麼也逃不過他們的注意。這也是為何，他們很了解寮國的富馬（Phouma）和富米（Phoumi）、剛果的盧蒙巴（Lumumba）和衝伯（Tschombé）、喀麥隆的阿伊喬總統（Ahidjo）和木米（Moumie）、肯亞的肯亞塔（Kenyatta），和那些定期被推到前面取代他們的人。他們十分清楚這些人物，因為他們揭露了其背後的運作勢力。被殖民者，落後國的人，是今日最具全球意義的政治動物。

獨立的確帶給被殖民人民道德上的補償，並建立了他們的尊嚴。但是他們還沒有時間建構一個社會，建立和肯定一些社會規範。尚未存在一個熾熱的泉源，使得公民和人類能在其中開展出愈來愈廣闊的領域，並能從中獲得發展與滋養。由於被置於一種不確定的狀態中，這些人輕易地相信，所有的一切將在他處被決定，同時替所有的人決定。至於政治領袖們面對這種形勢時，先是猶豫不決，然後選擇中立主義。

中立主義

有關中立主義本來還有好多可談之處。有些人把它等同於一種左右逢源又令人厭惡的唯利是圖。誠然，中立主義這個冷戰的產物讓落後國家得到雙方的經濟援助，但事實上，卻不能使每一方各自恰當地來協助落後地區。投入在軍事研究上、天文數字的金錢，轉變成核戰技師的工程師，這可能在十五年內提高百分之六十落後國家的生活水平。因此我們明白，對落後國家有利之處，既不是延長，亦非加劇這個冷戰。但有時候人家根本不徵求他們的意見。於是，他們在有能耐時便脫身。但真正能這樣嗎？例如，現在法國在非洲試爆原子彈。除了一些提案、會議和造成轟動的斷交之外，不能說非洲人在這個特定的範圍內對法國的態度有影響。

中立主義在第三世界公民身上，產生出一種精神態度，在日常生活上表現為勇敢無畏、莊嚴的自豪精神，特別的是，這些精神好比一種對抗。這種明確拒絕妥協，不想隸屬於什麼的頑強意志，令人聯想到高傲又什麼都沒有的青少年的行為，他們總是隨時準備為一句話而犧牲。所有這些都令西方觀察家啞口無言。因為，在這些人假裝出來的樣子與背後所擁有的之間的差距，嚴格說起來是醜聞一件。這個沒有電車、軍隊、沒有錢的國家，並不正當化他們在白晝裡的虛張聲勢。不用再懷疑，這是一個騙局。第三世界經常給人一種悲喜交集，和每週一次定期服藥以防止

發作的印象。這些一無所有、說話大聲的國家領袖們使人激怒，讓人想叫他們閉嘴。然而，有人奉承他們，給他們獻花，邀請他們。我們應該承認，許多人在爭取他們，這就是中立主義。他們的國家有百分之九十八的文盲，但他們的談話卻是引經據典。他們到處旅行；落後國家的領導階級和大學生是航空公司的金礦。非洲和亞洲的負責人，同一個月裡有可能先去莫斯科聆聽有關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的課程，再去倫敦或哥倫比亞大學求教有關自由主義經濟的好處。非洲的工會幹部們，則以一種加快的節奏在進步著。他們一當上領導位置，就決定要自己組織自主的工會。他們完全沒有工業國過去五十年的工會活動經驗，但已經知道不管政治的工會活動是荒謬的。他們不會迎擊過資產階級機器，沒有在階級鬥爭內發展出自己的意識，但這或許是不必要的；也許，我們將看到，這個經常被諷刺誇大成全球主義的整體性意志，是落後國家最基本的特徵之一。

讓我們回到被殖民者和殖民者獨特的戰鬥上。我們看到，這是不折不扣的武裝鬥爭。歷史上的例子包括印度支那、印尼，當然還有北非。不該忽視，這種武裝鬥爭隨時隨地會在一些地方爆發，在幾內亞或是索馬利亞，今天只要殖民主義仍延續的地方，它就會引爆，例如在安哥拉。武裝鬥爭的存在，證明了人民決定只相信暴力手段。殖民者不停地告訴人民，他只懂得武力的語言，他於是決定用武力來作自我表述。事實上，長久以來，殖民者向他指出他該走的道路，如果想要解放就得走殖民者的路子。被殖民者選擇的論證，是殖民者指點他的，透過諷刺性的事態回轉，現在是被殖民者斷言殖民者只懂得武力而已。殖民體制從武力取得了正當性，而且從來就沒

有試著去隱瞞這個性質。每一座雕像，費德爾布 (Faidherbe)、利奧泰 (Lyautey)、布喬 (Bugeaud) 或布朗當 (Blancan) 中士的雕像，所有這些矗立在殖民地上的征服者，不斷表示唯一和同一件事：「我們是通過刺刀來到這裡……」大家輕易地就可以把句子完成。在暴亂時代，每個殖民者以精確的算術來推理。其他殖民者對這個邏輯不以為奇，但重要的是，連被殖民者也不以為怪。首先，對「是他們或我們」這個原則的肯定並不是一個悖論，因為就如我們先前理解到的，殖民主義正是一個善惡二元論的世界，一個分割的世界。當殖民者，在提倡明確辦法的情況下，要求每個作為壓制的少數派代表去幹掉三十或一百甚至兩百個土著時，他發覺沒有一個人是憤怒的，而且問題最多不過是知道他們是一下子還是分階段完成〔註4〕。

這種以非常算術的方式預見被殖民者消失的推理，並不使後者因為義憤而亂了陣腳。他老早就知道，要在格鬥場上和殖民者一決雌雄。因此，他不會把時間浪費在唉聲嘆氣上，也不會企求別人在殖民地的框架內還他正義。事實上，如果在殖民者的論證下，被殖民者是堅定不搖的，那是因為，被殖民者用同樣的辭彙來提出他的解放問題：「我們把自己組成兩百人或五百人的團

〔註4〕很明顯的，這種以清空為主的掃蕩，會摧毀本來想要拯救的事物。這正是沙特所說的：「總之，通過重複（有關種族主義思想）這個事實本身，人們揭示出所有人團結起來對抗土著是不可行的，它只是惡性循環，況且，這種團結的凝聚，只有在屠殺被殖民者時才會形成，這也是移殖民者一直有的荒謬企圖。何況，如果這種團結同盟能夠實現的話，它最終一下子就會消滅殖民主義。」（《辯證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頁三四六）。

體，每個團體對一個殖民者。」每個主角就在這種相互的精神佈局下，開始決鬥。

對於被殖民者而言，這種暴力代表絕對的實踐。身處組織中的活動份子也是在工作中的。組織向活動份子提問的問題，標示了此一思想印記：「你曾在哪裡工作？跟誰在一起？幹過什麼？」團體要求每個人完成一項不可逆轉的行動。例如，在阿爾及利亞，幾乎所有號召人民進行國族鬥爭的人皆被判死刑，或遭法國警察追捕，信賴度和每個事件的絕望程度成正比。當一名新的活動份子再也無法回到殖民體制的懷抱時，你就可以信賴他。肯亞的茅茅團裡似乎也存在著這樣的機制，他們要求團體的每個人拷打受害者。因此，每個人都對這位受害者的死負責。所謂工作，就是工作殖民者的死亡。被承擔起的暴力，使得誤入歧途者，以及遭團體摒棄的人，回歸，重新找回他們的位置，再度融入。暴力因此被理解為莊嚴的調停者。被殖民者在暴力中並透過暴力來解放自己。這個實踐啓發了行動者，因為它指明了手段和目的。塞杰爾的詩，對暴力的明確遠景有一種預言的意義。我們可以回顧他的悲劇最關鍵幾頁中的一頁裡，那位造反者（看！）所表達的：

造反者（倔強地）

我的姓氏：被侮辱的人；我的名字：受辱者；我的身分：造反者；我的年齡：石器

時代。

母親

我的種族：人類。我的宗教：博愛……

造反者

我的種族：被廢黜的種族。我的宗教……

但，我的種族不是因您的解除武裝而造就出來的……

而是我，我用我的造反和我那可憐的緊握的拳頭，以及我那亂蓬蓬的頭。

（十分平靜）

我記得十一月的一天：他還不到六個月大，主人走進像橙紅色月亮般煙燻的小茅屋，摸摸他結實的小手小腳。他是個好主人，用他粗壯的手撫摸著小孩佈滿痘痕的小臉。他的藍眼睛露出了笑意，用甜言蜜語哄這個孩子：這將是個大人物，他看著我說。主人還談些其他愉快的事。應該盡早開始，把他培養成一個好基督徒和好奴隸，十分忠心的人，一個目光銳利、有權威的、看守黑人囚犯的好牢頭，二十年也不嫌多。這個人把我兒子的搖籃想像成一個牢頭的搖籃。

我們手握刀子匍匐前進……

母親

唉，你會死的。

造反者

幹掉了……我親手把他幹掉了……

對，豐饒之死亡……

在夜裡，我們在甘蔗田裡匍匐前進。

大刀在星光下微笑，但我們不在乎星星。

甘蔗那小溪般的綠葉劃傷我們的臉。

母親

我曾經夢想有個兒子來闔上他母親的眼。

造反者

我選擇了另一個太陽來打開我兒子的眼睛。

母親

噢，我的兒子……死得不祥和危險。

造反者

母親，死得富生命力和奢侈。

母親

因為太痛恨了。

造反者

因為太愛了。

母親

別讓我操心吧，我因你的鏢鏑而窒息，我因你的傷口而流血。

造反者

可是世界讓我放不下心……世上任何一個受虐的可憐蟲，任何一個被私刑或拷打的可憐蟲，都會讓我覺得好像被殺的是自己，受屈辱的是自己。

母親

老天爺，放了他吧。

造反者

我的心，你讓我無法擺脫記憶……

十一月的一個晚上……

突然，叫喊聲劃破了寂靜。

我們過去是蹦蹦跳跳的，我們；奴隸們，我們，殘渣；我們，忍氣吞聲的牛馬。

我們像瘋子般狂奔；開槍了……我們打人。汗和血使我們涼快。我們在愈來愈尖銳的叫喊中打人，一陣大聲喧嘩從東方升起，大家在放火，火焰溫暖地偎著我們的臉頰。

然後是襲擊主人的房子。

有人從窗戶向外射擊。

我們破門而入。

主人的房門敞開，主人的房屋燈火通明，主人在房裡十分鎮定……而我們人停步不進……這是主人啣！……我進去了。是你啊，他對我說，十分鎮定……我對他說，是我，正是我，那個好奴隸，那個忠心耿耿的奴隸，突然他的眼睛像雨天裡兩隻受驚的動物……我打他，鮮血四濺；這是今日我記得的唯一洗禮（註5）。

暴力之創造特點與解毒作用

我們明白，在這種氣氛下，日常生活變得完全不可能了。你不能再像從前那樣當農夫、小白臉或酒鬼了。殖民體制的暴力和被殖民者的反暴力取得了平衡，並在非凡的同質性中互相呼應。這種暴力的統治將因為宗主國的大量移民而更加恐怖。在被殖民民衆內部發展出來的暴力，和殖民體制所施展的那具爭議性的暴力成正比。在這個時期的第一個階段裡，宗主國政府是殖民者

的奴隸。殖民者同時威脅被殖民者和他自己的政府。他們用同樣的方法來同時對付兩者。埃維昂市長 (Maire d'Évian) 被暗殺和阿里·布扎杰爾 (Ali Boumendjel) 被謀殺，其機制和動機如出一轍〔譯註 12〕。

對殖民者而言，不是在阿爾及利亞人的阿爾及利亞，或法國人的阿爾及利亞間，選擇一個，而是在獨立的阿爾及利亞，或殖民的阿爾及利亞之間，選擇一個。剩下的都是廢話或企圖叛亂。殖民者的邏輯是不可改變的，人們只有在沒事先了解殖民者的思想機制之前，才被殖民者舉止中被解碼出的反邏輯搞得啞口無言。一旦被殖民者選擇了反抗暴力，警察的報復就在於機械性地稱這些為國族勢力的報復。然而，結果卻不一樣，因為機槍掃射和砲艦射擊的威脅程度，是被殖民者望塵莫及的，他們根本無力應戰。這種恐怖的來來回回，最終使得被殖民者中最被異化的那些人弄清楚了狀況。他們的確發現，一大堆有關人人平等的卓越論述，也掩蓋不了這個平庸的事實：七個在薩卡莫迪 (Sakamody) 山口被殺或受傷的法國人，激起了文明人的憤怒，然而，蓋爾古爾 (Guergour) 的洗劫阿拉伯村落，對引發這次伏擊的居民大屠殺事件，這些卻不被當作一回事。恐怖、反恐怖、暴力、反暴力……這就是觀察家們以尖酸的口吻所登錄下來的，當他們在描述阿爾及利亞如此明顯、頑強的仇恨循環。

〔註 5〕塞杰爾 (Aimé Césaire) · 《神奇的武器 (狗不吠叫)》 (Les Armes miraculeuses [Et les chiens se taisaient]) · Gallimard · 頁 111111
頁 111111。

在武裝鬥爭中，有著一個我們可以稱作是無法回歸的點。這幾乎是一場大鎮壓，施行的區域囊括了被殖民民衆的所有領域。阿爾及利亞在一九五五年被觸及，在腓利浦維爾（Philippeville）死傷一萬兩千人，以及在一九五六年，拉寇斯特（Lacoste）佈署了城市和農村的民兵（註9）。於是大家認為，甚至連殖民者也都認為：「不能重頭來了！」然而，被殖民者不理會數字上的帳面問題。他登錄了一個巨大的空洞，像一種「必要之惡」那樣。既然他決定以暴制暴，也就接受其所造成的後果。只是他要求，我們別要他去管別人的帳面問題。對於「所有土著都一樣」這句慣用語，被殖民者回答以：「所有殖民者都一樣。」（註7）被殖民者，當他被拷打，妻子被強姦或遇害，他不會向任何人抱怨。儘管壓迫人的政府每天任命一些調查小組或情報委員會，但在被殖民者眼中，這些委員會根本不會存在過。而且，事實上，在阿爾及利亞的罪惡已經快七年了，卻沒有一個法國人因殺死阿爾及利亞人的罪名被起訴。在印度支那，在馬達加斯加，在那些殖民地，土著始終明白，根本不必對另外一邊有什麼期待。殖民者的工作，就是使被殖民者連做做自由夢的可能都沒有。被殖民者的工作，就是構想所有可能消滅殖民者的辦法。在邏輯上，殖民者的善惡二元論導引了被殖民者的善惡二元論。他們以「殖民者絕對邪惡」來回答殖民者的「土著絕對邪惡」理論。

從整體看，殖民者的出現意味著當地人社會的死亡、文化的麻痺、每個人變成化石。被殖民者認為，生命只能從殖民者正在腐爛的屍體中才能出現。這就是兩個論證逐字逐句的對應。

〔註6〕必須再回到這個時期，來衡量法國當局在阿爾及利亞所做的這個決定的重要性。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阿爾及利亞的抵抗》(Resistance against) 第四期上，我們可以讀到：「應聯合國大會所望，法國政府最近決定在阿爾及利亞成立都市民兵。聯合國曾經說：『流太多血了。』而拉寇斯特回答說，讓我們組織民兵吧！聯合國建議停火。拉寇斯特則叫囂說，我們必須把民兵武裝起來！聯合國建議敦促交戰的雙方開始接觸，商討一個民主及和平的解決方案，拉寇斯特則宣佈，從今天起每一個歐洲人都要武裝起來，並應該向任何一個他認為可疑的人開槍。於是在聯合國大會上大家同意必須由當局制止野蠻、極不公平的、近乎種族滅絕的鎮壓。拉寇斯特回答說：我們要有系統鎮壓，有組織獵殺阿爾及利亞人。他象徵性的把法官的權力交給軍人，把軍人的權力交給平民。範圍被圈死了，圈子的中心是阿爾及利亞人，他們被解除武裝，忍飢挨餓、被追捕、被毆打、不久又被懷疑而遇害。今天，在阿爾及利亞，沒有一個法國人不被准予，不被說服使用他的武器。在聯合國呼籲停止紛爭的一個月後，沒有一個法國人不被允許而且有義務去尋找、挑動和追捕一些可疑份子。」

「在聯合國投票決定最終提案的一個月後，在阿爾及利亞，現在最駭人聽聞的大殺戮，沒有一個歐洲人可以逃脫關係。民主方式的解決？拉寇斯特讓步，同意，我們從滅絕阿爾及利亞人開始。為此，我們必須武裝老百姓並放手讓他們去幹。巴黎的新聞界總是有保留的接受成立這些武裝團體。有人說，這是法西斯戰鬥隊，說得好。但在個人及人權的水平內，法西斯主義如果不是傳統殖民主義國家內部的殖民主義，又算什麼呢？有人提過『體系合法化和受囑託的暗殺』，但是一百三十年來，阿爾及利亞人的皮肉不是帶著愈來愈公開、愈來愈多、愈來愈深刻的創傷嗎？人民共和國(MRP)的代表肯納—維涅(Kenne-Vignes)建議說，當心，在建立這些民兵時，我們是否會陷入阿爾及利亞兩個共同體之間的深淵呢？對。但是殖民的法律不就是有組織地奴化全體阿爾及利亞人嗎？阿爾及利亞革命正好是對這種奴化和這個深淵明顯的不滿。阿爾及利亞革命對占領國說：『拔掉你們留在阿爾及利亞人傷痕累累皮肉上的那些獠牙！給阿爾及利亞人民發言權！』」

「有人說，建立這些民兵部隊可以減輕軍隊的任務。這將使一些負責保衛突尼斯和摩洛哥邊境的部隊得到解放。一支六十萬大軍，幾乎是海、空軍的總數。一支龐大的、快速的、具有使人畏懼的光榮榜樣，吸收了那些曾經拷打突尼斯和摩洛哥人民的施暴者的警察部隊。具有十萬兵力的本土保衛軍。必須減輕軍隊的負擔。我們要組織城市民兵。拉寇斯特那歇斯底里的罪惡的確讓蔽了許多人，甚至連有遠見的法國人也上當。事實是，建立民兵的正當化當中，即具有其本身的矛盾。法國軍隊的任務是無限的。從今以後，我們將他的目標鎖定在封住阿爾及利亞人的嘴，並把通向未來的大門永遠封死。尤其我們禁止自己去分析、理解、估計阿爾及利亞革命的深度和密度；區長、島長、街道主任、大樓樓長、每一層的頭頭……今天，在平面上的分區控制上增加了立體的分區控制。」

「四十八小時內就有兩千個人應徵登記了。阿爾及利亞的歐洲人立刻響應拉寇斯特的殺戮號召。從今天起，每個歐洲人都應該清查自己區域內殘存的阿爾及利亞人。提供情報，對恐怖活動迅速反應，拘禁可疑份子，清除逃兵，增加警力。但是，必須減輕軍隊的任務。在平面的掃蕩上加上立體的分區掃蕩。今天，在家庭手工業式的殺戮上增加計劃經濟的殺戮。聯合國會勸告停止流血，拉寇斯特反駁說，要避

對被殖民民衆而言，這暴力，正因為它構成了他們唯一的工作，因而也就具有積極和創造的特點。既然每個人都變成巨大暴力的一環，對抗殖民主義暴力的偉大暴力組織的一環，暴力的實踐就變成全體化了。各個團體互相承認，未來的國家已是共有的了。武裝鬥爭動員了人民，即鬥爭把人民投入唯一的方向，一個單行道了。

在解放戰爭動員人民之際，這種動員把共同的利害、國族命運、集體的歷史導入每個人的意識中。因此，進入第二階段——建國——更由於有這種鮮血和憤怒的混凝土，而更加方便。我們因此更加理解落後國家所使用詞彙的獨特性。在殖民時代，我們號召人民起來反抗壓迫。國族解放後，我們鼓勵人民鬥爭貧困、文盲和落後。我們斷言，鬥爭至今持續不斷。人民證實了生活就是無休止的鬥爭。

我們已說過，被殖民者的暴力統一了人民。而事實上，殖民主義從其結構上看，是分離主義和地方山頭主義的。殖民主義不僅不滿足於觀察到各部落的存在，還支援他們，分化他們。殖民體制維持各酋長管轄區，並使老的伊斯蘭隱士教團復活。暴力的實踐是全體化的、國族的。由此看，暴力在其私密處，是包含著對地方主義和部落主義的清除。那些國族主義政黨也是，對本地籍的司法行政和部落酋長，通常是冷酷無情的。清除那些人是國民統一的先決條件。

就個人層次而言，暴力有解毒作用。它使被殖民者擺脫自卑情結，擺脫絕望和無力的態度。它使人民變得大膽，親眼看到自己恢復尊嚴。即使武裝鬥爭是象徵性的，即使人民由於迅速的去

殖民而被解除動員，人民還是有時間自己說服自己，說解放是大家的事業，而不是領袖的特別功勞。暴力把民衆提升到領袖的水平。因此，一些年輕的政府面對繁文縟節的外交禮儀，總是表現出故意抹殺它的挑釁態度。當群眾在暴力中參加了國族解放時，他們不允許任何人自稱「救星」。他們對於自己行動的成果，表現出像是一個忌妒者般，小心翼翼地提防著，不把自己的未來和命運，以及祖國的前途，交給一個活上帝。昨天他們完全不必承擔任何責任，今天他們想理解一切和決定一切。人民的覺悟受到暴力的啓發，反對一切和解。那些煽動家、投機者、巫師們今後任務艱鉅了。群眾投入絕望的肉搏戰，這種實踐更使他們嗜好具體事物。實際上不可能再長期運用神祕化的愚弄欺騙把戲了。

到這點的最好方法，是不再有血可流了。阿爾及利亞人民被交給馬肅（Masari）幫後，又被託付給城市民心好好照顧。拉寇斯特決定建立民兵部隊，明白地表示他不會讓別人碰他的戰爭。他證明了無限腐敗的存在。當然，現在他自己成了情勢的囚犯，但使所有人跟他一起完蛋是多麼的快樂啊！

「阿爾及利亞人在每一個決定之後，增強了自己的肌肉攣縮和對鬥爭的強烈程度。阿爾及利亞人在每次這種被唆使、有組織的暗殺後，更加強他的覺悟和鞏固他的抵抗。對，法國軍隊的任務是無限的，因為阿爾及利亞人的團結更是無止境的。」

【註7】所以，在戰爭初期沒有俘虜。由於地方幹部的政治領導，才使群眾接受：來自宗主國的人不見得都是自願兵，甚至是厭戰的；現階段鬥爭的利益，必須在行動中表現出尊重某些國際協定；一支俘虜敵人的部隊就是正規部隊，不再被當作一群攔路土匪；在任何情況下，抓俘虜是爲了保護我們那些被敵人囚禁的戰士的一種不可輕忽的壓力手段。

論國際情勢中的暴力

在前面文中我們一再指出，落後國家的政治負責人始終號召他的人民戰鬥，與殖民主義鬥爭、與貧窮和落後鬥爭、與使人貧苦的傳統鬥爭。他們訴諸的是一種參謀長的詞彙：例如「動員群眾」、「農業戰線」、「文盲戰線」、「遭受失敗」、「獲得勝利」等等。年輕的獨立國家在最初幾年內，是在戰場的氣氛中發展。這是因為，落後國家的政治領袖，總是心驚膽戰的估計著他的國家所必須跨越的寬闊道路。他們於是呼籲人民：「讓我們鼓足幹勁幹吧！」國家受到一種創造性的狂熱執拗所感染，付出巨大又不成比例的努力，非但要致力擺脫困境，更要自力更生的迎頭趕上其他國家。我們這樣想，如果歐洲人能達到如此輝煌的發達階段，那是他們努力的結果。所以，讓我們向世界及自己證明，我們能夠達到同樣的成就。但，落後國家這種提問題的方式，對我們而言，似乎既不正確，亦不理智。

歐洲各國是在國族資產階級手上集中了大部分財富之際才進行國家的統一。商人、手工業者、教士和銀行家都在國家的範圍內，壟斷了財政、貿易和學問。中產階級代表其中最生氣勃勃、最繁榮昌盛的階級。它因取得政權，而投入在一些關鍵性的操作當中，工業化、發展交通，

並迅速尋找海外殖民地。

在歐洲，除了一些極細微的差異（例如英國曾經稍微領先），各個國家在實現統一的過程中，都歷經差不多同樣的經濟狀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以它的進步發展特點，去侮辱別的國家。

選擇社會主義制度

然而，今天在落後地區的國族獨立和國家的形成，展現了全新的面貌。在這些地區，除了一些驚人的實例以外，不同國家都表現出同樣的沒有基礎建築。大眾跟同樣的貧困戰鬥，以同樣的姿態掙扎，並用他們萎縮的胃來描述稱作飢餓地圖的東西。後進世界、貧困的世界和不法的世界；同樣也是一個沒有醫生、沒有工程師、沒有行政管理人的世界。相對於這個世界，歐洲卻享受奢華、炫耀的富裕。歐洲這種富裕是十足可恥的，因為這富裕建立在奴隸的背上，吸榨奴隸的血，直接壓榨落後國家地上及地下的資源。歐洲的福利和進步是用黑人、阿拉伯人、印地安人和黃種人的汗水及屍體建立起來的。我們絕不可再忘記這件事實。當一個殖民主義國家，因為一個殖民地要求獨立而感到尷尬，並對國族主義領袖說：「如果你們想獨立，就獨立吧，並回到中世紀去吧！」新獨立的人民傾向同意應戰。人們的確可以看到，殖民主義抽走了它的資本和技術者，並在年輕國家的周圍安排經濟壓力的措施（註8）。無上榮譽的獨立變成了倒霉的獨立，殖民地強國勢力透過強大的制裁手段，迫使年輕國家退縮。殖民地強國說：「既然你們要獨立，那就

拿去，等著餓死吧！」國族主義的領袖別無選擇，只能轉向他們的人民，並要求人民作出偉大的努力。人們要求這些飢餓的人民遵守一個嚴格的體制，要求這些萎縮的肌肉承擔不相稱的勞動。設計了一個自給自足的制度，每個國家都動用其能掌握的少得可憐的資源，去應付全國的大飢荒和貧苦。我們目睹了一場人民的動員，人民個個面對撐飽肚子和充滿蔑視的歐洲感到疲憊不堪。

另外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拒絕這種考驗，接受舊保護國的條件而度過難關。這些國家利用他們的戰略地位——在美蘇兩大陣營的鬥爭中給予他們特殊利益——簽下一些條約，並受條約的約束。之前被直接統治的國家，如今變成經濟的隸屬國。殖民主義的經濟通路完整無缺的維持下來，有時甚至更加強了它的殖民貿易管道，同意用擠牙膏的方式提供獨立國家預算。所以，我們看到殖民地獨立後，帶給世界一個根本的問題：被殖民國家的國族解放暴露了他們的現實情況，並使這種情況更加難以忍受。殖民主義及反殖民主義這個似乎根本性的對決，甚至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決，都已經失去了重要性。今天重要的是財富重新分配的問題。人類在震驚之餘，必須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常常會以為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在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之間抉擇的時候到了。落後國家利用兩大體制之間存在的慘烈競爭而確保了國族解放鬥爭的勝利，如今應該逃避這種競爭的漩渦。第三世界不該滿足於用過去領先自己的各種價值來定義自己。相反的，落後國家

應該致力讓自己固有的價值、方法和特定的風格問世。我們面對的具體問題，並不是在其他大陸及其他時代的人已界定的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之間作選擇。當然，我們知道，資本主義體制作爲一種生活方式，並不能使我們完成國族或全球性的工作。資本主義剝削、托拉斯和壟斷，是落後國家的敵人。相反的，選擇社會主義制度，一個全面傾向人民一邊的，建立在人是最寶貴的財產的原理基礎上的制度，才能使我們更快的、更加和諧的向前走，這個制度的選擇，同時使這個事實變得不可能：即一幅社會諷刺畫，有些人掌握全部政治和經濟權力，不顧國家整體。

但，爲了使這個制度更加有效的發揮作用，爲了使我們能隨時遵守我們所借鑒的原則，除了人力投資外，還需要其他更多的原因。某些低開發國家朝著這方向全力以赴。男女老幼熱心投入強迫性的工作中，並宣稱自己是國家的奴隸。自我獻身，蔑視一切非集體的關心，創造了一種國

〔註8〕在今天的國際情勢下，資本主義並不用經濟封鎖來對付那幾個非洲和亞洲的殖民地。美國反卡斯楚的行動，卻在拉丁美洲開創了人類難解放史的新篇幅。由一些在聯合國占有席位並鑄造貨幣的國家形成的拉丁美洲，對非洲是個教訓。這些舊殖民從它們解放以來，就在恐懼和匱乏下忍受西方資本主義的苛刻法則。

非洲的解放和人民自覺的發展，使拉丁美洲人民能夠和那些換湯不換藥的一個個獨裁體制決裂。卡斯楚奪取了古巴政權並把權力交給人民，使美國佬對這個異端感到大禍臨頭似的，組織了一些反革命軍隊，炮製一個臨時政府，燒毀甘蔗，最後決定殘酷地扼殺古巴人民。但談何容易？古巴人民蒙受苦難卻終將勝利。巴西總統夸德羅斯（Janos Quadros）在一個具有歷史性的聲明中斷言，他的國家將使盡一切手段擁護古巴革命。甚至美國也可能在各國人民的意志面前退卻。到那天，我們會舉旗祝福，因爲那是世界上男女的決定日子。總之，只是靠著分佈在全球——在中東的油井裡，在祕魯或剛果的礦坑裡，「聯合水果公司」種植園或法雷斯通（Firestone）種植園裡的奴隸，才能確保的美金，將停止強而有力的控制那些自己繼續餓肚子和腦袋空空，還以自己的養分滋養美金的奴隸們。

族／國家的道德慰藉人心，讓人重拾對世界命運的信心，使得最持保留態度的觀察者們卸下武裝。然而，我們相信，這樣的努力不可能以如此猛烈的節奏持續很久。這些年輕國家在舊宗主國無條件撤出後，接下了挑戰。國家又重新被一個新的團隊所控制，但事實上，一切都必須重拾，重新思考。殖民體制實際上只關心某些財富和某些資源，確切來說，只對供應它的工業資源感興趣。截至目前為止，還未曾有過嚴謹的對於表面及深層底層的總結彙報出現過。因此，年輕的獨立國家不得不繼續維持那些殖民體制所安排的經濟流通管道。當然，它可以向其他的國家、別的貨幣區出口，但它的出口基礎卻沒有根本的變化。殖民體制固定了一些流通管道，人們被迫維持這些管道，否則就會遭殃。應該重新出發，改換出口的性質，而不僅僅只是改變出口的目的地，要重新察看土地、地下或河川，甚且也察看太陽。然而爲了這樣，除了人力的投資外，還要有另外的東西，如資本、技術人員、工程師、機械師等等。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認爲，落後國家的人民，在他們領袖的促使下，付出巨大的努力，這是不會得到預期的結果的。如果勞動條件不改變，要使這個被帝國主義勢力變成動物化的世界更加人性化，則需要幾個世紀的努力〔註9〕。

事實上我們不該接受這些條件。我們應該斷然拒絕西方國家想強加給我們的情勢。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把它們的旗幟和警力從我們的領土撤離時，並未償清他們欠我們的債務。幾百年來，資本主義者在落後國家的所作所爲，簡直就是真正的戰犯。資本主義爲了增加它的財富、黃金和

鑽石貯藏，爲了建立它的勢力，而用盡了流放、屠殺、勞役、奴役的手段。不久以前，納粹主義把整個歐洲變成真正的殖民地。歐洲各國政府要求補償，要求以金錢與實物歸還他們被搶走的財寶，要文化作品、畫、雕刻、彩繪玻璃等等物歸原主。一九四五年歐戰勝利隔天，歐洲人嘴巴裡唯一說的一句話是：「德國將賠償。」阿德諾先生在艾希曼案件重新審理時〔譯註13〕，代表德國人民向猶太人道歉。他並重新承諾，西德將繼續償付以色列巨款，作爲對納粹罪行的補償〔註10〕。

國際資本主義的危機

同樣的，我們可以說帝國主義國家犯下嚴重的錯誤和言語難以形容的不義，如果它們只局限於撤軍、把發現和開採財富，並把這些財富送回國的行政機關撤走。國族獨立的這個道德補償並不能矇住我們的眼睛，也不能養活我們。帝國主義的財富也是我們的財富。從世界的層次上看

〔註9〕一些受惠於龐大的歐洲人移民的國家，獨立後擁有房屋和寬闊的街道，傾向忘記內地貧困、飢餓的一面。命運的諷刺，通過一種共謀的沉默，使得這些國家彷彿以爲它們的城市和獨立是同時產生的。

〔註10〕然而，真正的情況是，德國沒有完全補償戰爭罪行。受害的各國並沒有向戰敗的德國要求全部的賠償金，因爲這些國家把德國納入反共的防衛體制內。正是這一考慮，促使殖民主義國家，在未被納入西方體制內的情況下，企圖獲得前殖民地的軍事基地和奴隸。它們一致以北大西洋公約（NATO）的名義和自由主義的名義，忘記向德國要求賠償。我們看到德國（西德）源源不斷得到美元和機器，一個復甦的強大德國對西方陣營是不可或缺的。所謂自由歐洲的利益要求一個繁榮與重建的德國，能夠充當第一道抵擋紅色幫的防護壁壘。德國在冷戰中的利用，歐洲的危機。因此，美國和其他歐洲國家，在面對這樣一個德國時——昨天跪下來，今天在市場上卻同他們無情的競爭

來，我們感覺到，這個斷言絕對並不意味著我們感覺到西方的技術和藝術創造與我們息息相關。十分具體的說，歐洲由於拉丁美洲、中國、非洲殖民地國家的黃金和原料而過度的自我膨脹了起來。幾百年來，鑽石和石油、絲綢和棉花、木材和外來的產品都從這些大陸源源不斷的流入歐洲，今天，同樣的這個歐洲在這些大陸的對面豎起奢華的巨塔。歐洲完全是靠第三世界創造出來的。把歐洲壓得透不過氣來的財富，是從落後國家人民掠奪過來的。荷蘭的港口、利物浦、波爾多和利物浦專門販賣黑奴的碼頭，更由於幾百萬被放逐的奴隸而聲名遠播。因而，當我們聽到某個歐洲國家元首手按在胸口，聲稱他應該幫助不幸的落後國家人民時，我們並不感到皇恩浩蕩。相反的，我們會告訴自己說：「這是對我們的合理補償。」因此，我們不會接受這種對落後國家的「慈善事業修女」的援助計畫。這種幫助應該是雙重的覺悟：被殖民者意識到這是他們該做的，而資本主義國家應該認識到他們應該償還（註11）。如果資本主義國家不夠聰明——我們姑且不說他們忘恩負義——而拒絕補償，那麼，他們自己制度不容改變的辯證法，將使他們窒息。這是事實，年輕國家很少吸引私人資本。有許多理由為宗主國的保留態度作辯護和解釋。當資本主義者一知道他們的政府準備去殖民，而且顯然他們是最先得知風聲，他們就急忙從殖民地抽走所有資本。如此壯麗的資本大逃亡，是伴隨著去殖民最常見的現象之一。

私人企業要在獨立國家投資，會要求一些根據經驗根本難以接受或無法實現的條件。資本家堅守盈利的原則，從一開始進出「海外」，就對長期投資保持慎重態度，他們有時候會抗拒並仇

視新政府的計畫綱領。在萬不得已下，他們會自動借錢給年輕國家，但條件是這些貸款用來購買成品和機器，其作用是使母國的工廠得以運轉。

事實上，西方金融集團的不信任，表達了他們不肯冒任何風險的顧慮。他們也要求政治穩定和明朗的社會空氣，一旦考慮到剛獨立後全體人民的悲慘狀況，這種要求就完全不可能了。因此，在尋求舊殖民地不可能履行的保證，他們會要求保留某些駐軍，或要求年輕國家加入一些經濟或軍事條約。民間企業向他們自己的政府施壓力，以求在這些國家設置軍事基地並隨時保護他們的利益。最後，這些公司要求他們的政府擔保他們所欲從事的對某落後國家區域的投資。

很少有國家達成托拉斯和壟斷集團所要求的條件。因此，失去出口的資本就凍結在歐洲動彈不得。尤其因為資本家拒絕在本國投資，使這些資本更加不動如山。在這種情況下，營利是極低的，而監督逃漏稅更令最大膽的資本家裹足不前。

從長期看來，情勢是災難性的。資本不再流通或極度減縮。瑞士銀行拒絕資本，歐洲喘不過氣來。國際資本主義儘管大把大把的耗盡在軍事開支上，終究還是陷入絕境。

〔註11〕「把歐洲社會主義的建立和『第三世界的關係』（好像我們跟第三世界只有外在的關係似的）徹底區別，這是明知或不知不覺地，將處置殖民遺產優於解放之上，這是在帝國主義掠奪的成果上建立一個奢華的社會主義——就像強盜集團內部多少有點公平的分贓，哪怕是用好心的形式分一點給窮人，而忘了這些都是從窮人那裡搶來的財物。」馬塞爾·佩竹（Marcel Pénu）〈爲戴高樂而死〉（*Mourir pour de Gaulle*），《現代》（*Temps modernes*）第一七五—一七六期，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一月。

然而，另一個危機更加威脅著國際資本主義。西歐各國發揮自私和不義，迫使第三世界實際上被拋棄或倒退，被迫停滯不進，因此落後國人民覺悟要發展集體的自給自足體制。西方產業將很快失去海外出口，機械如山的堆積在倉庫裡，歐洲市場即將展開一場金融集團和托拉斯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工廠倒閉、解雇和失業將導致歐洲無產階級發動一場反資本主義統治的公開鬥爭。這時壟斷集團才會覺悟到他們的利益就是幫助、大量幫助，不附太多條件的幫助落後國家。所以，我們看到第三世界年輕的國家向資本主義國家獻媚乞憐是錯誤的。我們有自己的權利而壯大，我們的立場是正確的。相反的，我們應該告訴資本主義國家並向他們說明，當前的根本問題不是他們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戰爭。應該立即結束這場不該到處進行的冷戰，停止世界的核武化準備，慷慨的投資和技術援助落後地區。世界的命運有待這個問題的答案。

此外，在面對無數有色人種、飢餓人群，資本主義制度若不試著讓社會主義制度對「歐洲命運」感興趣的話，也不行。加加林上校（Commandant Gagarine）的功業，儘管不會讓戴高樂將軍感到不悅，但畢竟不是一個能「榮耀歐洲」的壯舉。近來，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家、文化人士對蘇聯抱持矛盾的態度。他們爲了消滅社會主義制度而聯合起來，現在覺悟到必須重視這個制度。於是他們變得和藹可親，增加誘惑手腕，並不斷提醒蘇聯人民他們是「屬於歐洲」的。

若將第三世界視爲威脅著要去吞沒歐洲的洪流，那將使其動盪不安，無法將那導引人類走向

幸福的進步力量分流出來。第三世界並不想組織一個龐大的飢餓十字軍來反對整個歐洲。第三世界對那些幾百年來使自己淪為奴隸的人所期待的是：他們援助第三世界，恢復人性的尊嚴，使人類在各地、一勞永逸的勝利。

但很清楚的是，我們不會天真的以為通過歐洲政府的合作和善意，這就會達成。這件再把人類、完整的人類引入世界的巨大工程，將在歐洲群眾決定性的協助下完成，他們必須認識這項工作，他們之前在殖民地問題上，經常是歸順於我們那共同主人的立場。為此，首先，歐洲群眾必須決定覺醒，動動腦筋，停止再玩不負責任的睡美人遊戲。

【譯註 1】「Les derniers seront les premiers.」引自《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十六節。

【譯註 2】*Spécie de Damocles*，典出古希臘歷史故事。廷臣 Damocles 雖然經常大肆吹捧國王 Dionysius 財勢雙全，但明顯有篡位的野心。Dionysius 於是設計了一次宴會，讓 Damocles 坐在他的寶座上，而當他舉杯抬頭時便看到天花板吊懸著一把鋒利的長劍，劍柄只用一根馬鬃繫著，隨時都可能掉下來。Dionysius 意有所指地說：「這把利劍就是每天都在威脅我的危險象徵。如果你想做統治者，就必須冒各種風險，殺身之險與權力同在。從此 Damocles 不敢再有造次之想。」

【譯註 3】*紀·摩勒* (Guy Mollet, 1905-75)，曾任法國總理 (1957-58)。

【譯註 4】*Mau-Mau*，肯亞吉庫龍人的祕密團體，一九五二～五六年間以恐怖手段攻擊英國人，爭取國族獨立。

【譯註 5】*穆薩迪克* (Mossadegh, 1890-1967)，伊朗首相 (1951-53)。他宣佈伊朗石油國有化，被英、美間諜聯手收買叛徒將他推翻，美國石油集團因此得以控制伊朗的石油。

【譯註 6】*玻尼* (Houphouët-Boigny)，象牙海岸獨立後的首任總統，在位三十三年，迄一九九二年病逝。

【譯註 7】*Sharpeville*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南非沙普維爾，白人警察對和平示威的黑人開槍，殺害六十九人。當時南非仍然實施種族隔離，黑人抗議「通行法」(Pass laws) 制度。聯合國大會接著宣布三月二十一日是「國際消除種族歧視日」(the 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號召國際社會不只紀念這場悲劇，也要消除種族歧視與種族主義。

〔譯註 8〕赫魯雪夫 (Nikita S. Khrushchev, 1894-1971)，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在位十一年。

〔譯註 9〕一九五六年十月發生了反共產主義革命，也就是所謂的「匈牙利抗暴事件」。當初開始時是以和平的方式訴求政治上的民主，最後卻形成武裝衝突。新政府總理納吉·伊姆勒 (Nagy Imre) 要求蘇聯軍隊撤軍，宣佈匈牙利為中立國並退出華沙協議，請求聯合國的協助。同年十一月，蘇聯軍隊重新攻擊匈牙利，革命宣告失敗。

〔譯註 10〕一九五六在英、法、以色列出兵占領埃及國有化的蘇伊士運河，引起阿拉伯國家與蘇聯集團的強烈抗議，聯合國安理會也因受到英、法的否決權而無法做出任何決議，戰爭情勢緊張，可能一觸即發而擴大為戰爭。後由加拿大外長呼籲各方停火，並組成「聯合國緊急部隊」(UN Emergency Force, UNEF)，部署在蘇運士運河區域，以監督英國、法國與以色列軍隊從埃及撤出。

〔譯註 11〕門農·威廉斯 (Mennen-Williams, 1911-98)，美國民主黨政客，當過密西根州州長和非洲事務助理國務卿。

〔譯註 12〕阿爾及利亞戰爭末期，法國政府在埃維昂和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代表召開停戰預備會議，而當地的極右派法國殖民者則暗殺法國市長。阿里·布芒杰爾是阿爾及利亞人律師，一九五七年二月被捕，四十三天後當局宣佈他已「自殺」。

〔譯註 13〕阿德諾 (M. Adenauer, 1876-1967)，一九四九年起連續擔任西德總理。艾希曼 (Eichmann, 1906-1962) 納粹德國的黑衫隊 (SS) 頭子，一九四一年起執行屠殺猶太人的最終滅絕任務，戰後他逃到阿根廷，一九六〇年被以色列情報員綁架回以色列接受審判，一九六二年判處絞刑。

自發性的偉大和弱點

對暴力的反省思考，使我們意識到，國族主義政黨幹部和群眾之間，存在一種差距和不同的節奏。在所有政治組織或工會裡，群眾和幹部之間，照例總有一道鴻溝，群眾要求立即並全面改善他們的狀況，而幹部則衡量資方可能製造的種種困難，限制並壓縮群眾的要求。因此，經常可以看到群眾對幹部根深柢固的不滿。在每日的請願後，幹部慶祝勝利，而群眾則有完全被出賣的感覺。是透過請願示威的頻繁，工會鬥爭的增加，促進了群眾的政治化。一個政治化的工會幹部知道，一場地方衝突不會具決定性的闡明他和資方關係。被殖民地的知識份子，研究他們所尊敬的母國之政黨運作，謹慎組織相同的政黨來動員群眾，向殖民地當局施加壓力。殖民地的國族政黨與知識份子與商業菁英的形成，是同時代的產物。菁英們將賦予組織一個基本的重要性，而組織中的戀物癖成份，經常將走在對殖民社會理性研究的前頭。政黨的概念是從母國進口的，這個現代的鬥爭工具，緊貼在一個千變萬化、不平衡的現實上，而在這個現實中，奴隸制度、農奴、以物易物、手工業和股市交易並存。

政黨的弱點，不只在機械的利用一個原本是要帶領無產階級，在高度工業化的資本主義社會

內部進行鬥爭的組織。這個組織受限於組織型態，本該進行一些創新和適應。絕大多數落後地區的政黨最大的錯誤、先天的瑕疵，是依照傳統圖示，找最有政治覺悟的成員談話，也就是那些代表不到百分之一居民的城市無產階級、工匠和公務員。

然而，無產階級儘管已經理解政黨的宣傳，讀過他們的文件，但並未充分準備響應未來國族解放的殘酷鬥爭。誠如我們幾次指出，在殖民地內，無產階級是被殖民者中最受到殖民體制愛惜的核心。城市裡萌芽的無產階級，相對獲得優待。在資本主義國家裡，無產階級沒什麼好失去的，還可能贏得一切。在殖民地國家，他卻可能失去一切。的確，他是被殖民者中，那代表了就殖民地機構的正常運轉而言，不可或缺或無法代替的一部分：包括計程車司機、礦工、碼頭苦力、通譯、護士等等。這些人構成了國族政黨最忠實的支持者，而且，由於他們在殖民體系內占特權地位，因而構成了被殖民者當中「資產階級」的一部分。

因此，我們可以理解，國族政黨的支持者首先是城市居民，即基層管理人、勞工、知識份子和商人。他們的思想類型，已具有比較富裕的技術環境的特徵。在這裡，「現代主義」是國王。就是這些同樣環境的人士，要與厭惡開化的傳統鬥爭，要改良習俗，並與構成國族底盤的舊基石鬥爭。

農村群眾的作用

國族政黨裡頭的壓倒性多數，對農民群眾十分不信任。這些群眾的確帶給他們惰性和無所事事印象。國族主義政黨的成員（包括城市勞工和知識份子），很快就給予農村負面的評價，就跟殖民者一樣。但是，如果了解政黨爲什麼如此蔑視農村群眾，就必須考慮這個事實：殖民主義經常藉由將農村僵化，來強化或鞏固它的統治。由於農村到處都是回教隱士、巫師和部落頭目，群眾仍舊生活在封建時代，有著殖民主義的行政長官或軍人所維持的中世紀全能統治。

年輕的國族資產階級，尤其是商人們，要跟這些封建領主們在各方面競爭。隱士和巫師阻止病人去找醫生，長老會議的判決使律師無用武之地。當地籍司法行政長官和政治勢力，可以開辦一宗買賣或一條運輸線，部落頭目們可以藉宗教和傳統名義，反對引進新貿易和新產品。

新興的被殖民商人和貿易商階級，爲了發展，必須衝破種種限制的柵欄。當地土著顧客群，代表著被保留給封建主的獵物，多少被禁止買新產品，他們因此構成了一個大家競爭的市場。

封建領袖，在西化的青年國族主義者和群眾之間，築起了一道屏障。每當菁英們朝農村群眾做出努力時，酋長、共同體的大老、傳統權威人士就會出面警告、威脅並把他們逐出團體。這些被古領國所認可的傳統權威人士，很不高興看到菁英們企圖滲入農村去發展。他們深知城市的人所引進的思想，會對封建制的永久性原則提出否認。因此，他們的敵人不是占領權力；總之，他

們跟占領者是和睦共處的，而這些具有現代觀念的人打算瓦解這個原始社會，並從他們的嘴裡奪走麵包。

西化份子對於農村群眾，體會到一些令人聯想到在工業化國家的無產階級內部所發現的感情。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革命歷史，顯示了農村大眾經常成爲革命的絆腳石。工業國家的農村群眾通常是最不覺悟的、最無組織和最無政府主義的一群。他們所表現的特徵是：個人主義、不守紀律、貪財、易怒又容易心生氣餒，這一切定義了一種客觀上的反動行爲。

我們之前了解到國族主義政黨模仿西方政黨模式和主張，因此，在大部分情況下，他們不會向農村進行宣傳鼓動。事實上，如果對殖民地社會進行合理的分析的話，如果這個分析有被做出來的話，就會向他們指出，被殖民的農民們生活在一個結構依舊完整無缺的傳統環境，而在工業化國家裡，工業化的進步使這個傳統環境產生裂縫。在萌芽狀態的無產階級內部，人們可以發現個人主義的行爲。由於拋棄了農村，因那裡有著難以解決的問題，沒有土地的農民湧向城市，擠在貧民窟裡，力圖滲入由殖民者建立的港口和城市，構成了流氓無產階級（lumpen-proletariat）。廣大的農村群眾們則是繼續生活在一個一成不變的環境，而剩餘的人口沒有其他資源，只好湧向城市。待在原地的農民頑固守住自己的傳統。在殖民地社會，他們代表維持共同體社會的守紀律份子。的確，這種一成不變、僵化又萎縮的生活，可以穿插出一些宗教狂熱的運動或部落戰爭。

但是農村群眾自發的守紀律和利他主義，個人在共同體面前消失了。

農民不信任城市人。城市人穿得像歐洲人，講歐洲人的話，跟歐洲人一起工作，有時還住在歐洲人區。農民把他們當作是拋棄國族遺產的叛徒。城市人是「叛徒、變節者」，他們似乎跟占領者和睦相處，並在殖民體制下努力奮鬥成功。所以人們經常會聽到農民說，城市人沒有品德。我們在這裡並不是面對城鄉之間的典型對立。這是被排除在殖民主義利益之外的被殖民者，和利用殖民地剝削、從中分一杯羹的被殖民者之間的對立。

殖民主義者更利用了這個對立，來鬥爭國族主義政黨。他們發動山上人、鄉下人反對城市人。他們挑動內地反對沿海，好讓部落重新復活。所以，看到卡隆吉 (Kalondji) 加冕為卡賽 (Kasai，位於剛果的一個省分) 國王時，就像幾年前看到他在迦納首長會議時，頂撞恩克普瑪 (Nkrumah) 那樣，不必大驚小怪〔譯註一〕。

政黨並未在農村建立它的組織。這些政黨，不去利用現存的結構，為這些結構注入國族主義或是進步的內容，卻企圖在殖民體制的架構內推翻傳統的現實。他們相信能夠使國族這條船揚帆，然而，殖民體制的錨鏈卻仍沉重。他們不去會見群眾，不把自己的理論知識為人民服務，卻企圖根據先前的方案把民眾框起來。從首都到農村，他們到處安插一些無名小卒或太年輕的人，打算讓這些中央機關授權的領導們，像指揮企業裡的基本單位那樣，去領導村子或村落。傳統的

人受到忽視，甚至刁難。未來的國族歷史，應該是把村子的歷史，把國族和部落的傳統衝突歷史，寫進號召人民、決定性的行動中，然而，這些歷史卻被隨便踐踏成地方小傳記，也就是只有國家新聞是重要的。在傳統社會中備受尊敬和無可置疑的德高望眾的老人，卻當眾受到嘲笑。占領者地方當局不會放過利用這些積怨的機會，並隨時了解這個可笑的权利機關所通過的各種決定。建立在精確情報基礎上的警察鎮壓、突襲奏效了。從中央派下來的領導人，和新評議會的成員統統被捕。

這些遭受的失敗，證明了國族政黨的「理論分析」正確。這些因企圖吸收農村群眾而產生的亂七八糟經驗，加深了他們的不信任，並凝聚了他們對這部分人民的攻擊性。甚至在國族解放鬥爭勝利後，又重蹈覆轍，使得去中央以及自治傾向得以滋養。殖民地時代的部落主義，讓位給國族階段的地方主義，並制度化成一種聯邦主義。

農村的群眾雖然沒受到國族主義政黨多大的影響，但他們無論是在國族意識成熟的過程中，或是接力國族主義政黨的行動，或更少見的純粹爲了取代這些黨的貧乏，都扮演了決定性的作用。

國族主義政黨的宣傳，總是在農村群眾的內心得到迴響。在農村，人民不忘記反殖民時代的種種。婦女們依舊在孩子耳邊哼著曾經伴隨戰士們抵抗征服的歌。村童在十二、三歲就知道那些參加過最後幾次反抗的老人的名字。他們在村子裡作的夢，並不是城裡孩子所作的那種奢華或者

試及格的夢，而是夢見自己成爲戰士，這些戰士的壯烈犧牲故事，至今仍令人感動流淚。

當國族主義政黨企圖組織城市萌芽的勞動階級時，我們在農村參與了一場表面上幾乎不可理解的爆發。例如，一九四七年在馬達加斯加那場著名的起義。殖民當局十分制式化，把它視爲一場農民暴動。事實上，今天我們知道，事情更加複雜：大型殖民公司在二次大戰期間增加勢力，並且奪占了全部閒置的土地。在同一時期，人們談到可能將猶太難民、卡比亞人（阿爾及利亞的山上人）、安地列斯人移民進島上，還紛紛謠傳，下一步是南非的白人和殖民者共謀要占領本島。因此，戰後國族主義者的候選人紛紛當選，並立即組織了馬達加斯加革新民主運動黨（*Mouvement démocratique de la rénovation malgache, MDRM*）的各支部。殖民主義者爲達目的，使用最傳統的手段：大量逮捕、在部落間進行種族主義的宣傳、扶持一個無組織的流氓無產階級建立新黨。這個所謂「馬達加斯加窮人黨」（*PADESM*）的致命性挑撥，正好帶給殖民當局維持秩序的合法保證。然而，這種事先準備好清除一個黨派的行徑，在這裡卻造成大幅影響。農村群眾三、四年來一向採取守勢，突然發現到自己處於死亡邊緣，就決定狠狠抗擊殖民主義的武力。人民手持標槍，大多時候拿石塊和棍子，投入國族解放的大起義，我們知道結果如何。

這些武裝起義，僅僅代表了農村群眾介入國族鬥爭而使用的手段之一。有時候，農村接力了城市的騷動，接力了城市中成爲警察鎮壓目標的國族政黨的動亂。消息過分放大傳到農村：領袖

被捕、機槍濫射、黑人血濺城裡、小殖民者大肆屠殺阿拉伯人。於是仇上加仇，激烈的仇恨爆發了，鄰近的警察局被包圍，警察被拉扯，教師遇害，醫生因不在而倖免等等。綏靖部隊大批出動到現場，飛機出動轟炸。於是，叛亂的大旗展開了，戰爭的老傳統又出現了，婦女們鼓掌，男人組織起來並在山上占領陣地，游擊戰開始了。農民自發製造普遍的動亂不安，殖民者怕了，陷入要戰爭或談判的困境。

對於農村群眾在國族鬥爭中這種關鍵性的闖入，那些國族政黨的反應又如何呢？我們看到，大部分國族政黨沒把武裝行動的必要性列入宣傳裡。他們並不反對持久的起義，但也只是滿足於去相信鄉下人的自發性。大體上，他們把這一個新因素當作天上掉下來的大餅，向上蒼祈求繼續搞下去。他們利用這天賜的餅，但並不試圖去組織起義。他們並不派幹部去農村使農民政治化，去啓迪覺悟，提高戰鬥水平，他們只希望這些群眾乘勢追擊，不要慢下來。農村的運動沒有受城市感染，各自根據自己的辯證法去發展。

國族政黨並不嘗試對鄉下人下達明確的命令，儘管後者已完全準備聽令。他們沒向群眾提出目標，只期待這種運動無限期地持續下去，以及轟炸機不要平息這場運動。所以，我們清楚看到，即使在這種情勢下，國族政黨也沒有利用這種可能性把農村群眾拉進來，使他們政治化，提高他們的戰鬥水平。他們對鄉下保持不信任的犯罪立場。

政治幹部躲在城裡，讓殖民者明白他們和造反者沒關係，或跑到外國去。很少看到他們去山上見人民。例如在肯亞，在茅茅團叛亂期間，沒有一個知名的國族主義人士宣稱他歸屬於這個運動，或試圖捍衛這些人。

多產豐富的解釋並沒有出現，亦無國族內不同階層之間的對質。而且，由於獨立是發生於農村民衆被鎮壓之後，殖民主義和國族政黨和解放後，我們會發現，這種不理解更加劇烈了。農村居民對政府的結構改革方案，甚至是進步的社會革新，都抱持保留態度。因為，體制目前的負責人，在殖民地時代，確實從未向全體人民說明政黨的目標、國族的方針、國際問題等等。

殖民時代，農村居民和封建領主對國族主義政黨的不信任，則讓對這些政黨的仇視，在國族時期繼續下去。殖民主義者的祕密機關並未在獨立後解除武裝，這讓不滿繼續維持下去，而且給年輕政府製造各種麻煩。總之，政府只有爲自己在解放時期的懶惰和經常蔑視農村而付出代價。國家可能有一顆理智的，甚至是進步的頭腦，但龐大的身體仍舊虛弱、倔強和不合作。

於是，將出現一種嘗試，即試圖通過中央集權和加緊控制人民，來摧毀這個身體。這就是人們常聽說，在落後國家必須有一定程度的獨裁的理由之一。領導不信任農村群眾。例如，某些政府在國族解放後很久，仍舊把內地看作是不安定地區，除非在軍隊演習時，否則政府首腦、部長們不敢冒險深入內地。內地無異是陌生國度。吊詭的，國族政府對待農村群眾的某些行爲態度，

令人聯想到殖民政權。「我們不太清楚這些群眾會做出怎樣的行動。」年輕的領導人毫不遲疑的說：「如果我們要讓這個國家走出中世紀，必須用棍子。」可是，如我們之前看到的，那些政黨在殖民時代對農村群眾的爲所欲爲態度，只是損害國族統一，損害國族的加速啓動。

殖民主義有時候刻意要分散和瓦解來自國族主義的壓力。地方當局並不挑唆酋長和長老們反對城裡的「革命家」，而是把部落和一些團體組成政黨。面對城市政黨開始「體現國族意志」，並開始對殖民體制構成危險時，一些小集團誕生了，一些基於各種傾向、各種地方主義和族群的黨派出現了。一個部落形成一個政黨，並由殖民者在背後作顧問。圓桌會議可以開始了。統一主義黨派被許多潮流淹沒了，部落政黨反對中央集權，反對統一，責備統一黨的獨裁。

後來，這個策略被國族內的反對派所利用。占領者在兩、三個進行解放鬥爭的國族政黨中作出選擇。選擇的方式是很典型的：當一個政黨達到國族一致的支持，並以唯一的對話者姿態要占領者接受時，占領者就玩弄手腕，盡量拖延談判。拖延，被用來分散這個黨的要求，或將其中某些「極端主義」份子排斥在領導中心外（譯註2）。

相反的，如果沒有一個政黨具壓倒性，占領者就優先照顧那個他認爲最「理智」的黨派。不能參加談判的國族主義政黨，於是譴責另外那個黨和占領者的協議。從占領者那取得政權的黨，

意識到競爭對手蠱惑人心和混亂的立場所構成的危險性，企圖摧毀這個對手，並宣佈其非法。受迫害的政黨除了躲到市郊和鄉下地方外，沒其他辦法。這個黨就開始煽動農村群眾起來反對那些「海邊地方的賣國求榮者、首都的墮落份子」。他們利用各種藉口：宗教的理由、新當局那種創新並與傳統一刀兩斷的措施；人們利用農村群眾那種厭惡進步開化的傾向。所謂革命的主張，事實上是在農村群眾的落後、激情和自發性的基礎上。人們到處謠傳山裡騷動、農村不滿。有人信誓旦旦地說在某個角落，警察向農民開槍、派兵馳援、現存體制就要垮了。反對黨沒有明確的政綱，除了取代現在的領導小組外，別無目的，他們又重新把命運交給自發的、曖昧不清的農村群眾手中。

農民是唯一自發的革命勢力

相反的，反對派有時候不依靠農村群眾，而依靠進步份子和新興國族的工會。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號召群眾抵制勞工的要求，把這些要求醜化成反傳統主義的冒險家手段。我們從前在政黨層次上觀察到的一切，經過一些必要修正後，可在工會的層次上觀察到。起初，殖民地的工會就是母國工會的分支，其指令是母國指令的回聲。

當解放鬥爭進入明確的關鍵階段，一些工會的土著決定建立國族工會。從宗主國進口的舊組

織被當地大肆拋棄。這個工會的創立，是城市居民對殖民主義施加壓力的新因素。我們會說過，殖民地的無產階級是處於萌芽狀態，並代表一部分受優惠待遇的人。在鬥爭中誕生的國族工會，是都市人組成的，他們的綱領，首先是政治綱領和國族主義綱領。但這個在國族鬥爭的關鍵階段誕生的國族工會，實際上是自覺的和活躍的國族主義者的合法組織。

被政黨蔑視的農村群眾繼續被排斥在外。當然，也會有個農業勞動者的工會，但這個工會的創立，只是因應「向殖民主義展現一個統一戰線」的形式需要。宗主國工會培養出來的工會負責人，完全不懂如何組織農村大眾。他們失去了和農民的接觸，首先關心的是如何吸收冶金工人、碼頭苦力、瓦斯和電氣的職員等等。

在殖民階段，國族主義的工會形成了一個驚人的核心部隊。在城市裡，工會無論何時皆能夠凍結、癱瘓殖民經濟。由於歐洲移民者通常被安置在城市裡，示威行動對他們造成莫大的心理影響：沒有瓦斯、斷電、沒人清除垃圾、商品堆在碼頭任其腐爛。

這些殖民地城市，即宗主國的離島，對工會的行動十分敏感。以首都為代表的殖民地堡壘，不堪忍受這種痛擊。但「內地」（農村群眾）在這場對決中，仍是局外人。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從國族的觀點來看，工會的重要性和國族之內的其他人之間，有著不成比例的落差。獨立後，被吸收到工會的工人，有一種空轉的印象。他們所設定的有限目標，在達成的一瞬間，相較於國家建設工作的無止盡，顯得如此不穩定。面對與權力經常緊密結合的國

族資產階級，工會領袖發現，他們不能再局限於以勞動者為中心的風潮。由於工會天生遠離農村大眾，不能在市郊以外傳播指令，它就採取愈來愈政治的立場。事實上，工會成為政權的候選者。他們千方百計迫使資產階級走投無路：反對在國內保有外國基地、告發商業協議弊端、採取反對政府外交政策的立場。現在已經「獨立」的工人，仍舊在空轉。剛獨立後，工會發現，他們如果表達那些社會要求，將得罪全國的其他人。比起其他人，工人的確是體制裡最受惠的。他代表了人民中最寬裕的那部分人。打算為勞工、碼頭苦力爭取改善生活條件的示威，不只不得人心，還會引起農村貧困群眾仇視的危險。所有工會主義都被禁止的公會，只能原地踏步。

這個不健康的狀態表示，在客觀上需要一個訴諸全民的社會綱領。工會突然發現，內地也應該接受啓蒙和組織；但，在自己和農民之間設下一個傳送帶，從未成為他們關心的重點，而農民恰恰是構成國家唯一的自發革命勢力，這將證明工會的無效性，暴露綱領的不合時代性格。

工會領袖沉溺在政治和偏重勞工的行動中，竟然機械的準備搞政變。但是，在這個場合，內地還是被排斥在外。這只限定於國族資產階級和工會之間的紛爭。國族資產階級重新抬出殖民主義的舊傳統，誇耀警力和軍力；工會則組織集會，動員數萬成員。農民對這些國族資產階級和不管怎麼說總是吃飽的工人，聳肩觀望。因為他們意識到雙方都把他們看作助力。工會、政黨和政府只會以不道德的不擇手段驅使農民，把他們當作盲目的、遲鈍的力量，甚至當作暴力來利用。

這就相反的，在某些狀況下，農村群眾準備以具決定性的方式，同時介入國族解放鬥爭和未來國

家將選擇的遠景當中。這現象對落後國家具有基本的重要性。因此，我們必須詳細檢討這一點。

我們看到，國族主義政黨一方面擁有摧毀殖民主義的意志；另一方面又想跟殖民主義和睦相處。在這些政黨內部，有時會產生兩個過程。首先，一批知識份子高尚的分析殖民地現實和國際形勢後，會開始批評國族政黨意識形態上的空洞及其戰術上的貧乏。他們不懈的向領導們提出一些關鍵性的問題：「什麼是國族主義？你們在這些話的背後設了什麼？這些話有何含義？為什麼要獨立？而首先你們想如何達到獨立？」同時也對方法論上的問題提出要求，認為要對其進行嚴謹的討論。在選舉的方法上，他們會建議增加「另外的方法」。在初步的小爭論中，領袖們很快就擺脫他們通常形容青年的激情。但是這些要求既不是激昂的表示，也不是青春的標誌，擁護這種立場的革命份子很快就會被孤立。披著老經驗外衣的領袖們，準備無情的甩掉這些「冒險家、無政府主義者」。

黨機關對一切革新表現出反抗的樣子。面對一場不知會以何等面貌、力量、方向呈現的風暴，領導階層的態度是戰慄不安，對此，革命的少數派發現自己陷入孤立。第二個過程，與遭受過殖民地警察迫害的上級和下級幹部有關。這些幹部透過不懈的奮鬥、犧牲和模範的愛國主義，才達到領導的地位。這些人來自地方基層，通常是一些泛泛工人、季節工甚至是失業者。對他們而言，在國族政黨內活動，並不是爲了搞政治，而是選擇從動物狀態進入到人的狀態的唯一辦法。這些備受黨內頑固的合法主義所苦惱的人，將在他們被託付的活動範圍內，表現出首創的精

神、勇氣和鬥爭的意志，這些表現幾乎機械地把他們導向殖民主義的鎮壓武力。他們被逮捕、受刑求、被判刑、受大赦，他們利用坐牢期間釐清自己的思想，更加堅定自己的決心。在絕食鬥爭中，在監獄那個共同墳墓的團結一致中，他們盼望著解放，這對他們而言意味著一個機會，可以開始一場武裝鬥爭。但與此同時，在監獄外，備受來自四面八方攻擊的殖民主義，卻開始主動接近國族主義溫和派了。

我們於是旁觀了黨內的非法主義及合法主義兩種傾向的斷裂過程。少數非法者感覺到他們不討人喜歡，人們避而遠之。黨內合法份子會戒慎的支援他們，但雙方已形同陌路。這時，非法份子會接觸幾年前就已聽懂他們在講什麼的知識份子。一個與合法政黨併行的地下政黨，就在這種接觸下建立起來。但是，當合法政黨接近殖民主義，並企圖從內部改變之際，這種針對不可回收份子的鎮壓力量，就更加強化了。這就把非法份子逼入歷史的死巷。

被城市逼走的人，首先躲進市郊的周圍。但是警察網絡又把他們趕出去，迫使他們逃離城市、逃離政治鬥爭的場所。他們逃入深山、地方、鄉下找農民。農民從一開始就收容他們，使他們躲過警察的追捕。戰鬥的國族主義者決定把自己的命運交給農村大眾，而不再跟警察在城市裡捉迷藏，他們絕不吃虧。農民的大衣，將以意想不到的溫柔和勁道，將他包裹，不露出一點蛛絲馬跡。這些人真正成爲內地的流放者，事實上則變成了游擊隊員。他們不得不隨時轉移地方以逃

避警察，爲了不引起注意而在夜間行軍，他們將有機會走遍並熟悉自己的故鄉。他們忘了咖啡館，忘了討論下一次的選舉，忘了對某個警察的憤懣。他們聽到的是真正國家的聲音，他們的眼看到的是人民巨大、無限的悲慘。他們意識到時間寶貴，這些時間曾經浪費在無益的批評殖民體制上。他們終於懂得要改變，而不是改革，不是改善。他們在一種暈眩中明白，城市的騷動始終不能改變和震撼殖民體制。

這些人養成跟農民談話的習慣，他們發現，農村群眾始終未停止用激烈的言詞，提出關於自我解放的問題，像是暴力、從外國人手中奪回所有土地、國族鬥爭、武裝起義等。一切都很單純。這些人發現了一個永恆處於不動中的人民，他們表裡一致，不動卻完整保留了自己的道德價值和對國族的熱愛。他們發現了慷慨大方、準備犧牲、急切和勇敢奉獻的人民，他們堅如磐石。我們明白，這些被警察追捕的戰士，和蹂腳的群眾，以及本能的反叛者一旦碰觸，就會爆出一種具備異常威力的混合氣體。從城裡來的人向人民學習，並爲人民開設政治和軍事課程。人民磨好武器。事實上，課程持續不太久，因爲群眾摩拳擦掌，在重拾與肌肉親密接觸的同時，導引著領袖加快腳步，揭開了武裝鬥爭的序幕。

遊民無產階級的興起

起義使政黨不知所措。事實上，他們的方針始終是斷言：所有武力的嘗試都是無效的，甚至

政黨的存在，就是對所有起義的恆常譴責。有些政黨私底下偷偷分享殖民者的樂觀主義，慶幸自己與這個瘋狂之舉無關，有人說，這件蠢事將受到血腥的鎮壓。但是，點燃的星火迅速燃遍全國。裝甲車和飛機沒有獲得預期的勝利。面對如此慘重的損失，殖民主義開始思考。甚至在作為壓迫者一方的人民內部，也開使出現這樣的聲音提醒關注情勢的嚴重性。

至於人民，開始在小茅屋裡和睡夢中哼著新的國族韻律，他們在心底不停低唱對光榮戰士的讚歌。起義已蔓延全國，現在輪到那些政黨被孤立了。

然而，起義領袖意識到，有一天必須把武裝起義擴展到城市，這種意識絕非偶然。它接受那支配國族解放的武裝鬥爭之辯證法。儘管農村代表取之不竭的人民力量，儘管游擊隊在那裡使地方更加動盪，但殖民主義從不懷疑自己的體制固若金湯，根本不覺得自己陷入危險中。於是起義領袖決定把戰爭送進敵人家裡，也就是說，送進那安靜而雄壯的城市裡。

在城市組織起義帶給領袖們一些難題：我們之前看到，大部分出生在城市或在城市長大的領袖，逃離了他們原來的環境，因為他們經常受殖民地警察的追捕，又經常不容於黨內謹慎及理智的幹部。他們隱藏在農村，既是為了逃避鎮壓，更是因為不信任舊的政治組織。這些領袖在城市內的自然觸角，是黨內知名的國族主義者。確切地說，我們之前看到，他們最近歷史的開展，是與那些膽小怕事、緊皺眉頭沉思殖民主義罪行的領導，側身錯開的。

此外，游擊隊裡的人，對他們過去的老朋友——那些他們認為是最左傾的人——初步的試探

後，將進一步肯定他們的理解，甚至是打消重見老友의 意願。事實上，從地方發起的起義，要透過被堵在城市四周的農民深入城裡，這些人在殖民制度下尚未找到一根可以啃的骨頭。地方人口急速膨脹，被殖民體制徵收土地而離鄉背井的人，不倦的圍繞各個不同的城市打轉，希望有一天人們會允許他們入城。就在這群衆裡，在貧民窟裡的人民，在遊民無產階級的內部，起義將找到它在城市的長矛。遊民無產階級，構成了被殖民人民當中，最自發和最激進的革命勢力。

在肯亞，當茅茅團造反以前的幾年，我們看到，英國殖民當局強化了恫嚇遊民無產階級的措施。一九五〇至五一年，警察和傳教士合作無間的對付來自農村和森林、大量湧入城市的肯亞青年，他們由於未能找到市場出賣勞力而偷竊、放蕩、酗酒。殖民地的青少年犯罪，是遊民無產階級存在的直接產物。同樣在剛果，從一九五七年起，採取了一些嚴厲的措施，把那些擾亂既存秩序的「年輕小流氓」趕回鄉下去。傳教團被委託去開辦了一些收容所，當然，是在比利時軍隊的保護下。

遊民無產階級的組成與發展，是一個現象，順應它自身的邏輯；不是傳教士的大量活動和中央機構的法令所能阻止的。這個遊民無產階級像一群老鼠，不管用腳踩，用石頭砸，都會繼續啃樹根。

貧民窟投入在被殖民者的生物決定法則當中，不惜任何代價要入侵敵人的城堡，必要時將通

過最秘密通道。如此被構成的遊民無產階級，並對城市的「安全」形成沉重的壓力，它意味著一個無可救藥的腐敗，和深植在殖民統治心底的壞蛆。於是，拉皮條的、流氓、失業者和普通罪犯就像堅定的勞動者那樣，從下而上的投入解放鬥爭。這些無所事事的、失去社會地位的人，通過軍事和決定性的行動，重新找到國族的道路。他們在殖民社會乃至支配者的道德中，都不能找回自己的尊嚴；現在恰恰相反，除了通過手榴彈和手槍的力量，他們沒資格進入城裡。這些下三濫和失業者面對他們自己和面對歷史，重新找回了尊嚴；妓女也一樣，年薪兩千法郎的女傭，絕望的婦女們，所有那些在瘋狂和自殺間徘徊的男男女女，開始前進，並堅決的參加覺醒起來的國族大行進。

國族政黨無法理解這個加速它們瓦解的新現象。侵入都市的叛亂改變了鬥爭的面貌。當時全部投入農村的殖民地軍隊，現在又匆匆撤回城市，以確保人身和財產的安全。鎮壓的力量分散了，到處出現危險。是國族的土地，是整個殖民地陷入恐懼不安，陷入如鬼神附身的著魔狀態中。農民武裝團參與的是零星分散的軍事包圍。城市起義則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氧氣氣球。

起義領袖們看到積極熱情的人民對殖民主義機構決定性的打擊，而加強了他們對傳統政治的不信任。每次的勝利，證明他們今後對所謂漱口劑、咬文嚼字、「吹牛學」和無效的煽動的反對，是正確的。他們對政治、對蠱惑人心的宣傳，感到深痛欲絕。這也是為何，一開始時，我們見識到一場真正的神聖勝利。

誕生於鄉村、多方繁衍的農民起義，不管它在哪裡爆發，就證明了國族無所不在、普遍高密度的存在。每個武裝起來的被殖民者，就是今後活著的國族的一小部分。這些農民起義陷殖民體制於危險，在動員它的兵力的同時使它分散兵力、隨時威脅著要扼殺它。農民起義遵循一個簡單的法則：使國族存在。沒有政治綱領、沒有演說、沒有決議、更沒有政治傾向。問題很清楚：外國人滾蛋。讓我們組成一個共同陣線，抵抗壓迫者，讓我們用武裝戰鬥，來加強這個陣線。

只要殖民主義持續不安下去，國族事業就會發展，並成爲每個人的事業。解放的藍圖已畫好，並關係到整個國家了。在這個時期裡，自發性是國王，主動性是各地區域性的。在每一處山頂上，一個小型政府組成了，並發號施令。在山谷和森林中，在叢林和村子裡，到處會遇到一個國族權力機關。每個人以行動使自己的國族存在，並致力獲得區域性的勝利。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全面的以及徹底的立即戰略。每個自發組成的小組，其目的和綱領就是解放當地。如果說，到處是國族，那麼國家就在這裡；再進一步，它就只是在這裡，戰術和戰略混淆起來，政治藝術單純變成軍事藝術，政治活動家就是戰士，打仗和搞政治被視爲一件事，而且是同一件事。

遊擊戰起，國族傾覆

這些被奪去的與生俱來的權利，習慣生活在鬥爭和敵對的狹隘圈子裡的人，即將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下，清潔和淨化國族的地方面貌。在一場真正的集體狂喜下，一些敵對的家庭決定抹去一

切、忘記一切，和解情況倍增。重新勾起深埋、根深柢固的仇恨，是爲了能確實消除它。國族獲得承認，促進了覺醒。國族的統一，首先是集團的統一和團結，是消除舊的紛爭，和最終泯滅宿怨。同時，淨化包括一些當地人，他們因某些活動，因勾結占領者而損壞國族聲譽。相反的，叛徒和賣國賊將受審訊和懲罰。人民在制定法律的持續步伐中，發現自己在當家作主。從殖民沉睡中醒來的每一點，在這種無法忍受的氣溫下生存。村子裡盛行吐露真情、驚人的慷慨、使人無法生氣的善意、永遠堅定不渝的爲「事業」而死的意志。所有這一切，都使人聯想到共同體、教會和神祕的信仰。沒有任何一個當地人，不被這帶動國家的新節奏所感動。一些密使匆匆趕往鄰近部落。他們組成起義的第一個聯絡體系，並帶動尚無動靜的地區活動和發展起來。一些著名的頑固敵對部落，興高采烈，並且流著熱淚放下武器，發誓鼎力相助。人們如兄弟般親密的在武裝鬥爭中，跟昔日的宿敵重逢。國族的範圍擴大了，這是迎接新部族上場的陷阱。每個村子發現，自己是革命的絕對代理人和行動的中繼站。部落之間、村與村之間的團結一致，表示國族的團結一致，首先在增強打擊敵人方面看出來：每個組成的突擊小隊、每次爆發的新戰火，表明每個人在圍捕敵人、迎擊敵人。

這種團結一致，在以敵人發動的進攻爲特色的第二期裡，表現得更加清楚。在爆發後，殖民地軍力又重新集結、重新組織，並開啓了對應於起義性質的戰鬥方式。這種進攻，再度把第一期

那種令人愜意的、極樂的氣氛問題化。敵人發動進攻，並把重兵放在一些定點上。地方突擊隊很快被包抄。尤其，當他們傾向同意正面作戰時，更容易被包抄。第一期流行的樂觀主義，使突擊隊不屈不撓，甚至失去判斷力。他們深信，山頂即是國家，不接受撤退，不容邊打邊撤。出現多起失敗之後，他們也開始懷疑自己；因為突擊隊最終還是受到地方襲擊的考驗，此刻正如同整個國家的命運就在這裡上演。

但，我們懂的這種企圖和殖民體制算帳，立即結清自己命運的狂熱意志，被譴責為速食主義般，是一種自我否定。最日常的、最實際的現實主義，被昨日情感的抒發所取代，也被永恆的幻覺所取代。事實的教訓，被機槍掃射的屍體，引起對事件的重新解釋。殘活的簡單本能，支配著一種更加游移不定、多變的態度。這種戰術的改變，是安哥拉人民解放戰爭最初幾個月的特徵。我們記得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兩、三千名安哥拉農民的突擊隊衝向葡萄牙軍的陣地。男女老幼、武裝的和非武裝的、勇敢亢奮的、密密麻麻的人，一批接一批衝向殖民者、士兵和葡萄牙國旗的統治區。一些村子、機場被包圍，被無數次的攻擊，成千上萬的安哥拉人遭到殖民主義者的機槍掃射。安哥拉起義領袖不久就懂得，要真正解放自己的國家，就得另外找辦法。因此，幾個月來，安哥拉領袖霍爾登·羅貝托（Holden Roberto）在考慮不同的解放戰爭模式和利用游擊隊戰術後，重新組織了安哥拉國民軍。

在游擊戰中，事實上，戰鬥不再是人們所在之處，而是人們前往之處。每個戰士，在赤腳之

間把行走過的一部分捲入戰爭。國民軍不是跟敵人一決死戰的軍隊，而是向一個村子又一個村子移動，向森林撤退，當瞥見敵人在縱谷中掀起一片塵土時，就高興的蹀腳。部落開始移動，人民大搬家，更換陣地；北方人向西移動，平地上山，沒有一個戰略位置屬於優位。敵人自以為在追擊我們，而我們始終能設法處理，遁入敵人後方，就在它認為我們被殲滅的時候攻擊它。此後，是我們在追擊敵人。敵人用盡一切戰術和火力，給人的印象是不知所措和陷入困境。我們唱歌，高聲唱。

在這段期間，起義叛亂的領袖，理解到必須啓蒙團體、教育他們、灌輸理論、組織軍隊和集中權威。這個分散的國族，武裝起來的國族，必須修正和超越分散的狀況。曾經逃避城市那種徒勞無益的政治氣氛的領袖們，又重新發現，政治不是作為麻痺和矇騙的手段，而是作為加強鬥爭和把人民準備好，使他們朝往國家這個清晰方向前進的唯一方法。領袖們意識到農村起義，不管它多麼崇高偉大，也需要加以監督和引導。領袖們被帶往去否定農村起義這種運動模式，並把它導向革命戰爭。他們發現，鬥爭的成功，必須以目標明確、方法明確為前提，尤其，農村群眾必須對他們努力的暫時動力有所認識。利用大眾心中的怨恨，我們可以堅持三天，必要時堅持三個月，但我們無法因此就在國族戰爭中獲勝，無法使敵人恐怖的機器垮台，如果我們忘了提高戰士的覺悟，就不能改造人。壯烈的勇氣、漂亮的口號是不夠的。

此外，解放戰爭的發展，給領袖們的信念決定性的一擊。事實上，敵人改變了戰術。在粗暴

的鎮壓上，結合了伺機放鬆的姿態、分裂陰謀及「心理戰」。敵人成功的到處利用挑撥離間者，進行反顛覆活動，使部落鬥爭死灰復燃。殖民主義爲了實現它的目標，雇用兩種當地人。首先是傳統的合作者，長老、首長、巫師等等。我們之前看到，農村群眾規矩矩的沉睡在日復一日的平靜生活中，繼續尊重宗教領袖、貴族的後裔。部族像單一個體那樣，遵循傳統長老所指示的道路。殖民主義借助於教士的高位，以大量的金錢，讓這些心腹爲自己服務。

殖民主義也會在遊民無產階級中找到一大群差遣部隊。因此，任何國族解放運動都不可忽視遊民無產階級。這個階級總是會響應起義的號召，但如果認爲忽視他們就能起義，那麼，這群飢餓的和失去社會地位的人不會投入武裝鬥爭，而且是站在壓迫者那一邊。〔譯註3〕壓迫者絕不錯失時機，去挑撥黑人互相吵架，欣然利用遊民無產階級的頭腦不清和無知的毛病。如果起義部隊不先把這支預備隊盡速組織起來，它將重新站在殖民者那一邊充當傭兵。在阿爾及利亞，提供保安隊和梅沙立主義〔譯註4〕的，是遊民無產階級；在安哥拉，是他們充當葡萄牙軍隊的開路先鋒；在剛果，在開賽省和喀坦加省的地方獨立主義示威中，我們可以發現這批遊民無產階級；而在利奧波維爾（Leopoldville），他們則受到剛果的敵人利用，組織一些「反盧蒙巴的「自發性」集會。

敵人分析叛亂勢力，愈來愈仔細研究由被殖民的人民所構成的全部敵人，意識到其中某些階層的意識形態弱點和精神不穩定。敵人發現，在一個嚴格的、組織十分嚴密的起義先鋒隊旁邊，

有一大群人，因為他們習慣於生理的悲慘、卑屈、不負責任，他們對叛亂的參與，經常會萌生很多問題。敵人就利用這些人，不惜代價，敵人用刺刀或懲一儆百來刺激自發性。美金和比利時法郎流入剛果，而在馬達加斯加則增加了反荷瓦族（譯註5）的暴行，阿爾及利亞徵募一些新兵——名副其實的人質——補充法國兵力。起義領袖完全看到了國族正在傾覆。一些部落，全體組成保安隊，而且配備了現代武器，出發作戰，並侵入劃為國族主義環境的敵對部落。起義開始時那種壯大的一致性變質了，國族的團結瓦解了，到達決定的轉捩點。於是，群眾的政治化被認為是歷史的必要性。

一系列的局部戰鬥

這種聳動的唯意志主義，打算一下子將被殖民者帶往絕對主權，這種確信，以為我們可以以同樣的速度、在同樣的光芒下，隨身搬走國族所有的小碎塊，這種建立希望的力量，這一切，從經驗上看來，則顯露了極大的弱點。只要被殖民者想像，以為他可以不經過渡，即能從被殖民狀態到獨立國家的自主公民狀態，只要他自以為是的相信直接用肌肉上陣的幻景，那麼，被殖民者在認識的道路上，就不會有真正的進步。他的意識還停留在初步的階段。被殖民者熱情投入鬥爭，尤其是武裝鬥爭，這我們之前已經看到了。實際上，農民更是積極參加起義，狂熱程度遠勝於之前面對反殖民生活方式時都不會停止過的緊皺面孔。從永恆不變，在各種計謀之後，從那令

人聯想到魔術師精彩表演似的平衡體系，農民一向對殖民強制保持著相對的主體性。他們甚至相信，殖民主義不是真正的勝利者。農民驕傲，對入城、對接觸外國人建設的世界持保留態度，當殖民地政府代表靠近他時，總做出後退的動作，這一切都不斷表示，農民以自己的善惡二分法，來對抗殖民者的二分法。

反種族的種族主義，是一種捍衛性命的意志，是被殖民者面對殖民壓迫所做出的回應的特徵，這明確代表了投身鬥爭的充分理由。但是，人們不會爲了仇恨或種族主義的勝利而支持戰爭，忍受高壓，甚至眼看著自己家破人亡。種族主義、仇恨、憎惡，雖然是「復仇的正當欲望」，卻不能成爲解放戰爭的養分。這些意識中的閃電，把肉體拋向亂哄哄的道路，將它投入幾乎是病態的夢幻狀態中，在那裡，他人的臉使我暈眩，我的血召喚著他人的血，我那呆滯的死亡召喚著他人的死，最初之時的這個巨大狂熱會減退消逝，如果它打算靠自己的養分維生。殖民軍隊無休無止的暴虐，的確把激情的因素導入鬥爭中，給了戰士仇恨的新動機，和去幹掉殖民者的新理由。但是，領袖日復一日的意識到，仇恨是無法構成建國綱領的。如果你只依靠對手（他當然老是增加罪行）加深鴻溝，而把所有人推回到起義上面，那就必敗無疑了。在任何的情況下，敵我會設法爭取某些居民的團體、某些地區、某些首領的同情。在鬥爭的過程中，殖民者和警察會被下達一些命令，他們表現出不同的態度，變得更「通人情」。他們甚至在殖民者——被殖民者的交往中，稱呼當地人「先生」或「女士」，增加了禮貌和殷勤，使被殖民者有種印象，好像他們見

證了改變。

被殖民者不單單只是因為餓得要死、眼看他的社會瓦解，就拿起武器，也是因為殖民者把他看作牲畜，像對待牲畜那樣對待他，這些措施令他十分敏感。仇恨被這些心理上的發現平息了。技術專家和社會學者指出了殖民主義的伎倆，並對各種「情結」深入研究：欲求不滿情結、好戰情結、可殖民化的情結。殖民者提升土著，試圖通過心理學及理所當然花幾個小錢，來解除他們的武裝。這些卑劣的手段，這些表面的、而且拿捏恰到好處的彌補，獲得某些立竿見影的成效。被殖民者如此渴望，渴望有什麼東西能使自己變成人——甚至只是打了折扣——這渴望達到如此抑制不住的地步，使得這些施捨可以局部的動搖他。他的意識非常不穩定，非常不透明，一點點火花就會感動。欺瞞愚弄，威脅著最初那對未加分化的光明的強烈渴求。那些驚天動地的、全面性的要求，被撤回了也收斂了。一隻急著想吞掉一切的狼，一陣想引發真正革命的狂風，若是鬥爭持續下去的話，將會產生出令人辨認不出面貌的危險，事實上也是如此。被殖民者隨時有可能因為什麼隨便的讓步，被解除武裝。

起義領袖戰慄的發現了被殖民者的不穩定性。他們首先茫然，然後通過新的迂迴辦法，懂得解釋的必要性，以及把意識從困境中徹底解脫出來的必要性。因為戰爭持續下去，敵人更加組織起來，變得強大，猜測出被殖民者的戰略。國族解放鬥爭不是一蹴而成，史詩是每日的生活，是

困難的，人們忍受的痛苦超過殖民時代的所有一切。在城裡，殖民者似乎改變了。我們的人比以前更快樂，人們受尊重。日復一日，投入鬥爭的被殖民者，以及應該支持他們的人們，不該動搖。他們不該想像已達到目的了。當人們給他明確鬥爭目標時，他不該想像這是不可能的。再說一次，應該要向人民解釋，人民應該要了解他要往哪裡去、怎麼去。戰爭不是一次的戰役，而是一系列的局部戰鬥，老實說，沒有一次是決戰。

因此，我們有必要節省兵力，不要讓他們一下子全部投入萬劫不復。殖民者的後備軍比被殖民者更加強大和具有優勢。戰爭繼續下去，敵人在堅守，大規模的說明不是爲了今天或明天而做。事實上，它從第一天就開始，而且不會因爲不再有對手而終止，僅僅是因爲對手，基於種種原因意識到，結束這場鬥爭和承認被殖民者的自主權，對他們有利。鬥爭的目標不該仍舊停留在最初之時的那種未分化的程度。如果不對這點有所防備，就有可能碰到這種情況，人民每每在敵人稍做讓步時，就會思考爲什麼要延長戰爭的理由。人們習慣了占領者的蔑視，習慣他們不惜一切代價維持壓迫的堅強意志，以致於任何主動的寬宏大量、一切顯示善意的行徑，都令被殖民者又驚又喜，傾向高歌讚頌。必須使用多重解釋，向積極活動份子說明清楚，讓他們不被殖民者的讓步矇住雙眼。這些讓步算什麼，不過是一些讓步而已，它並不針對從被殖民者的觀點來看那本質的部分，我們可以肯定，如果讓步不觸及殖民體制本質的部分，那就不是針對主要部分。

更精確的說，占領勢力那種兇暴的型態可能完全消失。這種戲劇化的消失，表現出占領者減

少開支和防止兵力分散的積極作爲。但這種消失必須付出巨大的代價，沒有別的，而是把國家的命運更加強制的框住。舉歷史上的一些例子，可以幫助人民深信讓步這種騙人的把戲，以及不惜一切代價實施讓步，對於某些國家而言，是造成更加全面奴化的結果。人民全體戰士應該認識到這個歷史法則。這種讓步就是套在頭上的枷鎖。當澄清工作沒有完成，我們就會驚訝於，某些政黨的領袖容易跟前殖民者達成莫名其妙的和解。被殖民者必須相信，殖民者不會給他什麼。被殖民者通過政治或武裝鬥爭獲得的，並不是因殖民者的慈悲或善意而得到，只說明了殖民者不可能讓步。更進一步，被殖民者應該知道，這些讓步，不是殖民主義所造就，而是他自己造就出來的。當英國政府決定在肯亞議會上多賜給土著幾個席位時，無恥的或頭腦不清的人才會說，是英國政府造就這些讓步。難道看不出，這是肯亞人民所造就出來的嗎？被殖民者、被掠奪的人民必須丟掉一直成爲他們特徵的那種心理狀態。被殖民者在萬不得已下，可以接受殖民主義的和解方案，但絕不妥協。

鬥爭，揭開社會現實

所有這一切的說明，這些陸陸續續的啓發意識，這種走向認識社會歷史的道路，都只有在組織內、將人民編制、框架起來，才有可能掌握。這個組織，是利用起義初期由城市來的革命份子，和隨著革命的發展而重返農村的革命份子而建立起來的。是這個核心，構成了叛亂政治組織

的雛型。但是，農民在經驗中累積了自己的知識，也顯示他們有能力領導人民的鬥爭。在處於備戰狀態的國族和領袖之間，產生了相互啓迪和補充的作用。傳統的機構強化了、深化了，有時甚至完全改造了；仲裁所、長老會議和村民會議改造成革命法庭，變成政治、軍事委員會了。在每個戰鬥隊、每個村子裡湧現出一批政治委員。他們開始開導那些不理解地方情況的人民。這樣，政委就不再害怕那些如果不再說明清楚就會使人民迷失方向的問題。武裝的積極活動份子，看到許多土著繼續他們在都市裡的生活，彷彿山上發生的事與他們無關，彷彿不知道最重大的運動已經展開了，他們對此感到憤怒。城市一片寧靜，日常生活照常過下去，給農民一個苦澀的印象：整個國族的大部分人都坐在外場。這引起農民的反感，並加強了他們整個對城市人的蔑視和譴責。政委們應當引導他們透過覺悟，來看出立場上的細緻差異之處：人群中某些特定份子，他們握有一些獨特利益，這些利益並不總是與國族利益疊合。於是，人民才會明白，國族獨立使得現實的多重面向——有時是分歧和對立的——顯露出來。這些闡明在鬥爭時候具有關鍵作用，因為它使人民從廣泛但未分化的建國主義，過渡到社會與經濟的意識。人民的鬥爭在剛開始時採取了殖民者的原始善惡二元論：白人和黑人、阿拉伯人和歐洲人；他們在鬥爭過程中發現，有些黑人比白人更白，他們發現，即使將來有一面國旗和形成國家的可能性，也不會使一些人放棄他們的利益和特權。人民終於明白，有些土著像他一樣，並無迷失方向，恰恰相反，似乎利用戰爭，來加強他們的物質利益和新生的權力。他們進行不正當的交易，並大發戰爭財，不屑一顧那些始終

無條件自我犧牲而把鮮血灑在國土上的人民。用原始的手段對抗殖民主義戰爭機器的戰士，意識到自己在推翻殖民壓迫的同時，又協助建造另一個剝削機器。這個發現是令人不悅、痛苦以及憤慨的。以前很簡單，一邊是好人，另一邊是壞人。當初田園牧歌似的不真實的光明，如今已為渙散意識的昏暗所取代。他對著背叛尖叫，但必須修正這種尖叫。背叛不是在國族的層次上，而是社會的，必須要教導人們喊捉賊。人民在艱辛走向理性的認識中，同樣應該拋棄他對統治者過份簡單化的看法，族類在他眼前碎裂化。他在自己的周圍，見識到一些殖民者並不參與犯罪的歇斯底里，他們與整個族類有所區別。這些人譴責殖民戰爭，我們卻不加區分的將他們投入外國人整體中，真的會引爆發議論的，是當這族類的典型過渡到另外一邊，變成黑人或阿拉伯人，並接受痛苦、刑求、死亡時。

這些例子平息了被殖民者對外來移民的普遍仇恨。被殖民者熱情的接近這些人，並以一種感情豐富的競相許諾，而傾向絕對信賴他們。在被視為殘暴和無情的後母的宗主國裡，許多輿論，有時是相當知名的聲音，提出意見，他們毫無保留地譴責政府的戰爭政策，建議最終要考慮被殖民者的國族意志。一些士兵逃離殖民軍，另一些則明確的拒絕為反對人民的自由而戰，他們坐牢、受苦，因這群人民之名，為獨立、為管理自身事物的權利而戰的人民。

殖民者不再單純是應該被打倒的人。某些殖民主義中的成員，比國族的某些子孫們，更加接近而且極度的接近國族主義鬥爭。在兩個意義上，種族的和種族主義的層次被超越了。人們

不再發給所有黑人或穆斯林一張真實身分證書。不管哪個殖民者走近時，人們不再總是急忙找大刀或槍了。意識艱辛的通向局部的、局限的、不穩定的真實。可以想見，這一切是十分辛苦的。使人民成熟的任務，將同時因為組織的嚴密和領袖的思想水平，而變得容易進行。意識型態的力量，會歷經鬥爭的展開、對手的伎倆、勝利和失敗，而轉化和增強。領袖們展現他們的力量和權威，通過揭露錯誤，利用每次意識的倒退來吸取教訓，確保新的進步條件。每個地區性的事物消長，都被放在所有村子和所有政治網絡層次上進行檢討。起義證明了自身的理性，也表達了它的成熟，每次只要它將人民的覺悟，往前推進了一步。儘管周圍一些人有時會認為，將問題細緻化會構成危險，如此一來，會使得人民此一大整體內部產生裂縫，但領袖對於一些原則相當堅持：那些從國族鬥爭中得出的原則，以及從人類為爭自由所進行之普遍鬥爭中所得出的原則。在典型的革命家裡，存在著反對微妙的差異和蔑視個案的粗暴思想，但相似的粗暴，也存在於典型的反革命、冒進、無政府主義者當中，如果不立即克服這種純粹、完全的粗暴，勢必導致運動在幾個星期後失敗。

逃離城市的國族主義戰士，被領袖們那蠱惑人心、改良主義的手法嚴重刺傷，對「政治」大失所望，然而，他們在具體實踐中，發現一個與先前政治完全不同的新政治。這個政治，是嵌入歷史之中的負責人、領袖們的政治，這些人，以肌肉和大腦肩負了解放鬥爭的領導大任。這是國

族的、革命的和社會的政治。被殖民者現在將要認識的這個新現實，只有通過行動才存在。鬥爭粉碎了舊殖民地的真實，揭示了一些未知的方面，帶來了新的意義，並指出這些事實所掩蓋的矛盾。戰鬥的人民，依靠鬥爭，呈現出這個新現實，和認識這個新現實，奮勇向前，從殖民主義中解放出來，並事先對所有矇蔽企圖，對所有盲目的愛國心有所警惕。只有由人民所行使的暴力，由領導層組織和啓發的暴力，才能使群眾辨別社會現實，解答這個問題。如果沒有鬥爭，沒有在實踐中去認識，那麼只剩下狂歡和喧鬧；僅限於極小範圍內的再適應，權用上層的一些改革、一面國旗，而在下面，則是廣大未分化的群眾，繼續活在「中世紀」的混沌狀態裡，無休無止的運動。

【譯註1】卡隆吉本來是盧蒙巴領導下的「剛果國族運動」的穩健派，後來卻結合他的巴爾巴部族人反對盧蒙巴。

【譯註2】例如一九二〇—三〇年代台灣的民主運動蓬勃發展，日本當局（台灣總督府）准許台灣士紳成立台灣民眾黨（一九二七年七月），先決條件是他們必須先跟蔣渭水等「過激派」劃清界線，表明「不含任何政治鬥爭」的態度，迫蔣渭水妥協。民眾黨只能作為「代表輿論，以合法手段達成政策的交涉團體」，這一策略立刻分化了台灣人的反對力量。

【譯註3】例如清代統治台灣時期（1683—1895），每逢動亂，統治者就先利用地方頭頭去招募羅漢腳（遊民）組成所謂「義勇」，鎮壓朱一貴、林爽文等的叛亂。這些人死了再送進忠烈祠——義民廟享受春秋兩祭。

【譯註4】梅沙立·哈基（Messali Hadj），反對國族解放陣線的溫和派阿爾及利亞人。

【譯註5】荷瓦族（Hova），泛指全馬達加斯加人。



國族意識之厄運

歷史清楚的告訴我們：反殖民主義的鬥爭，從來就不是一開始就鑲嵌在國族主義的觀點中。長久以來，被殖民者的努力，是朝向廢除一些令其掛心之事：像是強迫勞動、體罰、工資不平等、政治權利的限制等等。這個爲了民主、反抗壓迫的鬥爭，逐漸脫離了新自由主義強調普同性的混亂，而通向——有時候是十分艱苦的——國族的要求。然而，由於菁英們的準備不足，他們和群眾之間缺乏建置性的聯繫，他們的怠惰，加上應該說是在鬥爭關鍵時刻的軟弱，將導致悲慘命運的開端。

國族意識，若不是協調的凝聚了全體民衆內心深處所憧憬的生活，若不是來自人民的動員最具體、直接的成果，那它將只是個毫無內容、脆弱且粗糙的型態而已。我們在其中所發現的缺陷，充分說明了年輕的獨立國家爲何容易從國族過渡到種族，從國家過渡到部落。正是這些裂縫，使人理解那些損害國族的飛躍發展和國族統一的倒退現象。以後我們將看到，會出現這樣的弱點以及其中涵蓋的嚴重危險性是一個歷史的結果：是因爲落後國家的國族資產階級不能使民衆的實踐理性化，即缺乏理性。

落後國家的典型弱點，那幾乎天生就固著於落後國家國族意識中的弱點，不單單是因為被殖民者受到殖民體制縛手縛腳所造成的，它也是由於國族資產階級的懶惰、精神貧乏以及極度受到國際思想影響的結果。

在殖民體制結束時得到權力的國族資產階級，是個發展落後的資產階級，幾乎沒有經濟實力。總之，沒有那種可以跟它想取而代之的宗主國資產階級匹比的經濟實力。沉溺在唯意志論的自我陶醉中的國族資產階級，十分容易深信，自己能夠進一步取代宗主國的資產階級。但是，獨立把它逼得走投無路，在它身上引發災難性的反應，迫使它向過去的宗主國發出焦慮的呼喚。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和商人們，是新成立國家最開化的組成部分，他們的特徵是人數少，集中在首都，從事商業，經營農業和自由業。在這個國族資產階級的內部，既沒有工業家，也沒有金融家，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並不傾向生產、創造、建設和勞動，它們幾乎全體被引向仲介型的活動，它極大的使命感似乎就是流通。國族資產階級沒有產業領導人，只有仲介人的心態。的確，殖民者的貪得無厭和殖民主義所設置的禁止輸出制度，使他們沒有選擇的餘地。

在殖民體制下，國族資產階級不可能積蓄資本。然而，確切來說，一個落後國家中，國族資產階級的真正歷史任務，就是否認自己是資產階級，否認自己是資本工具，而使自己完全成爲由人民構成的革命資本的奴隸。

在落後國家中，真正的國族資產階級，應該使自己背叛過去肩負的天職，使自己投向人民的學校；換句話說，把在殖民地大學所學習到的一切知識、技術的資本，投入人民的解放奮鬥，然而，不幸的是，我們看到國族資產階級經常背離這條英勇、積極有成果和正當的道路，反而心安理得的走入一條的可怕道路，因為那是一條反國族的道路，一條典型的資產階級的、因循守舊的，卑躬屈膝的、愚蠢又厚顏無恥的道路。

國族資產階級的過渡宿命

衆所周知，從一定時期起，國族主義各政黨的目標是純粹國族的。他們用獨立的口號動員民衆，把其他的委諸將來再說。當有人問，這些政黨它們所提出的經濟計畫如何，如何建立體制時，他們顯得無法回答，因為，他們完全對自己國家的經濟問題一無所知。

這個經濟始終在他們之外發展：他們對本國的地上及地下現有的和潛藏的資源，只有一種從課本上得來的概略知識，所以他們只能抽象、籠統的談論。獨立後這個落後的資產階級在數目上減少了，沒有資本，拒絕革命，勢必悲慘的停滯不進。它不能自由的發揮天才，過去可以略微輕率的推說它的天才受到殖民統治的阻礙。由於資本不穩定及高級管理人員稀少，使他們在幾年間走入手工業型經濟的絕境。在這種不可避免又十分局限的觀點中，國家的經濟是所謂建立在地方產物的基礎上的經濟，因此出現相當多手工業的論述。在不可能設置一些能替國家和自己賺更多

錢的工廠的情況下，資產階級就對手工業包裹上一種沙文主義式的溫情，意思就是將它和新的國族尊嚴劃上等號；此外，它還爲資產階級賺取實質的利益。這種對地方產物的崇拜，這種不可能想出新方向的困境，也表現在國族資產階級深陷在殖民地時期特色的農業生產中。

獨立後的國家經濟並未重新設定方向，始終是花生、可可、橄欖的收成問題；同樣，在基礎產品的貿易上，也沒出現任何的修正；國內並未建立任何工業，我們依然繼續出口原料，繼續讓自己作爲歐洲的小農，作爲未加工產品的專家。

然而，國族資產階級不斷要求經濟和商業部門國有化，因爲他們不認爲國有化意味著全體經濟爲國民共有，意味著滿足全民的所有要求；他們也不認爲國有化是按照新的社會關係來支配國家；對他們來說，國有化是把殖民時期承襲下來的那些不當的特權，一部分破格轉移給當地人。

由於資產階級既缺乏充分的物質手段，也沒有足夠的知識手段（即工程師、技師），他們的要求只局限在，占據前殖民者所占有的辦公室和商店。國族資產階級取代了以前殖民者的位置：醫生、律師、商人、代理人、經理、貨物過境或轉運代理人。他們認爲，爲了國家的尊嚴和保全自己，應該占據所有這些地位。接著，他們要求，今後不論是外國的大公司想要在國內維持下去，或者有意進出國內，都要由他們經手。國族資產階級發現了他們充當仲介商的歷史使命，正如人們所見的，所牽涉到的不是改造國家這個使命，而是充當一個偽裝的、戴上今天新殖民主義

假面具的資本主義的過渡角色。他們毫不引以為恥的、稱職的充當西方資產階級代理人，以此沾沾自喜。這個利字當頭的角色、這個收入微薄的職位、這種目光如豆、這種缺乏壯志雄心，象徵著國族資產階級沒有能力去發揮它身為資產階級該發揮的歷史作用。在這裡，可悲的是，我們看不到任何一個國族資產階級身上可以看到的生氣勃勃的開拓者風格、世界開創者和發明家風格。在殖民地國族資產階級內部，享樂主義主導一切；在心理的層面上，他們自我認同於他們吸取全部知識之所在的西方資產階級。他們追隨的，是西方資產階級否定的和頹廢的負面，完全沒有跨越探索和發明這些早先的階段，這些不管怎樣，恰恰是西方資產階級之所以能有成果之理由。殖民地國族資產階級在它的最初階段，自我認同為西方資產階級的結尾。千萬不要認為它快速超過各個階級。事實上，它是由結尾出發，它從未經歷青春期的驚濤駭浪、大膽無畏，且在唯意志主義的那些時候就已經衰老了。

從國族資產階級的頹廢面來看，他們受到西方資產階級的大力援助，後者以異國情調、打獵、賭場觀光客身份的出現。為了他們，國族資產階級全力建設休閒娛樂設施。這個活動將打著觀光業的名義，納入國家工業當中。如果我們想要證據來證明，前被殖民資產階級搖身一變成爲了西方資產階級「派對」的籌辦人，那麼，我們必須回顧一下在拉丁美洲所發生的事：哈瓦那和墨西哥的賭場、里約的海水浴場、巴西和墨西哥的少女、十三歲的混血女孩、墨西哥的阿卡普科

(Acapulco) 和玻利維亞的科日卡日納 (Copacabana)，這些都是國族資產階級墮落的可恥印記。由於缺乏主見，由於疏離人民，自己把門關死，由於先天沒有思考能力去顧全國家的大局，國族資產階級就只能充當西方企業的代理人，並將自己的國家組成歐洲的妓院。

再一次，我們不應忘記發生在拉丁美洲某些國家的慘況歷歷在目：美國來的銀行家、生意人和技術官僚，一降落到「熱帶地方」，可以一星期或十天就窩在為他們提供的「原住民保留區」裡，享受酒池肉林的日子。

地主的行徑實際上與城市資產階級的行徑一樣，當國家一宣佈獨立，他們立刻強烈要求農場國有化。藉助多重手段，奪取前殖民者的農場，以便強化在自己地盤上的支配力，他們並不試著改革農業、提高生產，或者把農業整合到真正的國家經濟中。

其實，農場主要求政府保證他們的利益、特權，使他們享受比從前外國殖民者更多的方便和百倍的優惠，對農業勞動者的壓榨更加強化和合法化。這些新殖民者玩弄兩、三個口號，透過為國家努力的名義，要求農業勞動者加強勞動。完全沒有農業現代化，沒有發展計畫，沒有革新，因為即使牽涉到最小風險的革新，也會使這些人恐慌，並使占有土地、猶豫不決的、小心翼翼的地主資產階級陷入混亂，他們愈來愈陷入在殖民主義所設置的回路中。在這裡，首創精神是政府的事，由政府確定革新，促進發展和提供融資。農業資產階級拒絕即使是一點點的風險，他們反

對打賭、冒險，只要求牢靠、迅速的回報。裝進他們口袋裡的巨額利潤，只是作為國民所得，不是用來再投資。儲蓄的心理支配了這些農場主，往往在獨立後那幾年，資產階級毫不遲疑把他們從祖國所獲取的利潤託付給一些外國銀行；另一方面，他們把巨款花在豪華消費、買轎車和別墅等種種被經濟學家描述為落後國家資產階級特點的東西上面。

我們說過，剛掌權的被殖民者資產階級，他們發動階級的攻擊性用來獨占過去被外國人據有的位置。獨立的第二天，他們立刻就 and 殖民主義同夥的律師、商人、地主、醫生和高官起衝突。它要跟這些「侮辱國族尊嚴」的人進行無情鬥爭，它使勁揮舞著指導階層的國族化和非洲化的概念大旗。事實上，它的行動愈來愈染上種族主義的色彩，它粗暴的向政府提出一個直截了當的問題：我們必須占有這些位置。直到它們完全占據這些位置時，才會完全壓住它們的火氣。

至於城市的無產階級、失業大眾、小手工業者，與這種國族主義態度站在同一邊；但是我們要給他們一個公道：他們只是追隨資產階級的脚步。如果說國族資產階級和歐洲人競爭，手工藝者和小手工業者則是發動反對非本土非洲人的鬥爭。在象牙海岸（Côte-d'Ivoire），其實有反達荷美（les Dahoméens）和反上伏塔族（les Voltaïques）的種族暴動。達荷美人和上伏塔人控制了小交易，獨立後他們備感象牙海岸人民的敵意。我們從國族主義過渡到極端國族主義、沙文主義，最終到種族主義。人們要求外國人離開，燒毀他們的商店，摧毀他們的棚子，把他們私刑打死，

象牙海岸政府的確勒令那些人離開，滿足了國民。在塞內加爾則出現反蘇丹人的示威，馬馬杜·迪亞（Mamadou Dia）先生指出（註1）：「確實是這樣，塞內加爾人民只因為仰慕其領袖才接受馬利神祕主義（La mystique du Mali）。他們加入馬利聯邦，除了表現出對這些領袖的政治上的信賴之外，沒有別的意義。塞內加爾的領土並不因為加入馬利聯邦而失去活力；尤其因為蘇丹人在首都達卡（Dakar）顯得太強勢，令人難以釋懷。因此，這件事說明了聯邦的分裂非但不會引起遺憾，反而受到民衆的歡迎，人民鬆了一口氣，而且，任何支持聯邦維持下去的聲音也沒有出現。」

當若干階層的塞內加爾人，一下子抓住了他們的領袖提供擺脫蘇丹人的機會——這些蘇丹人在商業上或行政部門上妨礙他們——的同時，剛果人旁觀了比利時人大批離開，對此還不敢相信之餘，馬上決定對住在利奧波維爾和伊麗莎白維爾的塞內加爾人施加壓力，叫他們離開。

如同人們所見，這兩種現象中的機制是一樣的。如果歐洲人限制了年輕國家的知識份子和資產階級的貪婪，那麼，對於大眾和城市人而言，競爭主要是由不同國家的非洲人表現出來。在象牙海岸是達荷美人，在加納是奈及利亞人，在塞內加爾則是蘇丹人。

當由資產階級提出的幹部黑人化或阿拉伯化之迫切需求，並不是來自真正的國族化意圖，只是出於把一向由外國人掌握的權力交給資產階級的考慮時，大眾在他們的思考水平上，也提出同樣的要求，但是限於在黑人或阿拉伯國家的範圍內。在倡言大陸大團結的熱烈主張和大眾受到指導階層鼓吹下的行爲之間，還可以描述出各種各樣的態度。人們可以看到一個永恆的往返，在落

入消亡的非洲統一，到最可惡、最令人惱火的沙文主義間的回歸。

馬馬杜·迪亞指出：「在塞內加爾，那些領袖們曾經是主張非洲統一的主要理論家，並一再爲這一思想犧牲了他們的地方政治組織和個人的地位，他們雖然出於善意，不能否認也必須負責到底。他們的錯誤——我們的錯誤——是藉口反對巴爾幹化〔譯註1〕，而在分析中沒有充分注意領土擴張主義這個前殖民主義的事實。我們的錯誤就在於我們的研究中沒有對這個現象投以足夠的關注。因此不管統一理論多麼令人讚賞，多麼能引起共鳴，但也無法消滅這個社會學事實，即這個理論是殖民主義的結果。我們被精神上最甜美的海市蜃樓幻影所迷惑，並把我們的理想當作現實，以爲只要口頭上譴責領土擴張主義及其產物——小型國族主義，就足以克服它並保證我們所幻想的事業將會成功。」〔註2〕

從塞內加爾的沙文主義到優洛夫族 (ouolof) 的部落主義，兩者之間的距離並非很大。事實上，由於國族資產階級行爲上的氣量狹小，理論立場的不明確，所以不能成功啓發全體民衆，不能首先提出與民衆關聯的問題，不能擴大他們的世界觀；在這樣的情形下，人們就會見識到一股往部落主義立場而去的回潮，我們會見識到，心裡帶著憤怒的種族主義激烈的勝利。因爲既然資

〔註1〕馬馬杜·迪亞《非洲國家和世界因有》(Nations africaine et solidarité mondiale) · P U F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一九六〇年，一四〇頁。

〔註2〕馬馬杜·迪亞，出處同上。

產階級唯一的口號是「讓我們取代外國人」，既然他們急於要在所有部門取得自己的權利，奪占他人的地位，那麼那些小國族主義者們，例如計程車司機、賣糕餅的、擦皮鞋的，同樣可以要求達荷美人回到他們的國家，甚至更加極端的，要求富爾貝人 (Foulbés) 和頗爾人 (Poulis) 滾回他們那未開墾的叢林或深山去。

我們應當用這種觀點，來解釋在新興的獨立國家中，聯邦主義到處勝利的事實。我們知道殖民統治優待了某些地域。殖民地經濟並未被整合進國家整體當中，它總是被安排在跟各個不同的宗主國的補充關係中。殖民主義幾乎從未開發整個國家。它滿足於發掘天然資源，開採這些資源並向宗主國的工業輸出，因而可以使殖民地部分的部門相對富裕，而其他部分則繼續落後與貧困，或加深這種現象。

獨立不久後，住在比較繁榮地區的人會意識到他們比較幸運，並且出於內心原始的反射作用，拒絕扶養其他地區的國民。盛產花生、可可、鑽石的地區展露頭角，面對著構成國家其餘部分普遍空蕩蕩的全景，這些地區的人民，仇恨的看著其他地區那些能引發他們妒忌、欲望和殺人衝動的人民。殖民地化以前的宿仇意識、種族之間的舊恨又重新挑起。巴盧巴人 (Balubas) 拒絕供養盧盧阿人 (Lulusas)，喀坦加 (Katanga) 州建立國家後，阿爾貝·卡隆迪 (Albert Kalondji) 立刻給自己加冕為南卡扎伊 (sud Kasai) 國王。

非洲統一是一個含糊的口號，但是非洲男女卻熱烈支持這一口號，並且運用它，對殖民主義施加可怕的壓力，揭示其真面目，並在同一個國族內粉碎內部的地方部落主義。由於國族資產階級急於捍衛自己眼前的利益，目光如豆，顯露出它無力實現單純的國族統一，無力把國家建立在牢固且豐饒的基礎上。曾經擊敗殖民主義的國族解放陣線解散了，日趨衰敗，浪費了他們既往的勝利成果。

種族和部落所進行的殘酷鬥爭，企圖占領外國人離開而騰出空位的好戰心，這些同樣也導致一些宗教上的競爭。在農村和偏遠荒區，各種小教團、地方宗教、伊斯蘭教的祭典重新活躍起來，並且也重新開始逐出教門這個階段。在大城市裡，在行政部門層級上，我們看到兩大啓示宗教正在對決：伊斯蘭教跟天主教。

宗教披上了種族主義的面具

被非洲統一的誕生而撼搖了根基的殖民主義，重整勢力，企圖利用運動的弱點來粉碎統一的意志。殖民主義藉由向非洲民衆揭露「宗教」上敵對的存在，來動員他們。在塞內加爾，《新非洲》(Afrigue nouvelle)每週散發對伊斯蘭教和阿拉伯人的仇恨；在西海岸掌握大部分小商業的黎巴嫩人，被交付國族制裁。傳教士向群眾提醒，黑人大帝國在歐洲殖民主義到來以前，老早就被阿拉伯人侵略而摧毀的史實。人們毫不猶豫的說，是阿拉伯人的占領為歐洲殖民主義鋪平了道

路；人人暢談阿拉伯帝國主義，並且譴責伊斯蘭的文化帝國主義，穆斯林通常被排斥在重要位置之外。在另外一些地區則呈現相反的現象，信奉基督教的當地人，被看作是國族獨立客觀及意識上的敵人。

殖民主義忝不知恥的使盡詭計，志得意滿使昨天聯合起來對抗殖民主義的非洲人反目成仇。聖巴泰勒米大屠殺〔譯註2〕的概念，在某些人的思想中成形了，殖民主義聽到非洲統一的崇高宣言時，一旁靜靜的冷笑。在同一國家內，宗教分裂民衆，這些宗教社團，被殖民主義及把殖民主義當作工具挑撥離間，彼此對立，到處爆發意外的事件。在一些天主教或基督教占優勢的國家，人們看到穆斯林少數國族投身在罕見的虔誠當中。伊斯蘭教的祭典重新活躍起來，他們強烈抵制天主教的暴力專制。人們聽到一些部長在會議時對某些人說，如果他們不滿意，何不去開羅算了。美國的長老教會往往把他們反天主教的偏見，移植到非洲的土地上，並透過宗教，使部落之間反目成仇。

在大陸的層次上，這種宗教的緊張，往往披上最卑劣的種族主義面貌，把非洲區隔成白色的和黑色兩部分。什麼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以北的非洲這種別名，終究掩飾不了潛在的種族主義。在這裡，人們主張白人非洲擁有千年的文化傳統，它屬於地中海世界，是歐洲的延伸，具有希臘、拉丁文化的性質。黑色非洲則是了無生氣的、野蠻的、未開化的……荒蕪的地域。那裡，人

們整天聽到關於女人的面紗、一夫多妻制、阿拉伯人歧視女性的嗡嗡聲。所有這些想法，由於他們的侵略性，使人想起殖民者經常被人描述的樣子。這兩大地域各自的國族資產階級，汲取了殖民主義最腐敗的根源，他們替代了歐洲人，並在大陸傳述一種對非洲未來十分恐怖且有利的種族主義哲學。由於他們的懶惰和依樣畫葫蘆，促進了殖民時代特徵的種族主義之植入和強化。同樣的，這一點也不足為奇，假如我們在一個所謂非洲的國家裡，聽到的只是種族主義的想法，而且見識到父權的行為，這讓我們會有一種苦澀的印象，以為自己身處巴黎、布魯塞爾或倫敦。

在非洲某些地區，父權大家長主義令黑人顫抖，也有著一種汲取自西方文化中的猥褻思想，認為黑人根本無法理解邏輯和科學。有時候，人們甚至有機會見識到少數黑人處於近乎半奴隸狀態，這些合理化劃分，甚至合理化黑色非洲各國對白色非洲國家的不信任。當一個黑人非洲的市民漫步在白人非洲國家的大城市裡，聽到孩子叫他是「黑鬼」，或一些官員用蹩腳的法語對他說話時，也就見怪不怪了。

不，很不幸，這種現象並非單一特例：一些在撒哈拉以北唸中學的黑色非洲學生，總是聽到同學們問他們，在自己的家鄉是否有房子住、他們是否知道電氣、他們在家裡有沒有吃人肉。不，很不幸，這並非無稽之談，在某些撒哈拉以北地區，當人們遇見一些來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時，總會要求這些南方人把他們帶到「隨便哪裡都可，但是要黑人在一起」。同樣的，在某

些新興的黑色非洲國家，一些議員甚至是一些部長，都嚴肅的斷言，危險之處，並不在於國家再被殖民主義占領，而是可能被「從北方來的、肆意破壞的阿拉伯人」入侵。

資產階級的無能為力

正如我們所見，資產階級的無能並不僅僅顯示在經濟方面，他們藉著狹隘的國族主義和種族的名義掌握權力，儘管有一些形式浮華、但內容空洞的宣言，完全不負責的玩弄出自歐洲的道德論或政治哲學的詞句，最終還是證明，他們不能使最起碼的人道主義占上風。當資產階級強大時，他們按照自己的力量安排世界，則毫不遲疑的肯定一些具普同性意圖的民主主義。對這個在經濟上穩固的資產階級來說，必須有一些特殊的條件，才會使他們被迫不去尊重自身的人道主義意識型態。西方資產階級，儘管本質上是種族主義者，卻經常透過多重的細緻差異，來掩飾種族主義，使他們白璧無瑕的保存所宣示的人類最高尊嚴。

西方資產階級充分佈置了路障和柵欄，可以安心的和它所剝削和蔑視的人競爭。西方資產階級對黑人、「北非的阿拉伯人」的種族主義，是一種蔑視的種族主義，是把對方視為無物的種族主義。但是，宣稱人與人之間實質上是平等的資產階級意識型態，為了使自己合乎邏輯、應付得宜，於是邀約次等人來完成自我人性化，這個過程，是透過去體現資產階級所代表的這類的西方人道主義。

新興國族資產階級的種族主義，是一種防禦性的種族主義，一種基於恐懼的種族主義。它在本質上，通常與庸俗的部落主義，甚至與黨派及教團之間的對抗，沒有區別。人們可以理解，為何那些敏銳的國際觀察家並不太認真看待非洲統一的大問題。因為看得見的裂痕那麼多，所以人們預感，在非州統一到來以前，應該先解決所有的矛盾再說。

非洲人最近才發現自己，他們決定以整個非洲大陸的名義，來對抗殖民體制的壓迫。然而，從這裡到那裡，那些急於獲取一己利益和建立剝削國家體制的國族資產階級們，卻竭力阻止這種「烏托邦」的實現。他們深知自己的目標，竭力阻止統一，決心阻止兩億五千萬人為戰勝愚蠢、飢餓、非人類所進行的努力。這就是為何我們必須知道，非洲的統一只能靠人民的壓力和人民的領導，也就是無視資產階級的利害關係，才能達成。

從內政和制度面看，也證明了國族資產階級的無能為力。在一些落後國家裡，議會遊戲根本是假的。資產階級由於經濟上的無力，也由於它不能催生和諧一致的社會關係，並也不能將這種社會關係立基於自身作為主導階級的準則上，於是，它就選擇了自己覺得最容易的解決辦法：單一政黨。他們尚未具備良好意識以及安心感，這些只有在經濟力強大和掌握國家機構時，才能擁有的。他們不創造一個使國民安心的國家，反而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國家。

國家本來應該由於它的堅強和領導，使人信服，使人卸除武裝，使人安眠；但它卻相反，十

分戲劇化的、炫耀自身的、製造混亂的、以暴力對待人民的，陷國民於經常的危險中。這個唯一的政黨，是毫不掩飾的、肆無忌憚的、無恥的資產階級獨裁的現代形式。

事實上，這種獨裁沒有遠大的前景可言，它不能制止自身不斷冒出來的矛盾。由於資產階級沒有經濟力來確保支配，並分給全體國民一杯羹，此外，由於它汲汲於以最快又最乏味的方式中飽私囊，於是國家更加陷入停滯。而爲了掩蓋這種停滯，爲了掩蓋這種倒退，爲了讓自己安心，爲了給自己找驕傲的藉口，資產階級除了拚命在首都加蓋宏偉的高樓大廈，只做所謂的聲譽花費之外，別無其他。

國族資產階級愈來愈不顧國內和國家落後的現實，反而向過去的宗主國、向確保爲他們服務的外國資本家看齊。就像它絕不跟人民分享利益，也絕不允許人民利用外國公司支付的酬勞，它將發現，需要一個大眾領袖去肩負雙重角色：安定體制，並使資產階級永續統治。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獨裁，從一個領袖那裡汲取了生存的穩固性。衆所周知，在先進國家中，資產階級獨裁，是資產階級經濟強大的產物。相反的，在落後國家裡，領袖代表道德的威力，讓瘦弱和一無所有的新興國家資產階級庇蔭其中，並中飽私囊。

長久以來，人們從旁聽說過或見過領袖，人們遠遠的或是在夢中追隨領袖與殖民族勢力對抗，於是本能的信賴這位愛國者。獨立前，領袖體現了人民的願景：獨立、政治自由和國族尊嚴。然而獨立不久後，領袖非但不能實際體現人民的需要，不再成爲帶頭者，讓人民經由擁有麵包、土

地和一個重返人民神聖手中的國家，而獲得尊嚴，反而暴露他私下的職能：成爲國族資產階級所建構的那種急於享受、唯利是圖的機構中的總統。

領袖，儘管他經常是正直的，儘管他所作的宣言那麼真誠，但是在客觀上，他卻成了今日國族資產階級和前殖民公司利益結合下之保護者。他那純粹受良心支配的正直，已日漸風化。由於領袖和大衆的接觸是如此不真實，導致他竟然深信人民怨恨他的權威，懷疑他爲祖國服務的熱忱。領袖冷酷批判人民對他忘恩負義，並日益堅決把自己列入剝削者的陣營。於是，他在知道原因的情況下，自我轉變成腐化、享樂的新興資產階級的共犯。

新興國家的經濟流通，不可逆轉陷入新殖民主義的泥沼。國家的經濟從前是被保護的，如今卻完全被指導。通過貸款或贈與來提供預算。每一季，從總理到政府代表團，都到舊宗主國或別處籌募資金。

舊殖民的強大勢力，增生了要求，積累讓步和保證，並且愈來愈不會小心掩飾對國族國家的壓制。民衆在無法忍受的貧困中了無生氣，慢慢意識到領袖們卑劣的背叛。這種意識，因資產階級自身無力形成階級，而變得更加激烈。資產階級並不按照各種部門來層層分配財富，不做階層化、差異化的工作。尤其當十分之九的人口繼續飢餓，這個新的特權等級，更是侮辱人和令人憤怒的。這個等級無恥、快速且無情發財，引起民衆徹底的覺醒，意識到明日的暴力將帶給他們希望。資產階級把國家的全部財富併吞到自己的利益中，它以一種邏輯，而且是匪夷所思的邏輯，

對黑人或阿拉伯人極盡貶抑，使人聯想到從前代表殖民主義者的種族主義學說。一方面是民衆的貧困，另一方面是資產階級特權者毫無節制財富，以及它對其他人的蔑視，這些，使得民衆的態度、想法堅決起來。

淪為空殼子的政黨

但是，破殼而出的威脅將導致權威的強化和獨裁的出現。具有戰士和獻身的愛國者背景的領袖，在人民和貪婪的資產階級之間構成一道屏障：他替這個特權等級擔保，並對這些人的無恥、平庸和傷風敗俗視而不見。他協助阻撓民衆的覺醒。領袖爲了挽救這個特權階層，對人民隱瞞了他的計謀，就這樣，淪爲矇蔽和麻痺大眾工作最熱忱的工匠。每當他對人民講話時，總是提起當年英勇的事蹟，他代表人民而戰鬥，以人民的名義而勝利，告訴人民要繼續相信他。作爲楷模的，是許多非洲的愛國者，他們在前輩們的政治鬥爭中，謹慎引入了國族主義的決定性風範。這些人來自偏遠荒地，他們說自己是來自偏遠荒地，並以黑人之名說話，這讓首都的國族主義份子感到羞恥，當權者視爲醜聞一件。這些人，過去歌頌自己的種族，承擔起所有的過去，無論是退化或人類學上的習俗，而今天，唉！他們又搖身一變，成爲某團體的爲首人物，轉過身去不理睬偏遠荒地，並宣稱人民的使命就是跟隨，一再，並且永遠的跟隨。

領袖安撫了人民。獨立後幾年中，領袖不能勸誘人民著手具體的事業，不能爲他們開闢真正

的未來，走上建設國家之道，只能一再重複獨立的歷史，重提解放鬥爭的神聖團結。因為領袖拒絕粉碎國族資產階級，於是要求人民退回到過去，並陶醉於引向獨立的回憶。領袖在客觀上阻止人民，拚命把人民從歷史上除名，或者執拗的阻止人民在歷史上站穩腳步。在解放鬥爭期間，領袖喚醒人民，並答應人民一個徹底、英勇的步伐。如今他卻加倍努力來麻痺人民，並且每年或每隔三、四年，要求他們回憶殖民時代，思量自己走過的漫長道路。

然而，必須說明，民衆表現出完全不能欣賞他們走過的漫長道路。農民還是犁田的農民，失業者仍處於失業狀態，儘管歡慶，儘管國家的旗幟仍新，卻無法說服自己，生命中有些東西是真正改變了。掌權的資產階級想證明些什麼也是徒勞，群衆無法抱持幻想。大家餓肚子，而現在由非洲人擔任的警察局長，卻使他們極度不安。民衆開始賭氣，掉頭離去，不再對這些不給他們任何出路的國家感興趣。

然而，領袖仍不時出現在電台上講話，下鄉巡視以安撫、平息並矇蔽群衆。由於沒有政黨，就更加需要領袖。在獨立鬥爭時期，的確曾經存在一個由當前領袖所領導的政黨，可是獨立後，這個黨卻可悲的解散了。只有形式上的政黨、名稱、黨徽和口號留下來。一個有建置的政黨，本該是為群衆真正的需要而組織起來，並自由傳播那些基於需要而經討論過後的想法；如今，政黨卻變成追求個人利益的工會。獨立以來，政黨不再幫助人民提出要求，幫助他們更加覺悟到自己的需要和更加鞏固自己的權力。今天政黨的任務，是把上面的指令傳達到民衆那裡。再也沒有那

種能奠定和保證黨內民主的從下而上和從上到下的往返。相反的，政黨成爲群眾和領袖之間的障礙，再也沒有黨的生活了。在殖民地時代設立的黨細胞、黨支部，如今完全解除動員了。

戰士們強忍怒火。這時，人們才意識到，有些戰士在解放鬥爭中所採取的態度是正確的。其實，在戰鬥時刻，有些戰士曾經要求領導機關，制定一個綿密的方針，確定目標，提出一個綱領。可是領袖們藉口捍衛國族統一，一開始就斷然拒絕這個任務。他們反覆強調，方針就是反殖民主義的國族大團結。這些人做事說話有時把激烈口號當作擋箭牌，一切思想活動限於國族自決，或歷史的趨勢是橫掃殖民主義等等說法。當戰士們要求更加正確分析歷史的風向時，領袖就拿希望、去殖民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來搪塞。

獨立後，政黨陷於令人驚訝的麻木不仁。只有在示威、國際會議、獨立紀念日的場合，才動員戰士。黨的地方幹部成爲行政官，黨變成政府機關，戰士們重新成爲平民，並空有公民權。

戰士們在完成了把資產階級扶上台的歷史任務後，就被堅決勸退，以便資產階級可以安穩的完成自己的任務。然而，我們並沒有看到，有哪個落後國家的國族資產階級完成了什麼使命。幾年後，政黨的風化變得明顯了，而觀察家，甚至是膚淺的觀察家，也能看到，過去的黨如今成爲一個空殼子，只是用來讓人民保持停滯的工具。從前在戰鬥時曾經吸引全體國族的黨，現在已經解體了。獨立前參加黨陣營的知識份子，現在通過他們的行動證明，當初入黨，只是爲了能在獨

立時分杯羹，黨變成個人成功的手段。

然而，在新體制內部，存在著一種不平等的富裕化及富裕獨占。有些人占兩、三個缺，從不同的職務中謀利，展現投機主義的專家作風。特權增加、貪污橫行、道德敗壞。國家財富貧乏，烏鴉太多又太貪婪了。黨淪為資產階級的權力工具，用來加強國家機構，並確定將人民框架住，令他們不得動彈。黨幫助政府壓制人民，愈來愈成為強制和反民主的工具。黨在客觀上，有時在主觀上，是唯利是圖的資產階級共犯。同樣，國族資產階級跳過建設階段而投入享受，同時又在制度方面，跳過議會階段，選擇國家社會主義的獨裁。今天，我們知道，長達半個世紀之久在拉丁美洲得逞的法西斯主義，是獨立時期半殖民地國家辯證的結果。

在這些貧窮、落後的國家裡——按理是最富有和最貧困並行——軍隊和警察支撐了體制。軍、警是由外國顧問出主意而形成的，警力和兵力，跟國家其餘處於萎靡不振的殘餘部分成正比。國族資產階級愈來愈公然賣身給外國大公司。外國公司透過報酬而攫取特許權，貪污醜聞百出，部長們發財，他們的妻子變成娼妓，議員們予取予求，甚至到警察和稅吏都不得不加入這個貪污隊伍的地步。

反對勢力變得更加挑釁，民衆不用解釋就領會了它的宣傳。對資產階級的仇恨從而更加明

顯。似乎得了早衰症的新興資產階級，根本聽不進逆耳忠言，並顯得不能掩耳盜鈴，無法理解到，掩飾他的剝削，甚至只是稍稍掩飾，也對自己有利。

布哈柴維爾 (Drazaville) 篤信基督教的《非洲週刊》(La Semaine africaine)，向體制的寵兒們寫道：「有地位的名流及夫人們，今天你們享受舒適的生活，可能是自己所受的教育，擁有漂亮的豪宅，受朋友、親戚的庇蔭，給你們各種天職並打開了你們的新視野。但是所有財富給你們包上了一層外殼，使你們看不到周圍的貧苦。要小心啣！」《非洲週刊》對尤盧先生 (Youlou) [譯註3] 的走狗所提出的警告一點也不具革命性。《非洲週刊》是想告訴那些使剛果人民挨餓的人，上帝將會懲罰他們：「如果你們心中沒有為處在你們下面的人著想，那麼教堂裡將沒有你們的位子。」

真正的資產階級並不存在

很清楚的，國族資產階級並不因這種指責而感到不安，資產階級攀附於歐洲，仍舊堅持利用這種狀況。他們從剝削人民中獲取的巨大好處，都被輸往國外。新興國族資產階級往往比外國大公司更不相信自己所建立的體制。他們拒絕在自己的國家土地上投資，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對保護和養育他們的國家，表現出顯著的忘恩負義行徑。他們在歐洲金融界炒股票，並在巴黎或漢堡度週末。某些落後國家的國族資產階級的行為，使人聯想到，強盜在每次持械搶劫後，對同夥們

隱藏自己的那一份贓物，並且小心翼翼準備撤退。這種行爲暴露出，國族資產階級扮演著長期看來是輸家的角色。他們深知這種狀況不會無限制持續下去，卻打算盡最大可能利用它。然而，如此的剝削和對國家的不信任，將不可避免的引爆大眾的不滿。而在如此條件下，體制強硬起來，軍隊變成有組織鎮壓不可缺少的支柱，由於沒有議會，軍隊成了仲裁者。但是軍隊遲早也會發現自己的重要性，使政府始終懷有可能會發生軍事政變危險的壓迫感。

正如大家所見，某些落後國家的國族資產階級沒有從書本上學到什麼。如果他們好好注意拉丁美洲國家，無疑就會認清那些正在醞釀的危險。於是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如此沸沸揚揚、製造轟動的小型資產階級，注定停滯不進。在落後國家裡，資產階級此一階段是不可能的。當然會有警察獨裁、利益集團，但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產生則注定失敗。在一個貧困的國家裡搶奪鈔票的庸俗利益集團，早晚會成爲受外國顧問團巧妙操縱的軍隊手中的一根稻草，任憑使喚。從前的宗主國所行使的是間接統治，透過它所餵養的資產階級，以及透過國家的軍隊，後者由它的專家所架構而成，針對人民而設，用來使人民動彈不得並且害怕。

以上關於國族資產階級所提出的幾點意見，使我們得出一個不必感到驚訝的結論：在落後國家，資產階級不可能找出生存和興旺的條件。換句話說，編入一個黨內的大眾，以及具有高度自覺、備有革命原則的知識份子，兩者共同努力，必須阻擋這個有百害而無一益的、缺乏經驗的資

產階級的行進道路。

五十多年來，當人們在提到落後國家歷史時，所問的一個理論的問題，就是關於資產階級階段能否被跳過，這個問題，應該在革命行動的層面上來解決，而非通過推理。在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只有當他們在經濟上和技術上，足夠強大到能夠建立一個資產階級社會，創造出壯大的無產階級發展條件，使農業工業化，最後使一個真正的國族文化成爲可能時，才能替自己辯護。

像在歐洲發展出來那樣的資產階級，才能在加強自己力量的同時，精心製作出一套意識型態；這個充滿活力的、有教養的、世俗的資產階級，完全成功的完成了它積累資本的事業，並帶給國家最起碼的繁榮。然而，在落後國家裡，我們看不到真正資產階級的存在，只看到一個野心勃勃、貪得無厭的、吝嗇成性的小型特權階層，他們甘於從舊殖民勢力得到保障。這個目光如豆的資產階級，呈現不出偉大的理想和創造性之樣態。他們記住西方教科書裡學到的東西，不是成了它的複製品，而是不知不覺中變成了它誇大諷刺的那一面。

對抗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遠遠不是一種理論位置。問題並不在於去解碼歷史的裁判對他們定的罪，不應該因爲他們有阻礙國家全體協調發展的危險，就去鬥爭他們。而是因爲它百無一

用，而必須要堅決與其對抗。這個資產階級汲取蠅頭小利，成就平平，思想平庸，企圖通過樹立個人威信，通過美國汽車的光鮮外表、在里維埃（Riviera）度假、在霓虹燈閃爍的夜總會度週末，來掩蓋它的庸俗。

這個愈來愈背離全體人民的資產階級，甚至未能從西方爭取到令人側目的讓步：對國家有益的經濟投資，和若干產業的設置。相反的，裝配工廠增加，這使得國族經濟痛苦掙扎在新殖民主義的類型中。不應該說國族資產階級延緩了國家的發展，浪費時間，把國家導向可能的絕路。事實上，資產階級在落後國家的歷史中是個無用的階段。當這個特權等級被自相矛盾吞滅時，人們就會發現，從獨立以來，什麼也沒發生過，必須從頭開始，從零開始。在資產階級統治的時期設置的種種機制裡，產業恢復、轉移將不會發生，因為這個特權階層除了毫無改變繼承殖民者的經濟、思想和制度外，什麼也沒幹過。

相對來說，我們看到資產階級在數字上、知識上、經濟上的種種脆弱，要消解它顯得較為容易。殖民地獨立後，資產特權階層主要是藉由和老殖民勢力建立各種協定，而獲取力量。尤其人們留給他們和舊殖民勢力單獨在一起的空閒，使他們更有機會接替殖民主義的壓迫者。可是，一些深刻的矛盾使這個資產階級的隊伍混亂，並給予認真的觀察家一種不安定的印象。這個特權階

層尚未具有同質性。例如，許多知識份子譴責這種建立在寡頭支配基礎上的體制。在落後國家裡，總有一些真誠的菁英、知識份子、公務員，感到必須計劃經濟、將圖利者逐出法律外，嚴格禁止欺瞞。此外，這些人在某種範圍內，將為人民參加管理公共事務而鬥爭。

在獲得獨立的落後國家中，幾乎總有少數正直但缺乏明確政治思想的知識份子，他們本能的信任獨立不久就逐名求利的這種症狀。這些人所處的特殊情境（人口眾多的家庭贍養者）或他們的歷史（艱難的體驗，嚴苛的道德養成），解釋了為何他們會對那些世故、唯利是圖者帶有如此明顯的蔑視。在為了國家健全的方向而進行決戰時，必須要知道利用這些人，阻止國族資產階級，也就是摒棄獨立後不久悲劇性的波折，摒棄國族統一的不幸，摒棄世風日下，摒棄國家被貪瀆腐蝕、經濟衰退，摒棄一個在短時期內建立在暴力及威嚇下的反民主制度。這是為了進步的唯一選擇。

資產階級表面上的穩固，拖延了決定的形成，並使得新興國家裡最民主、進步的份子膽怯起來。在新獨立的落後國家中，所有的指導層都集中在殖民主義所建設的都市裡。由於缺乏對總體人口進行分析，而使得觀察家們認為，強大、組織完備的資產階級是存在的。我們知道，在今天，事實上，落後國家裡並不存在著資產階級。創造出資產階級的，不是精神、愛好或態度。甚至它不是因希望就被創造出來，資產階級首先是經濟現實的直接產物。

然而，殖民地的經濟現實，卻是外國資產階級的現實。他們通過代理人，即母國城市資產階級，來到殖民地的城市。獨立前，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是西方資產階級的一種，是母國城市資產階級一個真正的分公司，它從宗主國資產階級那裡汲取其正當性、實力和穩定性。在獨立前的動盪時期，被這個進口的資產階級所涵蓋的一些土著知識份子和商人們，努力自我認同於這個資產階級。在他們身上，存在著認同宗主國代理人的資產階級此一永恆意志。

這個資產階級，毫無保留並且熱情接受母國的思想機制，喪失自己的思想，並把意識建立在典型的外國基礎上，它將飢渴的發現，自己缺乏成爲資產階級的東西，也就是金錢。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只是精神上想像的階級，並不是它強大的經濟實力、管理層的活力、概念的幅員廣闊保證其資格。而且，在一開始時，並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所謂的公務員資產階級。他們在新國家行政部門中占據的位置，賦予他們安定和穩固。如果權力給予他們時間和可能性，他們終究能給積蓄一小筆錢，強化統治。然而，他們始終無法產生一個伴隨經濟及工業發展而形成的真正的資產階級社會。

人民政治化的必要性

國族資產階級從一開始就走上了仲介型的活動方向。他的能力，表現在貿易如小買賣、獲取佣金等方面。不是用錢在滾錢，而是用他對做買賣的靈敏嗅覺在工作。他不去投資，無法累積資

金，而這正是實現一個正統的資產階級誕生和繁榮所需要的條件。如果以這樣的速度，他需要幾個世紀來建立工業化的雛型。不管怎樣，他們遭到舊宗主國執拗的妨礙，舊宗主國在新殖民主義協定的架構內，已經採取了萬全的預防措施。

如果政權想把國家帶出停滯狀態，並大步走向發展和進步，它首先必須使第三級產業國有化。但是資產階級想要讓圖利、享樂的精神獲勝，態度上蔑視群眾，獲利的方式可恥，甚至可說是一種偷竊，事實上他們在這個部門做了大量的投資。從前由殖民者控制的第三級產業，將由新興資產階級侵占。在殖民經濟中，第三級產業本來遠非最重要的部門，如果要向前發展，我們早該決定將其國有化。然而，國有化不應該是僵硬的國家控制形式，不是去安插一些在政治上尚未受養成訓練的公民，讓他們成爲這些部門的首長。每當這個程序被安排時，人們會發現，政權實際上促進了由舊宗主國培養出來的官僚專制獲得勝利，這些官僚很快就暴露出他們沒有全盤考量全體國民的能力。這批官僚開始破壞國家的經濟活動，瓦解機構，使貪污、瀆職、侵占公款、黑市等等猖獗起來；使第三級產業國有化，就是民主的組織產銷合作社，就是通過群眾參與公共事務，而排除這些合作社的集中化。我們看到，這只有使人民政治化才能成功。從前，人們意識到，有必要全盤釐清重要的問題。今天，事實上，落後國家一般已謹記使民衆政治化此一原則；但，似乎我們並沒有真正談過這件首要的工作。當我們在肯定使人民政治化的必要時，也同時意味著：我們需要人民的支持，支持我們將著手進行的行動。一個表明要使人民政治化的政府，表

示出它將和人民一起管理，並為人民而管理的慾望，這不應該是一句用來掩飾資產階級領導的用語。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早就已經超越過這個權力的幼稚階段，他們冷靜借助自己的法律、經濟力和治安來統治。既然他們的政權已經鞏固了，他們不是非把時間用在蠱惑民心的姿態上不可；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統治，昂然行使權力。他們創造了合法性，並使自己理所當然成為強者。

新獨立國家的資產階級，尚無犬儒主義，亦無從容感，這兩者是立基在老資產階級的強勢上才可能產生的。這也是為何他總憂慮著要掩蓋內心深處的信念，要展現出改變，簡而言之，就是要讓自己顯得受大眾歡迎。使群眾政治化，不是每年動員三、四次幾萬或幾十萬男女就可以；這些集會，這些轟轟烈烈的大會，首先是獨立前的老戰術，為了向自己和其他人證明，他與民眾同在；使民眾政治化，是使民眾成熟而不是將之幼稚化。

這導致我們思考在一個落後國家中政黨的作用。如前所述，我們看到把一些問題簡單化的人，即屬新興資產階級，他不斷重述，在一個落後國家裡，需要一個強權治理國家，甚至一種獨裁統治。在這種觀點下，人們賦予黨監視大眾的任務：黨充當行政和警察兩個角色，控制人民，不是為了確保他們能真正參與國家事務，而是要經常提醒他們，統治機構期待他們服從和遵守秩

序。這個自以為被歷史所乘載，自認為在獨立後是不可少的獨裁，實際上象徵著有產階級對統治落後國家所作出的一個決定：先是在人民的支持下，但不久就反對人民。黨漸漸變成一個情治機關，這表明權力機構愈來愈傾向防衛。未定型的民衆被當作是一股盲目的力量，應該通過欺瞞，或通過警力，使他們害怕，而加以牢牢的控制。黨充當氣壓計和情治機關的角色；我們把活動家變成告密者，把懲戒的任務交付給他們；反對黨才初具雛形，就立刻被以棒棍和石頭來肅清。反對派候選人看著他們的房子被燒毀，警察一再挑釁，黨成爲唯一的，且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選票會支持政府的候選人。我們必須說明一下，在非洲，有些政府根據這種模式行事。所有的反對黨，而且一般而言是進步的，他們爲了爭取在公共事務上具有更大的群眾影響力而努力，期待傲慢且貪婪的資產階級下台，然而卻因警棍和監獄的關係被迫沉默，然後轉入地下。

今天，許多獨立的非洲地區的政黨，都熟知十分嚴重的權力膨脹。只要一個黨員在場，人們就沉默下來，變得像羊那樣溫馴，並對政府和領導者歌功頌德。但是在街頭、在遙遠村落的晚上、在咖啡店或河面上，應該聽聽民衆那種苦悶、幻滅、絕望和抑制的憤怒聲。黨非但無助於人民表達苦情，使人民的意見自由傳向領導方向，反而形成屏障加以禁止。黨的領導們像吹毛求疵的士官長那樣，不斷叫人民「在隊伍中肅靜」。自稱是人民公僕、自稱爲人民充分成長而努力的黨，卻在殖民政權交割後，急忙把人民趕回洞裡。在國族統一方面，黨更是錯誤百出：曾經標榜

國族主義的黨，變成種族的黨。構成黨的只是一個部落。這個宣稱自己心甘情願是國族的，保證代表全體民衆的黨，卻祕密甚至公開組成一個如假包換的種族獨裁。我們見到的，不再是資產階級獨裁，而是部落的獨裁。部長、辦公室主任、大使、省長統統由領導人的部落產生，有時直接從他的家族中選出來。這種家族型的體制，似乎又重現了古老的內婚制法律，而面對這個愚蠢、招搖撞騙、智識和精神上的悲慘，我們感受到不只有憤怒而已，還有羞愧。這些政府首腦才真正是非洲的叛徒，因為他們把非洲出賣給最可怕的敵人——愚蠢。人們可以預料，權力的部落化將導致地方分立主義的風潮。地方分權傾向出現，並成爲主流，國家解體了、分割了；叫嚷著「非洲統一」而卻只考慮自己一族的領袖，有朝一日和五個部落一起醒來，發現這五個部落也想要有他們自己的大使和部長；這位領袖，始終不負責任，不自覺且卑鄙的，譴責「背叛」。

不能失去和民衆的接觸

我們多次指出領袖角色中經常是有害的部分。那是因爲在某些地區，黨是以強盜集團般被組織起來，最冷酷強悍的人經常擔任領導角色。人們往往樂於談論這個領袖的祖先或他的魄力，並且毫不遲疑用一種同謀、略具欣賞的口吻，提到他使身邊的人發抖。爲了避免各式各樣的暗礁，必須頑強戰鬥，以免黨淪爲領袖手中順從的工具。領袖 (Leader) 來自英語動詞，意即帶領、引導，現在已不存在所謂人民的領導者了。各國族不再是羊群，不需要被人領導。如果領袖帶領

我，我要他知道同時也是我在帶領他。國家不該是由一個大人物來領導的事業，因此，人們可以理解，爲何一旦這些領袖當中有人病倒，就會引起一陣恐慌。因爲困擾他們的是接班的問題。領袖死了國家會變成怎樣？那些曾經在領袖面前輸誠的、不負責任的、不自覺的領導階層，那些整天操心他們所過的好日子、鷄尾酒會、公務旅行和耍手段營利的人，遲早會發現國家核心的精神空虛。

一個國家，若要真正回答歷史對它的提問，要發展城市，發展居民的頭腦，則應該擁有一個真正的政黨。黨不該成爲落入政府手中的工具，恰恰相反，黨應該是人民手中的工具，由人民決定政策並由政府來執行。黨不是，絕不該是所有政府成員和達官貴人們隨便進出的政治局。太遺憾了，這個政治局構成了黨的全體，而且政治局成員多住在首都。落後國家的黨幹部，都應該像逃避瘟疫那樣逃離首都。除了幾個人以外，他們都應該住在農村地區，應該避免把一切都集中在首都裡。任何一個行政上的藉口，也不能正當化首都的沸沸揚揚，它跟那十分之九的領土相比，是屬過度開發，人滿爲患。黨應該極度實行地方分權化，這是促使那些死氣沉沉的地區，那些尙未感受活力的地區動起來的唯一辦法。

實際上，每一個地區至少要有一個政治局員駐在當地，但避免任命他爲當地的長官。他不能擁有當地的行政權力。對人民而言，黨不是權力機關，而是一個作爲人民通過它來行使權力和意

願的機構。權限的混亂愈少，雙重性愈少，黨就能扮演指導人的作用，對人民的決定就愈加有保證。如果黨和權力機構混同，那時，黨的活動家就會走最快的捷徑，達到謀己利的目的，即在政府機關占有位置，加官進爵，改變等級，求取個人的功名財富。

在一個落後國家裡，設置生氣勃勃的地方領導幹部，可以阻止城市畸形擴大的過程，以及農村群衆紛紛湧向城市的現象。從獨立後開始，全權安排有力的地方領導幹部去恢復地區的活力，促進其覺醒，使住民自覺的作法，是一個要向前邁進的國家不該遺漏的必要事宜。否則，在領袖周圍就會聚集了黨的負責人和國家的達官要人們。政府機構膨脹，並不是因為發展和區分的結果，而是因為新的親朋好友和活動家等待一個位置，並且希望滲入國家機構內；所有公民的夢想，即是進入首都，找一份閒差事；地方被遺棄，沒受領導、沒受教育和孤立無助的農民群衆離開荒廢的耕地，湧向都市的近郊，使遊民無產階級隊伍過度膨脹。

這樣一來，新的國族危機就將到來了。相反的，我們認為內地應該優先受照顧。說得極端些，政府設在別處而不是現在的首都也不會有何妨害。應該捨棄首都的神化，並向未受惠的大衆說明，這是爲了他們而決定的工作。在某種意義下，這也是巴西在巴西利亞（Brasília）嘗試做的。里約熱內盧的自大，對巴西人民是一大侮辱。但是不幸的，巴西利亞仍舊是個和里約熱內盧

同樣畸形的新首都。這個新都市唯一的好處，是今天有一條穿過未開發荒漠的公路。不，任何理由也不能充分反對選擇另一個首都，反對把整個政府搬到最荒廢的一個地區去。落後國家的首都，是一個承繼殖民時代的商業概念。但是在落後國家裡，我們首先反而要增加接觸農民群眾。我們應當制定一個爲人民大眾的國家政策，我們絕不該失去跟那些爲了他們自己的獨立，和要具體的改善生活而鬥爭的民衆的接觸。

當地的公務員和技術者應該深入民間，而不是埋頭在圖表和統計表裡；他們不該再爲涉及搬到「內地」而生氣、反對；不應該再看到落後國家官吏的妻子們，以離婚來威脅丈夫，如果他們不設法避免被分派到地方去。所以，黨的政治局應該優先照顧匱乏的地方，而首都的生活，矯揉造作、膚淺，如同在國族現實生活上鍍金的怪物生活，應該在國族生活中盡可能不占重要地位，國族裡的一般生活才是神聖與根本的。

在一個落後國家裡，黨組織不應該只滿足於和群眾有聯繫，黨應該直接表達民衆的心聲，黨不是負責傳達政令的行政部門，黨是群眾有力的代言人和廉潔的守護者。要達到黨的這個概念，首先必須清算那種非常西方的、非常資產階級的、十分蔑視群眾、認爲他們沒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只能靠我們來領導的思想。事實證明，人民可以完全理解複雜的問題。阿爾及利亞革命帶給阿爾及利亞知識份子最大的助益之一，就是使他們接觸民衆，能夠看到民衆極度的、筆墨難以形

容的悲慘，同時目睹了民衆覺醒的睿智和邁向進步的覺悟。阿爾及利亞人民，這些挨餓的文盲們，這些幾個世紀以來就被拋棄在驚慌失措黑暗中的男男女女，頑強抵抗了坦克和飛機，頂住了凝固汽油及心理戰，尤其抵制了腐蝕和洗腦，抵制了國族叛徒和貝盧尼將軍（Bellounis）的「國族軍」。這群民衆儘管有弱者、猶豫不決的人和未來的獨裁者，還是頑強的站穩腳步，因為七年的鬥爭，爲他們開啓了一些之前根本沒想過但卻存在的領域。今天，一些兵工廠在山中的地下好幾公尺深處運作；今天，各級人民法庭在各地工作，各地方計畫委員會有組織的瓦解大土地所有制，周全設計明日的阿爾及利亞。一個孤立的人可以表現反對理解某一個問題，但一個集團、村落以一種令人困惑的速度理解問題了。的確，假如我們謹慎使用只有法律或經濟學學士才聽得懂的語言，那就輕易的印證，我們認爲群眾應該接受領導。如果人們講日常的語言，不受那些居心叵測想把問題複雜化來混淆民衆、企圖擺脫民衆的念頭所困擾，人們就會發現，群眾懂得所有細微的差別、所有的訣竅。若只援引專業術語，這意味著我們把民衆當作門外漢。這種語言不能掩飾那些講演者想欺騙人民，想把人們拒於門外的用心；把語言變得深澀難解是一種偽裝，在它的背後，浮現出更大的剝削企圖，就是要奪走人們的財產和主權。我們可以跟人民說明一切，只要我們是真的要他懂。如果我們認爲不需要人民，相反的，認爲人民可能妨礙私人公司和有限公司的順利進行，這些公司目的在使人民更窮困，若是如此，問題就截然不同。

廣大群眾、知識份子與政治領導人

如果認為可以不用人民插手，就完全可以領導國家；如果認為只要有人民在場，就會造成混亂、拖延事情的進行、或由於其天生的無意識而破壞，那就不容猶豫，必須把人民推開。但有時，會有這樣的情況，人民受邀來領導國家，並不延遲反而會加速國家的進展。我們，阿爾及利亞人，有幸在這場戰爭中接觸到某些事情；在某些農村地區，負責革命軍事政治的領導人，的確面對了一些情境，需要一些徹底的解決方案。以下我們將提及幾個這樣的情境。

在一九五六至五七年間，法國殖民主義者封鎖某些地區，嚴格限制人們在那些地區往來。農民於是不能再自由進城，添購他們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在這一時期，食品雜貨商大發利市，茶葉、咖啡、糖、煙草、鹽價暴漲，黑市橫行。不能支付現金的農民只能以自己的收成，甚至以土地抵押，或一塊一塊地割讓土地；而在下一階段，他們則淪為雜貨商的佃農，開始在同樣的土地上耕種。政治委員們意識到這種危險，立即作出反應，他們立刻建立起合理的糧食供應制度：進城的雜貨商，必須要到國營批發商那裡進貨，這些批發商會開給他一張發票，上面詳列商品的價格；零售商回到村子裡，首先向政治委員報到，由後者檢驗發票，規定利潤及售價；限制的賣價貼在店內，由村裡一個類似監督員的村民在場，通知農民商品的應售價格。可是零售商很快發現

一個竅門，三、四天後他宣佈沒有庫存了，私底下他將貨品在非法的黑市買賣。軍政當局立刻作出了徹底的反應：決定重罰違犯者，沒收的罰款繳納村里經費或委成公款保管，或挪作社會救濟、全村的公共工事之用。有時候，當局決定把犯法的商店關閉一段時期；如果再犯，則立刻查封，並選出一個管理委員會來管理，同時按月支付店主一筆錢作為補償。

從這些經驗出發，我們以一些具體情況為基礎，向人民解釋經濟法則的作用。資本的積累不再是理論，而成為一個十分真實和當下的行動。民衆懂得，從一家商店起，我們能夠發財，把商店擴大，這時農民訴說這家雜貨店放高利貸給他們；另外一些人則回憶，他如何把他們從自己的土地上趕走，以及他們如何從業主淪為勞工的歷程。人民愈理解事理，就愈加警惕起來，愈加意識到，一切取決於他們自己，他們的得救來自團結一致，在於理解他們自己的利益，和認清誰是敵人。人們終於明白發財不是勞動的成果，而是有組織、有庇護的盜竊結果。有錢人不再受尊敬，他們不過是躺在人民鮮血中的豺狼野豹。在另一種觀點下，政治委員必須決定，沒有誰該為誰勞動，土地屬於耕地者。這個原則，通過向人民講解，形成阿爾及利亞革命內部的基本法則，聘雇農業勞工的農民，被迫把一部分土地交給他們過去的雇工。

於是，我們發覺，儘管在法國軍隊屢次進攻、轟炸和肥料供應困難下，土地產量依舊每公頃增加三倍。農民在收割時能估價和過秤獲得的產品，他們想搞清楚狀況。他們很容易發現，勞動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奴隸狀態不允許勞動，勞動是以自由、責任和覺悟為前提。

在這些地區，我們順利進行這些可作借鑑的試驗，我們目睹了革命組織對人的建設，農民清楚領會了這個原則：若要更能品嚐工作的滋味，必須要能清醒知道努力付出為何。人們使大眾理解到，勞動不是力氣的消耗，或一部分肌肉的功能運作，而是在付出努力和汗水的同時，進一步用頭腦和心去工作。同樣的，在這些已被解放，又同時被排斥在舊商業流通之外的地區裡，人們必得改變從前那種只能向都市和出口的生產方法。人們為民衆和國族解放軍安排消費物資的生產：小扁豆增產了四倍，並組織了木炭的燒製。新鮮的蔬菜和木炭由北方翻山越嶺運往南方，而南方則向北方運送肉類。這是阿爾及利亞國族解放陣線（FLN）所決定的調配，設置了交通網。我們沒有技術員，沒有來自西方大學的計劃工作者。但是在這些解放區，每個人一天的食物配給定量，達到當時未有的數字：三千兩百卡路里。人民並不以此為滿足，他們自己更提出一些理論問題，例如：為什麼有些地區在解放戰爭前從沒見過橘子，但我們卻每年向國外出口幾千噸的橘子呢？為什麼阿爾及利亞人大多沒吃過葡萄，而幾百萬串的葡萄卻滿足了歐洲人的口腹之欲呢？如今，人民對於屬於他們所有的東西，有了十分清楚的概念。阿爾及利亞人民如今知道，除了他們以外，誰都不是他們地上和地下資源的主人。如果有人不懂得阿爾及利亞國族解放陣線頑強的不容這些所有權遭受任何踐踏，毫不妥協拒絕一切協調，那就必須記住，阿爾及利亞人民今天是個成年人，是負責的、自覺的人民。總之，阿爾及利亞人民就是土地的所有者。

如果我們列舉阿爾及利亞為例來闡明我們的意圖，絲毫不是爲了讚美我們的人民，而是要指

出，阿爾及利亞人民的自覺，在鬥爭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很清楚的，其他人民也通過不同的道路，達到同樣的結果。在阿爾及利亞，我們更加認識到，武力的對決是不可避免的。而在其他地區，通過政治鬥爭和黨所進行的澄清工作，也引導人民達到同樣的結果。在阿爾及利亞，我們了解群眾能夠解決他們碰到的問題；經驗證明，在一個低度發展國家，重要的不是由三百個人構思、決策，而是由全體人民在理解之後共同做出決定，即使代價是必須花上兩倍、三倍的時間。事實上，用來解釋的時間，用來使勞動者人性化所「損失」的時間，可以在實行中得到補償。人們應該知道自己要去哪裡、知道爲什麼要去。政治家不該不知道，若人民的覺悟是粗淺的、不透明的、膚淺的，那麼前途依舊會被堵塞。我們非洲的政治家，應該對民衆的狀況有明確的想法。然而，這種明晰必須是深刻的辯證；全體民衆的覺醒不是一下子就促成的，他們在建設國家事業中的理性參與，是線性的；首先，因爲溝通和傳達的手段尚未發達；其次，在時間性上，應該停止瞬間的、或者是下一次收成的時間性，成爲世界的時間性；最後，因爲殖民統治深植在腦海中的失望，總是會浮現出來。但我們不該不知道，任何的抗拒點，是精神上及物質上的殖民統治的遺產，戰勝它，是任何一個政府不能迴避的必要性。以殖民制度下的勞動爲例，殖民者喋喋不休斷言土著好吃懶做。今天，在某些國家裡，人們又聽到一些領導在重彈舊調。

事實上，殖民者要奴隸認真苦幹。他想透過某種愚弄，使奴隸們相信，他們所耕種的是屬於他的土地，損害他們健康的礦坑是他的，這顯然是最卓越的異化手段。很奇怪，殖民者忘記他是

靠奴隸的末日而發財。實際上，殖民者對奴隸說：「累死吧，讓我發財！」今天我們該以不同的方式行事。我們不該對民衆說：「累垮吧，但讓祖國富裕起來！」如果我們想提高國民所得，減少進口有害無益的若干產品，提高農業生產和掃除文盲，我們必須解釋清楚，必須讓民衆理解他們下這賭注的重要性。公共事務應是萬人的事務，因此必要增加基層支部。我們的確經常滿足設立一些全國性組織，例如婦女同盟、青年同盟、工會等等，並且總是設在首都。但是，如果人們想到設在首都的辦公室後面找東西，如果人們經過存放檔案的後廳，則會被空洞、虛無、虛張聲勢的情況嚇一跳。我們需要基層，和確切提供內容和活力的支部。群眾應該能夠聚會、討論、提建議和接受教育。公民應該有說話、表達自己、陳述意見，發揮創意的可能性。支部會議、委員會是個禮拜性的儀式行爲。這是給人聽取和發言的絕佳機會。每次的集會都使頭腦進行多重的聯想激盪，眼睛則會發現一個愈來愈具人性化的象貌。

在落後國家，青年中很大一部分的人會向政府提出特殊的問題，重要的是，政府要能明確的談這些。無所事事、而且經常是目不識丁的都會青年，嘗遍了各種使人墮落的經驗。先進工業國的各种娛樂，經常被提供給落後國家的青年。的確，通常一個社會成員的精神和物質的水準，和該社會自己賦予的娛樂消遣之間有同質性。然而，落後國家的青年卻擁有資本主義國家青年的那一套娛樂：偵探小說、吃角子老虎、色情照片、色情小說、色情小說、十六歲以下禁止觀賞的電影、尤其是

酒……。在西方，家境、就學、勞動大眾的相對高水準下，可以相對的充當起防禦物，阻擋這些流毒。但是在一個非洲國家裡，智力的發展並不平均，兩個世界激烈的碰撞大大撼搖了老傳統，並使認知的世界崩潰了，非洲青年的感情、感受性，完全受到西方文化中所包含的各種攻擊所侵襲，他的家庭經常表現出無法以一種穩定和均衡的力量去對抗這種暴力。

在這個領域中，政府應當充當過濾器 and 穩定劑。落後國家的青年工作委員會們經常犯一個錯誤，他們以先進國家青少年委員會的方式來定位自己。他們總是談論如何鍛鍊精神，使身體茁壯，提升運動素質，我們認為他們應當避免這種觀點。一個落後國家的青年經常是游手好閒的，首先必須使他們有事幹，所以青年委員會應當隸屬於勞動部門。在一個落後國家裡，勞動部門是不可或缺的，它和另一個必要部門——規劃部——緊密合作，發揮作用。非洲青年不該被引向體育場，而是引向田間和學校，體育場不是設在都市的展示所，而是一個空間，座落於我們開墾、耕作、獻給國家的土地之上。資本主義的運動觀念與落後國家的運動概念有天壤之別。非洲政治家不該操心去培養運動員，而是培養有覺悟的人，再者，有覺悟的人都是具運動精神的。如果體育沒有納入國族的生活中，即國族建設中，只是一味培養國家運動員而不是有覺悟的人，那麼很快就看到體育被培養職業選手和商業化腐蝕。體育不該是城市資產階級提供自己的娛樂和消遣，最重要的工作是，時時刻刻去理解國家發生什麼事情。我們不該培養出例外的人物，不該尋找英

雄，領袖的另一種形式。我們應當激勵民眾，打開他們的視野，充實他們，對他們加以區別，使他們人性化。

我們再談談這個一再出現腦際的念頭，我們想要非洲的政治家分享這個念頭，即必須使民眾的全體努力增光，使勞動光耀奪目，使其從歷史的不透明中走出來。作爲一個落後國家的負責人，就是要知道，一切歸結於教育大眾，取決於提升他們的思想，取決於人們性急的稱作政治化的東西。

的確，人們經常以一種罪惡的輕率，以爲使大眾政治化，就是插曲般的，讓他們持有一些大論述即可。人們以爲，只要領袖或一個領導人，以教訓的口氣就現實大放厥詞，就盡到使群眾政治化的當務之急。然而，政治化，是開放思想、啓發思想、產生思想。誠如塞杰爾所指的「創造靈魂」那樣，使大眾政治化，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場政治演講就可以一蹴而成的。而是狂熱的激發群眾去懂得，一切都取決於自身。如果我們停頓，那是人民的錯，如果我們前進，那也是人民的錯，沒有上帝，沒有擔負一切的偉人，上帝就是人民，魔法的手就是民眾的雙手。我們再重複一次，爲了實現這個事實，爲了使它真正具體化，必須極度排斥集中化。從上到下，由下而上的循環應該是個嚴謹的原則。不是出於形式主義的考慮，完全只是尊重這個原則才有解放的保證。使領導上層鼓足幹勁，並辯證地使它能從底部產生新的飛躍力量。再一次吧，我們阿爾及利亞人

就快要懂這些事情，因為沒有一個上面的領導成員可以隨便下達解放的命令。在阿爾及利亞是基層在戰鬥，而且這個基層不是不知道如果沒有它每天英勇和艱巨的戰鬥，最高領導階層是支持不住的。同樣的，基層也知道如果沒有一個上面的領導，基層就不會統一且無秩序的瓦解。上層只有在人民進行鬥爭時才獲得它的重要價值和牢固。嚴格說，是人民自由的給自己提供一個領導，而不是領導容忍人民。

國族經驗、國族覺悟

群眾應該知道，政府和黨是為他們服務的。自尊的人民，就是意識到自己的尊嚴的人民，絕不要忘記這些道理。在殖民主義占領時期，人們對人民說他們必須為尊嚴的勝利而奉獻生命。但是非洲人民很快就明白，他們的尊嚴並非只被占領者否認；非洲人民很快就明白在尊嚴和主權之間，有個絕對的等值關係。事實上，一個自尊和自由的人民，就是擁有主權的人民。一個自尊的人民是負責的人民。想要「指出」非洲人民是幼稚且低能的企圖，不再有用。一個政府、一個黨都有其相應的人民，而人民遲早會有自己該有的政府。

若干地區的具體經驗，檢驗著這些立場。在開會時，一些活動家為了解決難題，有時使用「只有將……」這樣的口頭禪。經常是這個唯意志論的捷徑獲勝，其中，自發性、簡單化的各種

混合論調，非理智的考量，達到危險的頂點。每當遇到一位活動家如此放棄他的責任時，光對他說「你錯了」是不夠的。必須讓他負起責任，要求他把道理說清楚講明白，並觸及「只有將」這句話的本質，這本質通常是殘酷、無人性，歸結起來是貧瘠的。領袖和活動家，誰也不掌握真理。在一些地方情況下，追求真理是集體的事；有些人經驗較豐富，較快確立他們的思想，能在過去當中建立較多的精神關係。但他們應該避免壓垮群眾，因為被採納的決定成功與否，取決於全體人民的自覺參與，誰也不能徹底擺脫。大家都會被殺害或受拷問；若是在獨立國家的架構下，人人都會挨餓和共體蕭條，集體戰鬥必須以基層的集體責任和領導層的合議責任為前提。對！必須把大家都捲入共同解放的戰鬥中去；沒有雙手乾淨的人，沒有無辜者，更沒有參觀者；大家都在我們土地的泥沼中，和我們那空空如也的腦袋一起弄髒了雙手，一切旁觀者都是膽小鬼或叛徒。

領袖的責任就是使民衆追隨他，然而這種附著力必須伴隨對要完成使命的覺悟、理解，甚至可以說是初步的智識化。我們不該迷惑人民，把人民融在激情和模糊不清之中。只有從人民中湧現的革命菁英所領導下的落後國家，今天才能帶領人民走上歷史舞台。我們再重述一次，必須強烈和毅然決然反對國族資產階級的產生和特權階級的出現，使群眾政治化，就是使所有公民都意識到國家整體，就是把國族的經驗變成每個公民的經驗。正如幾內亞（Guinea）總統圖黑（Sekou

Toure) 寫給第二屆非洲作家會議的賀函上所說的那樣：「在思想領域內，人可以自以為是世界的大腦；但是，從所有干預影響肉體和精神存在的具體生活面來看，世界才是人的大腦，因為，是在這個層次上，坐落著能力和思考單位的總體化，坐落著發展和完美化的機動力量，是在這個層次上，各種能量融合，彼此交相作用，歸根究底，人的智力價值的總體於其中體現。」個人的體驗，由於它是國族的體驗，而且是國族生存的一個環節，於是不再是個人的、局限的、狹隘的，而是能通達國家與世界的真理。正如在戰鬥階段，每個戰士雙手掌握祖國的命運那樣，在國家建設階段，每個公民應該在他每天的具體活動中繼續參與全國的協調，經常體現辯證的國族真理，繼續希望全人類獲得勝利。假如造一座橋，無法豐富造橋者的意識的話，那還不如不造這座橋，就讓人民繼續用游泳或乘小船的方式過河。這座橋不應從天而降，不應由一名突然冒出來解圍的神明〔譯註4〕強加在社會景觀之上。相反的，它應出自人民自己的力量與智慧。當然，他們可能會需要一些工程師和建築師的協助，有時後者或許是徹頭徹尾的外來者，但是當地政黨負責人必須到場，合力將技術灌溉到人民枯竭的思想中，讓他們了解這座橋的整體構造和細節，以便一起參與它的構思，並在竣工後，一起承擔成果。必須讓人民自己擁有這座橋。唯有如此，未來才有無限寬廣的可能性。

一個自稱為國族的政府應當承擔全國族的協調一致，而在落後國家中，青年是最重要的一个領域。必須提高青年的覺悟，引導他們。我們在國家的軍隊中見到的將是這些青年。如果能對青

年解釋清楚，如果青年國族聯盟能完成把青年納入國家的任務中，那就可以避免發生像把拉丁美洲共和國的未来當作抵押，甚至加以破壞的錯誤了。軍隊絕不可成爲戰爭學校，而是一個具有公民責任感的學校，政治學校。一個成年國家的士兵不是傭兵，而是拿起武器保衛國家的公民。所以，這也是爲何，重要的是，士兵知道自己是在爲國服務，而不是替一個不管多麼有魅力的軍官服務。應當利用平民和軍隊爲國服務，來提高國族覺悟的水平，使部落解體、國家統一。在一個落後國家裡，盡可能快速動員所有男女。落後國家應防止重男輕女的封建傳統延續下去，婦女不是在憲法的條文中，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在工廠、學校、集會中和男性平起平坐。西方各國讓軍人住在兵營裡，但這並不代表是最好的方式。我們並不堅持必須使新兵編入軍隊。服役可以是平民役的，或是在軍隊中，但無論如何，最好是每個健全體魄的公民，都能隨時進入一個戰鬥單位，達成保衛國家的任務。

貧苦大眾治理國族政府

集體利益的大工程應由新兵來執行。這是促進落後地區的生機，使最多公民知道國家現實的妙策。必須避免軍隊成爲一個自立的集團，因爲它遲早會由於無所事事和沒有任務而開始「搞起政治」，並且威脅政權。那些在客廳的將軍們，仗著出入權力機構的會客室，老是夢想搞政變。唯一避免這種事情的辦法，就是使軍隊政治化，即成爲國民的部隊。增加民兵同樣是當務之急，

在戰爭情況下，是全民進行戰鬥或工作。不應該有職業軍人，而且職業軍官的數字應該減到最少。首先，因為軍官經常是從大學內挑選的，他們在別的地方更有用處。對於國家，一個工程師比一個軍官更加不可或缺。其次，因為必須避免特權等級意識的形成。我們在前面所講的，就是看到國族主義這一壯麗的歌聲激起民衆反抗壓迫者，卻在獨立不久立刻分崩離析。國族主義不是什麼政治理論，不是什麼綱領。要真的避免國家倒退，避免這些停滯、這些缺點，那就應該迅速從國族意識，過渡到政治和社會的意識。國族是不存在的，假如它不存在綱領之中，這個綱領，由革命領導周詳起草，之後由人民清楚且熱情接續。應該經常把國族的努力，置於落後國家的總體範圍內。

在男男女女的頭腦和肌肉中，應該不斷存在飢餓和黑暗的戰線，貧苦和初步覺醒的戰線。群眾工作和戰勝災難的意志——這些災難，幾個世紀以來，把群眾排除在人類思想史之外——應該是所有落後國家的共同命運。第三世界人民感興趣的，不是比利時博杜安（Boudouin）國王結婚，或義大利資產階級的醜聞之類的新聞。我們想知道的，是阿根廷人或緬甸人在掃除文盲鬥爭方面的經驗，或領袖們的獨裁趨勢，這才是加強我們、教育我們和使我們的努力更加有效的因素。

正如人們所見，一個真正想在政治上和社會上解放民衆的政府，必須有一個綱領。事實上，必須有一個對人的觀念、一個對人類前途的構想。任何蠱惑人民的那一套，任何與前占領者的共謀，都代替不了綱領。人民起初頭腦不清，不久就愈來愈清醒，奮力要求這種綱領。非洲人，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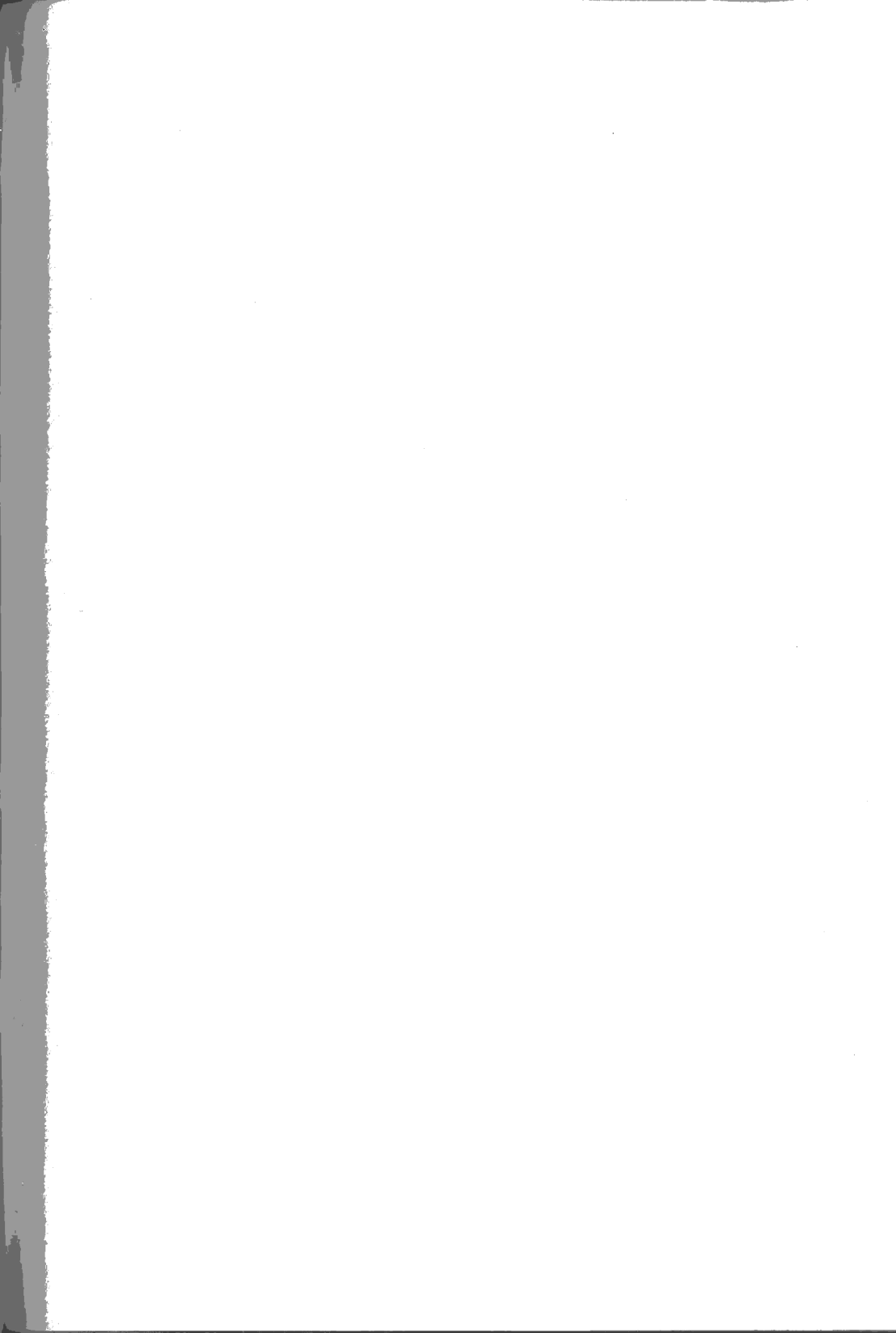
後國家的人民，和人們習慣相信的正好相反，很快就樹立起政治覺悟和社會覺悟；可能嚴重的是，他們往往在國族覺醒的階段以前，就到達了這種社會覺悟。因此，常常可以發現，在落後國家裡，對社會正義的強烈要求，恰恰是和原始部落制結合的。落後國的人民有挨餓者特有的舉止，這意味著在非洲吃喝玩樂的人的日子沒剩多久了。我們想說的是，他們的權力不可能無限延續，一個只給群眾國族主義這個糧食的資產階級，當不能履行它的使命時，必然陷入一連串的災難。如果不對國族主義詳加闡述、豐富並深入，如果它不急速轉變成政治意識和社會意識，轉變成人道主義，則將走入死胡同。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領導層把國族意識禁錮在枯燥無味的形式主義中。只有男男女女大量參加一些已經明確且充實的任務，才能賦予國族意識的內容和密度。那時，國旗和豪華的政府大廳不再是國族的象徵。國族遠離這些燈火輝煌和矯揉造作的地方，逃到農村，在那裡重獲生命及活力。生氣勃勃表現國族的，就是全體民衆躍動起來的自覺行動；就是男女一貫的、明確的實踐。集體建造一個命運，擔負適合歷史的責任；否則，就是無政府狀態、壓迫、部落化政黨的出現、聯邦主義的出現。國族政府如果真是國族的，就該是由人民來統治的和爲人民而統治的，爲貧苦大眾來治理並由貧苦大眾來治理的。任何傑出的領袖，也不能取代人民的意志。因此，國族政府在操心國際威信之前，應該先恢復每個公民的尊嚴，充實他們的頭腦，使他們的雙眼充滿人情味，創造出一個有覺悟、有自主的前景。

〔譯註 1〕巴爾幹化 (balkanisation)，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大國把巴爾幹半島分裂成幾個小國家，以便使其易於控制與制衡其他大國。

〔譯註 2〕一五二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法國新教徒在巴黎慶祝聖巴泰勒米節 (Saint Barthélemy) 當夜，信奉天主教的查理九世下令屠殺十萬名新教徒。

〔譯註 3〕Youlou，一九六〇—六年的剛果總統，後來被推翻。

〔譯註 4〕Deux ex machina (拉丁文)，字面意義是藉著某種機器從天降下的神。在古典戲劇裡，指的是在關鍵時刻出面破解陰謀的人物。引申意為，當現實處境看來沒有任何出路的時候，適時出面解圍的某個人或某件事。



論國族文化

只寫一首革命歌來參加非洲革命，是不夠的，革命必須同人民一起進行。和人民在一起，歌曲就會自己產生出來。

為了真正的行動，自己必須是非洲及她的思想中的活躍份子；必須成為整個被動員起來的民眾力量的一份子，為了非洲的解放、進步和幸福。藝術家和知識份子只能親自參加，與民眾一同完全被動員起來，為解放非洲及受苦的人類而戰鬥，除了戰鬥外別無其他可能的位置。

——西谷·圖黑〔註1〕

每一代人應該在相對的晦暗不明中，發現自己的使命，完成它或背叛它。在落後國家中，前輩們曾經在抵抗殖民主義不斷的腐蝕作用的同時，又為當前鬥爭的成熟作了準備。既然我們現在

〔註1〕西谷·圖黑 (Sekou Touré, 人作為一個文化代表的政治領袖) (Le Leader politique considéré comme le représentant d'une culture), 在第二屆黑人作家暨藝術家國際研討會上報告 (一九五九年, 羅馬)。

處於戰鬥的中心，就必須改掉將父執輩的行動極小化的習慣，或面對他們的沉默或被動時，佯裝不解的習慣。他們曾經盡他們所能的戰鬥，以他們當時所擁有的武器，儘管他們的鬥爭沒在國際舞臺上引起迴響。必須從根本不同的國際形勢來理解原因，而不是責怪他們缺乏英雄氣概。必須不只一個被殖民者說「不能再繼續這樣下去了！」必須不只一個部落起義反抗，必須不只一場農民起義被打擊，不只一場示威被鎮壓，我們今天才能帶著對勝利的確信進行抵抗。

我們的歷史任務，對於決定毀掉殖民主義前途的我們來說，是安排所有反抗、所有不顧一切的行動、所有失敗和浴血奮戰的嘗試。

國族國家的正當性

在這一章裡，我們要分析一個我們認為的根本問題：國族國家作為一個要求，它的正當性為何。我們必須承認，動員人民的政黨幾乎不關心這個正當性的問題。那些政黨從現實出發，並以這個現實為名，以這個壓在男男女女現在以及未來的現實為名，做出相符的行動。政黨懂得用動人的言語來大談國族，但它感興趣的是聽它說話的人民，假如他們期待的僅是要能生存、能了解參與戰鬥的必要性。

今天我們知道在國族鬥爭的第一個階段，殖民主義企圖通過經濟主義來撫平國族的要求。從一開始，殖民主義假裝理解、裝模作樣的虛心承認經濟的嚴重性，以及需要大量的經濟和社會的努力。

事實上，有時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出現若干令人側目的措施，或有些已停工的工地再開工，這使國族意識的凝聚延遲了幾年。但是，殖民主義遲早會發現，它不可能實現一個經濟和社會改革計畫，充分滿足被殖民土著的渴望；甚至在填飽肚子方面，殖民主義也證明是先天的無能的。殖民主義國家很快會發現，想在純粹經濟範圍中解除國族政黨的武裝，就等於是在殖民地做它不願在本國所做的事。如果說卡蒂爾主義（譯註一）在今天盛行，絕非偶然。

面對法國固執的要博得一些它該養活的人的好感，而那麼多法國人卻生活在拮据當中，卡蒂爾有著一種醒悟了的苦澀，這足以說明殖民主義不可能轉變成推行超越利害、大公無私的援助計畫。所以，不應該把時間浪費在重複寧可挨餓也不願失去尊嚴的空話上。相反的，應該深信殖民主義不可能為殖民地民衆帶來一些物質條件，讓人足以忘卻與尊嚴相關的煩憂。一旦殖民主義懂得它的社會改革策略會將它帶往哪個方向，它就會恢復過去的反應，加強警力，急派軍隊，建立一個更加適合自己利益和自己心理的恐怖統治。

在政黨中，比較常是在它的外側，出現一批有文化的被殖民者。對這些人來說，要求國族文化，肯定這個文化的存在，代表一場優先的戰役。當政治家把他們的活動定位於現實之際，文化人卻置身於歷史的框架之中。面對被殖民的知識份子挑戰殖民主義視殖民前為野蠻時代此一論調的決心，殖民主義很少做出反應。尤其因為被殖民的青年知識份子所展開的思想，已由宗主國專家們廣泛公開主張過，殖民主義對此更少有反應。我們的確看到幾十年來，許多歐洲的研究者，在總體上使非洲、墨西哥，以至祕魯的文明重獲尊重，這太平凡了。人們可能對被殖民的知識份子狂熱的捍衛國族文化的存在，感到不可思議。但是，譴責這種極端狂熱的人，卻奇怪的忘記了他們的精神機制、他們的自我，舒適的躲在久經考驗，且無人加以否認的法蘭西或德意志文化的背後。

我承認，在存在的層次上，過去存在一個阿茲特克文明這件事，對當今墨西哥農民的飲食生活並不會產生多大的改變。我承認，可能有資料顯示，曾經存在一個令人驚嘆的桑海文明（譯註2），但這並不能改變今天桑海人營養不良、文盲、頭腦空空、兩眼茫然的事實。但是，我多次提到，這種追尋殖民時代以前已經存在的文化的熱情，其正當性取自於被殖民的知識份子共同擁有的一種憂慮，想要退一步看西方文化，免得沉淪其中。因為他們意識到，他們正在迷失自我，也就是說，對於人民來說，對於這群發狂、怒火中燒的人來說，他們是迷失了，於是得發憤找回人民最古老的、最前殖民時代的活力。

推得更遠一點來說，可能維繫或者使之導向這種熱情和瘋狂的是一個私下的希望，希望在當前悲慘、對自我鄙視、否認和放棄之外，還能發現一個十分美好和輝煌的時代，這個時代能使我們在面對自己，以及面對他人時，恢復自身的榮譽。我決定進一步說，無意識裡，可能被殖民的知識份子，由於不能與他們被壓迫民衆目前的歷史交歡，更不能對現今的野蠻歷史感到讚嘆，於是決定走得更遠了，更往下坡走，興高采烈的發現一個毫不羞愧，而是尊嚴的、光榮的和莊嚴的過去。對於過去國族文化的要求，不只是使未來的國族文化獲得尊嚴，也不只是在於使未來文化獲得正當性。從精神和情感的平衡上看，這還引發了被殖民者的重大變化。人們可能還沒充分指出，殖民主義並不滿足於把它的法律強加於被殖民國家的現在和將來。殖民主義並不滿足於把人民鎖在鐵網裡，不滿足於只是清除被殖民者腦袋裡的一切形式和內容。殖民主義透過一種邏輯上的變態，指向被壓迫人民的過去，將之扭曲、毀容、消滅。這種貶低被殖民者以前歷史的企圖，在今天則具有辯證的意義。

當人們思考那些爲實現殖民時代特有的文化異化而展開的努力時，就會明白，一切並非偶然，是殖民宰制所追尋的大體上的結果，使土著相信，殖民主義應該會把他們從黑暗中拉出來。在殖民主義有意識的繼續下，一種深植土著腦中的想法：一旦殖民者離開，他們將重返野蠻、墮落和獸性。在無意識方面，殖民主義並不力圖讓土著感到它是保護孩子、防範周圍敵對環境的慈

母，而是扮演一個阻止罪大惡極的孩子自殺、阻止他發洩兇殘本能的母親。殖民地母親保護孩子、防備他自己，防備他的自我，防備他的生理及生物的現實，防備他那本體論的不幸。

黑色文化，黑人性

在這種狀況下，被殖民知識份子的要求並不奢侈，而是一貫綱領的要求。被殖民知識份子把自己的鬥爭放在正當性的層面上，他想證明，他甘於爲了展示自己更好的肉體的歷史而赤身露體，被迫投入自己民衆的腹中。

這種投入不特別是國族的。決定向殖民主義的謊言開戰的被殖民知識份子，把戰場指向大陸這個層級。過去被賦予價值。從過去挖掘出來的光輝燦爛的文化，不再只是其他國家所有。殖民主義並未進一步細緻化，只是不斷主張黑人就是野蠻人，黑人對它而言，既不是安哥拉人，也不是奈及利亞人，只是用大寫字母的「黑人」。對殖民主義而言，這片廣大的大陸就是野蠻人的巢穴，迷信及狂熱癡迷的土地，注定受蔑視、受上帝咒詛、吃人肉的土地、黑人的土地。殖民主義譴責的是整個非洲大陸，他們所斷言的，前殖民時代的特徵，就是人性的黑夜，這涉及非洲大陸整體。被殖民者爲了恢復自己的名譽，努力逃避殖民主義殘留的傷痕，卻陷入在邏輯上跟殖民主義處於同樣的觀點中。在西方文化上面走得太遠的被殖民知識份子，他們開始帶頭宣佈一種文化的存在，但他們這樣做，並不以是安哥拉或達荷美之名。被肯定的文化是非洲的文化。黑人只

是被白人統治後才變成這樣黑，當他們決心顯示文化的存在，創造文化時，發現歷史給他們指出一條明路：他必須證明一種黑色文化的存在。

的確，是歐洲人該對種族主義化思考負責，或者至少他們在思想方法是種族主義的，並且繼續用白人文化來對照其他各種非洲文化。殖民主義並不認為應該浪費時間去一個個否定不同國族的文化。被殖民者的回應，一開始也是全大陸性的。在非洲，近二十年來的被殖民文學，不是國族文學，而是黑人文學。例如「黑人性」（négritude，又譯黑鬼格）的概念，是白人對人性侮辱之反命題，這種反命題是就情感層面，或是邏輯上的。反抗白人侮辱的黑人性之興起，在某些領域內，顯示出只有它能夠取消禁令和詛咒。因為幾內亞或肯亞的知識份子，最先面臨的是遭受統治者全面排斥，以及面對統治者各種混合的蔑視，他們的反應是自我欣賞和自我歌頌。在無條件肯定西方文化後，才能無條件肯定非洲文化。大體上，在對黑人性的歌頌中，舊歐洲和年輕的非洲對立了起來，令人厭煩的說理跟詩歌相對立，一邊是呆板、客套、儀式和懷疑；另一邊則是純樸、活潑和自由，甚至華麗花俏，但也是不負責任的表現。

對黑人性的讚頌，毫不遲疑跨越了國界。美洲的黑色聲音將重新唱起這種讚歌，以更大的規模。「黑人世界」即將誕生，加納的布希亞（Busia）、塞內加爾的比拉戈·迪奧普（Birago

Diop)、蘇丹來的昂帕泰·巴(Hampaté Ba)、芝加哥的聖克萊爾·德拉克(Saint-Clair Drake)、都將毫不猶豫肯定他們之間存在著共同的聯擊和同一力量戰線。

同樣可以提出阿拉伯世界的例子。我們知道大部分的阿拉伯領土曾經被殖民統治過。殖民主義也曾經在這些地區，不遺餘力的在土著腦中植入這種思想：被殖民以前的歷史是野蠻統治的歷史。國族解放鬥爭伴隨了伊斯蘭文化覺醒的現象。現代阿拉伯作家們熱情的使他們的人民想起阿拉伯歷史的偉大篇章，這就是對占領者謊言的回答。阿拉伯文學中那些名人的姓名被編成目錄，如同非洲歌頌非洲文化般，他們以同樣的激情與活力，揮舞著阿拉伯文明的大旗。阿拉伯領袖們企望重返十二、十三和十四世紀光芒萬丈的文化中心——達爾·埃爾·沙蘭(Dar El Salam)的時代。

今天，在政治上，阿拉伯聯盟落實了這個再採用昔日遺產和使它達到最高峰的意願。今天，一些阿拉伯醫生和詩人穿越邊境互相往返，力求推出一個新的阿拉伯文化和一個新的阿拉伯文明。這些人以阿拉伯主義的名義聚集在一起，並以這個名義努力去思考。然而，在阿拉伯世界，國族感情即使在殖民統治下，仍舊保存了一種在非洲看不到的生氣。人們在阿拉伯聯盟裡也察覺不到個人與群體自發的一致性。相反，吊詭的是，每個人力圖以自身的方式歌頌自己國族的成就。文化現象其實源自於一種不加區分的狀態，這種不區分的狀態構成非洲世界的特徵，但阿拉伯人卻可以達到在對象面前被不抹去之境地。文化的實際經驗不是國族的，而是阿拉伯的。問題

不只是去保證一個國族文化，更不是去掌握國族運動，而是在面對統治者的全面壓制時，承擔起一種阿拉伯文化或非洲文化。在非洲的層次上，如同在阿拉伯的層次上一樣，殖民地文化人所提出的復權要求，是混合各種思想、全大陸性的，全世界性的，在阿拉伯人的例子裡也是如此。

非洲文化人所處的歷史職責——必須使他們的要求種族化，多談非洲文化，少談國族文化——把他們導向一條死胡同。讓我們舉非洲文化協會（*Société africaine de culture*）的情況為例：這個協會是由一群非洲知識份子創立的，他們希望互相認識、交換彼此的經驗和各自的研究心得。這個協會的目的是肯定非洲文化的存在，在一定的國與國範圍內編制文化財產目錄，顯示每個國族文化的內在活力。同時，這個協會又回應另一個要求：靠到歐洲文化協會那邊，而後者威脅著將轉變為全球文化協會。因此，這個決定追根究底起來，是因為它想帶著所有的武器，帶著一個就是從非洲大陸母體裡湧現出來的文化出席全球性的大會。然而，這個協會很快就暴露出它無力承擔這些不同任務，並把自己局限在一些暴露狂的表現：向歐洲人指出有一個非洲文化的存在，對立於愛炫耀和自戀的歐洲人，這也是協會成員一慣的態度。我們已指出這種態度是正常的，並從西方文化人所宣傳的謊言中得到正當性。但是，這個協會的目標將日益墮落，隨著黑人性概念的發展。非洲文化協會如今變成黑人世界的文化協會，並被引向包括散居在異國的黑人，即包括散居在美洲的一千多萬黑人。

在美國、中美洲或拉丁美洲的黑人，的確需要和一個文化的母體結合。對他們而言，美洲白人的行徑跟那些統治非洲的白人沒有兩樣。白人不分好壞把所有黑人混爲一談。一九五六年，在巴黎召開的第一屆非洲文化大會上，美國黑人本能想到他們跟非洲黑人遭遇同樣的問題。非洲文化人談到非洲文明時，給予從前的奴隸一個合理的地位。漸漸的，美國黑人意識到他們所提起存在的問題，並不和非洲黑人所面對的問題吻合。芝加哥的黑人只有在與白人相比時，才和奈及利亞黑人及坦桑尼亞黑人在這確切的範圍內相似：他們都是黑人。但在初步比對後，當主觀性平靜下來，美國黑人就察覺到客觀的問題根本不一樣。自由巴士，美國黑人和白人試圖使種族歧視削弱的運動，他們的原則和目的，跟安哥拉人反對萬惡的葡萄牙殖民主義的英勇鬥爭幾乎毫無關係可言。因此，在第二屆非洲文化協會代表大會召開期間，美國黑人就決定另創一個美國黑人文化協會了。

因此，黑人性在分析人的歷史性格現象中遇到第一個局限了。黑人文化、非洲文化被切割成一塊塊，因爲打算體現這個文化的人們意識到，所有文化首先是國族的，使理查·賴特（Richard Wright）或藍斯頓·休斯（Langston Hughes）保持警惕的問題，跟桑戈爾或肯亞塔可能面臨的問題，南轅北轍。同樣的，某些過去曾經受「阿拉伯復興」那首迷人歌曲震驚的阿拉伯國家，也該察覺到它們的地理位置，它們的區域經濟的互相依存性，比他們想要重活的過去更強。今天，我

們會發現，阿拉伯國家在組織運轉上，與地中海文化圈結合在一起。這就是說，這些國家屈從於現代的壓力和新的商業往來，而阿拉伯輝煌時代的商業網絡卻消失了。尤其一些阿拉伯國家的政治制度，對彼此來說，實屬於異質、陌生，以致這些國家彼此間甚至是文化上的交流，顯得毫無意義。

因此，文化問題有時會在殖民地國家裡提出來，有著引發嚴重曖昧不清的危險。殖民主義所宣稱的黑人是沒文化，阿拉伯人天生野蠻，必然合乎邏輯導向去讚揚那些不再是國族國家的，而是全非洲的文化，並且尤其是種族化的文化。在非洲，文化人的取徑是趨向非洲黑人的或阿拉伯伊斯蘭教的。它不是指向特定的國族文化。文化愈來愈脫離現實。它以激情沸騰的白熱化作庇護，在爲自己開闢一些具體道路上困難重重，可是唯有這些道路能使它獲得豐富、均質和稠密的特性。

被殖民知識份子的心理狀態

如果說被殖民知識份子所進行的活動，從歷史觀點來看有所局限，但他仍在大範圍內對於支持、正當化政治家的行動有所貢獻。而且，千真萬確的，被殖民知識份子的態度，有時具有崇拜或信仰的一面。但是，如果我們想要好好分析這種態度，就會發現，它表達了被殖民知識份子意識到，割斷最後幾根與人民繫綁在一起的纜繩所會有的危險。這種對文化存在的信仰告白，實際

上是熱烈的、絕望的向任何東西的停泊。爲了確保他的救贖和逃避白人的文化霸權，被殖民感受到必須縮回到不知道的根，不管怎樣，讓自己迷失在這個野蠻的人民之中。因爲他覺得自己被異化了，換句話說，陷入可能無法克服的矛盾困境中，所以他要從有可能陷入的泥沼中抽身，繼續身處其中的話，會讓他有著失去身體和靈魂的危險，於是他接受，他決定責無旁貸承受。被殖民者發現，自己有義務去回應一切，並以集體的方式去回應。他不僅變成捍衛者，還願意和其他人放在一起，並且從今以後勇於嘲笑自己過去的怯弱。

然而，這種充滿痛苦和艱辛的蛻變是必要的，不這樣做就會留下極度嚴重的心理、感情的創傷。沒岸可靠、沒有國界、沒有顏色的人們，無國籍者、沒有根者、天使們。同樣的，我們也不會驚訝於聽到有些被殖民宣稱「我以身爲塞內加爾人和法國人……身爲阿爾及利亞人和法國人……而說話」。阿拉伯法國的知識份子，奈及利亞英國的知識份子，當他在雙重國籍，兩種決定之必要性前絆倒時，假如他要誠實的話，他會選擇否定其中一個。然而，最常會有的情況是，知識份子由於不想或不能做選擇，他們就收羅所有影響過他們的歷史決定因素，並徹底站在一個「普遍的觀點」上。

因爲被殖民知識份子渴望投入西方文化。就像那些被收養的孩子，只有在精神上凝聚一個能

保證他們安全的最小核心時，才停止探究新家庭環境，被殖民的知識份子努力把歐洲文化變成自己的東西。他並不滿足於知道拉伯雷（Rabelais）和狄德羅（Diderot）、莎士比亞或愛倫坡（Edgar Allan Poe）就算了，他要全神貫注直到與這些人成爲最極致的同謀者爲止。

夫人並不孤單，

她有一個丈夫，

一個很體面的丈夫。

他知道引述拉辛（Racine）和高乃伊（Cornille），

伏爾泰（Voltaire）和盧梭（Rousseau），

老雨果（Hugo）和青年繆塞（Musset），

紀德（Gide）和瓦萊里（Valéry），

以及其他很多人。〔註2〕

但是在國族主義黨派以國族獨立的名義動員人民時，被殖民知識份子有時可能一腳踢開這些

〔註2〕德佩斯特（René Depestre），《面對黑暗》（Face à la nuit）。

令他突然感到異化的東西。然而，宣佈拋棄比真正拋棄更加容易。這些知識份子，透過文化這種傳達感情的東西作為中介，滲入在西洋文明當中，達到和西洋文明成爲一體，換句話說，用西方文明換了身體，當他因原創性的顧慮，想要去承擔起一個文化母體時，就會發現，這個母體幾乎無法提供他一些引頸的人物，足以跟占領者的文化那種衆多有魅力的傑出人物相匹配。當然，歷史，由西方人並且是爲西方人寫的，可能偶爾肯定一下非洲過去的某個時代。但是，知識份子站在當前國家的面前，清醒的、「客觀的」觀察那他想使其成爲自己的大陸的現實，卻被那空虛、粗野和野蠻給嚇壞了。然而，他覺得自己必須走出這個白人文化，必須到處去找尋，而由於找不到一個與統治者所展示的光輝前景相對稱的文化糧食，被殖民知識份子經常會退回到激情的立場，並發展出一個由異常感受性、異常的感覺和異常敏感所宰制的心理狀態。這種退縮，首先由他內部的機制和外貌中所產生的預期論點所引起，造成一種反應，一種肌肉收縮。

被殖民知識份子處於意識正在解放階段，他決定對此做出表達，這可以充分解釋他所使用的文體風格。那是一種生硬又充滿形象的文體，而形象是一座吊橋，能使無意識的能量分佈到周圍的草原去。那是一種神經質的文體，充滿著躍動的韻律，被連續噴發的生命所貫穿起來。這種風格更是多彩多姿的、黝黑的、充滿陽光和激烈的。這種風格在他那個時代使西方人大爲吃驚，並不像是像人們想談的，認爲這翻譯出種族特點，但肯定首先表達出的一種近身肉搏狀態，顯示出

這個人處在一種進行自我傷害、流倘真實鮮血、從他那已含有腐敗種子的存在中解放出來的必要性。一場痛苦、快速的鬥爭，在其中，不可避免的，肌肉必得取代概念。

如果說，就詩意的層次上來看，這一活動已達到一個不平常的高度，那麼，就存在的層面來看，知識份子經常走入死巷。當知識份子達到跟他的人民水乳交融的頂點時，他決定重新找到日常的道路，但只從冒險中帶回極度貧乏的公式。他高度肯定他的人民的習俗、傳統和外表，而他苦苦尋覓的不過是展現一種對異國情調的追求。這是一個知識份子歌頌所有相關土著全貌的決定性因素的時代，連最細節的部分也不放過。非洲阿拉伯人穿的長袍白衫被神聖化了，巴黎或義大利的皮鞋被阿拉伯人穿的拖鞋拋棄了。統治者的語言突然變得咬牙嚼舌了。重新發現他的人民，在這個時期，有時候意味著就是想成爲黑人，不是一個不像其他黑人那樣的一個獨特的黑人，而是一個真正的黑人，一條黑人的狗，一個白人想要的黑人。重新發現自己的人民就是變成骯髒的阿拉伯人，盡可能變成當地的土著，完全分不出來的土著，就是斬斷曾經任它長大的翅膀。

被殖民知識份子決定清點從殖民世界所汲取的壞習慣，並趕緊回憶起人民的善良風俗，這個被我們決定、認爲是持有所有真實的人民。這個取徑，在安頓在殖民地的殖民者間引發醜聞，這更加强了被殖民者的決心。被殖民者曾經在使人同化這點上品嚐過勝利的滋味，而當他們意識到這些被解救的人開始融入黑人羣中，整個體制開始動搖了。每個被征服的被殖民者，每個宣誓效

忠的土著，當他決心消失時，不僅對殖民化是個挫敗，而且還意味著已完成的事業無效和缺乏深度。每個越界的被殖民者，是對方法和體制的徹底判決有罪，被殖民知識份子在他們引起的醜聞中，找到了向殖民主辭職的理由和堅持下去的決心。

被殖民的藝術創作作品

如果我們想透過被殖民者作家的作品，來重新找到這一發展特點的不同階段，我們會看到眼前浮現三個時期的全貌。在第一階段，被殖民知識份子證明他被占領者的文化所同化。他的作品完全正確符合母國作家的作品。他的發想是歐洲式的，人們容易把他們的作品歸結為宗主國文學明確的一個流派。這是完全同化的時期：在這些被殖民者文學中，我們可以找到巴那斯派³、象徵主義者和超現實主義者。

在第二階段，被殖民者開始動搖，並決定回憶過去。在這個時期的創作，大致上符合了我們剛描述的重新投入。但是，由於被殖民者並未融合進人民之中，他與人民，維持在一種外部關係中，他只限於回憶。一些童年時代的舊插曲又從他的記憶深處勾起，一些古老傳說，參照著借來的美學和在外國星空下發現的世界觀，開始重新被詮釋。有時這種戰鬥前夜的文學，受到幽默和寓意所主宰。這是焦慮、不安的時期，充滿死亡和嘔心的體驗。人們把自己吐出來，但在私底下發笑。

到了第三階段，所謂的戰鬥時期，被殖民知識份子，在試圖消失在人民當中之後，反而將人民震醒。不以人民的麻木爲先，而是把自己轉變成人民的喚醒者。戰鬥文學、革命文學、國族文學。在這個階段，從前未曾想到寫作的大批男男女女，現在既然處於特殊的狀況下，在監獄裡，在游擊隊裡，或即將被處決前夕，他們痛感需要說說自己的國族，創造表現人民的文章，成爲一個新實際行動的代言人。

然而，被殖民的知識份子遲早會理解到，要去證明國族，不是從文化出發，而是在爲人民奮起反抗占領軍的鬥爭中證明。任何殖民體制的正當性，並不是提取自它統治的領土沒有文化這件事中。人們在殖民主義眼前展示一些鮮爲人知的文化瑰寶，永遠也不會使殖民主義感到慚愧。被殖民的知識份子憂心專注文化工作時，意識不到他正在借用占領者的技巧和語言。他滿足於把這些工具蓋上一個硬說自己是國族的印記，但卻奇怪的令人聯想到異國情調。經由文化作品回到人民身邊的被殖民知識份子，所作所爲實際上卻像個外國人。有時候他毫不猶豫的運用方言，以表達他盡可能接近人民的意願；而他的見解、他所關心的，卻和祖國的男女所認識的具體狀況不一致。知識份子感興趣的文化，常常不過是一個地方主義的庫存品。他希望符合人民，卻只抓到他們的外套。這件外套，不過是一個地下、稠密、持續在更新當中的生活之反映。這個近在眼前卻視而不見、似乎是人民的特點之客觀性，事實上只是了無生氣的結果，並且否定了一個更基礎實體，它那其實具有多重、卻具和諧一致的實體適應性，它其實是在不斷更新中。文化人不卻追求

這個實體，反而聽任自己被僵化的片段所迷惑；這些被穩定下來的片段，意味著否定、超越和虛構。文化絕不像習慣那樣的半透明，文化完全避開一切簡單化。它本質上是和習慣相反的，習慣始終是一種文化的退化。希望黏附於傳統，或恢復已被丟棄的傳統，這不僅是違反歷史，而且是違反人民。當人民支持反抗不共戴天的殖民主義的武裝鬥爭，甚至是政治鬥爭時，傳統的意義改變了。在這個時期，消極抵抗的技術可能受到徹底的批判。在一個處於鬥爭階段的落後國家裡，傳統基本上是不穩定和有著離心傾向留下的痕跡。所以這也是為何知識份子經常有著不合時宜的危險。進行鬥爭的人民，對蠱惑人心的煽動愈來愈具免疫力，因此愈想追隨民衆，他就愈顯得不過是個卑劣的投機主義者，甚至是個落伍者。

在造型藝術方面，舉例來說，拚命要搞國族作品的被殖民的藝術家，只不過一成不變的複製細部。這些藝術家曾經鑽研過現代的技法，並參與在繪畫或現代建築的主流當中，他們轉過身去否認外國文化，並開始追求國族的真實，重現他們認為是國族藝術的不變原理。然而，這些創作者忘記了思考的形式、精神糧食、資訊、語言、衣服等現代技術，已經辯證的在人民的頭腦中重新組合，忘記了那些在殖民時代猶如柵欄般的不變原理，已經徹底改變了。

這位決心描寫國族真實的創作者，一反常態的轉向過去和不現實的方向。在他深沉的意向性中所瞄準的，是思想的殘渣、外表、殘骸和明確被穩定的知識。然而，想要創作出真正作品

的被殖民知識份子，應該知道國族的真實首先就是國族的現實，他必須走到知識自身所預想的動盪之地去。

在獨立以前，被殖民的畫家對國族的全貌無動於衷，因此他們先搞抽象畫，或經常專攻靜物畫。獨立後，他汲汲於趕上人民，才開始真正埋頭描繪現實的點點滴滴，但那是一種沒有韻律、靜止的、不動的，不是生命而是喚起死亡的作品。有教養的人被這種逼真的真實所迷惑，但人們有權自問：這個表現出來的真實是不是現實，它是不是過時了、被否認了，是否該由人民通向歷史所鋪平的道路來重新檢討呢？

在詩歌方面，我們也可以作同樣的評價。在掌握押韻詩的階段後，就爆發出達姆達姆鼓聲的節奏。這是造反的詩歌，同時也是分析性、描述性的詩歌。然而，詩人必須懂得，沒有什麼可以取代人民武裝起來的那種理性地且不可逆轉的參與。讓我們再一次引述德佩斯特的詩：

夫人並不是孤身一人，

她有一個丈夫，

一個什麼都知道的丈夫，

但坦白說他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文化沒有讓步與共的話，是不行的，

讓卻血和肉，

將自己讓卻給他人，

這讓步的價值等同於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

和一切我們用來灌溉靈魂的東西。

被殖民詩人一心想寫國族作品，堅持描寫他的人民，卻未擊中目標。因為他在說話以前，不能做到像德佩斯特所談到的這種徹底的讓步。法國詩人夏何十分了解德佩斯特，他提醒說：「詩從主觀的強制和客觀的選擇中浮現。詩是那些具決定性的獨創價值之集合，這種集合一直是在運動中的，詩是與某人之當代關係之集合，這些都是詩出現的先決條件。」〔註3〕

對，被殖民詩人的首要義務，就是清楚確定以人民作為創作主題。我們無法堅定前進，除非先意識到自己的異化。我們從另一邊獲取了一切，然而，對方在給我們一切的時候，是不會不過迂迴曲折，使我們順從他的領導，不會不通過千方百計和花招百出，來吸引我們、引誘我們、毒害我們。在許多方面，也等同於被擄獲其中。因此，試圖以各種堆積的宣言和否認來擺脫是不夠的。在人們已不在的過去與人們碰頭是不夠的，因為他們已經前進了，不如投入他們剛剛開始的運動，從這個新運動出發，一切都重新思考。人民停留在一種神祕且失去平衡的場所，我們非

投入不可。因為不用懷疑，就在那裡，我們的靈魂凝聚，我們的感情和生命發出光芒。

幾內亞當前的內政部長凱塔·福德巴 (Keita Fodéba)，在擔任非洲芭蕾舞團團長時，並未用幾內亞人民提供他的現實耍花招。他以革命的觀點重新詮釋了他的國家所有的節奏形象。但是他做得更多。在他那不太為人所知的詩作中，我們發現，他不斷的明確指出鬥爭的歷史契機，界定行動展開的場所，凝聚人民意志的思想範圍。以下僅引述凱塔·福德巴那一首真正通向反省、覺悟、戰鬥的詩篇和讀者們分享。

非洲的黎明

(吉他樂聲)

黎明時刻。在達姆達姆鼓聲中跳了整夜的舞，小村莊漸漸甦醒了。衣衫襤褸的牧羊人們吹著笛子把羊領進山谷去。少女們頭上插著金絲雀羽毛，魚貫的向泉水彎彎的小路上走去。在清真寺的院子裡，一群孩子齊聲同唱古蘭經的詩句。

(吉他樂聲)

黎明時刻。日夜的戰鬥。但在夜裡筋疲力盡的戰鬥已經無能為力，並且慢慢的消

逝。預示白天勝利的幾縷吉兆的陽光，依舊姍姍來到害羞且蒼白的地平線上，最後的殘星悄悄地移到雲堆下，像盛開的金鳳花。

（吉他樂聲）

黎明時刻。在那裡，在那廣闊平原的深處，紫紅的邊緣處，一個彎著腰的男人的身影在開墾：那是耕種者納芒的影子。他每鋤一下，受驚的鳥兒飛起來，振翅飛到平靜的尼日大河流域。他的灰布褲被露水打溼，拍打著旁邊的草。他汗流浹背。不知疲倦，始終彎著腰，靈巧的操作他的農具，因為必須在下次下雨前把種子埋下。

（科拉樂聲）

〔評註4〕

黎明時刻。還是黎明時刻。麻雀在樹間飛舞，表示白天開始了。走在平原潮溼小道上的一个孩子，斜背著箭袋，氣喘吁吁朝納芒跑過去。他遠遠叫著：「納芒哥，村長找你，你去樹下談話。」

（科拉樂聲）

這麼早就接到通知被嚇一跳的農夫，放下手上的農具，走向沐浴在初升太陽微光中

的村子。老人們已經莊嚴的坐在樹下。他們身邊有一個身穿制服的人，一個行政管轄區的警備兵，面無表情，悠然地抽煙斗。

（科拉樂聲）

納芒坐在羊皮的座位上。身兼巫師、樂師和詩人的頭目站起來，向會議表達了長老們的意願：「白人派一個行政轄區的警備兵來，要求村子裡的一個男人到他們的國家打仗。大家經過討論後，決定指派我們族裡最有代表性的青年，使他在白人的戰役中證明一向就是我們曼丁哥人特點的那種勇敢。」

（吉他樂聲）

納芒被上級指定了。每晚姑娘們用和諧的歌聲讚美他威武的身材和發達的肌肉。他年輕的妻子，溫柔的卡迪亞聽到這消息驚慌失措，突然停止椿米，把白收在穀倉下，一句話也沒說，把自己關在小屋裡哭泣著自己的不幸。死神奪走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她無法想像白人從她身邊搶走納芒，因為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這個人的身上。

（吉他樂聲）

第二天，儘管納芒流淚並埋怨，莊重的達姆達姆戰鼓聲還是伴隨著他到村外的小碼頭，他上了一艘平底駁船，駛往管轄區的首府。夜晚，少女們不像平常那樣在廣場跳舞，而是到納芒的家前守夜，她們圍著火堆講話，一直到天亮。

（吉他樂聲）

幾個月過去了，一點也沒有納芒的消息傳回村裡。卡迪亞十分擔憂，去鄰村求助拜火教的祭司。長老們親自就這個問題召開了一次簡短的祕密會議，但什麼也沒透露。

（科拉樂聲）

終於有一天，納芒寫給卡迪亞的信寄回了村裡。卡迪亞擔心丈夫的遭遇，連夜走了幾個小時到管轄區的首府，那兒的一個通譯讀了來信。

納芒在北非，身體健康，他打聽收割、節慶、河水、跳舞、那棵討論場之樹、村子等等消息。

（巴拉豐琴聲）〔譯註5〕

當晚，村裡的老婦人們對卡迪亞開恩，讓她在年齡最高的長者的院子裡列席和閒話

家常。村長也因為有了消息而十分高興，邀請鄰近的乞丐大吃一頓。

（巴拉豐琴聲）

又過了好幾個月，大家又變得焦慮不安，因為納芒再次音信杳無。就在卡迪亞打算第二次詢問拜火教祭司時，她收到了第二封信。納芒去過科西嘉和義大利後，如今在德國，並慶幸自己獲得勳章。

（巴拉豐琴聲）

有一次，一張簡單的明信片，揭露說納芒被德國人俘虜，這個消息沉重的壓在村人的頭上。長老們開會，並決定從今以後准許納芒跳杜加舞（Douga）。任何人沒有光輝的貢獻不准跳這種神聖的禿鷹舞，這種馬凱林人皇帝的舞蹈，每一舞步都是馬利歷史的一個階段。卡迪亞看到她丈夫高升到國家英雄的崇高行列，深感欣慰。

（吉他樂聲）

時光流逝……兩年過去了……納芒始終在德國。他不再寫信了。

(吉他樂聲)

突然有一天，村長收到寄自達卡的信，通知納芒即將回家了。村裡立刻響起咚咚的達姆達姆戰鼓聲。大家唱歌跳舞到天亮。姑娘們做新曲準備歡迎他，因為獻給他的老歌曲沒有提到杜加，這曼丁哥人著名的舞蹈。

(達姆達姆鼓聲)

但是，一個月後，納芒的一個好友穆薩下士寄給卡迪亞悲情的信：「黎明時分，我們在佳羅伊海濱。在我們同達卡的白人長官大吵時，一顆子彈射中了納芒。他長眠於塞內加爾的土地下。」

(吉他樂聲)

的確，這是黎明時刻。清晨的陽光剛剛照射海面，把大海翻騰的細浪鑲成金黃色。在徐徐微風下，棕櫚樹彷彿也為這場晨戰而沮喪，樹幹略微傾向海岸。烏鴉成群呱呱叫，用叫聲向周圍宣告那血染佳羅伊海邊的黎明的悲劇……在血紅的天空中，正好在納芒的屍體上，一隻巨大的禿鷹笨重的翱翔。牠似乎對他說：「納芒！你並沒有跳這支以我的名字為稱的舞蹈，別的人將來跳它。」

(科拉樂聲)

我選用這首長詩，是因為它具有不容置疑的教育的價值。事情十分清楚，這是個明確、進步的敘述。理解詩並不只是個認知的步驟，而是個政治的步驟。理解這首詩就是理解人們所要扮演的角色，認識到自己的步伐，並擦亮武器。沒有一個被殖民者不被包含在這首詩的信息中。納芒是歐洲戰場的英雄，他不斷鞏固宗主國的強大和持久，在他重新接觸故鄉的土地時，卻被警察開槍打死了。這是一九四五年在塞提夫、法蘭西堡、西貢、達卡、拉哥斯所發生的。所有這些爲保衛法蘭西的自由或英國文明而戰的黑人和阿拉伯人，都在凱塔·福德巴的這首詩中重新出現。

但是，凱塔·福德巴看得更遠。在殖民地裡，殖民主義在戰場上利用當地人之後，再利用他們作爲退伍軍人來破壞獨立運動。在殖民地，退伍軍人協會成爲最反對國族主權的一個力量。詩人凱塔·福德巴促使幾內亞共和國的內政部長粉碎由法國殖民主義組織策動的陰謀。果然，在退伍軍人的幫助下，法國特務機關打算摧毀幾內亞剛剛獲得的獨立。

為國族解放而戰，文化才能存在

爲同胞而寫作的被殖民的作家，在利用過去往事時，應該是爲了開創未來，促使行動和樹立希望。但是爲了保證這個希望，使它有密度，就必須參加行動，全心全力投入國族鬥爭中。人們可以談論一切，但，一旦關乎談論一個人生命中獨一無二之事，就像是打開眼界、將光帶進來、

使自己和人民都站起來所代表的事情時，那就必須以肉身通力合作。

被殖民的文化人的責任，不止於對國族文化負責，更要對全體國族負責。總之，文化不過是國族的一部分。被殖民的文化人不應操心選擇哪一種戰鬥水平，和他決定投入哪方面的國族鬥爭。爲國族文化而戰鬥，首先是爲了國族解放而戰，這是個具體的母體，從它出發，文化才有可能存在。沒有一個文化鬥爭是在人民鬥爭的旁邊展開的。例如，這些阿爾及利亞赤手空拳同法國殖民主義抗戰的男男女女，並非與阿爾及利亞文化毫不相干。阿爾及利亞文化在這些戰鬥的過程中，在監獄裡、在斷頭台前、在被圍困和被摧毀的法軍崗哨裡形成和凝固了。

因此，我們不該爲了面對殖民主義的篡改、歪曲、貶抑的舉動，而滿足於專心關注人民的過去往事，只在往事中找尋一些要素。我們應該努力和民衆同樣的節奏去進行鬥爭，以便確立未來，耕耘已經萌芽的土壤。國族文化不是那抽象的民衆主義所認定的、以爲可以從中發現人民真實的那些民間傳說。它不是沉積下來的一堆沉澱物，即愈來愈遠離當前民衆現實的東西。國族文化是人民在思考層次上所作的整體努力，爲了描述、正當化和歌頌一場民衆於其中能完成自我構成與自我維持的行動。因此，在落後國家裡，國族文化應該是位於解放鬥爭的中心。那些還在以非洲黑人名義作戰，以這個文化名義反覆召開會議的非洲文化人，今天應該領悟到，他們的活動和作品，其實只是在核對一些文獻和比較一堆石棺罷了。

塞內加爾國族文化和幾內亞國族文化沒有一個命運共同體，而是同樣具有受到法國殖民統治的共同命運。如果我們要塞內加爾的國族文化與幾內亞的國族文化相像，光靠兩國領袖決定用相似的觀點提出一些問題是不夠的：解放的問題、工會問題、經濟問題。甚至不可能有絕對的一致可言，因為民衆的節奏和領袖的節奏是不一樣的。

不可能有兩種完全同一的文化存在著。想搞黑人文化的人卻奇妙的忘記了黑奴正在消失，那些製造黑奴的人正在目睹自己的經濟和文化霸權的崩潰〔註4〕。不會有什麼黑人文化，因為沒有任何一個政治家以創造黑人共和國為志。問題是，這些人打算保留給他們的人民什麼樣的位置，讓他們決定建立怎樣的社會關係，和對人類未來的構想為何，這才重要，其他的不過是不切實際的空話和欺騙。

一九五九年在羅馬聚會的非洲文化人，不斷高談統一。但是這種文化統一的最偉大旗手之一的雅各·哈布馬納賈哈（Jacques Rabemananjara），如今是馬達加斯加政府的部長，並以這個身份和他的政府一起在聯合國大會上，採取反對阿爾及利亞人民的立場。如果他忠於自己，就該向他

〔註4〕在達卡最近的一次頒獎會上，塞內加爾總統桑戈爾決定將對黑人自豪感概念的研究登錄在議程中。如果說塞內加爾總統所關心的，是屬於歷史層次，那我們也同意，但是，如果所牽涉到的，是要去打造黑人的自覺，那就是無視於歷史上已上演了大部分的黑奴消失此一劇碼。

的政府辭職，並譴責那些聲稱體現馬達加斯加人民意願的人。九萬名死去的馬達加斯加人，並沒有給予哈布馬納賈哈在聯合國大會上反對阿爾及利亞人民的任務。

非洲黑人文化，它之所以能增加密度，是圍繞著民衆的鬥爭，而不是圍繞著頌歌、詩句或民間傳說的。桑戈爾先生也是非洲文化協會的成員，並和我們一起圍繞這個非洲文化問題而工作，他從無懼於下令代表團去支持法國關於阿爾及利亞的主張。要加入非洲黑人文化和非洲文化統一的首要條件，就是無條件支持民族的解放鬥爭。如果不具體協助這個非洲文化的必要條件，即非洲大陸的解放，那就不可能享有什麼燦爛的非洲文化了。

我再說一遍，任何演說、任何關於文化的宣言，也不會使我們放棄基本的任務，即祖國的解放、對新殖民主義型態的不斷鬥爭，並堅決拒絕我們之間相互極端的互相吹捧。

國族文化和解放鬥爭互為基礎

——第二屆黑人作家暨藝術家國際研討會上的演講

羅馬，一九五九年

殖民統治因為太過於全面化和簡單化，所以很快以驚人的方式把被征服者的文化生命摧毀。否定國族現實，全面植入占領國的新法律關係，把土著和他們的風俗習慣排斥在殖民社會的周圍，強占土地，有系統的奴役男男女女，這一切都導致文化可能被毀滅。

三年前，我在第一屆會議上指出，很快的，在殖民地的狀況下，態度的固化會取代積極動性。於是文化領域被一些柵欄、路標所限制。這些都是最基礎的防禦措施。在許多方面和普通的生存本能相似。這個時期的關注點在於，壓迫者竟然不再滿足於認為被壓迫的國族和文化在客觀上是不存在的。他們使盡一切氣力，使被殖民者承認，他那已變成本能舉動的文化的劣等性，承認他的國族的非現實性，甚至承認他自己的生物學結構的無組織能力和不完美的性格。

被殖民者面對這種狀況的反應不一。在民衆將那最異質於殖民情境的傳統保持得完整無缺時，手工業則是愈團結在一成不變的形式主義中，知識份子狂熱的吸收占領者的文化，同時刻意

貶低國族文化的特點，或滿足於詳盡、有系統的、充滿激情但又很快枯燥無味的列舉這個文化。

這兩種企圖的共同特徵，都是陷入難以容忍的矛盾。被殖民者不論是叛徒或實體論者，其努力都是無效的，因為確切來說，都未對殖民狀況作嚴密的分析。殖民地的處境幾乎全面中斷了國族文化。在殖民統治範圍內，不可能存在國族文化、國族的文化生命、國族的文化創意或文化的轉變。有時，到處會冒出一些大膽的企圖：重新發動文化活力、重新定位主題、形式和色調。然而，這種發作的行爲，企圖獲得直接且具體的成效，證明是白費力氣的。但是藉由追隨其後果到極限，我們發現，國族意識的去晦暗化、壓迫的重新被問題化、解放鬥爭的揭幕，這些正處於準備狀態中。

在殖民統治下，國族文化是被否認的文化，而且繼續受到有系統的破壞。這是個在壓制下迅速轉入地下的文化。這個地下活動的概念，馬上在占領者的反應中被察覺到，占領者把對傳統的偏愛，詮釋爲忠於國族精神和拒絕順服。這種堅持殖民社會所禁止的文化形式，已經顯示出一種國族意志了。但是，這種展示卻指向一種慣性律則，沒有進攻，沒有重新確立關係。只剩下對一個愈來愈狹隘、愈來愈無生趣、愈來愈空洞的核心起痙攣。

在一個或兩個世紀的剝削後，造成國族文化全貌的極度憔悴。國族文化變成一種運動機能習慣、衣著的傳統、被割裂的制度的庫存。從中很少發現動力，毫無真正的創造性，沒有激情。人民的悲慘、國族的壓抑和文化的禁止是唯一共同的事情。在一個世紀的殖民統治後，人們發現一

個極度僵化、被沉澱、被礦物化了的的文化。國族現實的衰敗和國族文化極度苦悶，形成互相依賴的關係。所以，在解放鬥爭時注意這種關係的發展，就變得至關重要了。否定文化、蔑視運動或蔑視情緒性的國族表達，把一切特殊組織非法化，這些都有助於在被殖民者身上產生出攻擊性的行爲。但這是屬於直接反射、未加分化、無政府狀態的、無效的行爲。殖民剝削、貧窮、地方性的飢餓，愈來愈把被殖民者逼上公開和有組織的鬥爭絕路。他們漸漸、不知不覺感受到，決定性的對抗是有必要的。以前不存在的緊張增加了。各種國際事件、殖民帝國到處土崩瓦解、殖民體制固有的矛盾，都將導致並加強戰鬥性、提高國族意識並賦予它力量。

這些存在於殖民現實所有階段中的新緊張，在文化層面上引起迴響。例如文學相對的生產過剩。雖然當地人的作品只是統治者的次級複製品，但它卻指向有所區別和特殊化。在壓迫時代，主要是消費者的知識階級，如今變成生產者。這種文學首先往往局限在詩和悲劇類，之後涉及了長篇小說、中篇小說和雜文。似乎存在著一種內部組織，一種表現規則，它使得富有詩意的表現，隨著解放鬥爭的目標和方法明確化後，會變得罕見。主題徹底改變了。人們發現，愈來愈少充滿苦澀和極端絕望的抗議，愈來愈少綻放開來、充滿聲效的暴力，這些反倒使占領者安心。殖民主義者以往鼓勵這些表現，使其容易存在。的確，占領者把尖銳的譴責、暴露出來的貧困、和表現出來的激情，等同於一種淨化作用。他們助長這種作用，在某種意義上，是爲了避免悲劇

化，也爲了緩和氣氛。

但是，這種局面只是過渡。的確，民衆的國族意識的發展，修正並確立了被殖民的知識份子的文學活動。人民的繼續團結，對知識份子而言，構成了一種邀請，要求他們要超越尖叫。從訴狀到起訴，到上訴。下一個時期，命令出現了。凝聚起來的國族意識，將撼動文學體裁和主題，同時又創造一個全新的讀者群。起初，被殖民的知識份子寫作所針對的，單單只是壓迫者，爲了迷惑他，或是爲了透過種族的或主觀主義的範疇來譴責他，漸漸，他開始採用向人們說的習慣。

只有從這一刻起，才能談國族文學。在文學創作的層面上，重拾和澄清一些典型的國族主義主題。這就是嚴格意義下的戰鬥文學，在這個意義下，文學號召全體國族爲國族生存而鬥爭。戰鬥的文學，因爲它賦予國族意識一個形式，給出形式和輪廓，並且爲它開闢了新生的和無限的前景。因爲它擔負責任，凝聚等待時機的意志，所以是戰鬥文學。

從另一方面來看，一向被編成目錄和凍結起來的口傳文學、故事、敘述詩、民謠也開始起了變化。那些傳述一些了無生氣篇章的說故事人，開始將之生動化起來，並加進一些愈來愈根本的修正。企圖使衝突現實化，使提及的鬥爭形式、英雄的名字和武器的形式具有現代風格。諷喻的方法愈加被使用。人們用更曖昧的字眼來替代「從前從前」這個用語，例如，「要說的事情，曾經在某個地方發生，但很可能今天或明天就會在這裡發生。」就這一點，阿爾及利亞的例子很能

說明問題。從一九五二至五三年起，那些一成不變和聽來令人疲憊的講故事的人，完全攪亂了講述的方法和故事的內容。從前聽眾稀稀疏疏，如今人山人海。史詩，隨著類別的典型化，又重新出現了。這才是個真正重新提升文化價值的景象。殖民主義者對此並非誤解，從一九五五年起，開始有系統逮捕那些說故事的人。

文化表現中的運動

人民與新的行動之接觸，引起新的呼吸和節奏，忘卻肌肉的緊張，並發展想像力。每當講故事的人對他的聽眾講一段插曲，大家就參加了一次真正對靈感的祈求。他們向聽眾啓迪了一種新型的人的存在。當前事物不再是自閉的，而是向四面八方放射出去的。講故事的人又重新使自己的想像自由奔放、革新、創造發明，甚至這種變化中，有時會發生一些安排不當的形象被重拾或修正的例子，像是攔路搶劫的強盜或多少是反社會的浪人。在殖民地國家中，必須要一步步追隨湧現的想像力和歌曲、民間史詩之創造力。講故事的人以連續不斷的故事來符合民衆的期待，表面上他是孤軍奮戰，但實際上卻受到民衆的支持而走上追求新典型、國族典型的道路。喜劇和鬧劇消失了，或者失去魅力。至於戲劇化，也不再處於知識份子的意識危機狀態中此等層次上。它喪失了失望和反抗的性格，變成人民共同的命運，變成正在醞釀或已在進行的活動的一部分。

在手工藝方面，一向沉積的形態，受到敲擊，如今也漸漸緊張起來。例如木雕，從前複製的某些面部表情或姿勢也開始不一樣了。缺乏表情或難以忍受的面具開始生動起來，手臂更傾向脫離身體，描繪出行動的輪廓。兩個、三個或五個人物的組成構圖出現了。傳統派備感業餘愛好者或反對派湧現的壓力，開始創新。文化生活領域上的這種創新活動，經常不被人察覺。然而，它對國族鬥爭的貢獻是重要的。藝術家通過賦予臉部和肢體的生動，通過把觀眾席上的一群觀眾當作主題，鼓勵有組織的運動。

如果我們研究在陶器或瓷器製作的領域上，國族意識覺醒的迴響，也可以指出同樣的事實。創作拋開了形式主義。罐子、雙耳壇、盤子起先是極細微修改，後來大刀闊斧的變形了。著色法在從前遵循很少顏色和調和的規則，現在則是色彩繽紛並受到革命衝動的衝擊。過去在某些文化圈內被禁用的土黃色、藍色，如今肆無忌憚的為大家所接受。同樣的，根據社會學家的見解，作為某區域特徵之人類面部無形象表現，如今突然變成完全是相對的了。宗主國的專家、國族學者很快察覺到這種變化。整體說來，這些變化被以一種經符碼化過後的藝術形式、在殖民情境內部發展出來的文化生活為名，遭受譴責。殖民專家們不承認這種新的形式，並趕去援助土著社會的傳統。殖民主義者反而成了當地傳統的保護者。大家的記憶猶新，這個例子有著一定的重要性，在二次大戰後爵士咆勃（be-bop）這種爵士新風格的穩定成形，它不牽涉到殖民地現實，無關爵士樂中那些白人專家的反應。爵士樂不應該只是一個黑人老頭在五杯威士忌下肚之後，對支離破

碎和絕望的懷舊、對自己厄運的詛咒和對白人種族主義的仇恨。打從他理解自己和以不同的眼光理解世界，使得希望誕生，並強迫種族歧視的世界向後退後，很明顯的，此時，他的喇叭響亮，嗓音清澈。關於爵士樂的新風格之誕生，不僅僅是出於經濟競爭。從中不容置疑的看到美國南北戰爭後南方失敗的後果。這個後果儘管來得遲緩，卻是不可避免的。這一點也不烏托邦：假設在五十年後，這種由一個可憐該死黑鬼哽咽的叫喊爵士範疇，可能只有白人才會捍衛，因為他們忠於一個關係類型，擁有對黑人性的停滯印象。

我們也可以從舞蹈、富有旋律的歌唱、宗教祭典、傳統儀式各方面，尋找和發現同樣的推進力，察覺出同樣的變化和同樣的焦急。早在國族鬥爭的政治或武力鬥爭階段之前，讀者若留心的話，可以感受到和看到一種新活力、戰鬥逼近的展現。不尋常的表達形式，從未聽過或見過的主題，其負有一種力量，能以「目的」召集和凝聚人民。這一切都幫助喚起被殖民者的敏感，促使觀望的態度變得不切實際、難以接受或遭受失敗。因為被殖民者更新了手工藝、舞蹈和音樂、文學的口頭史詩裡頭的目的和動力，被殖民者重新架構了認知。世界失去了被咒詛的特徵。各種條件匯聚起來，為了一場不可避免的衝突。

我們見證了在文化表現中出現的運動。我們看到，這個運動，這些新形式，是和國族意識成

熟的過程結合在一起的。而這個運動愈來愈趨向客觀化、制度化。從運動中可看出，無論如何，國族存在有其必要性。其中一種錯誤——而且是錯得離譜的——就是試圖在殖民宰制的架構中，發揮文化的創新，恢復當地文化的價值。所以，這也是為何，我們得到一個看似弔詭的命題：在一個被殖民國家裡，最初步的、最粗暴的、最未區分的國族主義，是防衛國族文化最有效、最熱情、最熱烈的形式。文化首先是一個國族的表達，它的喜好、禁忌或典型。其他禁忌、別的價值、別的典型，則是在全社會的各個階段中形成。國族文化就是這些評價的總合，是全體社會和這個社會的各個不同階層的內外緊張的各種因素湊合的結果。在殖民情境下，文化被剝奪了國族和國家的雙重支持，日趨衰竭和苟延殘喘。因此，文化存在的條件是靠國族解放和國家的復興。

國族不僅僅是文化的條件，不僅是文化興揚、不斷更新、深化的條件而已，它也是一種迫切要求。首先，是要求為國族生存而戰鬥，打開文化的封鎖，給文化打開創造的大門。之後，則是國族保證給文化提供條件和表現的範圍。國族為文化聚集各種不可或缺的元素，而且只有這些要素能賦予文化可靠性、有效性、活力和創造性。同時，也是文化的國族特性，使文化對其他的文化能具有可滲透性，並使它能影響和滲透到其他文化去。不存在的東西不大能對現實起作用，甚至不能影響這個現實。必須首先有國族的復興，才能將生命賦予國族文化，這裡談的生命就是其最具生物學的意義而言。

因此，我們追隨著古老文化沉澱層中，那愈來愈根本的爆裂聲，在為國族解放而決戰的前夕，更新表現法，解開想像力的束縛。

這裡還必須提出一個重要的根本問題。鬥爭、衝突（不論是政治衝突或武裝鬥爭）和文化之間存在著什麼關係？在衝突時，文化會不會中斷？國族鬥爭是不是一種文化的表現？最後，是否應該說解放戰鬥儘管後來豐富了文化，它本身是否否定文化的嗎？解放鬥爭是一種文化現象嗎？

我們認為，被殖民民衆為了恢復國族主權而有組織的、自覺的鬥爭，是最充分的文化表現。不僅僅是鬥爭成功後文化被賦予有效性和力量，在戰鬥中，也沒有讓文化冬眠。鬥爭本身在進展中，在其內部過程中，發展文化的多樣性，並勾勒出文化的一些新方向。解放鬥爭並不是要恢復過去的價值和舊輪廓。鬥爭本身目的是指向徹底重新分配人際關係，它不可能讓這個國族的文化形式和內部原封不動。鬥爭後，不只是殖民主義消失了，連被殖民者也被消滅了。

這個新人類對自己和對他人，不得不確立一個新的人文主義。在鬥爭的目的和方法中預示這個新人文主義。一個動員全民的戰鬥、一個表達人民的意志和焦慮，並且不怕幾乎只靠這個人民的鬥爭，必勝無疑。這種類型的鬥爭的價值在於，是它實現了最大幅的發展和創造文化的條件。

從這些條件中獲得國族解放後，也就不會發生令人痛苦的文化不定的情形，這倒是常見於某些新獨立國家中。因為，國族是在它來到世界的形式中，在它的存在模式中，根本的影響文化。一個從人民討論活動中誕生的國族，一個體現人民真正的意願，改正國家的國族，只會以異常豐富的文化形式存在。

關心祖國的文化並想開啓它普世面向的被殖民者，不應該只相信那不可避免的獨立原則，而忘記將之銘刻在人民的意識中。以國族解放為目標是一回事，鬥爭的方法和民衆的內容又是另一回事。我們常常覺得似乎文化的未來、國族文化的豐富性，也同樣和解放鬥爭中經常體現的那些價值有關。

現在是揭露假仁假義的時候了。有人到處說國族復權的要求，是人類一個過時的階段，現在是大聯合的時代，那些落伍的國族主義者應該糾正自己的錯誤。相反的，我們認為，這是錯誤的且具有嚴重的後果，它錯在想跳過國族的階段。如果文化是國族意識的表現，在這樣的狀況下，我會毫不猶豫的說，國族意識就是文化最洗鍊的形式。

自我意識並非對溝通關上門。相反的，哲學的思考教導我們，它才是溝通的保證。國族意識並非國族主義，唯有國族意識能給予我們國際面向。這個國族意識、國族文化的問題，在非洲有

其獨特面向。在非洲，國族意識的誕生和非洲意識保持最緊密的時代關係。非洲人對自己的國族文化的責任，同時也就是對黑人非洲文化的責任。這兩個交會一致的責任，並不是一個形而上原理下的事實，而只是一條陳腐律則下的意識：它想要在今天殖民主義還想死抓著不放的非洲，讓所有獨立的國家，當一個被包圍的、虛弱的且處於危險的國家。

如果說，人的作爲，讓人之所以爲人，那麼我們可以說，非洲知識份子當務之急，就是建設國族。如果這種建設是真實的，即，如果這種建設表達了人民明確的意志，如果它在急切中彰顯出非洲人民，那麼，這個創建必定伴隨著普遍價值的發現和促進。因此，國族解放不是遠離其他國族，而是使國族躍上歷史的舞台。國際意識只有在國族意識的深處，才高揚起來，並且充滿活力。總之，這雙重性的湧現才是所有文化的泉源。

〔譯註1〕卡蒂爾主義 (Cartier)，法國編輯，一向主張不必援助落後國家。

〔譯註2〕桑海文明 (Songhaïs)，屬於馬里 (Mali) 和尼日 (Niger) 的少數族裔，居住於尼日河的谷地，主要從事農業和工藝。在十五世紀期間，桑海帝國的領土擴充至尼日爾、馬里和今日的幾內亞 (Guinée)、塞內加爾 (Sénégal) 的部分國土，但在十五世紀末沒落。

〔譯註3〕巴那斯派 (Leptanasse)，十九世紀下半葉法國文學中的一個流派。強調嚴謹性、客觀性、技巧上的完美和描寫準確，反對浪漫派詩人多愁善感和言過其實的表現手法。

〔譯註4〕科拉 (Cora)，一種非洲的樂器。

〔譯註5〕巴拉豐 (Balafon)，一種西非及中非的木琴。



殖民戰爭和心理失調

但是戰爭仍舊繼續下去。我們還要再繼續包紮那因為殖民主義翻騰而在人民身上造成的各種傷口，有時候這些傷口是無法抹去的。

今天，帝國主義爲反對人的真正解放而戰，到處拋下那會萌生腐敗的芽，以致於我們應該毫不留情從我們的土地和腦海裡，將之連根拔除。

我們在這裡討論，產生自阿爾及利亞人民進行的國族解放戰爭的心理失調的問題。

人們可能會覺得，把這些精神科的病例筆記搬到這本書中不甚恰當。我們不得不這樣做。

在這場戰爭中，由不得我們的是，精神醫學的現象、行爲和思考上的失調，對那些執行綏靖者，或「被安撫」的居民身上產生重大影響。事情的真相是：殖民化在本質上所展現的，就已經是精神病院的一大供應商了。一九五四年以來，在種種學術的論文中，我們要法國和全世界的精神科醫生注意到，當他們要去正確「治療」一個被殖民者——就是使他徹底同化到殖民地類型的社會中——所會遭遇到的困難。

因爲殖民主義是一個對他人的系統性否定，一個瘋狂的決定，拒絕給他人的所有屬性，它逼得被宰制人民得不斷問自己說：「我到底是誰？」

從被殖民者和殖民體制暴力對決中產生出的防禦態度，形成一個結構，顯示出被殖民化的人格。要理解這種「敏感體質」(sensitivité)，只要研究和衡量一下，在殖民體制內生活一天中，被殖民者所遭受殘害之深度和數量就夠了。無論如何必須牢記，被殖民的民衆，不單單是被統治的國族。在德國占領下，法國人還是人；在法國占領下，德國人也還是人。在阿爾及利亞，不僅有統治，還有那嚴格意義下，一種就是只占領土地的決心。阿爾及利亞人、包裹著毯布的婦女、棕櫚樹林和駱駝，構成了畫景，法國人存在的自然背景。

惡劣、倔強、非常難應付的自然，在殖民地實際上被再現為偏僻荒漠、蚊子、土著和熱病。當整個不馴服的自然本性終於被制伏時，殖民化就大功告成了。貫穿荒漠的鐵路、沼澤地的乾涸、土著在政治上經濟上的不存在，這些實際上是同一碼子事。

在殖民未受到武裝抗爭的那個時代，當有害的、刺激的總量超過一定的界限，被殖民者的防禦陣地垮了，後者於是大量出現在精神病院。因此，在這殖民化成功的平穩時期，有著一個重大、規律性的精神病理，因壓迫而直接被產生出來。

今天，由阿爾及利亞人民領導的歷經七年的國族解放戰爭，由於它對人民而言是屬於整體性的戰爭，於是成了一塊利於心理疾患破殼而出的土壤(註1)。以下我們提供幾個阿爾及利亞人和法國人的病例，他們都經過我們的診療，對我們而言，這些病例似乎特別具說明性質。用不著多說，但是，我們提交的並不是一份學術科學工作。我們避免一切關於徵候學、疾病分類學或治療

的種種討論。在這裡使用的幾個專門術語僅僅充當參考。但是，我們必須強調兩點。

按一般規則，臨床精神醫學把我們病人所表現的種種不同失調，歸結在「反應性精神病」(psychoses réactionnelles) 這個範疇內。在這麼做的同時，被優先重視的是引發疾病的事件，儘管多少會提及本身場域（主體心理、感情和生物學的歷史）、或環境所扮演的角色。對我們而言，在這些病例中的肇發事件，似乎主要是冷酷無情、血腥的氣氛、普遍化的不人道行為、人們目睹了可怕末日般的事情後留下的揮之不去的印象。

系列A中，第二號的病例是典型的反應性精神病病例，但是，系列B中的第一、第二、第四及第五號病例，由於在因果關係上呈現較鬆散的狀態，我們無法真正去談一個特定具引發性的事件。這裡所謂的具引發性的事件，指的就是戰爭，這場經常帶有真正種族滅絕樣貌的殖民戰爭，這場終究撼動也粉碎世界的戰爭。我們使用反應性精神病這個既成的標籤，同時是要特別賦予這場具全面性與特殊性的殖民戰爭一個優先地位。兩次世界大戰後，不少刊物探討在被徵召作戰的

〔註一〕從一段末在《阿爾及利亞革命第五年》(L'an V de la révolution algérienne) 最初兩版中發表的引言中，我已指出，一整個世代的阿爾及利亞人，因沉浸在肆無忌憚的集體被屠殺中，而引起的心理、感情的後果，將是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留下的人間遺產。那些譴責在阿爾及利亞進行酷刑的法國人，嚴格說來，用的是屬於法國的觀點。我不是責備，而是對事實做一種見證：他們想保護當前、握有權力的拷問者的意識，並試圖避免使法國青年的精神受到污染。我們只能同意這種態度。在這裡集中的一些病例，主要是A系列的第四號及第五號的病例，可悲的展示也證明了法國民主主義者被灌輸的強迫觀念。不管怎麼說，我們的意圖是要指出，可以預料的是，被折磨者的人格，因遭受的酷刑而完全被解體。

軍人、遭遇集體逃難或轟炸的老百姓身上產生的精神病理症狀。但是，這裡提到的一些前所未見的精神疾病類型，證實了——如果還需要證實的話——這場殖民地戰爭，甚至它所分泌出來的病理學，絕對是獨特的。

另一個牢固的既成概念，認為這些反應性失調症，相對來說算是輕微，這個觀念在我們看來，值得讓它稍微靈活些。當然，我們可以描述一些屬於次級精神病（psychosés secondaires）的狀態，但總之是在很例外的情形下，也就是在一些整體人格徹底崩潰的病例。相反的，對我們而言，在此似乎有一個通則，即病理過程經常往惡性發展。這都是持續數月之久的失調，在自我遭受嚴重擊襲的情形下，幾乎總是留下虛弱這個後遺症，一般肉眼即可辨識。很顯然，這些病人的未來極困難。一個例子將說明我們的觀點。

在一個已經獨立好幾年的非洲國家裡，我們有機會對一位愛國者——前反抗份子進行治療。這位三十多歲的男性向我們諮詢，要求紓解病痛，因為每年的某段日子將近，他就會陷入失眠，伴隨著焦慮不安的狀態，並固定出現自我毀滅的念頭。關鍵日期那天，他在地下組織的命令下，在某個地方放置了一枚炸彈，炸死了十個人（註2）。

這位戰士在任何時刻都不打算否認自己過去的行爲，他十分清楚知道他爲國族獨立所付出的代價。這些臨界的病例，提問了革命的架構中的責任問題。

我們在這裡所列舉的觀察，涵蓋的時期從一九五四至五九年。某些病人是在阿爾及利亞接受

診療，不是在當地的醫療中心，就是在我的私人門診。其餘的則是在國族解放軍的衛生隊裡被治療的。

系列 A

這裡收集了五個病例。有阿爾及利亞人或歐洲人，由明顯的事實可見，他們都表現出反應性的心理失調。

一號病例：一個因為妻子被強姦而患陽萎的阿爾及利亞人

B 先生是位二十六歲男性。他因頑強的偏頭痛和失眠症，經國族解放陣線的衛生部轉介過來。他過去是計程車司機，十八歲起積極參加國族主義政黨的活動。一九五五年以後加入阿爾及利亞國族解放陣線支部，好幾次，他利用自己的計程車運送傳單，也載過一些政治委員。面對鎮

〔註 2〕這些失調出現的時間，無論從哪個面向看來，都相當有趣。在他的國家宣佈獨立的幾個月後，他認識了一些過去占領國的僑民，覺得他們很友好。那些人對獨立致意，並毫無保留對愛國者在國族解放戰爭中的英勇行為表示敬意。於是這位戰士突然感到一陣暈眩，他焦慮自問，是否在那些被炸死的人當中，可能有類似跟他說話的那些人。當然，那家成爲攻擊目標的咖啡館，是公認的種族主義的巢窟，但從不禁止任何一個過客進去消費。從這個人第一次感到暈眩起，他嘗試避免去想過去的事。然而，出人意料之外的，就在那個關鍵日期的前幾天，最初的失調出現了，從此，這個失調就非常規律重複出現。

換句話說，我們所作所爲會永遠緊追在我們身後。這些作爲被安排的經過、發生的順序和行爲的動機，都可能事後被徹底改變。這並不是人類歷史及其衆多限定條件對我們設下微不足道的陷阱之一。但我們能逃過暈眩嗎？誰敢揚言，一生中沒有過暈眩的糾纏？

壓的加劇，阿爾及利亞國族解放陣線決定將戰爭帶到城市中心。於是，B奉命把突擊隊運送到攻擊地點附近，並經常就地等候他們。

然而有一天，一場於歐洲城市中心進行的比較重要的行動陷入嚴重的包圍，迫使他不得不拋棄自己的計程車，突擊隊隊員四散。B成功逃離敵人的陣仗，躲到一位朋友家避難。幾天後，他沒回家而奉命先到最近的游擊隊那裡。

他好幾個月沒有妻子和二十個月大女兒的消息，只知道警察在城裡找他好幾個星期。在游擊隊逗留兩年後，他才收到妻子的來信，要他忘了她。因為她已被污辱，不用再做一起生活的打算。十分不安的他請求上級，讓他祕密回家一趟，但被拒絕。然而，上級叫一個阿爾及利亞國族解放陣線的成員去找他的妻子和雙親。兩個星期後，一份詳細的報告送抵隊長那裡。

在發現他遺棄的車子後（他們在裡頭找到兩個衝鋒槍的彈夾），法國士兵由警察陪同，找到他家。他不在那，於是他們把他妻子帶走，留置一個多星期。

她受審訊，被追問丈夫交往的人，並且在兩天內受到粗暴的對待。第三天，一個法國軍人——她不能確定是不是軍官——叫其他人出去，把她給強暴了。過一陣子，第二個人當著其他人面前強姦了她，同時告訴她說：「如果有一天，妳見到妳那下流的丈夫，尤其別忘了告訴他我們對妳幹的好事！」她又待了一個星期，沒受到新的審訊。此後人們把她送回家。當她對母親訴說自己的經歷，母親勸她把一切都告訴他。因此，當她一聯絡上丈夫，就向他坦白自己的受辱。

第一次震撼過去後，由於經常參加行動，B復元了。幾個月裡，他聽到了阿爾及利亞婦女被強暴或受盡折磨的種種故事，也有機會遇到一些妻子遭污辱的丈夫，於是他本人的不幸，和那受到嘲弄的丈夫的尊嚴，被拋到次要地位。

一九五八年他奉命出國。當他再度歸隊後，一種異常的心神恍惚和失眠症使他的同志和上級十分不安。他的出發日期延後，上級決定叫他去見醫生。我們是在這時候見到了他。立即接觸情形良好。神情多變，可能甚至有些過度，微笑些微誇張，表面上露出愉快的樣子：「很好，很好，我覺得現在好多了。給我一些補藥、維他命，讓我自己慢慢恢復。」背地裡流露出一種深沉的不安，他隨即便住院了。

第二天起，樂觀屏障倒塌了。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意氣消沉、若有所思、食欲不振、臥床不起的病人。他逃避政治討論，並明顯表現出對所有國族鬥爭事情毫不關心的態度。他逃避聽到有關解放戰爭的消息。他非常吃力的談論他的困難，但幾天後我們就重新把他的經歷串連起來了。

他在外面的時候，嘗試過一次性行爲，卻失敗了。他以為是過度疲勞，在經過急行軍和營養不良時期後，這是非常正常的，於是兩個星期後，他又嘗試一次，又失敗。他和同志談起這件事，同志建議他吃維他命B₁₂。他吃了，又開始新的嘗試，又是新的失敗。此外，在行動前，他有著克制不住想撕掉小女兒相片的慾望。如此一個象徵性的結合，可以使人聯想到無意識亂倫衝動的存在。然而，好幾次談話和一個夢（病人夢見一隻小貓很快的腐爛，並且發出難聞的臭味），

把我們引到另一個方向。一天，他對我們說：「這個女孩（指他的女兒）身上有些東西在腐爛。」從這個時期起，失眠變得十分痛苦，儘管使用大量的鎮定劑，一種焦慮的興奮狀態仍持續發展，令我們衛生部相當不安。他第一次笑著對我們談到他的妻子：「她嚐過法國男人的味道。」從這時候起，我們才得以重新建構他的整個經歷。事情的來龍去脈攤開了。他告訴我們，他在每次嘗試性行為以前，總是想到妻子。對我們而言，他所提到的這些隱情，有著根本值得注意之處。

「我跟這個女孩結婚時，所愛的是我的表妹，但表妹的父母為她安排了另一門婚事。於是，我接受了我父母為我找的第一個妻子。她很溫柔體貼，但我不愛她。我總是對自己說：你還年輕，慢慢等，當你再找到一個好女人時，就離婚另組一個幸福的家庭。所以，我並不依戀我的妻子。隨著戰爭，我更加遠離她。最後，我回家後幾乎就是吃飯睡覺，都不跟她講話了。」

「在游擊隊裡，當我知道她被幾個法國人強姦後，我首先對這些惡棍十分憤怒。後來我說：『噢，事情並不嚴重，她沒被殺，可以重新過日子。』好幾個星期後，我才意識到她是『因為人家搜查我』才被強姦的。事實上，是爲了懲罰她不招供才把她強姦的。她本來可以完全或至少供出一個戰士的名字，從這個缺口他們可以找到、摧毀這個組織，甚至可能逮捕我。這就不是一個普通的強姦，像我在鄉下看到的，由於閒著無聊或虐待狂那樣，這是強姦一個固執的女人，她接受一切，卻不出賣自己的丈夫，而這個丈夫就是『我』。這個女人救了我的命，也保護了組織。她因爲我而受污辱。然而她卻不對我說：『這是爲了你而遭受的罪！』反而跟我說：『忘掉我，

重新過你的日子，我被玷污了。」

「從這個時候起，我決定戰後跟妻子破鏡重圓，因為我必須告訴你，我看到一些農民，替曾經當著他們的面被強姦的妻子擦眼淚。這令我震撼。而且我該向你坦承，起初我並不理解他們的態度。但我們愈來愈不得不介入這些故事，向老百姓解釋一切。我看到一些老百姓自願娶一個被法國軍人強姦過並且懷孕的女人。所有這一切引導我重新思考我妻子的問題。」

「我決定跟她和好，但我不知道再看到她時，我會作何反應。而且，經常，當我看女兒的相片時，我想她也受辱了。似乎妻子的一切都是腐爛的。要是他們拷打她，要是他們敲碎了她所有的牙齒，打斷了她的一條胳膊，這些對我不算什麼。但這件事能夠忘掉嗎？而且她是否一定要讓我知道這一切呢？」

於是，他問起我，據我看，他的「性無能」是不是由於他自己的煩惱所引起的。

我回答說：「這是不可能的。」

他坐在床上：「如果你碰到這種事會怎麼辦？」

「我不知道……」

「你會再想要你的妻子嗎？」

「我想會吧……」

「啊，瞧，你不完全有把握……」

他雙手捧著腦袋，不久離開病房。

從這天開始，他漸漸接受聽些政治討論，而偏頭痛和食欲不振也大為減退。兩個星期後，他在回部隊前對我說：「獨立時，我要去找我的妻子。如果行不通，我會再到阿爾及爾看你。」

二號病例：一次集體殲滅時倖免於難者所帶有的不加區分的殺人衝動

S，三十七歲，農民。他住在康士坦丁的一個村子裡。從不關心政治。開戰時，他住的地方，正好是阿爾及利亞軍和法國部隊激烈交戰的地方。就這樣，他看到了死人和傷兵，但繼續袖手旁觀。就像全體人民一樣，村裡不時有農民跑出來幫助路過的阿爾及利亞戰士。但是有一天，在一九五八年初，離他村子不遠處發生了一次致命的伏擊。敵軍策動一場軍事行動，包圍村子，而村裡卻沒一個士兵。所有村民被集中起來接受審問，沒人回答。幾個小時後，一個法國軍官乘直升機降臨，說：「這個村子太引人議論了，毀了它！」士兵們開始放火燒房子，同時用槍托毆打那些試圖撿幾件衣服或存糧的婦女們。某些農民趁亂逃走。軍官下令把留下來的男人們集中帶到一條河邊，開始大屠殺，二十七個男人被槍斃，他被兩顆子彈打傷，子彈分別射穿他的右大腿和左臂，左臂的傷造成他的肱骨碎裂。

他暈了過去，醒來時已在一隊阿爾及利亞國族解放軍戰士的隊伍裡。他接受衛生部的治療，並在能走動後被撤離。在路上，他的舉止愈來愈不正常，令護送隊不安。他要一支槍，但他是個

老百姓，又是殘廢，他拒絕走在任何人的前面。他不要任何人在他背後。一天夜裡，他突然奪取一名戰士的武器，笨拙的向睡著的士兵開槍。他被相當粗暴的制伏，雙手被捆，就這樣被送到中心來。

起先他對我們說他沒死，說他耍了其他人一招，漸漸的，我們重構了他僥倖未被殺死的故事。S並不焦慮，而是過份興奮，伴隨著激烈的暴躁不安，連吼帶叫的階段。他不大砸碎東西，但喋喋不休令人疲勞，衛生部經常處於戒備狀態，因為他老是在叫嚷著要「殺死大家」！在住院期間，他用身邊隨手拿到的東西當武器，連續攻擊八個人，連護士和醫生也不能倖免。我們甚至開始自問，這是不是經常處於亢奮狀態、帶有攻擊性的非典型性癲癇發作。

進行睡眠治療。從第三天起，每天的談話使我們更能了解病理過程的動力。智能失調漸漸變得那麼嚴重，以下是病人所講的一部分：

「神與我同在……但他不和那些死掉的人同在……我好狗運，……活著，要不被殺，就得殺人。……我以前竟然對他們的來歷一無所知……我們當中有一些法國人。他們裝扮成阿拉伯人。該把他們都殺光！給我一支衝鋒槍。所有這些所謂阿爾及利亞人就是法國人。……他們讓我不得安寧。我剛睡了，他們就走進我房間。但現在，我可以認出他們了。大家都想殺我。可是我會自衛。我要把他們全無例外的殺掉。我要把他們一批批的斷喉，你也一樣。你們想把我撿倒，但必須換另外的方式。幹掉你們，我不會有任何感覺，大人、小孩、女人、狗、鳥、驢子……大家都

會輪到……從此，我就可以安心睡覺了……」

所有這些話都是斷斷續續講的，態度始終是充滿敵意、傲慢、輕蔑的。

三個星期後，興奮消失了，沉默不語和某種孤獨的傾向使我們擔心病情惡化。然而，一個月後他要求出院，學習一種適合他的殘障狀況的職業。於是便把他交給阿爾及利亞國族解放陣線的社會服務部。六個月後複診，情況良好。

三號病例：在狂妄殺害一個女人後，產生去人格化的重度焦慮型精神病

D J 過去是大學生，十九歲加入阿爾及利亞國族解放軍。

他到中心時，已經病了幾個月之久了。他的表現很典型：極度抑鬱，十分虛弱，嘴唇乾燥，雙手經常流手汗。胸口隨著不斷嘆氣起伏。失眠現象頑強。從開始錯亂起，曾經兩度企圖自殺。談話時出現幻聽現象，有時目光盯住空間上的某一個點，停留一些時候，臉部表情生動，給觀察者在看戲的印象。思想含糊不清。出現一些精神醫學上叫作屏障（*barrage*）的現象：一個手勢或一句話毫無原因突然中斷。但有一個要素特別引起我們注意：病人談到他的血從動脈和心臟大量流出來，流到動脈都快空了，心臟也數度停止跳動。他要求我們爲他止血，不再讓人闖進醫院來「吸他的血」。有時，他說不出話來，要一支鉛筆寫道：「我沒聲音了，我整個生命要完了。」

他經歷去人格化（*depersonalisation*）的狀態，令我們覺得病情嚴重。

好幾次談話時，病人跟我們談到一個女人會在夜裡來迫害他。之前我就已經知道他母親去世了，他十分愛他的母親，什麼也不能安慰失母之苦（這時他的聲音大大降低，並且流出幾滴眼淚），我把焦點朝向母親的形象。我要他描述一下這個糾纏不休、甚至迫害他的女人，他宣稱那不是陌生人，他十分熟悉她，因為他殺了她。問題於是在於，我們是否面對一個母親去世後無意識的罪惡感情結，就像佛洛伊德在《哀悼與憂鬱》（*Deuil et Mélancolie*）裡所描述的那樣。我們要求病人，既然他十分熟悉這位女性，似乎認為親手殺了她，那麼請他跟我們慢慢道來。就這樣，我們重構了以下的故事：

「我從唸大學的城市上山打游擊，好幾個月後，得到家裡的消息。母親被一個法國士兵槍殺，兩個妹妹也被帶往軍營。直到現在，我不知道她們怎麼了。母親的去世使我十分震撼，我父親已去世了好幾年，我是家裡唯一的男人，而我唯一的志向，是有一天成就一些什麼，讓母親和兩個妹妹過好日子。有一天，我們到一個殖民者的農園，那兒的經理是個活躍的殖民主義者，殺害過兩個阿爾及利亞老百姓。我們摸黑到他家，可是他不在，家裡只有他的妻子。她看到我們時，哀求我們別殺她：『我知道你們是要來殺我丈夫的，但他不在家……我對他說過好幾次別參加政治。』我們決定等他丈夫。但我看著這個女人就想到我的母親。她坐在一張搖椅上，似乎心神渙散。我心想爲什麼我們不殺了她，就在這時，她發現我在看她，就撲向我高聲說：『我求你們……別殺我……我有孩子。』一會兒她死了，我用刀子殺死她。班長卸了我的武器，並下令出

發。幾天後我受到地區司令的審訊，我以為自己要被處決，但我才不在乎（註3）。接著我開始飯後嘔吐，睡不好。再後來，這個女人每晚向我討血債。那我母親的血債又該上哪兒去要呢？」

夜幕來臨時，病人一躺下，房間就「擠滿女人」，都是那個女人。這是同一個女人的各種再版，她們的肚子上都有一個開口的洞，她們失血、蒼白，消瘦得可怕。這些女人糾纏這個年輕病人，要他還給她們流出的血。這時，一陣流水聲充滿房間，愈來愈大聲，使人想起瀑布的轟轟聲，同時這個年輕病人看到地板上沾滿了血，是他的血，而那些女人變得愈來愈鮮紅，她們的傷口開始癒合了。病人渾身冒汗並且在極度焦慮中醒來，輾轉難眠到天亮。

幾個星期的治療後，他的夢般幻覺（惡夢）幾乎完全消失。然而，他的人格裡還有著一個很大的裂痕。他一想到母親，這個開了膛的女人便以令人驚愕的分身出現。儘管這似乎不太科學，我們還是認為只有時間才可能使這位青年的肢解人格（la personnalité disloquée）改善。

四號病例：一名抑鬱的歐洲警察守衛，在醫院碰到被他加害而陷入情感麻木的阿爾及利亞愛國者A，二十八歲，已婚，無子女。我們得知，他和妻子因想要孩子而看了幾年的病，很不幸無效。他經由上級指定，來找我們治療行為失調。

立即接觸的情況還不錯。病人主動對我們談他的困難：他和妻子及岳父母相處十分融洽，跟同事也是，上級對他很器重。使他煩惱的是，夜裡他會聽到一些叫聲，妨礙他安眠。事實上，他

告訴我們，幾個星期來，他在睡前就關上了百葉窗，堵塞窗戶的縫隙（現在正是夏天），他的妻子熱得透不過氣來，並對此十分懊惱。此外，他更用棉花塞住耳朵，來減輕激烈的叫聲。他甚至爲了聽不到這些噪音，有時候在深夜裡打開收音機，或放音樂。他對我們詳盡敘述了他的故事。

幾個月前他被編入一個反阿爾及利亞國族解放陣線的大隊，起先負責監視幾座大樓或咖啡館。然而，兩三個禮拜後，幾乎都在派出所值勤。於是他有機會進行審訊，這種工作進行起來絕不是沒有什麼「推擠拉扯」的，因爲「他們什麼也不肯承認」。

他解釋說：「有幾次，我真想對他們說，如果他們稍稍對我們有點同情心，就該開口，而不要迫使我們浪費幾個小時逐字從他們口中套取情報。可是你完全拿他們沒輒，他們對所有的問題千篇一律回答『不知道』，甚至連他們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問他們住在哪裡，他們也說『不知道』。於是當然……我們不得不下手。但他們大聲鬼叫。最初，這令我覺得好笑。但是後來，卻令我開始心神不安。今天，只要聽到叫喊聲，我就可以告訴他的狀況如何，審訊進行到什麼程度。挨了兩拳和耳朵後一記警棍的小伙子，會有某種說話、吼叫、聲稱他是無辜的方式。雙手吊了兩個小時後，會有另一種聲音。浴缸浸水後，又是另一種叫聲。諸如此般繼續。特別是在電刑後，變得令人無法忍受。我們會說，這傢伙好像隨時會死。當然，有些人是不吭聲的，是條好

〔註3〕經法醫鑑定證實了行爲的病理，阿爾及利亞國族解放陣線參謀部決定不起訴他。

漢。他們想像馬上會被殺，但對我們來說，我們對殺他們沒興趣。我們需要的是情報。爲了情報，我們首先設法讓他們鬼吼鬼叫，遲早他們會說的。這已經是一種勝利了。以後再繼續。請注意，我們希望避免這些。但他們不配合，不讓我們輕鬆完成任務。現在我竟然在家裡也聽到這些鬼叫聲了，尤其是幾個死在派出所裡的人的哀號。醫生，我對這個工作極度厭煩，如果你們把我治好了，我就要求調回法國去。要是他們拒絕，我就辭職不幹。」

面對這樣的病症，我開了一張請假單。由於病人拒絕住院，我私下替他做治療。有一天，在診療時間稍早之前，我被召去急診。我妻子要我等我回來，但他寧可到醫院轉一圈，跟我碰面。幾分鐘後，我在回家路上碰到他。他靠在一棵樹下，顯得精疲力竭，渾身發抖又冒汗，處於極度焦慮的狀態中。我讓他上車，把他載回家裡。他一坐在沙發上，就告訴我，他在醫院裡碰到我的一個病人。此人在警察局受過審訊（是個阿爾及利亞愛國者），他是爲了「木僵型震盪後失調症」（*troubles post-commoionnels de type stuporeux*）在醫院接受治療。於是我知道這名警察實際上參與了對這個病人的嚴刑逼供。我給他服幾片鎮定劑，緩和焦慮……他走後，我到那位愛國者的病房去。那裡的醫務人員什麼也沒察覺，而病人卻不見了。最後我們在廁所裡找到他，他在裡面企圖自殺（那個病人也認出那個警察，以爲警察是來把他重新帶回警察局的）。

後來，A來找了我幾次，而在情況明顯好轉後，以身體健康狀況不佳爲由調回本國。至於那位愛國者，醫務人員花好長時間一再說服他，這是一個幻覺，警察不能到醫院來抓人，他是累

了，他來醫院是爲了能被治療云云。

五號病例：一位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們施刑的歐洲刑警

R，三十歲，自動來找我們看病。他是個刑警，幾個禮拜以來確信「出了毛病」。已婚，有三個孩子，煙抽得很兇，每天五包。胃口不好並且經常作惡夢。這些惡夢沒有什麼特徵。讓他覺得頗受困擾的，是他稱之爲的「瘋狂發作」的狀態。首先，他不喜歡受到阻撓：「醫生，請解釋解釋。我遇到反對我的人，就很想揍他，甚至在工作之外，也想揍那個擋我路的傢伙。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喏，譬如我去報攤買報紙，人很多，不得不排隊，我伸手去拿我要的報紙（賣報紙的是我的哥兒們），排隊的人裡有個傢伙用稍帶挑釁的語氣說：『別插隊！』於是，我想揍他，我心中默唸：『小老頭，要是我給你幾個小時的教訓，看你還敢不敢搞怪。』」他不喜歡噪音。在家裡，他想揍所有的人，隨時想揍人。而實際上，他打自己的小孩，甚至連最小的孩子，才二十個月大，也照揍不誤，並且下手相當殘忍。

但是，使他驚愕的是，有天晚上，他的妻子強烈批評他打孩子打得太過份了（甚至對他說：「我發誓，你瘋了……」），他竟然撲向她，打了她，並把她綁在椅子上，對她大吼說：「我要叫你一輩子都記住，我是這裡的主人！」

幸虧孩子們開始哭叫起來，他恍然自己舉止的嚴重性，趕快給妻子鬆綁，並在第二天決定去

找一位「神經專科」的醫師看病。他明白指出，「以前他不是那樣的」，很少體罰孩子們，而且無論如何都不會和妻子吵架。自從那些「事變」發生之後，現在的這些現象出現了，他說：「因為現在我們做步兵在做的事情，譬如上個星期，我們在執行部隊做的事。政府高官們說，阿爾及利亞沒有戰爭，而維持秩序、確保安寧，就是警察應該做的事。可是阿爾及利亞有戰爭，當他們察覺到的時候，已經太遲了。最使我受不了的是嚴刑逼供。您不會不曉得這種事吧？有幾次我連續拷問了十個小時。」

「執行拷打，對你造成什麼影響？」

「這太累人了……確實是大家互相輪流，但問題在於什麼時候交班。每個人都認為自己快要得到情報了，並且提防把煮熟的鴨子讓給另一個人，使他撈現成的。於是，放手……或者不放手。」

「甚至有時候，有人會爲了讓被受審人開口而給他錢。的確，對我們來說，問題就在：你能否叫那個傢伙開口？這涉及個人成就的問題；大家在競爭，最後大家打得筋疲力竭，於是，我們利用那幫『塞內加爾人』幫忙審訊。但他們打得太兇，半個小時內便把人打壞了，或者打得太輕而沒什麼效果。事實上，這項工作要成功就必須聰明：知道什麼時候抓緊，什麼時候放鬆。這是嗅覺靈敏的問題。當那小子差不多了，就不必再繼續拷打。這也是爲何，這工作必須要自己來做：我們自己比較可以監視進度。我反對由別人代打，而自己每小時才進來看進展狀況。尤其不能使那傢伙有他不會從你們手下活著出來的印象。這樣他就會思考爲什麼要說呢？既然知道說

也救不了他自己的命。在這種狀況下，您就沒有任何運氣知道什麼了。應當讓他抱著一絲希望，是希望使他開口。」

「最令我煩惱的，是我打妻子那件事。一定出了什麼毛病，醫生，我必須要處理這部分。」他的部門不准他休息，況且，病人不要精神科醫生開證明，於是，他的治療是在工作仍屬「全職」的情形下進行的。我們輕易就可以猜到，採行這種配套會出現的弱點。他完全知道自己所有的狂亂是直接由審訊室的活動引起的，儘管，他仍然試圖把責任完全拋棄在「事變」上頭。由於他不考慮（這沒有意義）停止刑訊（否則必須辭職），他直言不諱要我幫助他，讓他能在不受良心責備、不患行為失調症的情況下，心平氣和的拷打那些愛國者（註4）。

系列 B

這裡收集了幾個或幾組病例，其中的引發事件，首先是全面在阿爾及利亞蔓延的戰爭氣氛。

一號病例——一對十三歲、十四歲的阿爾及利亞少年殺害他們的歐洲玩伴

這裡關乎一份法醫的鑑定。一對十三和十四歲的阿爾及利亞少年，他們是一所小學的學生，

〔註4〕在這個觀察中，我們面對一個完整無缺的和諧體制。一個喜歡鳥語花香、安祥的享受交響樂或奏鳴曲的劊子手，這只是一個階段。稍後，我們會發現一個鑲嵌在徹底、絕對的施虐當中的存在狀態。

被控殺害一位歐洲同學，也認罪。犯罪被重構，相片被列入訴訟記錄。人們看見一個小孩抓住被害者，而另外一個小孩用刀子殺死他。兩個年幼的嫌犯並不翻供。我們與他們做過很長的會談。在此轉述他們話中獨特的部分。

(1)十三歲少年的話

「我們沒生他的氣。每個星期四，我們一起用彈弓打小山頭與村子上空的鳥。他是我們的好朋友。他不想再上學了，想學他父親一樣當水泥工。有一天，我們決定幹掉他，因為那些歐洲人要殺死所有阿爾及利亞人。我們無法殺死那些大人；可是他和我們年紀一樣，我們能夠殺了他。我們不知道如何下手，想把他扔進一條溝子裡，但他可能只受點輕傷。於是，我們從家裡拿了一把刀子，並把他殺了。」

「爲什麼選上他呢？」

「因爲他跟我們一起玩。別人不會跟我們一起上那個小山頭。」

「可是，他是個玩伴？」

「那爲什麼他們也要殺我們呢？他爸爸是個民兵，他說，必須把我們的喉嚨割了。」

「但他沒對你們說什麼吧？」

「他？沒有。」

「你知道他現在死了？」

「知道。」

「死亡是什麼？」

「就是當生命結束時，人就升天了。」

「是你把他殺死的。」

「對。」

「殺死一個人會困擾你們嗎？」

「不，既然他們要殺我們，所以……」

「你不怕坐牢嗎？」

「不。」

(2) 十四歲少年的話

這個小被告和他同學形成鮮明的對照。他幾乎長大成人了，從肌肉控制、面部表情、口氣和回答內容上，都表現出是個大人。他也不否認殺人。爲什麼他殺人？他不回答，卻問我是否看過歐洲人坐牢。有沒有一個歐洲人在殺害阿爾及利亞人後被抓進監獄？我回答他，我的確沒見過歐洲人坐牢。

「然而，每天都有阿爾及利亞人被殺，是不是？」

「對。」

「那麼，爲什麼在監獄裡看不到歐洲人？您能解釋嗎？」

「不，可是你爲什麼殺死這個男孩，他是你的玩伴？」

「我告訴您……您聽過里韋事件嗎？」〔註5〕

「我聽過。」

「那天我的兩個親戚在那裡被殺了。我們這裡的法國人發誓說要把我們一批批趕盡殺絕。沒有一個法國人因爲所有這些被殺的阿爾及利亞人而被捕的？」

「我不知道。」

「好吧，沒有任何人被捕。我啊！我想上山（打游擊），可是我太小了。於是我對X說，必須殺死一個歐洲人。」

「爲什麼？」

「在您看，我們該怎麼辦才好？」

「我不知道。但你是個孩子，而這種事是發生在大人身上的。」

「可是他們連小孩也殺……」

「但這不是殺你玩伴的理由。」

「好吧，我殺了他。現在你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吧！」

「是不是你的朋友惹火了你？」

「沒有，他沒惹我什麼。」

「那麼？」

「就是這樣。」

二號病例——一名二十二歲的阿爾及利亞青年，具被控告妄想（*déire d'accusation*），並以「恐怖

行動」偽裝其自殺行為

這名病人是由法國司法當局指定來就醫的。這項治療處置的介入，是在阿爾及利亞的一些法國精神科醫生進行完司法醫學鑑定後施行的。

這名病人身體消瘦，完全陷入精神錯亂的狀態。全身佈滿瘀斑，上下頷骨的骨折使他根本無法吃東西。因此，在兩個星期內，借助各種注射給他提供營養。兩個星期後，思想空白緩和了，經過接觸後，我們可以重構這名年輕人的悲慘經歷。

他年少時，以罕見的熱情參與童子軍活動，成爲穆斯林童子軍活動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但在

〔註5〕里韋（Rives）是個村子，從一九五六年的某一天起，開始名震阿爾及利亞人地區。這天晚上，法國兵侵入這村子，把四十名男人從床上拖起來，並把他們集體屠殺。

十九歲時，完全把童子軍活動拋在一邊，只關心自己的職業。身為機械操作員，他帶著頑強的毅力學習，並夢想成為這一行的頂尖高手。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他的注意力完全被職業上的問題所吸引，對國族鬥爭毫無反應。他已經不再跟老同學來往，他給這段時期的自己下一個定義：「被徵召鑽研自己的專門技能。」

然而，在一九五五年中期，在一次晚上的家庭聊天中，他突然覺得自己被父母看作叛徒。幾天後，這個短暫的印象淡化了，但他仍陷入一種不安、莫名其妙的煩惱中。

於是他決定很快吃完飯，逃離家庭，並把自己關在房裡，避免所有的接觸。災難是在這種狀況下突然出現的。有一天，正午十二點半，他在街道正中央清楚聽到有人罵他是懦夫的聲音，他轉過頭去，沒有看到任何人，他加快腳步，決定不工作了。他待在自己的房間裡，不吃飯。夜裡開始發作了。三個小時內，他聽見各種侮辱的罵聲。他的腦子裡、黑暗中迴盪著一些聲音：「叛徒……懦夫……你所有的兄弟都死了……叛徒……叛徒……。」

他陷入莫名其妙的焦慮，「十八個小時內，我的心跳每分鐘一百三十下。我以為自己就快要死了。」

從此病人嚙不下任何東西。日漸消瘦，把自己關在房間裡的一片漆黑中，拒絕給父母開門。將近第三天，他跪下來禱告。他告訴我，他每天保持十七至十八個小時的跪姿。第四天，他衝動得「像個瘋子一樣」，蓄著「想必也讓人以為是瘋子的鬍鬚」，不穿上衣也不打領帶出門到城

裡。在街上，他茫然不知要去哪，走著走著又走到歐洲區。他當時的體態（他像個歐洲人）似乎保護他免受歐洲巡邏們的取締。

相反的，在他身邊的一些阿爾及利亞男女卻遭到臨檢、推擠、侮辱和搜身……然而，奇妙的是，他沒帶任何證件。敵方巡邏們對他的親切，更使他堅信自己的妄想：「大家都知道我和法國人在一起。士兵們奉命別理我。」

此外，被臨檢的阿爾及利亞人雙手放在頸後，他感到他們的目光充滿對他的蔑視。抑不住的煩躁，促使他大步離開現場。他是在這種情況下走到法國參謀部大樓前。在柵欄前，好幾個士兵拿衝鋒槍對著他。他走向士兵們，撲向其中一個，想搶他的衝鋒槍，一面大喊大叫：「我是阿爾及利亞人。」

他很快被制伏，被帶到警察局去。局裡的人堅持要他招供他的領導人和所屬的其他人員的名單。幾天後，警察和軍人們發現，他們是在跟一個病人打交道。他們決定對他進行精神鑑定，並在得出精神疾病的結論後，命令他去住院。他對我說：「我想要死，甚至在警察局裡，我以為並希望他們在拷打我後，會把我幹掉。我很高興被揍，因為這證明了他們也把我當作敵人。我再也不會聽到這些指責而不反抗了。我不是懦夫，我不是女人，我不是叛徒。」〔註6〕

〔註6〕一九五九年期間，這類的病例在阿爾及利亞特別多。不幸的是，並非所有的病人都有幸去住院。

三號病例——一位年輕法國女性的精神官能症傾向，父親是政府高官，在一次伏擊中遇害

這位二十一歲的少女是位大學生，來找我求診，因為有著輕微的焦躁型症狀，在唸書和與人交往時令她感到困擾。手心老是潮濕，周期性的焦慮，在這期間，水「從她手中流出來」，夜裡偏頭痛加上胸部受壓迫。她啃指甲。但值得注意的是，她與人的接觸十分容易，卻很明顯過快，而在私底下感到重大的焦慮。病人輕描淡寫提及她父親的死亡，然而，她父親剛過世，因此我很快就把調查轉向父女關係方面。她對我描述得很清楚，完全一清二楚，清楚到幾乎貼近無動於衷的地步，恰是這種理性主義揭示了她的失調，和內心衝突的性質和起因。

「我父親是高級公務員，負責管轄一大片農村地區。當事變爆發以來，他就憤怒的追捕阿爾及利亞人，達到完全不眠不休的程度，這些都令他亢奮。我眼看著父親緩慢的變化，卻無能為力。最後，我決定不再去探望父親，待在城裡。其實，我在家裡時都徹夜難眠，因為叫喊聲從下面直通到我的房間，不斷折磨我；在地窖和改變用途的屋子裡，有人在拷打一些阿爾及利亞人，叫他們招供情報。你們無法想像整夜聽見這樣的嘶叫聲有多可怕。有幾次我思考一個人怎麼能忍受……我不談拷打，只說聽到痛苦的叫聲。這種情況持續著。最後，我不回家了。我父親很少來城裡看我，少數幾次他來看我，我無法做到正面看他時不侷促不安及害怕。我變得愈來愈難以擁抱他了。

「因為我在鄉下住了很久，幾乎認識所有的人家。那些和我同年齡的阿爾及利亞青年，小時

候會跟我一起玩過。每次回家時，父親總是告訴我他逮捕了一些新人。最後，我都不敢上街，我肯定會到處碰到仇恨。在我的心底，我認為這些阿爾及利亞人有理。如果我是阿爾及利亞人，我也會加入游擊隊。」

然而，有一天，她收到一封電報，通知她父親受了重傷。她去醫院，發現父親已經昏迷不醒，不久就死了。她父親是跟一隊人執行偵察任務時受了傷，巡邏隊中了阿爾及利亞國族解放軍的埋伏。

「葬禮引起我的反感，」她說：「所有那些來為我那『擁有高尚的品德，使當地居民心服』的父親悼喪的軍官，令我厭惡。大家明明知道那是假的。誰不知道我父親指揮整個地區的審訊中心？他們知道我父親每天嚴刑逼供，打死十個人，而他們卻忠誠、忘我、愛國等謊言連篇胡扯。我應該說，現在那些語調對我不再有任何價值了，總之是沒多少價值了。我立刻回到城裡，躲開所有的大人物。我拒絕他們給我的撫恤金。我不要他們的錢，這是我父親流血喪命的代價。我不要，我要去找工作。」

四號病例——十歲以下的阿爾及利亞少年們所具有的行為失調症

這是一些難民的例子。他們都是被法國人殺死的戰士或平民的兒子，被安排在突尼西亞和摩洛哥的各個中心。這些小孩子入學，安排給他們一些遊戲和集體外出活動，定期接受一些醫生的

追蹤調查。因此我們才有機會接觸其中一些孩子。

(1) 在這些不同的孩子身上，有著對父母形象明顯的愛，他們執著尋找所有像父親或母親的東西，並小心翼翼保存下來。

(2) 在他們身上普遍存在對響聲的恐懼症、受到斥責時倍感不安、十分渴望平靜和愛。

(3) 許多孩子具有帶夢遊現象的失眠症。

(4) 周期性的尿床。

(5) 具有虐待狂的傾向：一種常玩的遊戲；在一張緊繃的紙上狂亂戳許多窟窿。咬鉛筆；執拗的啃指甲。他們私下雖然十分友愛，卻經常吵架。

五號病例——婦女難民們的產褥精神病

我們將婦女們在生育期間出現的精神疾病，稱作「產褥精神病」(psychoses puerperales)。這些疾病可能在產前或產後的幾個星期發作。這些病症的決定因素十分複雜，但估計有兩個主要原因：內分泌系統失調和「情感的衝擊」。後一項雖然很含糊，但一般大眾稱之為的「強烈情緒」也包括在內。

在突尼西亞和摩洛哥的邊境上，自從法國政府決定在幾百公里的土地上進行軍事監控及焦土政策以來，就有將近三十萬的難民。大家知道他們生活在一無所有的狀態，一些國際紅十字會成

員多次去那裡，見證了極度貧困和生活條件不穩定後，叮嚀國際組織加強援助這些難民。因此可以預見，由於營養不良，那些孕婦們特別容易出現產褥精神病。

法國部隊運用「窮追猛打」戰略，頻頻出動空襲、掃射——我們知道法國軍隊在摩洛哥和突尼西亞領土上的轟炸不計其數，而薩基埃·西迪·尤素夫（Sakiet-Sidi-Youssef）這個受害村子更是血淋淋的例子——家庭支離破碎，集體遷移，為難民們帶來持久不安的氣氛。不得不承認，產後的阿爾及利亞婦女難民，很少沒出現心理失調症的。

這些失調症有各種類型。或是煩躁不安，有時可以是帶著狂怒的樣貌，或是停滯的嚴重抑鬱，並有多次自殺的企圖，最後是伴隨著哭泣、哀嘆、哭天搶地的焦慮狀態等等，同時也產生各種妄想的内容。或是發現一種模糊的被迫害妄想，對任何人都害怕，或者妄想法國人要殺她的小孩而產生的攻擊性，或者是死亡迫近的印象，於是病人哀求看不見的劊子手饒了她們的孩子。

這裡必須指出，那些妄想的基本内容，並未由於障礙被平靜、緩和下來而一掃而光。被治療病人其所處的情境，會維持並滋養這些病理的癥結。

系列C 酷刑後的感情—智力變化及心理失調

在這裡，我們集中了一些在酷刑後或在酷刑時，立刻出現多少算嚴重失調症的病人。我們將描述幾個子類型，因為我們察覺到，無論對人格造成表面或深度的傷害，每種酷刑方法都各自對

應到一種病態特徵。

第一類 在無差別的酷刑待遇後，即所謂的預防性的酷刑後

這裡我們所指涉的，是一些粗暴的方式，重點主要不在刑求，而是讓人開口說話。達到一個極限，超過後痛苦即變得無法忍受的原則，在此有著獨特的重要性。目的是要儘可能迅速達到這個極限。不講究精心進行；有的是進行大量、各式攻擊：好幾個警察同時拷打；四個警察站在那裡，圍繞著犯人，拳打腳踢玩弄他，而一個警察用香煙燙他的胸膛，另一個警察用棍子敲他的腳掌……在參照受刑者吐露的隱情後，我們始終覺得，在阿爾及利亞使用的某些酷刑特別殘忍。

(1) 由嘴裡灌進水，並用肥皂水高壓灌腸〔註7〕。

(2) 把瓶子塞進肛門。

所謂「不動姿勢」的兩種酷刑：

(3) 犯人跪著，手臂平行伸在地上，手心翻過來朝天，上身和腦袋挺直，一下都不准動。一個警察坐在囚犯後面的椅子上，用警棍強迫他不準動。

(4) 囚犯站著，臉靠牆，雙臂高舉，手緊貼牆。同樣，稍微動一下或是想要放鬆一下，就會慘遭毒打。

我們確定有兩類的受刑人：知道一些事情的人；什麼也不知道的人。

知道一些事情的人在衛生部隊裡很罕見。當然，我們不是不知道某某愛國者在法國監獄裡被修理過，但並未見到他以病人的身份來到這裡（註8）。

那些什麼也不知道的人，卻經常來看病。在這裡，我們不談那些在掃蕩或包圍時挨打的人，那些人並沒有以病人的身份來找我們。我們專門談這些不屬於任何組織的阿爾及利亞人，他們被捕，被帶到警察局或審訊處，遭受審訊。

精神醫學症狀描繪

(1) 躁鬱症：四個例子

這是一些悲傷、意氣消沉的人，並無真正的焦慮現象，大多躺在床上，逃避接觸別人；但突然會發展出極度、難以理解其含義的興奮。

(2) 心性厭食症：五例

這些病人帶來嚴重的問題，因為這樣的心性厭食症併發與他人身體接觸的恐懼症，例如當護士走近要碰觸他、牽他手時，他立即嚴厲拒絕，因而不可能補給人工的營養或給他服藥（註9）。

〔註7〕這是引起大量死亡的酷刑。在這些高壓灌腸後，腸黏膜受到各種損傷，引起腸穿孔，使氣體栓塞和腹膜炎屢見不鮮。

〔註8〕顯然，我們講的是一些知情而在刑求下沒有招供的阿爾及利亞人，因為大家清楚，一個招供的阿爾及利亞人事後馬上被殺。

(3) 運動機能不穩定：十一例

我們接觸到一些坐立不安的病人。由於他們持續處於孤獨一人狀態，很難接受跟醫生關起門來進行門診。

在第一類受酷刑的人身上，經常呈現兩種感情：

首先是「不公平的感受」。這些人歷經幾天幾夜無端的折磨後，似乎被弄壞了一些什麼，這些受害者當中一個，曾有過特別痛苦的經歷：經過好幾天徒勞無功的刑求後，警察們終於相信他們在跟一個安份守己、與阿爾及利亞國族解放陣線無關的人打交道。儘管如此，一個刑警還是說：「可別這樣就放了他，讓他再痛苦一點，好讓他出去後安份守己。」（註10）

然後，另一種情感是，「對一切道德議論冷漠」。對這類病人來說，不存在所謂正當理由。被施加酷刑的理由就很薄弱，就因為他是弱者。因此，首先要處理的是如何增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去問理由立論依據是否正確。只有力量才算數。

第二類 電刑後

在這類裡，我們列入了主要受到電刑的阿爾及利亞愛國者。電刑以往是酷刑步驟的一部分，但是從一九五六年起，某些審訊專門只使用此刑。

精神醫學症狀描述

(1) 局部或全身的體感異常症：三例

病人痛苦的感覺到渾身像有螞蟻在爬，有人在拉他的手、腦袋炸裂、有人咬掉他的舌頭。

(2) 冷漠、意志缺乏、無動於衷：七例

這些病人缺乏生氣、沒有計畫、萎靡不振、過一天算一天。

(3) 電器恐懼症

害怕接近開關，尤其是收音機、電話更令他們恐懼。醫生絕對不能提及電擊療法。

第三類 在注射「真話血清」後 (après le «sérum de vérité»)

我們深知這種治療的原則。面對一個似乎遭到無意識的內在衝突折磨而無法在會談過程中將衝突外化的病人，我們會借助化學辦法。靜脈注射戊硫巴比妥 (penthotal) 是最常使用的辦法，這會使病人得以擺脫那似乎超越他可適應範圍的衝突糾葛。醫生採取治療措施的目的，是要把病人從這個「異物」(註11)中解放出來。然而，我們發現，要控制精神各審決機構(譯註)的漸進解

(註9) 醫務人員得日夜輪班看顧病人，並作解釋工作。大家都理解到「稍加粗暴對待病人」這個方法，在這裡是行不通的。

(註10) 這種預防性的酷刑在某些地區就變成「預防性鎮壓」。在里韋，當時一片平靜，而殖民者們不想遭到襲擊(鄰近地區已經開始騷動了)，決定殲滅阿爾及利亞國族解放陣線的人。單單在一天內就殘殺了四十多名阿爾及利亞人。

體，是有困難的。我們經常眼見驚人的惡化情形或無法解釋的新症狀，因此，一般而言，我們幾乎已放棄這種療法。

在阿爾及利亞，軍醫和精神科醫生們在警察局審訊室裡發現了進行實驗的大好機會。如果戊硫巴比妥能使精神官能症掃除那些遮蔽內在衝突的屏障，那麼它也應該可能粉碎阿爾及利亞愛國者的政治屏障，不必靠電擊就可以使囚犯招供（醫學傳統是教導我們要免除痛苦）。這是「顛覆戰爭」的醫療形式。

劇情是這樣上演的。首先：「我是醫生，不是警察，我是來幫助你的。」如此，幾天後，我們獲得囚犯的信任〔註12〕。然後：「我給你打幾針，因為你受到非比尋常的打擊。」幾天裡，我們隨便進行各種療法：維他命、強心劑、葡萄糖水。第四或第五天，再靜脈注射戊硫巴比妥。開始審訊。

精神醫學症狀描述

(1) 口語刻板症 (stéréotypies verbales)

病人不斷重複這類句子：「我什麼也沒說，請相信我，我沒開口。」這種症狀伴隨著恆常的焦慮不安。實際上，經常有的情況是，病人不知道他是否被套出情報。於是他對他所捍衛的事和可能被供出姓名地址的同志，深具罪惡感，這罪惡感悲劇性的、沉重的壓在他心底。不論人家怎麼說，告訴他沒這回事，也無法使他破敗不堪的意識回復平靜。

(2) 智力或感官的知覺變得混濁

病人不能確認某個知覺對象的存在。他掌握一種推理，但又不加區別，根本分不清真假。一切都是真實同時又是虛偽的。

(3) 對所有單獨談話的病態恐懼

這種恐懼，來自於我們可能隨時會再對他進行審訊的深刻印象。

(4) 抑制

病人心存戒備，他逐字逐句記下提問，投射出的回答也是一字一句都經過斟酌。這讓我們會有幾近抑制的印象，伴隨有精神遲緩，字句中斷、回到之前已說過的等等。

很清楚的，這些病人頑固的拒絕一切靜脈注射。

第四類 經過洗腦以後

最近，我們談很多在阿爾及利亞的「心理戰行動」。我們並不想對這些方法進行批判研究，

〔註11〕事實上，衝突一點也不是外在的。他只是人格積極發展的結果，裡面不會有什麼「異物」。倒不如說是沒有被好好整合進去的病體。

〔註12〕有些主持「法國人參與」團體的精神科醫生，被指派去鑑定囚犯，一開始與囚犯接觸時，就自稱跟辯護律師交情深厚，並且表明他們兩（律師和他）將解救囚犯出去。所有在這種情況下受鑑定的囚犯都被處死了。然而，這些精神科醫生卻在我們面前吹噓這種戰勝「抵抗」的妙策。我們在此也摘引了其中的一些病例。

在此只局限於提及這些方法所導致的精神醫學結果。在阿爾及利亞，有兩種洗腦的刑訊機關：

一、針對知識份子的

原則上是要引導囚犯扮演某個角色。我們可以知道這種方式是參照社會心理學流派〔註13〕。

(1) 推進合作活動

透過對合作的正當性進行討論，誘使知識份子與法國合作。他被迫過雙重生活：一個有名的愛國者，變成預防檢束的囚犯。從事活動的目的，是從內部打擊那些構成國族意識的各種要素。他不僅應該合作，而且被命令「自由的」和那些持保留態度的人，或反對派，進行辯論，並說服他們。這就是讓他能吸引愛國者的注意力，也就是充當線民的一個漂亮手段。如果剛好他斷言找不到反對派，我們就給他指派，或要他照做，把對方當成反對派。

(2) 報告有關法國所作所為的價值和進行殖民的理由

爲了充分執行這項任務，他們的身邊大量聚集了「政治顧問團」。例如本地事務官，或者如心理學家、社交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等等，則是更好不過。

(3) 一一駁斥阿爾及利亞革命的論據

阿爾及利亞不是一個國族／國家，現在不是，將來也不是。

沒有「阿爾及利亞人民」。

阿爾及利亞的愛國主義是無稽之談。

「叛徒」都是野心勃勃者、罪犯、上當受騙的可憐蟲。

每個知識份子必須要輪流針對這些主題作報告，而且必須有說服力。每個月底給他們打分數（惡名昭彰的「獎賞」），這些報告作為決定是否開釋該名知識份子的評估資料。

(4) 過著完全病態的集體生活

獨來獨往是叛逆行爲。於是我們始終跟某一個人在一起；禁止沉默，必須大聲說出想法。

證詞

在此引證一名被監禁和被洗腦幾個月的教授的證詞。有一天，集中營的牢頭祝賀他進步了，並宣佈即將開釋他的好消息。他深知敵人的策略，對這個消息十分警惕。實際上，方法是，向囚犯預告釋放的日期，並在之前幾天搞一個集體批判會。一旦囚犯沒有顯示出已受矯正的決定性徵兆，批鬥會結束當天，通常會決定延期開釋。出席的心理學者們說，這種會議暴露出國族主義病菌的頑固性。

〔註13〕我們知道，在美國，有一門社會精神醫學流派相當發達。擁護這一派的人認為，現代人的悲劇在於個人無法再扮演一個角色，淪為社會機制的一個齒輪。於是，提供的治療方式，就在於讓人能在真正的遊戲活動中，扮演一些角色。我們隨便扮演一個角色，甚至在同一天內變換角色，也可以象徵性的處於不管是誰的位置上。美國那些在工廠工作的精神科醫生，似乎在對工人進行團體治療上，做出了奇蹟。他們果然成功的讓工人認同於英雄。勞資關係的緊張大大被緩和。

然而，這一次不要花招。囚犯真的被釋放了。一出監獄，回到城裡及家裡之後，犯人對自己如此成功演出的角色感到十分滿意。他很高興又能重返國族鬥爭的位置，並開始試圖聯絡其他同志。這時，一個刺痛的可怕念頭閃過腦袋。他可能誰都沒騙過吧，沒騙過看守，沒騙過其他牢友，尤其沒騙過自己。

這場戲該在哪裡結束？

還是這麼一回事，必須清除疑慮，解除有罪推定。

精神醫學症狀描述

(1)對一切集體討論的恐懼症。一有三、四個人的會面，抑制就立刻重現，並表現出異常的猜忌和沉默。

(2)無法說明或捍衛特定立場。思考的開展，是透過正反對比的命題組。一切被肯定的事物，可以在一瞬間又同時被否定。這的確是這一場戰爭中我們遇過最痛苦的後遺症。強迫性人格是阿爾及利一亞殖民主義所實施的「心理作戰」的成果。

二、針對非知識份子

在一些中心裡頭，像貝魯瓦吉耶 (Berouaghia)，我們不再從主體性出發來修正個人的態度。

相反的，我們仰賴的是那具我們摧殘的肉體，以此期待能瓦解國族意識，這真是徹底的矯正，以

不施刑或給飯吃來表示獎賞。

(1) 必須招認自己不是阿爾及利亞國族解放陣線。必須集體而且大聲說出來。必須反覆重述幾個小時。

(2) 然後，必須承認過去自己是阿爾及利亞國族解放陣線，但明白這是不好的，再大叫：「打倒阿爾及利亞國族解放陣線！」

過了這個階段，再進入另一個階段：「阿爾及利亞的未來是靠法國，只能靠法國。」

「沒有法國，阿爾及利亞將會回到中世紀。」

最後，「我們是法國人，法蘭西萬歲！」

這種情況下會出現的失調症並不嚴重。但，身體的不適和痛苦需要休息和平靜。

系列D 身心症

阿爾及利亞殖民地戰爭，不僅僅增加了心理失調，助長了特殊疾病的出現。除了酷刑病、受刑者病和行刑者病等病理現象以外，還需加上一種在阿爾及利亞繁衍的氛圍病，經常使執業醫生在面對他們所理解的病人時，一律會說：「一切都將隨著這場該死的戰爭而結束。」

我們提議在D系列中，列入阿爾及利亞人會出現的疾病，其中有些人特別是被關在集中營裡頭，這些病症的特徵是屬於身心型。

我們將那些由衝突情境引發的器質性失調症，總稱爲身心症 (pathologie psychosomatique) (註14)。之所以稱之爲身心症，是因爲其決定因素來自心理。這種病理現象，被看作是一種有機體反應的方式；換句話說，也就是去適應他碰到的衝突，失調既是症狀，又同時是痊癒。更正確來說，大家一致認爲有機體（再次重述，問題在於大腦皮質—內臟的統一性，即過去人們所謂的身心性）通過糟糕的，但總之是經濟的方法來超越衝突。人體選擇了最小的痛苦來逃避大災難。

總而言之，這種病理現象在今天廣爲人所知，儘管我們覺得所提出的各種不同療法（鬆弛、催眠暗示）的療效似乎是靠運氣。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英國遭受轟炸和蘇聯居民被包圍時，尤其是在史達林格勒 (Stalingrad)，關於此種失調症的描述倍增。當今，人們清楚知道，不需要被槍彈打傷，身體以及頭腦即會因戰爭的存在而受苦。和所有戰爭一樣，阿爾及利亞戰爭也創造了它的皮質內臟疾病配額。如果把下列的最後一組疾病排除，我們則可以說，在阿爾及利亞所遇到的失調症，是在常規／古典的戰爭下所會出現的描述。我們覺得最後一組似乎是阿爾及利亞殖民戰爭所特有的。這種特殊型的病理現象（全身肌肉攣縮），在革命前已引起注意。可是，記述這種病理的醫生，卻把它烙上了土著的先天烙印，認爲這是因他們神經系統的特異性，人們斷言在裡頭找到了被殖民者錐體外路系統 (système extra-pyramidal) 占主導地位的證明 (註15)。這種攣縮，實際上只不過是伴隨姿態而生之物：被殖民者在面對殖民權威時所呈現的肌肉僵硬、沉默和執拗。

精神醫學症狀描述

(1) 胃潰瘍：為數眾多。主要在夜間激烈疼痛，大量嘔吐、消瘦、憂傷和悶悶不樂，偶有易怒的情況。值得特別指出：這些病人大部分是十八至二十五歲的青年。在一般情況下，我們絕不建議開刀。然而，胃切除手術動了兩次，而這兩個個案都在同一年間再度發病。

(2) 腎疝痛：他們在夜裡疼痛到極點。很少有結石。這種絞痛罕見的出現在十四歲到十六歲的少年之間。

(3) 婦女亂經：這病理現象眾所周知，不必多說。婦女們或是三、四個月不來月經，或是月經來時劇烈經痛，引發性格和行為上的反應。

(4) 由於特發性的顫抖而引起的嗜睡症 (*hypersomnies par tremblements idiopathiques*)：這是一些年輕的成年人，由於全身性、細微的顫抖而無法休息，令人想起帕金森症。一些有「科學精神」的人可能會提及錐體外路此一決定因素。

(5) 少年白頭：從審訊中死裡逃生的人，他們的頭髮突然變白，一小撮、塊狀或全部變白。這

(註14) 這個稱法，表達了一個理想主義式的概念，是愈來愈被廢棄了。實際上，有一個屬於皮質—內臟層面的術語，延襲自蘇聯，尤其是巴甫洛夫 (Pavlov) 的工作成果，至少比較有利於把大腦放回它該有的位置，也就是把大腦看作是一個鑄型，心理現象在那裡確切進行加工、轉化。

(註15) 就神經的層次而言，愈是高等，就愈不呈現錐體外路的樣態，如同我們所見，所有一切似乎都具一致性。

些失調症經常伴隨嚴重虛弱無力、同時有對一切失去興趣及性無能的狀況。

(6) 陣發性心悸症 (tachycardies paroxystiques)：心律突然加快，每分鐘一百二十下、一百三十下、一百四十下。心跳過快引起焦慮、垂死的感覺，發作末了大量出汗。

(7) 全身攣縮 (contracture généralisée)、肌肉僵硬：一些男性病人逐漸(有兩個例子是突發的)感到無法做某些動作：爬樓梯、快走、跑步。這種障礙的原因是特有的僵硬，讓人強烈聯想起是否腦子裡的某些區域受到損傷(中央灰結節部分)。僵硬會逐漸擴展，但緩步進行。下肢幾乎不能彎曲、無法放鬆。一進到攣縮狀態時，任何自主性的鬆弛都是不可能的，病人簡直像是一團東西。臉部毫無表情，但顯示出一定程度的茫然。病人似乎不能「使自己的神經緊張解除」，他永遠處在緊張，等待狀態中，處於生和死之間。如同其中一個人對我們說：「你們看，我已經僵硬得像個死人了。」〔註16〕

從北非的犯罪衝動，到國族解放戰爭

不應該只是爲了自己人民的自由而戰，更應該在整個戰鬥時，重複教導人民，當然先是重複教導自己作爲「人」的重要性。應該回顧歷史——人因其他人而受難的歷史，並促使人民與其他

人相遇的可能性。

實際上，參加武裝鬥爭、國族鬥爭的戰士，有意要一天天測量出殖民壓迫而加諸於人身上的毀損。戰士們有時會有筋疲力竭之感，因爲他必須使他的人民恢復尊嚴，把全體人民從井裡、從洞穴裡拉出來。他經常發覺，不僅應該追擊敵人，更應該追擊那凝聚在被殖民者體內的絕望核心。壓制的時代是痛苦的，可是戰鬥，當它在使受壓迫者恢復尊嚴同時，亦發展出一個極具生產力以及具關鍵性的整合過程。一個國族戰鬥的勝利，不只是有助於國族各種權利之獲勝，它同時讓這個國族獲得了密實感、一致性以及同質性。因爲殖民主義不只造成被殖民者的去人格化。這種去人格化，也在集體的層次上，也就是社會結構方面被感受到。於是，殖民地人民，簡化成一

〔註16〕在此多餘的補充一句：這不涉及歇斯底里的攣縮。

群個人的集結，其存在基礎只能從殖民者的存在中獲得。

國族爲了自己的解放而從事的鬥爭，依據情況的不同，會將它帶往兩個境地：對於那些透過殖民地的民政、軍事占領、經濟剝削而深植在意識中所謂的真理，要不將之拋棄，要不將之引爆開來。只有戰鬥才能真正拆穿這些謊言，它貶低並實際斷傷了我們當中最有覺悟的人。

在巴黎或埃克斯，在阿爾及爾或巴特爾，我們屢次看到一些被殖民者，強烈抗議著所謂黑人、阿爾及利亞人、越南人的懶惰。然而，在殖民體制裡，一個積極工作的農民，一個拒絕休息的黑人，難道不算是單純的病態個例嗎？被殖民者的懶惰，是對殖民機器有意識的破壞；從生物學的角度看，這是一種出色的自我防衛的方式，不論如何，這拖延了殖民者對全國的控制。

森林和沼澤是被殖民者抵抗外國人深入的自然同盟。必須理解這件事，並且停止去論證和肯定黑人是勤勞的勞動者，阿拉伯人是罕見的開墾者。在殖民體制裡，黑人的真相和阿拉伯人的真相，就是袖手旁觀，不幫助壓迫者更方便進行燒殺搶掠。政治覺悟尚未成熟、並未決定排拒壓迫的被殖民者，他的責任是讓自己不動如山。這是一種不合作的具體展現，總之就是一種最低限度合作的展現。

這些應用於被殖民者和勞動關係的考察，也同樣可以應用於被殖民者對壓迫者法律的遵守，規規矩矩納稅與否，以及可應用於被殖民者與殖民制度的關係。在殖民體制裡，所謂感激、真誠和榮譽都是廢話。最近幾年，我有機會證實一個十分典型的基本事實：榮譽、尊嚴、信守承諾，

只有在一個國族與國際同質的框架中，才能表現出來。既然你們和你們的同類人皆被當作狗那樣清除，你們只能奮力，用所有的手段，恢復做人的尊嚴。因此，你們必須用盡氣力壓在施刑者的身上，使他迷失的理智重新找回屬於普世的價值。在最近幾年，我們有幸看到在戰鬥中的阿爾及利亞，以非凡的形式，展現出榮譽、奉獻、熱愛生命、視死如歸。不，問題不在於歌頌戰士們。這裡牽涉到一個最平庸的事實，連最狂熱的殖民主義者也不會錯過做出這樣平凡的觀察：當涉及到保護人民或掩護兄弟時，阿爾及利亞戰士有一種非比尋常的戰鬥和赴死的方式，即使參考伊斯蘭或死後保證上天堂的想法，都無法解釋這種慷慨獻身。這個壓迫人的沉默——肉體當然在吶喊——這個沉默壓倒了行刑者。在這裡我們又發現，當國族開始前進，當人類要求，並肯定自己無限的人性時，那個禁止任何人袖手旁觀、維持不動的舊法則。

「可怕的犯罪天性」？

殖民主義所建立的阿爾及利亞人民的特點中，我們將討論「可怕的犯罪天性」這一條。一九五四年以前，法官、警官、律師、記者、法醫學者們都一致承認，阿爾及利亞人的犯罪天性是個問題。他們斷言，阿爾及利亞人是天生的犯罪者。一種理論被製造，賦予種種的科學證據。這個理論，過去二十多年來在大學裡被傳授。阿爾及利亞的醫科學生不知不覺接受這種教學，那些社會菁英也一樣接受殖民主義的洗禮，認定此為阿爾及利亞人民的先天缺陷。阿爾及利亞人天生懶

惰，是天生的說謊者、天生的小偷、天生的犯罪者。

我們打算在這裡陳述這個被公認的學說，重新提出它的具體基礎和科學論據。接著，我們要重述事實，並賦予其他的解釋。

「阿爾及利亞人經常殺人」，這是個事實，法官們會對你們說，五分之四的預審案件和傷害有關。他們主張，阿爾及利亞高居世界犯罪率最高國家之列，沒有輕度犯罪的存在。當阿爾及利亞人，在此適用於所有北非人，做犯法之事時，總是達到罪大惡極的程度。

「阿爾及利亞人殺人相當野蠻」，首先，他們喜歡選擇刀子作武器。「熟悉這個國家」的法官們，就這問題創造一個小小的哲學。例如，卡比利亞人喜歡手槍和步槍，平地的阿拉伯人偏愛刀子。某些法官會自問，阿爾及利亞人是否有著沒有見到血腥就不罷休的衝動。他們會對你說，阿爾及利亞人需要感受熱血，沐浴在受害者的血泊中。這些法官、警察、醫生認真論述穆斯林的靈魂和鮮血的關係（註17）。有些法官甚至會說，一個阿爾及利亞人殺人的話，首先並特別是會割斷對方的喉嚨。阿爾及利亞人的野蠻，表現在多重傷口上，有些是死後才帶上的不必要的傷口。屍體解剖無可辯駁的驗證了這件事：屍體上有太多的傷口，證明了殺人者非但欲致其於死地，而且還連續砍殺。

「阿爾及利亞人無緣無故殺人」，法官和警察面對殺人動機經常是目瞪口呆：任何一個動作、一個影射、一句曖昧的話、因一棵共有的橄欖樹而起口角、一隻在八分之一公頃土地上瞎逛

的家畜……。面對這種殺人，有時候是雙重或三重的兇殺，動機、理由追究起來，實在是平庸得令人絕望。由此我們經常會有種印象，好似這個社會團體隱藏真正的動機。

最後，阿爾及利亞人偷東西時，總是透過破壞、或有或無的引發謀殺，同時，在所有的例子裡頭都有對業主進行攻擊的行爲。

所有這些圍繞著阿爾及利亞人犯罪性的元素，似乎足以將其獨特出來，甚至可以建立系統化。類似的觀察，在突尼西亞和摩洛哥曾出現過，雖然較無深遠寓意，但北非人的犯罪性愈來愈成爲問題。在阿爾及爾大學精神醫學教授波侯（Porot）超過三十多年的指導下，有好幾個小組明確標定出犯罪性的各種表述模式，並對此提出一個社會學的、功能的和解剖學的解釋。

我們在此引用阿爾及爾大學精神醫學大師們對這問題所作出的主要成果。讓我們再次提醒，這些進行了二十多年的研究結論，是精神醫學資深教授在大講堂裡的授課內容。

就這樣，阿爾及爾大學畢業的阿爾及利亞醫生們，聽到和學到的是阿爾及利亞人是天生的犯罪者這樣的說法。而且，我想起我們當中某人十分認真陳述這些學說，並補充說：「儘管難以下嚥，但這在科學上是確立的。」

北非人是罪犯，他掠奪的本性衆所皆知，他的巨大攻擊性更是有目共睹。北非人喜歡極端，

〔註17〕我們知道，伊斯蘭教徒在沒有確定動物的血已流空之前，不得吃牠們的肉，所以動物是割喉屠宰的。

因此絕不能完全相信他。今天是最好的朋友，明天就變成不共戴天的敵人。他不懂分寸，對笛卡爾主義根本一竅不通，平衡感、沉著冷靜、中庸感，這些觀念和他內心深處的秉性相抵觸。北非人是粗暴的，遺傳下來的粗暴者。他不可能守規矩，無法疏導自己的衝動。是啊，阿爾及利亞人是天生的衝動者。

我們明確指出，這種衝動非常具攻擊性，而且，一般而言，是殺人的衝動。這樣，人們才得以解釋有憂鬱症的阿爾及利亞人不符合常規的行為。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精神科醫生，面臨這樣一個棘手的難題。醫師在面對憂鬱症的病人時，通常害怕他自殺。然而，患憂鬱症的阿爾及利亞人卻殺人。這個始終伴隨自我譴責、自我破壞傾向、道德意識之病，在阿爾及利亞人身上，卻具有毀滅他人的形態。患憂鬱症的阿爾及利亞人並不會自殺，而是殺人。這就是經波侯教授的研究，並在他的弟子蒙塞哈（Montserrat）論文中所述的「殺人的憂鬱症」（*mélancolie homicide*）。

阿爾及利亞學派又如何理解這種異常呢？首先，阿爾及爾學派說，自殺是回歸自己、凝視自己和自我反省。而阿爾及利亞人抗拒內在生活。北非人沒有內心生活可言；相反的，北非人將煩惱丟到周圍，以此來擺脫煩惱。他不作分析。既然憂鬱症確實是一種道德意識的病，那麼很顯然，阿爾及利亞人就只能產生假的憂鬱症，因為大家都知道，阿爾及利亞人意識不穩定，道德觀念薄弱。如果我們參照法國作者所提倡的兩種因果關係的話，阿爾及利亞人對情勢進行分析的無能，以及對組織一個心理綜觀的無能，可以完全被理解。

首先是關於智力方面。阿爾及利亞人是頭號的薄弱智者。如果想理解這些事實，首先得指出

阿爾及爾學派所建立的症候學，其中提到的土著所表現出的特徵如下：

- 沒有或幾乎沒有情緒性；
- 輕信且容易受暗示；
- 難以根除的固執；
- 心理幼稚，不如西方小孩有好奇心；
- 容易發生意外和易得暗示病。〔註18〕

阿爾及利亞人感知不到整體。他總是問些細枝末節的問題，並排除一切整合的工作。點畫法派主義者（Pointilliste），對物體緊抓不放，在細節中迷失，對觀念無動於衷，抗拒概念，口語表達降到最少，舉止總是衝動和挑釁的。阿爾及利亞人不能從整體出發來解釋細節，他們把個別因素絕對化，並把部分當作整體。因此，他面對很小的刺激會有全面的反應，像是對一棵無花果樹、一個手勢、在他土地上的一隻綿羊這類微不足道的小事。天生的攻擊性自行尋找出口，哪怕只是個微不足道的藉口，也能藉機發洩。這是一種攻擊性的純粹狀態〔註19〕。

〔註18〕波侯（A. Porot）教授《醫學、心理學紀要》（*Annales médico-psychologiques*），一九一八年。

〔註19〕一個阿爾及利亞審判長的嘴說出這樣的話：阿爾及利亞人的攻擊性，表現在對「騎兵騎術表演」的熱愛。他在一九五五年指出：「我們將這種反抗視為是政治性的，絕對是個錯誤。不時，他們所擁有的這種對戰鬥的愛，得要發洩出來才行！」民俗學者認為，建立一種可

阿爾及爾學派放棄了描述的階段，開始進入說明階段。波侯教授於是在一九三五年的布魯塞爾法語圈的精神科醫生與神經學家的會議上，明示了他的學說的科學根據。在討論巴乎克（Baruk）關於歇斯底里的報告時，他指出：「北非土著的大腦皮質性的高級活動幾乎沒有進化，而是一個原始人。他們的生活是植物性的本質，本能的受間腦的控制。」

爲了正確評估波侯教授此一重大發現，在此必須先提醒大家，在比較人類和其他脊椎動物時，人類這個物種的特徵即是大腦的皮質化。間腦是大腦中最原始的一部分，人是受大腦皮質支配的脊椎動物。

波侯教授認爲，北非土著的生活，是受間腦的要求所支配的。這等於說，北非土著沒有大腦皮質。他並不迴避這個矛盾，並於一九三九年在《南方醫學和外科》（*Sud médical et chirurgical*）刊物上和他的學生，也就是現任阿爾及爾精神醫學教授修泰爾（Sutter）合作，明確指出：「原始性並非缺乏成熟，並非是心智生活發展中顯著的停滯。它是一種臻至演化終點的社會狀態，它以一種邏輯的方式，適應於一種與我們不同的生命。」最後，教授們提到學說的根據：「這個原始狀態，不只是特殊教育下所產生的一種結果，它有更深層的基礎，我們甚至想，它的根本基質該是位於神經中樞結構上，至少是神經中樞動力分層化上的特殊體質。」正如我們所見，阿爾及利亞人的衝動性，他殺人的次數和特徵，其永久的犯罪傾向和原始狀態，絕非偶然。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協調一致的行爲，一個可以用科學解釋清楚的一致的生活。阿爾及利亞人沒有大腦皮質，或

者更精確的說，簡直就像低等脊椎動物那樣受間腦的控制。即使有大腦皮質的存在，也是十分脆弱的，幾乎未被整合在動力學當中。因此，既不神祕也無矛盾。殖民者對於將責任委託於土著一事有所保留，這不是因為種族主義或父權作風的關係，而單純只是一種對於被殖民者生物上的局限所做出的科學判斷。

向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卡羅泰爾博士（Dr. A. Carothers）請教有關非洲的結論，可以用來見證此一回顧。這位國際專家將他的觀察之重點部分，都集結在在一九五四年出版的書中〔註20〕。

卡羅泰爾博士在中非及東非行醫，可是他的結論卻印證了北非學派的結論，這位國際專家認為，非洲人很少運用前額葉。非洲精神醫學的特殊性，可以歸結於額前頭部的機能低下〔註21〕。

為了使別人明白他的結論，卡羅泰爾博士作了一個十分生動的比較。他提出，正常的非洲人是個「腦葉切除了的歐洲人」。我們知道，盎格魯撒克遜派曾認為，對一大部分大腦施行切除，是某些嚴重精神疾病的根本療法。此方法經證實，會出現嚴重的人格肢解現象，於是從此被放棄。根據卡羅泰爾博士的看法，正常非洲土著和動了腦葉切除手術的歐洲人之間，有著驚人的相

能可以疏導士著的全面攻擊性本能的測驗和投射遊戲，應該就可以終止一九五五至五六年在奧雷斯山脈的革命。

〔註20〕卡羅泰爾，《非洲人的正常及病態心理學病理學》（*Psychologie normale et pathologique de l'Africain*）收錄於《人種精神病学研究》（*Etudes ethno-psychiatriques*），Masson 出版。

〔註21〕同前，第一七六頁。

似之處。

在研究了一些非洲行醫者的不同著作成果之後，卡羅泰爾博士向我們提出一個結論，而這個結論奠定了一個關於非洲人的統一概念。他寫道：「這都是無關歐洲人的資料。它們是在東非、西非、南非的不同地域被收集到的，而且總體上，作者們彼此很少或完全不知道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因此，這些成果根本上的相似性，完全是值得注意的。」（註22）

在結束前，讓我們指出，卡羅泰爾醫師把茅茅團的叛亂，定義為欲求不滿的無意識情結的表現，經過一些巨大的心理調適後，可能可以在科學上避免這種情結再度出現。

因此，像這樣一個不尋常的行為：阿爾及利亞人經常性的犯罪，不值得一談的犯罪動機，總是帶有高度血腥味以及致命特質的吵罵打架，對觀察家們構成問題，被當成了教材的解釋，似乎可歸結為下：北非人的大腦結構，可同時闡述土著的懶惰、智力上及社會性的無能，以及接近動物般的衝動。北非人的犯罪衝動，是在行為的層次上，表現出神經系統的某種交錯配列。這是一種在神經學上可被理解的反應，這反應是屬於事物的本性，即那些被以生物的方式組織起來的事物。額葉在大腦活動中的未統整，說明了懶惰、犯罪、盜竊、強姦、說謊。而結論，是一位郡長——現在的省長給我的。他說：「必須用嚴格和無情的架構，去對付這些盲目聽從自己本性法則的自然人。必須馴服本性，而不是去說服。」使之守紀律、矯正、制伏，以及現今會談到的綏靖，這些是殖民者在占領地上使用最頻繁的詞彙。

意識覺醒之必須且持續

假如我們不厭其煩重述殖民主義者的科學家們提出的學說，倒不是爲了指出他們的貧弱和愚蠢，而是爲了開始討論一個在理論和實踐上十分重要的課題。其實，在環繞著「革命」而來的問題中，在政治解釋和釐清真相的層次上，很多經過辯論的主題當中，阿爾及利亞人的犯罪天性不過是一小部分而已。但剛好是圍繞著這個主題的會談達到一定程度的豐富性，才使我們能深入並且更明確勾勒出個人解放和社會解放的概念及範圍。在革命實踐當中，當我們在幹部和戰士面前討論阿爾及利亞人的犯罪性問題時，當我們陳述革命以前的罪行、不法行爲、竊盜等多種犯罪手法，當我們解釋一個罪行的面貌，不法行爲的頻繁時，是用一種關係的作用來理解，一種男女之間、個人與國家之間所存在的關係來解釋，而且每個人對此都能有所理解；如果我們參與了阿爾及利亞人或北非人出於天職而犯罪這個觀念的崩毀，這個釘入阿爾及利亞人意識中的觀念，「我們易怒、愛打架、壞人……諸如此類」，那麼，這就對了，我們可以說，革命進步了。

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必須隨時隨地闡明、揭穿騙局、驅趕那對自身的污辱。不應該等待國家產生新人，不應該期待在不斷的革命變革中，人會不知不覺轉變。這兩個過程是重要沒錯，但必

〔註22〕同前，第一七八頁。

須助意識的覺醒一臂之力。革命實踐，如果想要它是全面具解放性的，並且獨具生產力的話，則必須要求，不能有任何不尋常的東西繼續存在。我們有著一股獨特的力量，強烈感覺到有必要將事件總體化，有必要把一切攬在身上，必須解決一切，負責一切。於是，意識並不厭惡走回頭路，必要的話放慢腳步。所以，一個戰鬥的部隊在戰場前進時，埋伏終了並不意味著休息，而是一個讓意識的覺醒能走上一程的時刻，因為一切必須同時並進。

對，阿爾及利亞人自然而然後會認為法官和警察有理（註23）。因此，必須重新討論在自戀的層次上，被體驗為真正的男子氣概表現的阿爾及利亞人的犯罪天性，並放在殖民史的層次上來談。例如，指出阿爾及利亞人在法國的犯罪，根本上不同於直接在殖民剝削下的犯罪行為。

第二件事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在阿爾及利亞，阿爾及利亞人的犯罪，實際上是在封閉的圈內進行。阿爾及利亞人互相偷竊、互相毆打、互相殺人。在阿爾及利亞，阿爾及利亞人很少攻擊法國人，避免同法國人吵架。相反的，在法國，移民在不同的社會、群體間犯罪。

在法國，阿爾及利亞人的犯罪減少。犯罪完全針對法國人，動機也徹徹底底是新的。以下這個弔詭現象大大有助於戰士們認清真相：我們注意到，從一九五四年以來，涉及普通法的犯罪事件幾乎消失了。不再有爭吵、不再因為一些雞毛蒜皮小事而導致死亡事件，不再因為妻子額頭或左肩被旁人看見而怒火中燒。國族鬥爭似乎疏導了所有的怒火，把所有的感情或激情的活動都國族化了。法國法官或律師已發現了這一點，但戰士必須意識到這一點，必須引導他知道這件事的

道理。

其餘的解釋。

是否應該說，戰爭，作為社會化了的攻擊性的最佳表現場所，把天生殺人的舉動導向占領者那邊呢？社會大動盪降低了犯罪及心理失調的頻率，這是一種平庸的看法。因此，人們可能完全用戰爭的存在，來解釋阿爾及利亞人犯罪行為的消滅，戰爭把阿爾及利亞一分爲二，同時把司法及行政機關視爲敵方。

然而，在已解放的馬格里布國家（Magrab，指北非的阿拉伯國家）中，那些同樣在解放鬥爭時期會出現的現象，仍隨著獨立而繼續維持著或逐漸明朗化。因此，殖民地此一背景似乎是相當獨特的，足以讓我們重新詮釋犯罪性。這就是我們要戰士注意的。今天，在我們國家裡，大家都知道犯罪性並非阿爾及利亞人的先天性格，也不是神經系統組織的結果。阿爾及利亞戰爭，國族解放戰爭，使得真正的主角出現。在殖民情境下，前面已指出，當地人只跟自己人相處，他們傾向當彼此的屏幕，每個人對彼此掩蓋了國族的仇人。被殖民者經過一天十六個小時的勞累後，倒在自己的蓆子上時，一個小孩的哭聲穿過布簾牆壁，妨害了他的睡眠，彷彿是巧合，這是個阿爾

〔註23〕況且，十分清楚的，這種對於由歐洲人製造出來的形象的認同，是十分矛盾的。的確，歐洲人似乎——同樣情緒矛盾的——向粗暴、激動、野蠻、忌妒、自豪、驕傲的阿爾及利亞人，爲一件芝麻小事，爲一句話而拿生命作賭注等等的阿爾及利亞人，致上敬意。順便指出，與在法國的法國人相對照之下，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愈來愈傾向認同於對立於法國人的阿爾及利亞人的形象。

及利亞小孩。當他去向雜貨店央求一點粗麵粉或油——他已積欠這個雜貨商幾百法郎了——而遭到拒絕時，一股巨大的仇恨和強烈的殺人欲望占據了他，而且雜貨商是個阿爾及利亞人。當他躲過當地司法行政官幾個星期後，有一天，他被這長官攔住，逼他繳「稅」，他甚至來不及去恨歐洲人的行政官員；當地的長官，一個阿爾及利亞人，在他面前引起仇恨。

暴露在日常的殺人企圖中：飢餓、未付房租而被掃地出門、母親沒奶水、骨瘦如柴、工地關門、失業者像烏鴉般在經理人的身邊遊蕩，土著終究會達到把自己的同類看作是無情的敵人這樣的地步。如果他光著腳，被路中間的一塊大石頭擦破了皮，那是一個土著把石頭放在那裡的，他準備採下的幾顆橄欖被X的孩子們在夜裡偷吃了。對，殖民時代的阿爾及利亞以及其他的地方也是，人們為了一公斤的粗麵粉可以幹許多事，可以殺很多人，必須要有想像力才可以理解這些事情；或者，很有記憶。在集中營裡，人們為了一小塊麵包互相殺害。我想起了一個可怕的場面：一九四四年，在瓦赫蘭（Oran）。我們在一個兵營前等車，看見士兵們把幾塊麵包扔給幾個阿爾及利亞小孩，他們瘋狂、仇恨的爭奪。獸醫們提及在家禽飼養場裡所看到的「啄食的順序」，可以用來說明這種現象。丟給家禽的玉米的確變成你死我活的競爭目標。某些最兇猛的飛禽吞下所有的穀物，而另一些不好鬥的，明顯消瘦；所有的殖民地變成一個巨大的養雞場、巨大的集中營，在那裡，刀子是唯一的法律。

在阿爾及利亞，打從國族解放戰爭以來，一切都改變了。一個家庭或一個家族的全部存糧，

可以在一個晚上供應給路過的一隊士兵。家裡唯一的一頭毛驢，可以出借來運送一名傷兵。而在幾天後，當物主知道他的牲口被飛機掃射而亡後，他並不會詛咒或威脅借驢子的人；他並不對牲口的死感到不解，反而不安的詢問傷兵是否安然無恙。

在殖民體制下，人們爲了一公斤的麵包或一隻可憐的綿羊……什麼都可以做。在殖民時代，人和物質的關係、人和世界的關係、人和歷史的關係，就是人和食物的關係。對於一個被殖民者，像阿爾及利亞那樣受壓迫的情況下，活著絲毫不是體現價值，不是投入一個協調一致和具生產性的發展中：活下來就是不死，存在就是維持生命。每一個椰棗就是一個勝利，這勝利不是流血流汗的結果，但卻像是一種感到生命戰勝了的那種勝利。因此，偷椰棗、放任自己的綿羊吃鄰家的青草，並不是否定別人的所有權、違反或不遵守法律，這是殺人的企圖。要理解偷竊是殺人的企圖，而不是不友善或不法的行爲，必須到阿爾及利亞的卡比利亞山區去看看，幾個星期以來人們到深谷裡去找土，並用小籃子把土背上去的光景。因爲，唯一的觀點來自這個愈來愈縮小的胃袋，胃袋的要求當然也愈來愈少，但不論如何，總要滿足這個胃袋。怪誰呢？法國人與警察、軍隊、戰車一起在平原上。山上只有一些阿爾及利亞人，上面是上天和它往生後的諾言，下面則是法國人，允諾的可是非常具體之物：監獄、警棍和死刑。人們註定只能靠自己。在這裡，我們發現了對自身恨意的核心，這個核心導致隔離社會裡種族衝突的特徵。

阿爾及利亞人的犯罪性、他的衝動、他的殺人暴力行爲，不是神經系統組織的結果，不是性

格的特異性，而是殖民情境的直接產物。阿爾及利亞戰士們討論過這個問題，不怕質疑殖民主義者灌輸給他們的信念；他們知道，每個人只是其他人投射的螢幕，而事實上，每個人在撲向他人的同時，也是一種自殺，這些在革命的覺悟中應該有著根本的重要性。再說一遍，戰鬥的被殖民者，其目標是要結束統治；但他也應該注意，去清除壓迫政權強加在他身上的所有非真理。在一個殖民體制裡，如現存於阿爾及利亞的殖民體制，殖民主義公開主張的思想，不只影響少數的歐洲人，更影響阿爾及利亞人。完全解放，是有關人格全方位的解放。埋伏或突襲、刑求或同胞的大屠殺，加強人們戰勝的決心，更新了無意識，並滋養了想像力。當全國族動起來的時候，新人類不是這個國族後天的產物，而是與這個國族共存，與這個國族共同發展、共同勝利。這個辯證的要求，解釋了為何我們對量身改造過的殖民化和表面的改革持保留態度。獨立並不是一個應被驅逐的語詞，而是令真正獲得解放的男女存在之不可或缺條件，所謂真正獲得解放的男女，也就是所有可能使社會徹底轉化之物質工具的支配者。

編按：本章節由彭仁郁（現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校閱協助。

〔譯註〕des instances psychiques，指精神分析觀點中，人格結構所包含的本我、超我、自我三部分。

結論

來吧，同胞們，最好現在就決定改絃易張。我們曾經沉陷在其中的廣袤黑夜，現在必須撼動它、擺脫它。而在業已升起的嶄新曙光中，我們必須展現出堅強、謹慎、果決的自己。

必須離開夢境，拋棄之前那些陳舊信仰和友誼。我們不要把時間浪費在那些無效、冗長的敘述或令人厭惡的模仿上面。讓我們離棄這個歐洲吧，它一面叨叨不休的暢談人道，一面又到處屠殺它所遇到的人類，在它自己街道的每個角落，也在世界的個角落。幾個世紀以來，他們阻礙了其他人的進步，以自己的光榮和目的而奴役別人；幾個世紀以來，歐洲假借「心靈探險」之名，窒息了大半的人類，看看今日的歐洲，擺盪在原子的分化解離與精神的解離之間。

然而，在實踐的層次上，我們可以說，歐洲獲得完全的成功。

歐洲熱切的、忝不知恥的、粗暴的領導世界，看看它的遺跡陰影廣延繁增。歐洲的每個運動，使得空間和思想的界限破裂。歐洲不接受一切謙遜、一切樸實，但也不接受一切關心和體貼。她對人，只表現出精打細算、氣量狹小，只是殺人和吃人。

因此，兄弟們，怎麼可能不明白，比起跟隨著這個歐洲，我們有更好的事要做。

這個歐洲，不斷的談論人，從未停止宣稱她只關心人。今天我們知道，爲了她精神的每一個

勝利，人類是如何付出痛苦的代價啊！

同志們！歐洲的把戲最終玩完了，應該另找出路。今天我們什麼都可以幹，只要不一味模仿歐洲，只要不癡迷於趕上歐洲。

歐洲達到這樣的速度、瘋狂和無秩序，以致今天她避開一切領導者、一切理性，並可怕的、昏頭昏腦的陷入深淵，最好趕快遠離這深淵。

然而，我們的確需要一個榜樣、一個藍圖和一些實例。我們當中有許多人認為歐洲的榜樣是最完美的。然而，我們在前面的章節中，卻看到這種模仿把我們帶到何種沮喪和失望的地步。歐洲的成就、歐洲的技術、歐洲的風格應該停止引誘我們，並使我們失去平衡。

當我在科技、歐洲的作風裡尋找人的時候，我看到的是一連串對人的否定和大量的殺戮。人的狀況、人的計畫、人與人之間爲了提升人類整體，在工作上的合作，這些都是新的問題，要求真正的創新。

讓我們決定不再模仿歐洲，並把我們的肌肉和腦子集中在新的方向，讓我們努力創造歐洲沒有能力助他勝出的全人吧。

兩個世紀前，一個舊的歐洲殖民地，即美國，決定趕上歐洲。它是那麼成功，卻變成一隻集歐洲的缺陷、毛病和不入道於一身的怪獸，而且，這些弊病到達了極端。

同志們，難道除了創造一個「第三歐洲」之外，我們就沒有別的事可幹了嗎？西方想要讓自

身成爲一場精神的冒險。歐洲以她的精神爲名義，以擴展歐洲精神的名義，來爲自己的罪行辯護，正當化自己對五分之四的人類所持續進行的奴役。

是啊！歐洲精神有些奇怪的依據，整個歐洲思想愈來愈荒蕪，愈來愈向陡峭的地方延伸。人們就這樣習慣在那裡愈來愈少見到人。

恆常與自我對話、愈來愈猥褻的自戀，這些都不斷替一種幾乎是妄想的溫床鋪路。腦力活動變得痛苦不堪，現實絲毫不是活著的、正在工作中的、親手打造一切的人的現實，而是一些詞彙、一些詞意的不同組合，以及詞意中所產生的緊張之現實。然而，卻有一些歐洲人曾經鼓勵歐洲勞動者打破這種自戀，並同這種不現實決裂。

一般的歐洲勞動者並沒有響應這些號召，因爲歐洲勞動者也自認爲和歐洲精神那種奇妙的冒險有關聯。

所有得以解決人類重大問題的元素，在不同時期的歐洲思想中曾存在過。但是，歐洲人的行動並未完成屬於他們的使命，這使命在於暴力加重這些元素所背負的重量，在於改變它們的安排和存在，在於改變它們，最後，在於把人的問題提升到一個無可比擬的最高水準。

今天，我們目睹了歐洲的停滯。同志們，我們要避開這僵化的運動，在這運動中，辯證法漸漸變成平衡的邏輯。我們重新再說說人的問題吧！再說說大腦的現實問題，全人類所有大腦的問題吧！應該增加連結，使其網絡多樣化，使訊息更人性化。

同胞們，我們有太多的事情要幹，可以讓我們盡情玩後衛遊戲。歐洲已經做了它該做的，而且終歸是盡力了；讓我們停止對它的指控吧！但要堅定對她說，她不該再那麼大聲嚷嚷了。我們不要再怕她了，停止羨慕她吧！

今天，第三世界像一群巨人般面對歐洲，他們的目標應該是試圖解決歐洲未能找到答案的問題。

讓我們搞清楚，重要的是，不要再去談論效果，談強化，談節奏。不對，問題不在於回歸自然。問題非常具體的涉及到，不把人民帶往一個毀損他們的方向，不把一些使大腦很快閉塞和出毛病的節奏加上去；不該以追趕為藉口，使人陷入混亂，使他脫離自己、脫離自己的內心深處，使他筋疲力竭並致他於死地。

不，我們不想趕上任何人。但我們要隨時隨地、日以繼夜，在人的陪同下，在所有人的陪同下前進。問題在於別把隊伍拉太長，因為每一行幾乎看不到前面的一行，而且互相不再認得彼此的人愈來愈少相遇，愈來愈少交談。

對第三世界而言，問題是在重新開始人的歷史，這歷史既考慮到那些有時被歐洲肯定的、罕見的好議題；但也同時考慮到歐洲的罪行，其中最可怕的是在人的內部，造成功能的病變分裂的、粉碎統一的東西。排除在一個共同體內形成裂痕、形成階層、由一些階級所維持的血腥緊張，最終在全人類的大範圍內造成根深柢固的仇恨、奴役、剝削，尤其把十五億人排斥在外的那

種蒼白無力的種族滅絕。

同志們，在建立國家、制度、社會時，讓我們別再向歐洲納貢。

人類期待我們的，絕不是這個總體上猥褻和誇張的模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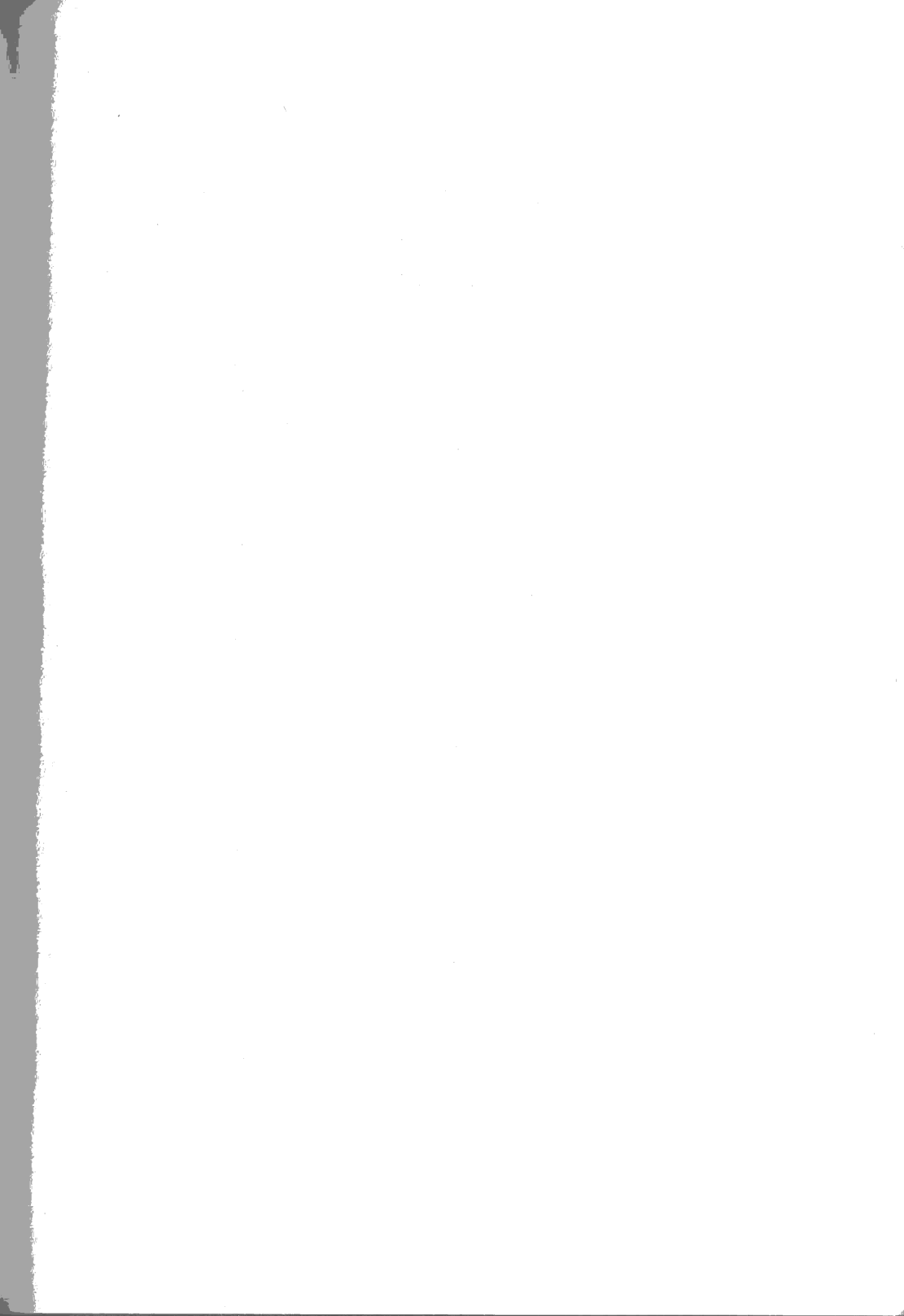
如果我們想把歐洲改造成一個新的歐洲，想把美洲改造成歐洲，那我們就把我們國家的命運交給歐洲人。他們會比我們做得更好。

但是，如果我們要人類進一步，如果我們要使人類達到跟歐洲所顯示的不同水平，那就必須創新、必須發現。

如果我們想要回應我們人民的期待，就必須在歐洲以外的地方找。

進一步，如果我們想要回應歐洲人的期待，則不該扔回給他們一個關於他們的社會和思想的形象，甚至是扔回給他們一個理想的形象，對此他們感到極度厭倦。

爲了歐洲、爲了我們自己，也爲了全人類，同胞們，我們必須改頭換面，發展新的思想，嘗試著創造出一個全新的人。



【後記】

世界新革命的推動者（二〇〇二年）

穆罕默德·哈爾比（Mohammed Harbi）

我們一直認為資本主義這塊領域並非無法超越的，然而這是否在自欺欺人？官僚的社會主義已經過氣，第三世界主義也一樣。先是發生各式各樣的慘劇，人類的生命也史無前例的向下贬值，接著便浮現這樣的潰敗；六〇年代，當主動權移轉到那些被壓迫的人民身上，西方世界那些因享受特權而惶惶不安的人，也適用於這種潰敗。

面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索求，這些工業大國不得不讓出一些地盤。自此之後，近來的那些演變使這些國家確信，為了走出黑暗，走上進步及民主的道路，他們已別無選擇。然而這些工業大國其實更依賴經濟及意識形態上的壓迫，也依賴他們所控制的那些國際金融組織：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

總而言之，第三世界所面臨的嚴重危機，極需對後殖民時期提出一個批判性的分析，也需要與解放運動同時產生的（或有助於解放運動的）某些意識形態。從這個觀點來看，重新審視弗朗

茲·法農的作品（特別是《大地上的受苦者》一書）便顯得格外重要，尤其是，許多關於革命動力的思想，都是來自對阿爾及利亞經驗的看法，更益發突顯出這個重要性。在法農這本遺作當中，阿爾及利亞經驗是他思考的泉源之一，卻經常遭受扭曲。

「法農主義」之所以頗具權威的理由之一，是因為它回應了第三世界「反對菁英主義的菁英們」的憧憬，列出一個社會發展規律的公式，有別於當時史達林派推廣的那種褪色的馬克斯主義。法農以自身的行動及他對所有內、外部敵人的理解，來捍衛第三世界。我是一九五九年在突尼西亞認識他的，當時我們兩人一同在那裡為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GPPRA）做事。對於革命方面的事情，我們都做了社會性的詮釋，同時也都不認同知識份子作為先驅角色的那種不切實際的合理化。我們意見紛歧之處在於：他認為農民應該扮演主動的一方；他相信國族意識是有可能意見一致的；他認同宗教上的奇異現象。關於最後這一點，法農所面臨的那種情境（他和主張不可知論（一種唯心的認識論。認為除了感覺之外的世界是無法認識的）的活動份子有所往來），使他意識不到在阿爾及利亞的文化空間裡，菁英份子的思想只占了微不足道的地位。這種思想其實只是九牛一毛，起源於那些容易受到宗教影響的人對阿爾及利亞國族解放陣線的投入。

然而這一切並無損《大地上的受苦者》一書的重要性。無論是提出問題的那些部分，或者很有遠見的某些章節，本書都能使我們針對革命理想的演變及它眼前的衰退，進行深入的探討。

「舊日陳腐，行將摧毀。」法農把「國際歌」（L'Internationale）的這個理念納入自己的思想。然

而旁人卻無法理解他將馬克斯理論逼入絕境的那種提問方式。

關於革命的那種目的性的、普遍性的提問，乃因馬克斯而生。對於那個年代徹底歐化的資本主義社會，他的分析只考慮到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交替，並以資產階級作為主要角色，無產階級次之。社會中的其他階級，都服從於這兩種角色互相衝突所產生的動力。無產階級被視為歷史的主題：它帶來普遍性的概念，並且，在掙脫枷鎖的同時，它也是解放全體人類的力量。在這樣的分析之下，歷史動力的中心並沒有包含被殖民者（事實上，當法國共產黨將那些殖民地收納於「法國聯盟」〔Union française〕之下時，便是使用這樣的邏輯：替被殖民者——法國無產階級的附屬同盟——開闢解放之路的，應該是法國反資本主義的革命）。

在俄國，民粹主義份子為俄式的區別原則提出辯護，也對馬克斯的論點提出異議：他們認為在自己的國家裡，革命應屬於農民，而非無產階級，而且應該避開資產階級發展資本主義的那個階段，直接通往社會主義。有鑑於這個反對意見，馬克斯（在一次與俄國馬克斯主義份子普列漢諾夫〔Plekhanov〕及維拉·札索烏利奇〔Vera Zassoulich〕的通信中）修改了他的思考藍圖，並承認假若俄國的革命與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背道而馳，那麼俄國社會（在當時是個很農村化的傳統社會）就能避開資本主義的階段而完成革命。馬克斯過世之後，他的夥伴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又重拾俄國例外的概念：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才是革命的階級。

由於列寧的關係，革命模式的表達出現一種轉折：他以世界性的規模來推廣階級鬥爭的原

則，繼續在馬克斯開闢的道路上把革命納入世界性的計畫中，不過卻認為革命可能會出現在帝國主義比較薄弱的那個環節，亦即出現在那些並非很工業化和都市化（因而大部分成員都是農民）的社會中。扮演救世主角色的，依舊是無產階級，然而這些無產階級的利益卻是由一個政黨來承擔，依列寧之見，這是因為無產階級將自己託付給自己，因而理所當然成為工會成員。這並非馬克斯的見解。我們所面對的是另一種革命動力的概念。列寧是實用主義者，而且他的思想一直都密切留意為革命開闢道路的事件，無論是在東方——在這裡，他看著「世界革命的煽動性素材」一路成熟（一九〇八年）——或歐洲。

一九一七年十月發出革命訊號的，是一個本質屬於農村的國家，然而這道火花並未引燃期待中的那種大火。而且這個社會主義的影響範圍，也只局限在單一的國家。

在共產國際中，有一些沒定型的「第三世界主義者」，比如韃靼共和國黨領導人蘇丹·加里耶夫（Sultan Galiev, 1880—1939）、印尼共產黨領導人馬拉卡（Tan Malaka, 1894—1949，又譯陳馬六甲），都在期待這個運動能使被殖民者成為改變的動力，而不像羅汀生（Maxime Rodinson）講的那樣，僅僅是個全球戰略的目標。他們的努力始終是徒勞，然而，經過許多波折之後，在共產主義的運動中，由於毛澤東及弗朗茲·法農的關係，這個概念已經有所進展。他們兩人都強調農民革命：但已經不是由西方國家的無產階級來引導被壓迫的人民進行奮戰，而是由這些人民的奮戰來決定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這個觀點獲得不少門徒的信服，其中也包括歐洲人。

然而毛澤東和法農有所不同。他並沒有使自己的戰略「農村化」：無產階級依舊是先驅份子，共產黨則從中介入。不過，法農進行了改革。他並不自限於對帝國主義的經濟進行純粹的分析。他同時也針對身分與文化的衝突提出理論，並試圖指出真正受苦的人、始終被剝削的人，其實是那些被殖民者。西方世界勝出之處，並不局限於這種有如國族主義者才有的獨特性：普遍性的希望才是動力所在。

因此，為第三世界的動機進行辯護，並非盲目進行：法農已經意識到革命的計畫和那些被統治國家的物質基礎之間，其實有所差異。而且他也沒有忽略以發展與民主來作為擔保的社會學影響。他的非洲經驗，尤其是突尼西亞與迦納的經驗，使他特別關注在國家建設之中可能會危及政治菁英份子的失控現象：獨裁主義、拒絕多元化、貪污腐敗，以及政權的個人化。法農，這個世界新革命的推動者，內心或許還有一些想法，比如俄國在單一國家施行社會主義的失敗經驗、革命運動變成堡壘捍衛者的轉化，以及一黨獨大的專制現象。

如今，法農的政治現狀並沒有停留在這些論述上。在他之前，非洲沒有人懂得分析菁英份子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之中培養出來，不懂得分析他們與殖民者之間的關係有著什麼樣的演變，也不知道要藉由他們作為天生領導者的概念與他們對不成熟群眾發表的那些談話，來突顯受過教育的「極端菁英主義」。這是民主的障礙之一，而且擋在眼前的並不是那種可以視而不見的小障礙。

於是，假若只強調《大地上的受苦者》一書當中某些充滿爭議與激情的主題、農民的救世主

降臨說、救贖的暴力，以及第三世界在地理政治觀點裡的人為構成，但卻忽略那些警告我們要提防革命浪漫主義的主題，是很不公平的。最基本的要求，其實不在於那種殷切的期盼，而是要對以下兩點嚴加防備：一切有助於劃分領導者與執行者的批判思想，以及一切自詡為行政機構者（後者極需知識與權力，以便控制那些被視為天生無能且有待制服的群眾）。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永久不變的關聯便在於此：剝削者會變，但被剝削者依舊都是那些人。

我們再補充幾句作為結語：法農的靈感也來自他作為一個精神科醫師所理解的實踐方式。精神醫學教育在他看來就如同一台機器，目的在於使「瘋子」回歸正常，並將一些與瘋子所表達的東西沒有關聯的準則，強加在他們身上。法農加入反傳統精神醫學運動的行列，強調要把這句話說出來，同時推翻醫師與病人之間的關係。實話與真實性，乃位於瘋狂這一邊，應當讓病人自由發揮才是。在法農那種主張絕對自由的民粹主義及他的實踐醫學之間，有著很明顯的相似性。

*關於哈爾比：一九三三年出生於阿爾及利亞，歷史學家。十五歲便加入「阿爾及利亞國族解放陣線」(FLN)，獨立戰爭結束後，他成為新總統班貝拉的幕僚之一。一九六五年，政治變天，他遭逮捕，雖然後來出獄了，仍受軟禁。一九七三年，他用假護照逃到突尼西亞，輾轉到了法國，從此定居巴黎，在巴黎大學授課政治學，現已退休。他在軟禁期間寫了一本書《FLN的運動進程》(The History of FLN)，一九七五年出版。

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

楊碧川

百年屈辱

阿爾及利亞 (Algeria) 位於非洲西北部，北隔地中海與歐洲遙望，領土有百分之九十被阿特拉斯山脈 (Atlas) 橫貫，到處是不毛荒漠，游牧民族在沙漠綠洲及山谷生活。人民絕大多數是阿拉伯人，其次是原住民的柏柏爾人 (Berbers)。

柏爾人和住在摩洛哥阿特拉斯的民族同源。他們和阿拉伯人合起來佔阿國回教徒的多數，但是這兩地的柏柏爾人在語文、文化上未及三分之一，其他則被阿拉伯人同化。

一八三〇年六月，法軍入侵阿爾及利亞，法國陸軍部長解釋說：「爲了解決我們過剩的人口，推銷我國產品來換取我國氣候和土壤條件生產不出來的東西，必須占領阿爾及利亞。」

阿布蝶兒卡爾 (Abd-el-kader, 1807-1883) 率領奧蘭地區的人民反抗法軍，神出鬼沒的打游

擊，但在二八四七年十二月投降，二八四八至五三年被法國人囚禁，後來死於敘利亞的大馬士革。原住民的文盲，即不懂法文的男性占百分之九十四，女性占百分之九十八。法國歷史教科書的第一句：「我們的祖先是高盧人。」這對回教徒原住民從小造成無可抹滅的心理創傷，他們被迫認賊作父，以外來殖民政權的歷史、文化、世界觀爲自己認知的基礎。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十六名萬阿爾及利亞人去打仗，十一萬人在戰場當奴工，不料卻使人接觸了法國勞工，有了組織生活的體驗。留學回來的阿爾及利亞原住民知識份子，更和摩洛哥、突尼西亞、中東的學生產生共同的反帝國主義鬥志。阿布蝶兒卡戴爾的孫子埃米爾·哈萊德當過法軍上尉，一九一九年起到處演講，號召人民起義爭取平等地位，一九二三年被迫流亡埃及。一九二四年他在巴黎演講時，阿爾及利亞僑民高呼「阿爾及利亞獨立！」歡迎他。

梅沙立·哈基 (Ahmed Messali Hadj, 1898-1974) 也在戰時當過兵，戰後進入巴黎大學就讀，他一度參加法國共產黨，不滿法共漠視阿爾及利亞問題而退黨。一九二四年他在巴黎成立「北非之星協會」(Étoile Nord-Africaine)，到處宣揚阿爾及利亞獨立理念。一九三二年哈基主張爭取出版、結社、集會自由，由普選產生的阿爾及利亞議會；所有公職由阿拉伯人擔任；推行阿拉伯文化教育；法軍撤離，改募阿爾及利亞人當兵；沒收殖民者的土地歸還原住民等等。總之，是典型的爭取在外來政權下高度自治的理念。

另一批受法蘭西教化的「進化人」、「開化派」，由貴族出身的藥劑師飛哈特·阿巴斯 (Ferhat

Abbas, 1899-1985) 領導，他宣稱不為阿爾及利亞祖國而死，「因為根本就不存在這個祖國。」一九三八年他成立「阿爾及利亞人民同盟」，爭取自治。

一九四〇年六月，法國維奇政府（德國占領下的偽政府）開始迫害阿爾及利亞民族民主運動，強制阿人提供德軍（隆美爾將軍）糧食及物資。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英美聯軍登陸北非，點燃阿爾及利亞人的獨立希望。一九四三年二月，阿巴斯等二十八名議員連署一份〈阿爾及利亞人民宣言〉，譴責法國當局對七百萬原住民的壓榨及罪惡，要求取消一個民族剝奪另一個民族的殖民統治，給阿爾及利亞人一部憲法，成立一個阿、法聯合的阿爾及利亞國家。

一九四四年三月，阿爾及利亞各黨派聯合成立「宣言與自由之友聯合會」，爭取「法蘭西聯合」下成立自治共和國，梅沙立·哈基又遭殖民當局流放海外。

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歐戰結束，阿爾及利亞人高舉綠白兩色旗及「結束殖民統治」、「獨立」標語示威，在塞提夫和格勒馬兩地的示威群眾被殖民地警察亂槍打死。阿人憤而殺死塞提夫和呂卡兩個市的市長，攻擊歐洲人的農場、警察局和兵營，破壞鐵路和交通線，殺死一百零二名歐洲人。

一九四六年三月，阿巴斯成立「擁護阿爾及利亞宣言民主聯盟」（Union Démocratique du Manifeste Algérien, UDMA），主張「既不要同化，也不是迎接新主人，也不要分離；而是同自由的大國聯合，接受民主的、社會的教育……接受偉大的法蘭西民主主義的薰陶。」梅沙立·哈基的

「民主自由勝利運動」(Mouvement pour le Triomphe des Libertés Démocratiques, MTLD) 在十一月的法國選舉中獲得五席，殖民當局再次宣佈當選無效。

傲慢的法國人把海外殖民地當作本土延伸的一個「海外省」，由內政部長向總統推薦的總督統治。

獨立革命

生於奧蘭的班·貝拉 (Mahamed Ahmed Ben Bella, 1918-) 打過二次大戰，一九四五年當選馬爾尼亞的村莊議員。一九五四年十月，阿爾及利亞人在瑞士成立「阿爾及利亞國族解放陣線」(FLN)，決定趁法國在越南潰敗的良機——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萬聖節起義。

一九五五年一月，精通南美洲馬雅文明的人類學家蘇斯戴爾 (T. Saustelle) 總督上任，當過戴高樂的情報首長，他強調法國不願離開阿爾及利亞，就像他不願離開普羅旺斯或布列塔尼亞那樣；阿爾及利亞的命運就是法國的命運。他成立特別行政部門，四千名部門官員必須精通阿拉伯語文及阿爾及利亞問題。他當然不忘另外成立一支心戰部隊，被穆斯林稱作「藍帽子」(bleu)。很快的，總督釋放了政治犯。

FLN 從一九五五年起繼續在各地打游擊，宣佈禁止穆斯林抽煙，第一次違抗者割嘴巴或鼻子，第二次再犯就割斷喉嚨。當局強迫原住民拿出五百萬法朗抵債一輛被 FLN 毀損的卡車，以

十四條人命換一個法國小孩的命，拿二十萬法朗賠一根受損毀的電線杆。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日，FLN殺死阿巴斯的姪子——康士坦丁市議員阿爾巴，以報復阿巴斯對他們的譴責。狂熱的阿人更向歐洲人的咖啡館丟炸彈，把人從車子裡揪出來用刀子刺死。

生於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存在主義文學大師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在八二〇事件後，寫了一封〈致阿爾及利亞戰士書〉，宣稱他本人已陷入極度絕望，呼籲法、阿人雙方各自抑制，別把明天的阿爾及利亞變成廢墟與死人的國度。他強調阿爾及利亞是阿人和法國人的共同土地，法國人在這裡已超過一百萬人，而且已經生活一百多年了，大家要共同抑止暴力和屠殺，讓阿拉伯人和法國人在自由和正義的旗幟下重新和解。十二月，卡繆又奔走「民間停火」運動，呼籲雙方都不得對非戰鬥的人進行攻擊。

卡繆荒謬的主張阿爾及利亞留在法國裡作爲一個聯邦，總比成爲回教帝國的一部份而更加貧困划得來。他的老戰友沙特認爲，FLN提出「即使在法國的槍劍下我們活得幸福，也要戰鬥到底」是完全正確的。沙特痛斥法國人僭稱阿爾及利亞的主權者，玩法弄權，更譴責卡繆變節，阿拉伯人也痛批卡繆完全不知道他們深受法國殖民統治的痛苦。一九五六年一月卡繆去阿爾及爾，被當地充滿敵意的歐洲人大聲怒吼「吊死卡繆！」落荒而逃。

沙特在〈殖民主義是一種制度〉（引自《情境》（*Situations*），一九六四年）中指出：一百萬名殖民者和他們的子孫，被殖民主義形塑成依照殖民體系思考、說話及行動。他們的生命核心

是種族主義，製造出「一個智障的阿爾及利亞人」，再用「智障」來證明剝奪阿爾及利亞人的基本人權是合理的。殖民者沒有好壞之分，「殖民者就是殖民者」。他指出，阿爾及利亞人在殖民壓迫下已經汲取了一個深刻的教訓——殖民者給自己培養了敵人，他們告訴猶豫不決的人，除了武力解決外，別無選擇。

當卡繆辯稱殖民主義增進原住民的人格尊嚴，沙特則堅持認為，阿爾及利亞人正在「反對種族隔離和日常生活鬥爭中」塑造他們自己的人格。

老一代的FLN領袖已經凋零，卡比亞人賽伊德（M. Saïd）、阿巴涅（Abane）等繼續在山區打游擊。阿巴涅靠自修而取得大學文憑資格，當過公務員，他在獄中勤讀馬克思、列寧及希特勒的著作，堅信唯有暴力才能斬斷法國的暴力束縛。一九五六年，FLN從六千增加到兩萬游擊隊，殖民軍也從十八萬擴增為四十萬人。

一九五六年四月，法國社會黨的工會領袖拉寇斯特（Robert Locastle）出任阿爾及利亞部長，並下令解散阿爾及利亞議會，FLN則下令作戰。六月，兩名FLN戰士被當局處決，FLN下令：「每一個犧牲者用一百條法國人命來抵償！」幾天內打死七十二個歐洲人，那些叛徒、告密者的阿拉伯人也不例外；歐洲人也展開恐怖報復，炸死阿拉伯區的七十多人。十月，法國人在空中攔截從開羅飛往突尼西亞的摩洛哥飛機，強迫停降在阿爾及爾，一舉逮捕班·貝拉等人，誤以

爲FLN完蛋了。

從蘇伊士運河戰役失意的第十空降師長馬肅(Massu)，率領四千名傘兵協助一千五百名警察維持秩序，拉寇斯特爲法蘭西第四共和簽了死亡執行書。馬肅把阿爾及利亞劃爲四個戰區，下令傘兵接管阿爾及爾市。一九五七年二月，軍方根據黑名單，逮捕一千五百人，嚴刑逼供，打死了埋在後院。三月，拉寇斯特成立「都市保護機構」，強迫所有阿拉伯居民向當局登記戶口，由當局指派的組長監視，隨時向軍警報告。

一九五八年初，FLN發展至七十三萬人，而法國也在阿爾及利亞投入五十多萬大軍，耗盡二十多億法郎。在這一年四月，走馬燈似的換過二十屆內閣，法國政局盪漾，戴高樂派、軍隊（尤其是在阿爾及利亞的）和殖民者的三支力量，構成反對共和國的力量。

一九五八年六月，戴高樂上台，三天後去阿爾及爾。他雙管齊下，一面宣佈「康士坦丁計劃」，許諾發展阿爾及利亞的經濟，解決一百萬阿人的住宅問題，把二十五公頃土地分配給貧農。一九五九年一月他釋放七千名政治犯，取消一切死刑，同時又下令推行「勇者計劃」，重點圍剿FLN，分段綏靖，增兵至八十萬。

FLN也在一九五八年九月成立「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開羅），阿巴斯出任總理。九月二十六日，他強調：「將永遠完全忠於烈士們所付出最大犧牲的理想、正義與社會解放。獲得解放後，決定權將歸於人民，反對純粹法國制度的公民投票。」並且重申：「願意通過

談判，和平解決阿爾及利亞問題，準備任何時刻會見法國政府代表。」

一九五九年，FLN已發展出十五萬正規軍，有效控制全國三分之二的土地。九月十六日，戴高樂廣播宣佈，在實際恢復和平以後最多不超過四年內，由阿爾及利亞人民舉行公投，就「分離」、「全面合併」，「內政自治」三者擇其一。至少，法國元首第一次承認阿爾及利亞不是法國的一部份了。九月二十六日，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在突尼西亞開會後，拒絕戴高樂的建議方案，他們重申已經犧牲一百萬名阿爾及利亞人，將為國族解放鬥爭到底；但又表示願意在法軍全部撤出為條件，同意和法國政府就停火和實現自決等問題進行談判。

一九六〇年初，馬肅對記者點名批評戴高樂，立刻被召回巴黎。殖民者憤憤不平，一月下旬白人開始罷工。二月一日，全境一千兩百萬工人罷工一小時。聲討叛亂，迫叛亂者投降。戴高樂的地位更加鞏固，六月，他又重申阿爾及利亞有自決權，接著法國政府和FLN開始祕密談判。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八日，雙方在埃維昂簽署協議，十九日停火，法國當局釋放邊貝拉等人。四月八日，法國人公民投票，承認阿爾及利亞自決。七月一日，阿爾及利亞人民公投，百分之九十九點七贊成獨立。一九六三年九月，邊貝拉當選首任阿爾及利亞共和國總統、總理兼三軍元帥。

第三世界最震撼的著作

一九五三年，法農通過了精神科醫生的資格考試，前往阿爾及利亞的布里達，前一年他已經

發表了《黑皮膚，白面具》。他在阿爾及利亞面對精神病患的體驗，逐漸形成了《大地上的受苦者》這本書的一些內容，並且在原住民及歐洲人的心目中取得了一定的聲譽。

一九五五年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開始，法農前往治療布里達附近的游擊隊病患。他在一九五六年第一次寫信給拉科斯特總督，聲明他不可能想使一些人「在一個把沒有權利、不平等和殺人當作合法原則的國家裡」安分守己，而原住民在自己的家鄉經常精神錯亂，生活在一種絕對失去人性的狀態下，他卻繼續當他的精神科醫生。他被逐出阿爾及利亞。在法國逗留三個月後，他去突尼西亞接觸FLN海外組織，繼續行醫，並為FLN的《鬥士報》(El Moudjahid)寫稿。一九五九年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任命他為黑色非洲的巡迴大使。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他發現自己罹患白血病，用僅存的一年生命寫下這本《大地上的受苦者》。

阿爾及利亞的獨立史，幾乎抹煞了法農的存在，因為他並非真正投入阿國境內的解放戰鬥，而且他太鷄婆了，像烏鴉聒噪的預言了阿爾及利亞，甚至第三世界（或許也包括了我們台灣）的解放運動歷程，尤其是人民與領袖間的矛盾對立真實面，不幸卻言中了。

這不是一本教人如何搞暴力的制式教科書，當然沒有如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游擊戰》那樣被第三世界奉為經典。他只是在醫療的體驗中自我反省，批判歐洲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壓迫對第三世界勞苦大眾所造成的，不只是權利的剝奪、經濟的掠奪，更加深化的是精神的殘害和心理的創傷。

他的著作沒有馬克思的嚴謹辯證邏輯，沒有列寧的有力論證，有些花俏——這正是他拚命反對的模仿西歐文明、筆調及思想，自己卻不自覺的陷入這個矛盾；甚至反覆囉唆，經常跳躍甚至偏離主題，但仍不失為第三世界最具震撼力的著作。

法農對歷史過程的描述太過薄弱，用字遣詞相當情緒化，沒有馬克思、列寧那種一槍斃命的快感。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刻意忽略了牠，社會主義陣營也不重視牠，嫌他不夠辣。薩伊德（*Said*）偷用了他的觀點，卻在美國及世界大言不慚地暢談什麼「去殖民化」、「後現代」等等，連我們台灣也有一些大師們依樣畫葫蘆。但是，講到現實與歷史，我們的大師們卻自我閹割了。

喜歡趕思想／精神時髦的台灣「自認為中產階級」的讀者，當然不能錯過這本他們早在二十多歲時就應該看過的書，才能擺脫中、老年以後的良心不安。原本法農老早就揭示被殖民者的各種心態和反應，現在讀它還來得及自我淨化和昇華。

別把這本書當作精神病教科書，只要把它當作一本散文去唸，大家才會心平氣和，逃避自我人格分裂的困境。

*參考 Roland Aronson, *Camus & Sartre* (2004) 第九章；以及 Camus, *Resistance Rebellion & Death* (1988)。

延伸閱讀

- * 《黑色吶喊：法農肖像》（2008），艾莉絲·薛爾齊（Alice Cherki），心靈工坊。
- * 《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2007），張京媛，麥田。
- * 《黑皮膚，白面具》（2005），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心靈工坊。
- * 《權力，政治與文化：薩依德訪談集》（2005），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麥田。
- * 《霍米巴巴》（2005），生安鋒，揚智。
- * 《後殖民理論》（2005），巴特·摩爾—吉爾伯特（Bart Moore-Gilbert），聯經出版。
- * 《文化與抵抗：「巴勒斯坦之音」的絕響》（2004），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立緒。
- * 《知識分子論》（2004），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麥田。
- * 《後殖民文學：從邊緣到中心》（2004），宋國誠，擎松圖書。
- * 《文化與全球化迷思》（2004），約翰·湯姆林遜（John Tomlinson），韋伯文化。
- * 《認識薩伊德》（2003），Valerie Kennedy，麥田。
- * 《後殖民論述：從法農到薩依德》（2003），宋國誠，擎松圖書。

- * 《後殖民及其外》（2003），邱貴芬，麥田。
- * 《拉岡與後女性主義》（2002），伊麗莎白·萊特（Elizabeth Wright），果實。
- * 《遮蔽的伊斯蘭：西方媒體眼下的穆斯林世界》（2002），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立緒。
- * 《發現政治社會：現代性、國家暴力與後殖民民主》（2001），陳光興編，巨流文化。
- * 《人類的主人：歐洲帝國時期對其他文化的態度》（2001），柯能（Victor G. Kiernan），麥田。
- * 《後殖民批評》（2001），巴特·穆爾—吉爾伯特編，北京大學。
- * 《後殖民主義》（2000），陶東風，揚智。
- * 《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後現代》（2000），周英雄、劉紀蕙著，麥田。
- * 《文化與帝國主義》（2000），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立緒。
- * 《鄉關何處：薩依德回憶錄》（2000），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立緒。
- * 《東方主義》（1999），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立緒。
- * 《後殖民主義文化理論》（1999），羅鋼、劉象愚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 《文化與社會》（1998），Jeffery C. Alexander、Steven Seidman 著，立緒。
- * 《性帝國主義》（1998），張小虹，聯合文學。
- * 《殖民與後殖民文學》（1998），博埃默（Elieke Boehmer），香港：牛津出版。

* 《當代文化論述：認同、差異、主體性》（1997），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著，立緒。

* 《全球化與後殖民批評：全球化譯叢》，王寧，中央編譯。



Master 036

大地上的受苦者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作者—弗朗茲·法農 (Frantz Fanon)

譯者—楊碧川

法文校訂—洪萍凰

出版者—心靈工場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王浩威 諮詢顧問召集人—余德慧
總編輯—王桂花 執行編輯—周旻君 校對—陳佳聖
通訊地址—106 台北市信義路四段 53 巷 8 號 2 樓
郵政劃撥—19546215 戶名—心靈工場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2702-9186 傳真—(02) 2702-9286
Email—service@psygarden.com.tw 網址—www.psygarden.com.tw

印刷—彩峰造藝印像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8990-2588 傳真—(02) 2990-1658
通訊地址—242 台北縣五股工業區五工五路二號
初版一刷—2009 年 6 月 ISBN—978-986-7574-66-4 定價—420 元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By FRANTZ FANON
Forewords by JEAN-PAUL SARTRE (1961) and by ALICE CHERKI (2002)
Afterword by MOHAMMED HARBI (2002)
Copyright © Librairie FRANÇOIS MASPERO, Paris, 1961, 1968
© Editions LA DECOUVERTE, Paris, 2002, 2003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PsyGarden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大地上的受苦者——弗朗茲·法農 (Frantz Fanon) 著；楊碧川翻譯
初版--臺北市：心靈工場文化，2009〔民98〕面：公分--
譯自：Les Damnés de la Terre

ISBN: 978-986-7574-66-4 (平裝)

1. 民族主義 2. 殖民 3. 阿爾及利亞—歷史

767.226

95003125

感謝您購買心靈工坊的叢書，爲了加強對您的服務，請您詳填本卡，
直接投入郵筒（免貼郵票）或傳真，我們會珍視您的意見，
並提供您最新的活動訊息，共同以書會友，追求身心靈的創意與成長。

書系編號—MA036

書名—大地上的受苦者

姓名 _____ 是否已加入書香家族？ 是 現在加入

電話 (O) _____ (H) _____ 手機 _____

E-mail _____ 生日 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地址

服務機構 _____ 職稱 _____

您的性別—1.女 2.男 3.其他

婚姻狀況—1.未婚 2.已婚 3.離婚 4.不婚 5.同志 6.喪偶 7.分居

請問您如何得知這本書？

1.書店 2.報章雜誌 3.廣播電視 4.親友推介 5.心靈工坊書訊
6.廣告DM 7.心靈工坊網站 8.其他網路媒體 9.其他

您購買本書的方式？

1.書店 2.劃撥郵購 3.團體訂購 4.網路訂購 5.其他

您對本書的意見？

封面設計 1.須再改進 2.尚可 3.滿意 4.非常滿意
版面編排 1.須再改進 2.尚可 3.滿意 4.非常滿意
內容 1.須再改進 2.尚可 3.滿意 4.非常滿意
文筆／翻譯 1.須再改進 2.尚可 3.滿意 4.非常滿意
價格 1.須再改進 2.尚可 3.滿意 4.非常滿意

您對我們有何建議？

廣 告 回 信
台 北 郵 政 登 記 證
台 北 廣 字 第 1143 號
免 貼 郵 票



10684台北市信義路四段53巷8號2樓

讀者服務組 收

免 貼 郵 票

(對折線)

加入心靈工坊書香家族會員
共享知識的盛宴，成長的喜悅

請寄回這張回函卡（免貼郵票），
您就成為心靈工坊的書香家族會員，您將可以——

◎隨時收到新書出版和活動訊息

◎獲得各項回饋和優惠方案





黑皮膚，白面具

作者—弗朗茲·法農
譯者—陳瑞權 定價—350元

《黑皮膚，白面具》是黑人世界反抗帝國主義的第一道呼聲。它推翻殖民時代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白—黑」、「優—劣」刻板觀點，為宰制關係做了深層的文化與價值觀照，更為「後殖民論述」燃起第一把火炬，至今仍照耀著我們的思考和陰影，在近代思想史上具有無與倫比的重要性。



黑色吶喊

【法農肖像】

作者—艾莉絲·薛爾齊 譯者—彭仁郁 定價—400元

作者薛爾齊是法農生前的好友兼革命夥伴，她鉅細靡遺地將人們鮮少涉獵的北非歷史書寫下來，在歷史的脈絡裡重建法農如何從一個馬丁尼克孩童轉變為北非抗法殖民戰爭的一員，教讀者清晰可見他轉變的足跡。本書可說是全面重新理解弗朗茲·法農和其去殖民論述（包括他的作品和思想）的最佳管道。



道德的重量

【不安年代中的希望與救贖】

作者—凱博文 譯者—劉嘉雯、魯沁 定價—350元

凱博文是世界頂尖的醫學人類學家，對人類的「受苦經驗」有深刻體察，他以富含情感的筆觸，思索人性和存在的意義。書中訴說七個真實故事，主角都是平凡人物，當他們面對人生的巨大衝擊時，都做出自己的選擇，並透過這些行動和價值觀，重新認識自己。



變的美學

【一個顛覆傳統的治療視野】

作者—布萊福德·賈尼 譯者—丘羽先 定價—350元

「改變」是心理治療的終極關切，更是一種美學，是需要傾注心力和智慧的過程。本書以顛覆性的敘述風格，穿插故事、案例討論、評述認識控制論，希望藉此徹底改變我們對人類經驗的既定想法，並引導讀者更貼近心理治療的核心思想，為當代治療實踐建構出一套基於哲學與生態學的理论架構。



家族再生

【困境中的家庭韌力與療癒】

作者—布萊恩·華許
譯者—李淑瑛、江麗美、陳厚愷 定價—600元

每個家庭都可能遭遇大大小小的困頓，但為何有些家庭會被創傷和困境擊垮，而有些卻安然過關？華許博士以長年的研究與豐富的臨床經驗，提出促進家庭韌力的關鍵歷程，幫助讀者了解如何汲取家庭的獨特優勢，讓所有成員受益。



臨終心理與陪伴研究

作者—田口純一
定價—350元

知名的心理學家赤德慧教授多年來一直在花蓮慈濟醫院的心蓮病房擔任志工，陪伴臨終病人，在瀕臨死亡之處，碰觸生命的深刻頓悟。本書為赤德慧與其他研究者融合臨終照顧實務與本土心理學理論所撰作的論文集結。



台灣風宗教的心靈療遇

作者—田口純一
定價—350元

在民間信仰、藝文書壇撫慰了人世間許多悲歡離合的複雜心緒，當有極端災難或精神崩潰時，便祈求者引入一個非現實的、靈性的結核空間。在這裡，生者與死者再度見面說話，過往的經驗與痛苦可以釋懷和流動，為心靈療遇創造出種種豐富內涵。